

当代大学生关心的 25个理论问题

主编 张雄 王晖

DANGDAIDAXUESHENG
GUANXINDE
25GELILUNWENTI

中国青年出版社

当代大学生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

主 编：张 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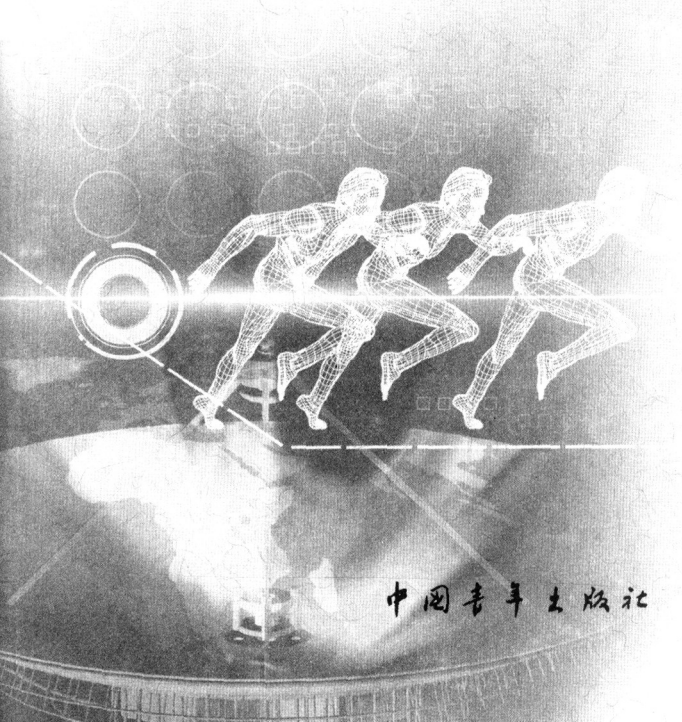
王 晖

副主编：徐国权

陈金华

汪传发

王克斌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大学生关心的 25 个理论问题/张雄, 王晖主编.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ISBN 7-5006-5763-3

I. 当... II. ①张... ②王... III. 大学生—学生
生活—青年读物 IV. G645.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9356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15594 邮购部电话: (010) 64049424

北京市梨园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 × 1230 1/32 10.25 印张 2 插页 230 千字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9.8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 84039659

前言

跨世纪的大学生是文化的新生代,他们思维活跃,信息敏感,观念开放,心态向上。他们往往以敏锐而独特的眼光,关注着世界,关注着社会,关注着自我。他们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对社会的热点和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及对校园文化和青年时尚等,大都有着深层次的思考,直至理论上的探究。这显示了青年大学生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目标的认真探求,蕴含了对世界风云和国计民生的分外关切,折射了文化新生代的睿智之光。这是十分可喜的。然而,由于多元非主流文化交互渗透,各种社会非理性因素的复合影响,以及不同角度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局限性,从而导致了大学生对他们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既有认同的主流,也还有各自的困惑。对此,有必要进行积极地、科学地探讨和沟通。

本书正是这种理念的产物,所有话题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酝酿。我们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领域,通过对大学校园部分学生的问卷调查,收集了300多个理论问题,又多次召开学生干部和团干部的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最后遴选出当代大学生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

参加本书撰稿的都是长期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教授、博士。我们谨希望以此书为载体,与大学生朋友一起,共同探讨和研究这25个理论问题,以求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一种理性的共识。这种共识,应使师生双方互有

启迪,同有受益。应当承认,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有些还很难全有定论,但是,我们应当倡导这种思考的精神和追问的勇气。

目录

CONTENTS

➡ 1.	大学生如何对待忧患意识?	001
➡ 2.	大学生如何走出异常人格的阴影?	014
➡ 3.	怎样对爱情进行一种新的解读?	025
➡ 4.	试婚是婚姻的另一形式吗?	038
➡ 5.	性行为纯属个人私事吗?	057
➡ 6.	从绝对美到相对美是当代审美坐标的转换标志吗?	068
➡ 7.	没有声音的音乐究竟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078

⇒ 8.	网络文化是现代青年话语方式的新时尚吗?	089
⇒ 9.	“黑客”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吗?	101
⇒ 10.	为什么今天有些科学家相信宗教,而宗教似乎在某些方面又能容纳科学?	112
⇒ 11.	科学研究绝对自由,科学实验没有禁区吗?	125
⇒ 12.	未来科技发展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后果?	136
⇒ 13.	“非典”爆发给我国国民生活带来了哪些启示?	146
⇒ 14.	寻找新的家园,人类的未来命运究竟会走向何方?	158
⇒ 15.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究竟新在何处?	170
⇒ 16.	雷锋精神在当代世界究竟还有没有价值?	185

⇒	17.	
	在当代,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更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吗?	196
⇒	18.	
	今天的人类是否进入了无意识世界?	211
⇒	19.	
	现代生态伦理为什么又回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命题中?	227
⇒	20.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关系?	237
⇒	21.	
	怎样看待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概念会消失吗?	251
⇒	22.	
	怎样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相对繁荣和发展?	261
⇒	23.	
	“讨价还价”是当代国际政治的流行色吗?	273
⇒	24.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给了我们哪些启示?	288
⇒	25.	
	美伊战争向传统的战争样式究竟提出了哪些挑战?	307

1.

大学生如何对待忧患意识？

在大学校园里，总有一些学生喜欢谈论音乐、小说、影视或艺术时尚等问题，但也有一些学生喜欢讨论文化反思、民族国家发展或人类未来命运等问题，其间不乏诸多忧患意识。持有忧患意识究竟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正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青年大学生应当怎样正确认识和理解忧患意识？应该怎样自觉为国家发展做什么？分忧什么？这是每位大学生都将面临的问题。大学生朋友们应该自觉地增强主人翁意识，做一个忧国忧民，敬业爱国，钻研业务，提高德、智、体综合水平的社会有用人才。

哲学大师黑格尔说过，“熟知未必真知”。关于忧患意识，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高级牢骚，是知识分子的“职业病”。知识分子由于看的书多，思考的时间多，对存在的问题方面总抱有分析与批判的态度。如果总是



与现实存在格格不入,它极易使人走向消极、悲观、厌世的境地。也有人认为,忧患意识是一种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显现。知识分子有较强的爱国情操,喜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诊断社会,针砭时弊,从人类的终极关怀层面上,批评现实,直面社会存在的问题。这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本性。笔者以为,忧患意识是一个亘古存在的历史性话题,它对上至一个国家和民族,下至一个企业和个人都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有了这种修身立德的浩然正气,我们将谦虚谨慎,自强不息;有了这种胸怀天下的博大情怀,我们将高瞻远瞩,前途光明。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持有正确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不是简单的高级牢骚,牢骚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它无助于事物的推进和发展,忧患意识是理性的沉思,它有着深刻的哲学内涵。我们应当对此有一个科学的理解和把握。

一、什么是忧患意识

远古时期,人类童年时代的困惑,以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表现出的忧患感,正是原始人思维的感觉表象的确认。没有人对自然的忧患,就没有原始宗教与神话的诞生。可以说,人类的文明起源于双重忧患:人对自然的忧患,导致早期自然哲学、自然科学萌芽的出现;人对社会存在的忧患,导致早期历史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萌芽的出现。由自然神向人神、由多神教向单一神教的转变,西方基督教原罪意识和东方道教的出世观念的出现,从文化形态上反映了封建自然经济状态下人对人自身存在的异化现象的反思,正是这种反思成熟了近代西方人文主义复兴的精神传统。因为对神的思考与对人的思考都是人类自身精神现象学的传承。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资产者们甩着马鞭子搞圈地运动,贪婪地推进资本的扩张行为,不少启蒙思想家、激进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对以“资本”为中轴的世界规则的忧患,他们在抨击



私有制的同时，也创造了工业时代乌托邦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甚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可以说，卢梭、马基雅维里、伏尔泰、孟德斯鸠、圣西门、欧文、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们的忧患意识为西方社会一代文明传统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忧患意识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精神杠杆。

提起“忧患意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此概念的中文表达，最初出自知名学者徐复观先生《中国人性论史》著作中，他把忧患意识界定为人类在新旧社会更替时期所具有的“一种坚强意志和奋发的精神”。他认为，华夏民族最初的忧患感发端于“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困难的处境”，实际上来自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社会现实。易经的出现与作者对此种现实的忧患感分不开。他在书中引述：“易之兴者，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也，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①徐先生对忧患意识的表述有两点值得肯定：其一，忧患意识是历史变革时代的精神现象；其二，忧患意识有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意志。可是，徐先生的观点具有浓厚的史学观色彩，缺少一点历史哲学的抽象反思。

什么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意识的一种特殊现象，有更深的哲学内涵。它与心理学的忧患情绪不同，忧患情绪是一种极其普通而又广泛的心理现象，它似乎更接近作为条件性情绪反应的“焦虑”范畴。心理学家斯托曼认为，^②人的焦虑、欢快、宽慰和愤怒四种情绪，来自四种类型的刺激：消

① 《孔孟月刊》[台湾]，1984年第23卷，第2期，第20、24页。

② 斯托曼《情绪心理学》，第24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极刺激、积极刺激、消极强化刺激、积极强化刺激。焦虑来自消极刺激,它是“带有不愉快情绪色调的正常的适应行为”,它包含着对危险、威胁和需要特别努力,但对此又无能为力的苦恼的强烈预期。在生理机制上表现为自主神经系统活动增加,肾上腺素输出量提高,血压和心率增强。因此,心理学上的焦虑与哲学上的忧患意识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具有较大的情景性、激动性和短暂性,是一种紊乱的心理状态;后者具有较高的抽象性、深沉性、持久性,是一种理性层面的意识流动。前者极易导致消极的心理结构,后者表现为向上的生命之流的冲动。从本质上说,忧患意识是人的理性思维为追求客体的内在必然性,对现实存在进行否定性思维的外部情感表现。我们也可把它称为危机意识或历史的诊断意识。与其他社会意识现象不同,忧患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表现为理性通过情感的“装扮”与存在相适应。以往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只是强调认识过程中感性向理性、理性向实践的转化。在实际过程中,人的理性认识对客体的作用只有首先外化为情感的判断,才能存在认识的价值判断。理性本身所具有的肯定性与否定性思维无所谓好与坏,它们只是现象世界的杂多在抽象思维过程中的分割和蒸腾,是客体制的规定性的两个重要的抽象环节。所以,从理性的二元抽象(肯定性和否定性思维)到情感的两种判断(祝福意识和忧患意识)表现了理性的外化和最初的确认。忧患意识正是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显示了它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里所言的情感判断区别于由感觉引起的情感判断,前者是理性的外化,后者是非理性的直观。我们也可以把前者称为理性的情感判断,后者是感觉的情感判断。

从哲学的层面上说,忧患意识表现了对现实存在进行主动变革的意识能动性。

其一，它表现为主体意识的“内醒”状态。即主体的精神达到自我反省、主动介入“病态社会”的意向。意识流动呈现十分活跃的态势。这种“内醒”可表述为四种公理：(1)精神可以靠想像力来创造出与人的本能冲动相背离的种种愿望，以此来反叛大自然的声音；(2)精神可以将对象世界脱离人的感官区域，并使它朝着内心化和持久化的方向发展，使它由单纯的感官对象变为人的认识对象；(3)精神可引导人类去深思熟虑地期待未来，从而结束过去那种动物式的单纯享受当下瞬间的生活状态；(4)精神带来了人类生存的目的意识，外部世界也就成了供人类任意支配以达到自己所爱的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实际上，意识的内醒意味着人的精神意向性活动的开始，它是理性活力的最初表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的大转变伴随着一大批具有“内醒”意识的思想家的出现，如马基雅维里、托马斯·莫尔、蒙田、乔丹诺·布鲁诺、伊拉斯莫斯等等。他们思想活跃，精神激昂，从不同的领域显示了主体精神的投入和活力。20世纪初，一位德国中学教师在一间十分简陋的房子里写出了一部洋洋百万字的巨著《西方的没落》，作者在书中向世人宣告：西方文明已处于无历史、无生气的僵死状态，并且将在公元2200年趋向瓦解。许多思想家认为，这部著作连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所阐发的思想，标志着西方世界那种充满着繁荣与和平、乐观与自信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至此进入了一个自我分裂、自我挫败、自我否定的忧患时代。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带来了西方文化形态的自我革命和发展的活力。哲学由理性主义传统走向了非理性主义思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代替了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复兴的历史哲学代替了实证主义历史学；荒诞、幽默与变异的文学创作范式代替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20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

罗马,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向世界揭示了人类无可避免的困境:人口爆炸、生态失衡、能源危机、核战阴影、社会邪恶和道德沦丧。这种自我忧患的潮流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然有增无减。号称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在1987年底出版了一本更为震惊世俗的著作《大国的兴衰》,作者从美国人自我忧患的角度尖锐而深刻地剖析了今日美国衰落的必然根源。这一切都说明了西方文明在变迁与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忧患意识的“自我内醒”形式。

其二,它内含着辩证的否定精神。在德国的启蒙时期,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古典哲学最能体现这一点。黑格尔把否定旧世界的合理性改装为思辨哲学的抽象形式,用否定的辩证法学说为德国现实历史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武器。在他看来,仅仅对现实存在进行肯定判断,这是认识的空虚和浅薄的表现。他说:“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肯定的东西上,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死抱住纯善——即在它根源上就是善的,那么,这是理智的空虚规定……”。^①他还说:“理念如果内中缺乏否定物的严肃、痛苦、容忍和劳作,它就沦为一种虔诚,甚至于沦为一种无味的举动。”“思想完全成为一种否定的思维,否定了那多方面有规定性的世界,而自由的自我意识的否定性在生活的这种多样性形态中成为真实的否定性。”^②思维的否定性意味着无限性,否定就是规定、界限的突破。所以,“从思维或无限性的原则看来,那些与它有差别的种种独立事物,都只是行将消逝的东西”。^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旧世界必然灭亡的抽象原则:任何存在物是有规定的,有界限的。规定、界限的否定,便是这些存在物的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45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第13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③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第13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消逝而转化为另一新的事物。

其三,它持有理性的怀疑眼光。日本著名哲学家三木清指出:“人的理性自由首先在怀疑中。”忧患意识内含着对客体当下的否定,实质上是主体探究客体更深本质的精神流动。精神作为惯性,意味着精神中流入了自然。作为破除精神惯性的怀疑已经显示出理性对自然的胜利。怀疑也是一种沉思,它可以使得主体在理性世界对客体进行再次分离、蒸腾和筛选时去发现新的事物的内在精神。它是一切发展的初始点,它能觉察出已经确立的存在的非本质性,从而把它加以扬弃。《怀疑论美学》作者赫伯特·曼纽什认为,怀疑态度,即一种在本能状态下做出某种决定的同时,对之加以仔细平衡和毫无偏见的检查的态度。这种在做出决定时不断问一个“为什么”的怀疑态度,通常被视为有学问者或者有文化者的典型表现特征。这种对怀疑态度的高度评价已延续了若干世纪。毫不奇怪,当怀疑论逐渐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时,表明人类思想业已趋向成熟。这种带有怀疑色彩的哲学主张是: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绝对真理和丝毫不容更改的确定性是不可企及的。^①在历史重大变革时期,理性怀疑的原则最能激发思想启蒙运动,新世界战胜旧世界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在历史主体的思想观念中打破原有的思维范式,怀疑精神乃是摧毁旧的思维范式的精神“工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哲学家库恩极为重视怀疑原则在科学理论革命中的作用。他在论述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第三个时期时指出,反常和危机时期主要通过怀疑精神来运作的。反常指经验事实与范式相矛盾,即人们无法用范式对现象做出解释。当人们开始怀疑既定范式时,科学共同体便发生分

① 赫伯特·曼纽什《怀疑论美学》,第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裂,于是,一部分人要求抛弃原有范式主张变革,另一部分人却坚持维护它。这就预示了科学理论巨大转折期的到来。

其四,忧患意识有着对传统的社会进行猛烈批判的精神,它既是理论的批判,又是实践的批判。中国近代历史大变革时期,曾涌现出一大批理论批判家,如顾炎武对封建君权制的批判;王夫之对历史倒退论的批判;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龚自珍对封建“衰世”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洪秀全对孔学及各种神庙的偶像的批判;章炳麟对封建神权的批判等等。哲学家康德曾以“批判哲学”为自称,强调理性批判的功能,特别是理性批判所射向现实的力量。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批判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避这个批判的。宗教企图躲在神灵的后面,法律企图躲在尊严的后面,而结果正引起人们对它们的怀疑,并失去人们对它们真诚尊敬的地位。”^①理性的批判有助于将认识的触角更接近世界的本质,只有这种批判,才易于见到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的否定、推移、转化的辩证运动,也只有这种批判,才能打消世界存在的固有惰性,使已经熄灭了的世界精神重新燃起新的火焰,也只有这种批判,才能使昏睡的人类站立起来,打破封闭社会的门窗,从而以新的姿态,接受新环境的挑战。

最后,忧患意识具有走向实践、走向变革、追求现实发展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批判一个旧世界,而且要建构一个新世界。他们对现实世界的忧患,包含着建构未来的成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每个范畴、每个原理的产生都凝聚着两位导师作为世界公民的忧患意识。他们所设计的历史变革模式,是历史上最具有创力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3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的发展模式。他们所倡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最富有实践建构特色的历史创造性活动。忧患意识之所以有着追求“发展和建构”的内在要求,原因在于对原有世界的否定与批判只是主体为了达到自身目的的一种手段。否定的目的在于完善、建构和创造,而不在于毁灭现实一切。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辩证的否定观本身内含着肯定,但更表现出创生的萌动,生成的欲望,使客体主体化的冲力。主体对客体的再塑造总是从打破客体内在的完满性开始的,没有这一点,就没有主体对客体的超越和改造。

总之,忧患意识乃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给与积极的精神诊断,并以危机感为基础,以加快历史进程为主题,对现实存在进行辩证的否定、批判、怀疑与建构的自觉意识。它表达了知识分子、政治家和一切爱国者对民族历史的进化与提升所给与的终极关怀,从而成为爱国主义的基本精神。

二、怎样正确对待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的主体主要是指具有阅历深广、知识水平较高和洞察能力较强的知识分子。这是因为,忧患意识的出现离不开主体自我意识的二元分裂(即肯定性思维和否定性思维),这种理性思维的二元化是深入客体更本质的认识的前提和条件,是认识较高层次的形式。因而,这种自我分裂的力量不可能来自外部世界的“机械力”,而来自主体自身较高的智力。只有博学多才、阅历深广、通古达今,方可在理性世界中创造出哀感顽艳的精神作品。可以说,忧患意识是流淌在知识分子血液中的一种活力,一种素质,一种生命之流的冲动。它是蕴育人类智慧之果的花蕊,是射向自然与社会的理性之光。历史上一批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在生成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中无不都是最初的忧患意识

者。所以,知识分子是忧患意识的真正附着体,只有知识分子,忧患意识才能得以绵延、确认和实现。而忧患意识是知识分子得以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自我优化、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杠杆。

实际生存世界中,我们应当怎样正确对待忧患意识呢?

第一,增强忧患意识就是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古人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能激励人不断进取,磨炼人的意志,从而使人的生存与发展不断更新;安乐容易使人沉湎于享受,丧失警惕和苦斗的意志,最终滑入失败乃至灭亡。这句至理名言是对沧桑人生富有哲理的深刻认识,是对历史上朝代兴盛衰败的经验总结。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亡国之君,都是与堕落丧志、居安忘危、贪淫奢靡有关。如,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后自号“始皇帝”,幻想帝业永传,但不出两代,他的儿子就居安忘危,沉湎安乐,昏庸透顶,使政权毁于一旦。而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能创出“贞观之治”的国泰民安的好形势,与他“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也须思其始终”的忧患意识不无关系。他的居安思危、严谨临政的精神,显示出难得的清醒和深邃,至今仍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和教育意义。

第二,注重忧患意识的反思性与现实变革性的统一。增强忧患意识,不是为了忧患而忧患,而是通过忧患引起思考和变革,这是对忧患的超越。从忧患中走出来,通过对实践的介入,最终使自己得以升华和实现,这才是忧患意识自我追求的目的。忧患意识决不是无病呻吟、杞人忧天、患得患失、苦恼厌烦,而是一种洞察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肩负历史重托的生存智慧和崇高精神。在今天的生存世界里,理想的实现和事业上的成功,往往与勇于忧患、善于忧患、敢

于变革联系在一起。就市场竞争而言,优胜劣汰是竞争的规则。企业在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同时更应当注重变革和创新。早在1984年,海尔集团的总裁张瑞敏当着全体员工的面,将带有轻微质量问题的电冰箱当众砸毁,使员工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与责任感,树立起了海尔的生存理念:“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给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由此通过一系列的管理上变革和创造出的一套独具特色的海尔企业文化,使海尔集团快速成为国内企业的佼佼者。

第三,注重忧患意识的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增强忧患意识,就是要始终把握发展这一主题,确保忧患意识在积极向上的方面发展,而不可走向消极、颓废、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道路。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忧患与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谈忧患也就是谈发展;谈发展也就是谈忧患。两者相互依存,又依一定的条件而转化。艰苦忧患可以使人自强不息,奋斗不已,最终能获得发展;安逸享受容易使人满足现状,颓废丧志,从而走向进步与发展的反面。我们提倡的忧患意识,不是像中国历史上的屈原,尽管忧患得很深,但由于不能正确对待忧患,最终却以消极、厌世、悲观自杀的结局而告终。应当明白地指出,一切忧患都是为了现实的完美和发展,是为了追求进步。坚持在发展中思危,在思危中实现发展,通过不断地发展来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提高发展的平台和水平,实现快速全面发展的目的,这才是忧患意识的正确归宿。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现实的忧患包含着强烈的实践建构性原则。在他看来,对建国以来我国建设的曲折和失误做深刻的反思,反思是为了扬弃和前进,为了发展与创新。如,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否定和批判,他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理论;对思



想僵化的“两个凡是”教条的批判,他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原理;对社会主义尚存在着封建残余和官僚主义的批判,他提出了要建立科学、民主精神,实行体制改革的思想;对社会主义还存在着某些贫穷落后现实的批判,他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第四,把忧患意识紧紧扎根于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我们把世界历史进程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为了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把握自己特殊的历史国情,选择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把握国情谈忧患,要做到从世界进程看中国,找出中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同时还要从中国国情看世界,找出中华民族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现实差距。此外,我们一方面要从中国历史看中国,从民族自身历史发展的比较中,找出哪些优良传统在当今被丢弃,糟粕传统在滋生着不良之患;另一方面还要从中国未来看中国,从未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来诊断现实社会进程中所存在的各种社会弊病。

第五,注重忧患意识与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的统一。忧患可以兴邦,主要是它以急迫的危机感,催人奋进。但是如果我们脱离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就等于失去了忧患意识爱国兴邦的本质。失去自豪感、自信心的忧患,只能导向消极和沉沦。反省失误和不足,同时也要肯定正确和扬其所长,这正是理性思维所应有的辩证态度。邓小平说过,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他经常告诫世人,毕竟我们还落后,但是,我们确实很有希望。悲观是没有根据的,扎扎实实抓好它几年,中华民族空前繁荣的新局面,一定会到



来。我们以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只能使忧患意识带来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唤醒大众的忧患,决不是使国人在危机和困难面前走向消极悲观、民心涣散,甚至想到解散民族,消灭自我,而是通过现实的压力,使人们感到发展的危机和改革的必要,从而激发每个人的主人翁意识、历史使命感和爱国心,并勇敢地接受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挑战,通力合作,振奋精神,鼓起斗志,把目光、思想和智慧凝聚到一起,使民族历史得到升华和创新。

(作者:张雄,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

大学生如何走出异常人格的阴影？

大 学校园既是当代大学生学习知识的殿堂，又是他们心理成长的摇篮。大学生群体中，有些学生嚼着口香糖、打着彩屏手机、参加蹦迪舞会，表面上看，他们是快乐的一代。但是，内心深处却是痛苦不堪。大学校园里不仅有快乐的一族，而且也有抑郁的一族。他们面对紧张的学习竞争，成绩下降带来的心理挫伤，择业竞争引起的心理焦虑，追求爱情过于完美，不懂矛盾的哲理，经不起打击，容易走向人格自我，甚至个别学生在异常人格的作用下，从高楼跳下来，这类自杀现象在大学校园里，时有发生。如何塑造当代大学生的健康人格，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健康人格与异常人格

英文中的“人格”一词，来自于拉丁文的“面具”一词，它原是指古希腊时期的演员为扮演角色而戴上的面具。随着西方古代语言学的发展，“人格”这个具体的专指面具的词

被加以扩展和引申，以至于渐渐演变成一个抽象而又多义的名词。这个词在当时至少包含以下几种含义：(1)个人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2)他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3)使一个人适合于其工作的个人品质的总和；(4)他的声望和名誉。把面具转义为人格等于把人格视为人的社会自我，由于种种原因，人在社会行为之外还掩饰着某些个体特点。“健康人格”是人格研究中逐渐产生并形成的一个新概念，它包括：公认有健康人格者能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生活，具有自我同一性，能正视现实，具备情绪调节能力，有责任感，有目的性，有创新和开拓精神。

而心理健康，指一种生活适应良好的状态。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多能符合下列若干条件：其一，情绪较稳定，无长期焦虑，少心理冲突。其二，乐于工作，能在工作中表现出自己的能力。其三，能与他人建立和谐的关系，而且乐于和他人交往。其四，对于自己有适当的了解，并且有自我悦纳的态度。其五，对于生活的环境有适当的认识，能切实有效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逃避。通常而言，心理健康的人，应该是具有健康人格的人。

人格具体分为健康人格与异常人格两个方面。首先，健康人格，即全面发展的人。具体说来它具有这样一些共同之处：其一，具备健康人格的人是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生活的；其二，具备健康人格的人具有自知之明并能接纳自己；其三，具备健康人格的人正视并生活于现实；其四，具备健康人格的人是有目的性的；其五，具备健康人格的人是富有创新和开拓精神的。其次，异常人格主要包括强迫性人格、偏执性人格、分裂人格、反社会人格和臆病人格等。

强迫性人格的特点是，在待人接物，以及对自己时，总有一种求全和固执的表现，而且，这种表现涉及面广、相对

稳定。在生活中,这种人处处以“正人君子”自居,不苟言笑。他们总是把标准定得太高,因此,常常因为自己有一点错误而陷入痛苦。工作上,他们由于相信某一既成模式,因而不能容忍任何变化。他们行为刻板,缺乏想像力。在决断事情时往往需要思虑再三,有时则因此而误事。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上,这些特点也较为显著,他们表达情感的能力较差,对一些小节却投入太多的精力。有些人还有洁癖,容不得一丝纤尘。有的则如“葛朗台”一样吝啬,明知无用的东西也不愿扔掉。

偏执型人格又称妄想型人格。其行为特点常常表现为:极度的感觉过敏,对侮辱和伤害耿耿于怀;思想行为固执死板,敏感多疑、心胸狭隘、嫉妒忌,对别人获得成就或荣誉感感到紧张不安;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惯于把失败和责任归咎于他人,在工作和学习上往往言过其实;同时又很自卑,总是过多过高地要求别人,但从来不信任别人,认为别人存心不良;不能正确、客观地分析形势,有问题往往从个人感情出发,主观片面性大;如果建立家庭,常怀疑自己的配偶不忠等等,这种人格的人在家不能和睦,在外不能与朋友、同事相处融洽。

分裂型人格主要表现出缺乏温情,难以与别人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因此他们的人际关系一般很差。他们不能享受人间的情感乐趣,也缺乏表达人类细腻情感的能力,因此大多数分裂型人格患者独身,即使结婚也多以离婚告终。一般这类人对别人的意见漠不关心,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其中有些人,可以有一些业余爱好,但多是阅读、欣赏音乐、思考这类安静、被动的活动,部分人还可能一生沉醉于某种专业,做出较高的成就。但从总体来说,这类人生活平淡,刻板,缺乏创造性和独立性。他们的内心世界极为广阔,常常

想入非非,但常缺乏相应的情感内容,缺乏进取心。他们以冷漠无情来应付环境,逃避现实,但他们的与世无争的外表并不能压抑其内心的焦虑和痛苦。

反社会型人格也称精神病态或社会病态、悖德性人格等。在人格障碍的各种类型中,反社会性人格是心理学家所最为重视的。他们的共同心理特征是:情绪的爆发性,行为的冲动性,对社会和他人冷酷、仇视、缺乏好感和同情心,缺乏责任感,缺乏愧疚悔改之心,不顾社会道德法律准则和一般公认的行为规则,经常发生反社会行为,不能从挫折与惩罚中吸取教训,缺乏焦虑感和罪恶感。

癡病型人格又称表演型人格或歇斯底里人格,其典型特征为心理发育的不成熟性,特别是情感过程的不成熟。其表现为:引人注意,情绪带有戏剧性色彩;高度的暗示性和幻想性;情感易变化,视玩弄别人为达到自我目的的手段;高度的自我中心。此外,此类患者还有性心理发育不成熟,表现为性冷淡或性敏感,女性患者往往天真地表现性感,用过分娇羞样诱惑他人。具有这种人格的人的最大特点是做作、情绪表露过分,总希望引起他人的注意,这类人的人格障碍多见于女性,尤其以25岁的女性为常见。

当代大学生处于人格发展的特殊时期。西方心理学家称其为“疾风怒涛期”、“忍辱负重期”、“人格成长期”。这一时期他们人格的发展从未定型到基本定型,从不成熟到基本成熟。过渡期的人格面临各种的干扰,出现各种趋向,产生各种结果,他们心理人格的成长固有一定的内在规律,这都是在各种因素的交叉影响下逐步形成的。

二、当前影响大学生人格塑造的多元因素

文化变迁因素对大学生人格塑造具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的文化形态形成一定的人格,并为大学生提供相应的思

维方式、观念形式和行为模式。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后,传统人格赖以生存的同一性文化已让位于现代多元的异质性文化,现代文化激烈地冲击着传统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在现代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开始衰落,但并没有导致现代人格的完善确立。这便使处于传统与现代双重文化网络中的大学生置身于无所适从之中。他们在人格选择上表现出摇摆性和不稳定性,特别是在“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之间。这种冲突反映到大学生的人格上,往往表现为价值取向在理想与现实、社会关怀与个体关注之间波动。

社会变革对大学生人格塑造具有一定的影响。倘若说文化变迁是对大学生内在人格产生影响,那么,社会变革则是使大学生形成人格的外在环境发生改变。社会变革包括社会体制的转变,以及由这些转变所带来的资源重组、利益再分配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等。大学生对市场经济持有很高的认同感,他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了自由选择的重要机会;现代社会的高消费趋势,也使得“待遇好、收入高、有依靠”成为部分大学生追求的价值目标,对经济收入的关注代替了原先对社会地位和职业名声的关注。大学生的人格定位发生了重大变化。

性心理的正确辨认对大学生人格塑造具有一定的影响。当代大学生正处于性心理逐渐趋向成熟的时期。性生理需求与性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传统的性观念影响与西方性观念影响之间的碰撞,构成了大学生性心理与性道德发展的重要背景因素。性道德作为调整两性关系的行为规范,既表现为性心理意识和性道德理论,又表现为性行为的原则和规范。大学生在性心理发育成熟过程中,他们的人格面临着自我性角色的爱憎与困扰,经历着两性交往的渴求与苦闷,沉浸在性冲动与性幻想的羞愧与自责之

中,他们产生性刺激、性梦的兴奋与忧虑。性心理的正确辨认是否得当,对大学生的人格是否异常,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家庭的熏陶对大学生人格塑造具有一定的影响。人格心理学家认为,家庭对人的塑造力是今天我们对人格发展看法的基石。心理学研究表明,家庭和父母对孩子的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人格的发展的确受到童年经验的影响,不幸的童年会引发儿童不良人格的形成。家庭确实是“人类人格的加工厂”。它塑造了大学生不同的人格特征,综合家庭因素对人格的影响,可以得出这样三个结论:首先,家庭是社会文化的媒介,它对人格具有强大的塑造力;其次,父母教养方法的恰当性,会直接决定孩子人格特征的形成;最后,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自己的人格,并有意无意地影响了孩子的人格,形成家庭对人格的“社会遗传性”。由于家庭和父母的不良影响,客观上导致了个别大学生异常人格的形成。

学校教育滞后对大学生人格塑造具有一定的影响。学校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学生施加影响的教育场所。教师对学生人格的发展具有指导定向的作用。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产生着巨大影响。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为学生设定一个“气氛区”,在教师的不同气氛区中,学生表现出不同的行为表现。心理学家在一项教育研究中发现:在性情冷酷、刻板、专横的老师所管辖的班集体中,学生的欺骗行为增多;在友好、民主的教师气氛区中,学生欺骗减少。同时,学校也是同龄群体会聚的场所,群体对大学生人格具有巨大的影响。因此,如果学校教育滞后,将很容易导致大学生异常人格的产生。

心理承受能力差对大学生人格塑造具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大学生在现代家庭中都是独生子女,都是“小王子、小公主、小太阳、小月亮”,从小得到父母的宠爱,他们长期是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在父母的襁褓中,在顺境中学习和生活,心理的承受能力较弱,往往经不起现代竞争中的心理挫折和心理压力。一旦他们遇到学习和生活中意外的打击,就容易产生情绪波动,有的大发脾气,不可收拾;有的情绪低迷,一筹莫展;有的伤心流泪,痛苦不堪。心理的承受能力的或缺,往往使异常人格油然而生。

人际交往障碍对大学生人格塑造具有一定的影响。大学生的独生子女的自我盲目优越感,容易使他们产生我行我素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待人处事往往以我为中心。进入大学,在相对独立的学习范围中,部分学生产生了人际交往的障碍,有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在班级中,似乎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坚持“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整天就是“一只书包两只碗,教室、宿舍、图书馆”,单线循环,保持着“洁身自好”。有的大学生不愿意与别人交往,有的不善于与别人交往。性格过于内向,对同学之间的人际交往不感兴趣,甚至产生恐惧心理,于是异常人格便应运而生。

道德标准的模糊对大学生人格塑造具有一定的影响。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人们的逐利意识得到苏醒。市场经济中社会群体利益分配的差异以及群体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大学生价值观念上的矛盾明显增加。首先是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反差:大学生既崇尚高尚的道德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又注重讲求实际和切身的物质利益。其次是校园内与校园外的反差:校园内是“知识万岁”,校园外是“金钱万能”;校园内是提倡高水准的道德规范,校园外是低水准的道德行为蔓延;校园内的长期教育往往被校园外的短期误导所抵消。再次是理想教育与社会现实的反差:理想教

育是“到西部去、到老区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社会现实则是“到外资单位去、到合资单位去、到挣钱最多的地方去”。道德标准的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人格倾向的波动性，从而对异常人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如何构建大学生健康人格的模式

培养愉快心境是构建大学生健康人格模式的前提。当代大学生在创造性的学习中，良好的心境至关重要。有的大学生由于冲突、挫折、疲劳、紧张、烦恼、厌倦、憎恨、怨怒、苦闷、委屈……常使他们心境不佳，应积极引导大学生把自己置身于愉悦、舒适、恬静、宽松、自如、充实的心境中，不断地测试和把握培养心理调适的能力，消除焦虑心态，保持良好心境。首先，是采取心境娱乐法；其次，是采取心境体育调适法；再次，是采取心境休息法。使大脑处于暂时放松、静息状态，使为烦事所乱的心境得以调整，逐渐转入良好状态，从而为化解人格障碍，确立健康人格，具备重要的基本前提。

培养乐观情绪是构建大学生健康人格模式的动力。当代大学生的情绪，是其人格是否健康的显示器、晴雨表。情绪的乐观和悲伤，积极与消极，对大学生是否产生人格障碍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大学生应经常自查，把握自己的情绪，摒弃抑郁。应积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性格特征，逐步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培养和造就个体良好的性格，克服和改正自己孤傲、乖僻、急躁、暴怒、阴冷等不良性格。进而把握自己的性格，控制自己的情绪，始终保持乐观、积极和向上的情绪，向健康人格迈进。

提高心理素质是构建大学生健康人格模式的有效措施。“健康的一半是心理健康。”具有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是防止大学生人格障碍产生的重要举措。首先，可以用目标调整法与需要补偿法减轻挫折。其次，可以用权

衡分析法和时间推移法来解决心理冲突。再次,可以用辩证分析法与合理化法降低心理压力。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机遇与风险并存,大学生在建构理想人格中,遭受挫折在所难免。应该消除异常人格的产生,以良好的心理状态,建构自我的理想人格。

培养理想人格是构建大学生健康人格模式的核心。21世纪,全球竞争为当代大学生走向世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大学生从个体方面来说应该确立好目标,具备全面的知识结构,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独立性、主动性和积极性的理想人格。

首先,建构民族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结合的自由理想人格。

大学生是知识的创造主体,也是知识运载的载体。他们应立志做一个自由的人,把这一宏伟志向和抱负,同对国家、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结合起来。中华民族有着光荣的优秀传统,放在新的历史天平来衡量,仍不失其光芒四射的形象。有识之士将是否为国家与民族建功立业,是否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抱有强烈的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作为一种理想人格。这种人格对大学生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大学生需突破自我,发扬独创性的个性品质,提高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强化风险意识,执著进取,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直至成功,以科学的精神来建构理想人格。

其次,立下志向,树立远大抱负,为实现理想人格而努力。

意志作为大学生追求理想的一种心理机制,是自觉地确立目标并据此指导个体行为实现理想的重要手段。纵观历史,任何一个伟人的建功立业,无一不是具有良好的意志

品质。几乎所有有成就的科学家都具有一种百折不回的精神,因为大凡有价值的成就,在面临反复挫折的时候,都需要毅力和勇气。意志坚强的人,可以克服对自己种种不利的条件,使自我价值得以实现。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身体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写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不朽名著;美国的海伦·凯勒在完全失去听觉和视觉的情况下,以顽强的毅力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著名学者和作家;中国的张海迪用毅力的大锤撬开了人生智慧的大门。这些大学生的楷模在他们人生道路上显示了自己的人格力量。

一定时代的理想人格,是一定历史形态下社会关系、经济条件、民族历史、文化心态的复合产物,同时又是该时代的人们自觉发挥主体能动性、不断执著追求的结果。大学生的理想人格,应在21世纪的时代旗帜上清晰地写下自己鲜明的特征:其一,具有远大理想。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拥护四项基本原则,为实现共同理想,振兴中华而奋斗。他们讲自立,讲创造,胸怀远大,脚踏实地,尊重规律,埋头苦干,是大有希望的人。其二,具有高尚的品德。他们有强烈的义务感和道德心,热爱祖国,关心集体,忠诚,正直,关心同志。具有崇高的美德,是一个行为高尚的人。其三,具有法纪观念。他们尊重法律,依法行事。以科学眼光看待和自觉遵守纪律,法纪观念很强。其四,具有自强精神。他们主张“自尊、自立、自律、自强”。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对社会进步和集体发展有较强的责任感。其五,具有竞争意识。他们敢冒风险并努力争取竞争的胜利,反对竞争中的投机取巧和违法乱纪。其六、具有民主意识。他们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殊意识,主张人人平等,心胸豁达开朗,懂得民主与法制的制约关系,善于以民主程序做出各种决策。其七,具有创新意识。他们的精神适应性强,有求新创新的心理倾向。不相

信传统和权威,总试图突破已有的成就,去创造新的理论和工作方法。其八,具有扎实的学风。他们学习勤奋、扎实、刻苦,有合理的知识结构、科学的思维方式,具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和从事创造的能力。其九,具有个人效能感。他们有强烈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能应付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其十,具有健康的体魄。他们情趣高雅,身体健康,具有保障事业成功的精力和体力人格。

(作者:王克斌,东华大学学生处处长;陶国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政治系副主任,副教授)

3.

怎样对爱情进行一种新的解读？

“问 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爱情，既是文学艺术永恒的表现主题之一，也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历史的长河翻涌着无数爱的浪花，生命的变奏曲回响着激情的旋律。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校园爱情是他们大学生活中重要的一幕，谈恋爱的经历是他们人生体验不可缺少的一项。大学生活因此而变得难忘，大学校园因此而显得多姿多彩。

然而，爱情这一词汇的内涵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注入了新的内涵，对于风华正茂、刚入大学的少男少女而言，他们来不及理清情感的思路，便已带着高考过后的绝对放松坠入了爱河，去碰撞情感的苦辣酸甜、悲欢离合了。4年的寻寻觅觅，有人终无所获；有人与爱情失之交臂；也有人如愿以偿，从此比翼齐飞；还有些人几经沧海，梦断校园，变得玩世不恭，游戏人生。可见大学如同舞台，各色人物在上演着

光怪陆离的故事。

因此,解读当代大学生的恋爱心态,做出正确引导,使他们充分享受情感的幸福,减少情感的挫折,从而锻炼坚强的心理承受力,强化责任感,是教育工作者应当思考的课题,本文试对此做出探讨。

一、当代学子恋爱趋势的走向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二十几年的时间悄然逝去,生活从物质存在到精神存在有了本质的变化,改革开放使我们从封闭中走出,迅速地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对话,与时代同步,迈进了现代化的今天。伴随思想观念的更新,学子们的爱情世界也走过了从禁止到默许,从关注到指导的心路历程。这一变化意味着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本身都进行了一番精神世界的革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关雎》)爱情从来就没有被遗忘过,只是滋养爱情的环境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教育部门对大学生恋爱问题的管理,经历了由明文禁止,到“不提倡,不反对”(所谓“二不政策”)的转折,这是认识大学生恋爱现象演变的重要背景。上世纪80年代初,高校学生守则规定不许谈恋爱。虽然,在大学校园里不乏出双入对者,演绎着爱情悲喜剧,实际上,他们被学校管理者侧目而视,承受着一定的压力。当时,针对大学生谈恋爱问题,媒体还组织了“大学生应不应该恋爱”、“应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等讨论,在今天看起来,这类举动朴素得近乎于幼稚。刘心武的《班主任》、张抗抗的《夏》等小说描绘了80年代初期大学生对待爱情的态度。某师范大学一位系领导曾在公开场合说:“我经常晚上到运动场去看看那些谈恋爱的同学,查查他们是哪个系哪个班的。”足见当时校园中对公然恋爱还是有成见的。

80年代中后期,禁止空气有所缓和,校方管理者对校园爱情持“不提倡,不反对”的默许态度。受此风影响,大学生中的恋爱行为出现了有趣的分化:一部分学生干部、入党积极分子或者说在政治表现上、学生工作上、各类先进表彰上欲有所作为的同学相当谨慎,不敢轻涉爱河,即使有,也处于极其隐蔽的地下状态。某高校曾有这样几则爱情例子:该校中文系八六级在大四时保送一女生直升研究生(八六级大四时正好是1990年,除保送形式外,全国高校研究生在那年没有举行研究生考试),除了成绩4年累计名列前茅,这位女生还有一项过硬的条件:大学期间从未谈过恋爱。学姐树立的榜样令学弟学妹们心情各异。该校中文系八七级一团支部书记向以稳重、干练、工作能力强著称,为系里所倚重,全年级同学对其充满敬畏之心。临近毕业之时,偶遇她与一男生同撑一把雨伞走向校外。很多人以为她又是在和同学谈心、谈工作,后来得知这位男生是其男友时,众声哗然,眼镜大跌:“她也谈恋爱了?”该校中文系学生会主席虽心怡一学妹,但却从未公开承认,以免受人以柄。二人采取了一种默契,即频繁“巧遇”在阅览室读书,然后共同送一年迈老师回家,既加强了二人的交流,又昭示他人:我们只是好朋友而已。其实,旁观者早已心知肚明,当事人陡增安慰而已。该校中文系一女生才貌双全,暗恋者无数。但此女为了毕业之际能够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留在省城,从不愿给领导老师以不良印象,冷淡的眼神令爱神缩回了脚步,虽然被同学们嘲做“塑料玫瑰”,淑女形象却赢得了系里领导、老师的一致好评,分配时心愿得遂。与上述学生相比,另一部分同学则自由自在地花前月下,他们往往自诩“澹泊明志,不求闻达”,有没有奖学金,评不评优秀,当不当先进,统统与我无关,就算有读研之想,也不寄希望于保送,而是拼考试成绩,

至于毕业后的分配工作问题,顺其自然。心理负担没有了,剩下来的精力和空间就奉献给爱情了。校园里相依相行,携手进出,你为我买饭,我为你打水的甜蜜情侣多属于这类同学。不管毕业以后有无结果,至少这4年中是实实在在、潇潇洒洒地爱了一回,甚至几回,着实令人羡慕。

到了90年代,校园恋爱的空气变得开放自由。这一变化与毕业分配由国家统分转为“双向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找工作这样的命运抉择权从校、系、辅导员手中交还到学生手里,再也不用担心所谓的“进步”、“形象”、“优分”之类的外界因素,这大大减轻了学生的心理压力。很多同学坦率地说,只要我自己努力,即使谈了恋爱也不用担心“老师印象”了。恋爱已为高校所默许,为社会所接受,为亲朋好友所鼓励。社会对大学生关注的目光已集中到诸如多角恋爱、婚前性行为 and 伦理道德等更深层次问题的公开讨论了。

从90年代末至今,恋爱已是大学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随时可见情侣们的身影,卿卿我我、恩恩爱爱的镜头也不再令旁观者惊奇或者脸红了。新生入校意味着象牙塔的舞台上又一批主角即将闪亮登场……“没有谈过恋爱,没有过补考,不算读过大学”。更有甚者,“老公老婆”这种已婚夫妇专用语出现在高校恋人之间,最初,这些称呼只在呼机、邮箱、书信里“犹抱琵琶半遮面”,如今则挂在同学嘴边,甚至在公共场合此起彼伏,常闻某高校男生宿舍楼梯间空中断喝:“某某,你老婆电话!”迎面走过一对女生,耳边飘来一句“你老公真有出息”。“和老婆最近关系咋样了”已是老友见面的问候语。恋爱关系的公众化反映了部分学子自我感觉良好的优越心理。据武大行政学院一位教师说,部分学生以夫妻样出入课堂,而且公然在课堂模仿F4里的一些亲昵动作,彼此以“老公老婆”相称,鄙视者少,羡慕者多。北京某

大学甚至在校园里专设安全套发放机。就学校管理者、教师的态度而言,针对学生恋爱的这些外在行为,也早已由看不惯转为关心、指点了。

总之,回顾二十几年来大学生恋爱的历程,我们发现,学生恋爱行为伴随着思想领域的解禁而更加公开化、升温化、普遍化,这一点是教育工作者必须正视的现实。值得高兴的是,教育工作者、家长们乃至社会舆论对待这一现象的心态也有了积极的变化,由简单、硬性的禁止转向柔性的关注、引导,肯定少男少女们情窦初开、向往情感的正常要求,倾听他们的情感心声,指点他们遭遇的困惑,帮助他们走出感情的误区,最终成熟起来。

二、当代大学生的恋爱特征

当代大学生多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生,改革开放20年为这一代人的成长创造了全新的环境。与一般人相比,大学生们的观念尤其前卫。他们蔑视传统,个性独立,思考敏锐,有可贵的勇气,有自己的主见。这些性格特征不仅影响着他们的求知过程,也在他们的情感经历中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使校园恋情形成了自身的特征。

大学校园恋爱现象十分“踊跃”,此其一也。这种踊跃具体表现为恋爱的普及化和低龄化倾向。调查统计表明,当今高校平均约有30%以上的学生在谈恋爱。较低的占10%,较高的可达70%,有的班级甚至可达100%。恋爱者的年龄偏低,很多人步入大学二三个月便开始了,学生中流传着“大一傲,大二靠,大三拉警报,大四没人要”的说法。高考过后的放松渴望、身体发育的成熟,以及压抑和潜藏了许久的对异性的爱的渴望是恋爱低龄化的动力。

爱情的表现形式趋于公开化,此其二也。随着时代发展,当今大学生恋爱观念日益开放,传统道德逐渐淡化。在

回答“你认为‘爱人只能一个，情人可以多个’这句话”时，认为“有一定道理”者，男生占28.57%，女生占18.37%；认为正确者，男生为12.24%，女生为4.54%。在回答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时，34%的学生不反对，17%的学生赞成，9%的同学认为无所谓，只要顺其自然。漫步校园中，从花园、湖畔、路旁、树下，到食堂、操场、图书馆、宿舍楼，随时可见相依相伴的男生女生旁若无人地上演着电影里屡见不鲜的爱情镜头。有的学生在被问及这样做是否不好意思时，对方常常会觉得发问者“怪异”、“老土”。还有的学生干脆扔过来一句掷地有声的名人名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伤逝》女主人公子君语）

缺乏对恋爱动机、前景的完整思考，此其三也。为什么要谈恋爱？现在谈是否合适？学生们常常来不及思考，先谈起来再说，“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相比之下，学子们更注意恋爱过程，轻视恋爱结果，很少考虑实质性问题，炮制恋爱快餐。有一首流行歌曲恰切地表现了这种心态：“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要你的追忆有个我。”甚至有些学生把恋爱当做一种排遣寂寞的方法。几年前，北京的大学里流传着一首校园歌曲《今天又是星期天》，其中唱到：“今天又是星期天又是星期天，冷冷清清是校园是校园。北京同学回家去团聚，留下外地学生孤单单。没有约会也没有恋爱可谈，泡包方便面就当晚餐。书记校长来视察，教育我们要树立……人生观……”唱的就是这种孤单寂寞、百无聊赖的感觉。也有学生谈恋爱出于盲从心理。某高校一女寝8个人中有3人在大一即涉足爱情，到了大三，全宿舍只有一位女生“待字闺中”。晚上、周末，男生们登门探望

各自的女友，或几对恋人相约出游，这位女生便显得形单影只，她天天上晚自习，别人赞她勤奋，她却苦笑着说：“我给她们让地方呢。”我们承认，在恋爱之风狂吹的校园中，当然仍有同学能够保持清醒，不轻涉爱河，甚至有人自诩“横眉冷对秋波，俯首甘为光棍”。但同时也要看到，盲从心理在大学生中还是相当普遍存在的。向这样的人询问毕业打算时，答曰：“到时候再说吧！”“想那么多干吗？”事实上，此类行为是只强调爱的权利，而否认了爱的责任。

恋爱结局不尽如人意，此其四也。恋爱的学生“重色轻友”，对班级、系里的集体活动采取淡出方式，一心经营二人天地。但“有情人”虽多，“终成眷属”者却是少数。通常最先谈恋爱的一批大学生们的恋人都是中学同学，昔日朦胧的种子在大学发芽，到了大三、大四，随着眼界的开阔，身心的成熟，谈恋爱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往往和原先的恋人分手，又开始新的寻觅。即使相处到毕业前夕，常常因理想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落得个“桥归桥，路归路”、劳燕分飞的无言结局。很多学生直到研究生阶段，或工作以后，对象才会稳定下来，才考虑到结婚成家的问题。对此，学生们认为有几次情感体验，使他们更理解人生，这是除学业以外的最大收获。至于结果，随缘自适好了。正像一首诗写的那样：“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徐志摩）

大学生恋爱的上述特征较多地体现出不成熟的、任意性的一面，这与80年代后出生的独生子女成长环境有关。因此，就教育工作者而言，只有了解、把握这些特征，才能找到恰切的引导方法与途径，帮助大学生迅速成长起来，变得理智，学会思考，懂得自制，从而减少情感挫折。

三、大学恋爱的利与弊

80年代中期,一篇《柳眉儿落了》在社会上激发了有关“早恋”的讨论,一提及这个词,家长老师均如遭遇洪水猛兽一样紧张,毫不犹豫地坚决予以扼止。面对大学生恋爱的低龄趋势,很多人将他们也归入“早恋”的范畴。实际上无论中学生,还是低年级的大学生,涉足恋爱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转向教育工作者一面,如何对待这个现象?显然,简单粗暴的压制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开导、分析、耐心沟通,陈清过早介入恋爱的“利”与“弊”,使其在冷静中做出选择才是明智之举。

校园之恋的弊端首先表现在对学业的影响上。不能否认的是,许多原本优秀的学生因为谈恋爱而放松甚至是放弃了学业,注意力完全转移,情绪为恋爱的晴雨表所左右,结果虚度了4年时光,有的甚至连一段成熟的感情都没有获得。这样的例子在大学校园里屡见不鲜。某高校中文系一女生入学以来成绩骄人,气质姣好,能力出众,深得全系师生的欣赏,大四考研时结识一男友,“从此君王不早朝”,最后以3分之差与研究生失之交臂,同学先是惊诧其出局,后是可惜其才华。毕业后,工作动荡了一阵,原本情深义笃的男友在成为丈夫后,在生活的考验面前显得平庸无为,昔日的爱情早已磨得伤痕斑斑。好友相聚之时,这位女生心生悔意,欲重拾书本,只可惜幼时待哺,年华不再了。笔者曾有两位同窗,均考入名牌大学,却双双在大一堕入爱河,甚至禁果偷尝,被校方开除,一人重读再战,次年升入另一所大学,而另外一人从此告别大学校园。走过青涩的20岁,回首往事,怎能不为此痛心?

其次,校园之恋即使成功也未必带来如意婚姻。有人提出大学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各种社团活动很多,便于各系学

生扩大交往,加深了解,是广泛选择未来伴侣的最佳时期。出了校门,生活圈子就集中在单位一个地方,认识的人有限,选择余地很小,未免耽误了终身大事。有些人甚至固执地认为,大学毕业还没有男朋友的女孩,都是别人挑剩下的。鉴于此,某大学哲学系的系副主任说,我们不禁止大学生谈恋爱,怕他们毕业后就找不着对象了。然而,现实告诉我们,大学中的恋爱选择不一定造就稳定、幸福的婚姻。其原因在于大学时爱情是象牙塔中产生的,生活的考验尚未摆在眼前,校园中的志趣相投并不代表日后的生活观念、奋斗目标的一致。校园中关于音乐、文学、追星、娱乐、时尚等等的共同语言也不是工作、生活中的主要话题,这种差异常常导致大学伴侣即使结婚也会分道扬镳。“你变了”之类的语言成为学子们简单的反思理由。事实上,正如歌中所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改变快。”某高校女大学生A大三时与本系一个男生确立了恋爱关系,毕业后组建了家庭。A不愿让自己的生活过早地步入生孩子、早九晚五的平淡状态,于是婚后继续求学,先后考取了硕士博士,生活对她展开了另一片新天地,可是男的不愿再去奋斗,甘心守住现有状态,二人在生活观念和方式上的分歧日渐明显,双方都很苦恼,拉锯了几年,终于分手了。类似的情况在高校研究生中并不是偶然,而有相当的普遍性。上海某高校英语系的在职研究生班以女生居多,经过3年努力,她们不但拿到了学位,而且大多数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工作,但结果她们却不得不放弃了,带着留恋与遗憾回到了原来的环境中,原来留守家中的另一半早已失去开创新生活的兴趣,对新环境心生畏惧,这些女生的爱人大多数是大学时期的同学。某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女生受周边恋爱同学影响,也坠入情网,毕业后组成了小家庭。女的不久就发现这男生从不干家务,对事业心

强、工作繁忙的她也很不体谅。每当她大老远采访回来,精疲力竭还要忙着做饭,男的却只知坐在沙发上看球赛。多次唠叨无效,因为男的本质上是自我中心主义者,习惯于被人关心被人照料,对别人缺乏体贴。这位女同学因而多次累病。后来在老同学聚会上,她懊悔地说,如果能重来一次,她一定要找个年龄大一些,特别宽容,特别会体贴人的男人做丈夫。

上述例子表明,校园恋的弊端既表现在学业,也表现在生活中,处理不当时,当事人常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人生苦短,有多少岁月可以重新来过呢?当然,我们看到校园恋弊端的同时,也要承认校园恋光明、有利的一面,不过化弊端为有利靠得是理智而非冲动。

就恋爱与学业而言,对大学生来讲,二者并非一对水火不容的天敌,调合的关键在于把握分寸和是否能正面发挥情感的促进作用。大学校园中不乏这样的恋爱结果,相爱的双方相互鼓励,相互支持,既保证了学业的共同进步,又在奋进中强化了感情。某高校一位女大学生自高中时代起便悄悄喜欢上一位学长,当对方考取了一所名牌大学时,这位女生决心“要和他站在同一地平线上”。成绩平凡的她在这一信念的支撑下步入大学校门,4年中他们一直通信往来,学长的知识常令她耳目一新,视野豁然开朗。她曾一度想平平常常地度过大学时代、随便找个工作算了,但学长却告诉她“人不能眼高手低,但更不能眼低”。学长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在学长的鼓励下,这位女生重新理清了未来的思路,毕业之际以优异的成绩读研了。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各自有了情感归宿,女的人生道路有了崭新的轨迹,现就职于南方某高校。回想起走过的初恋道路,该女生真诚地感谢老天让她在自己尚不成熟时结识了这样一位学长,他是自己

从高中到大学时代的光亮,他让自己成为了一个自信、有能力的女性。虽然,这段感情没有结出果子,但它所起到正面作用却是巨大的。

就大学生的性格完善而言,爱情关系处理得好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众所周知,现在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虽说未必人人都是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但倍受长辈宠爱却是共同的。人们常说现在的孩子自私、心中只有自己、生活能力差、不会关心人,等等。这些缺点在父母的唠叨中并未改变多少,但一场真诚的恋爱却可以使他们脱胎换骨。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女孩子变得温柔、细心,男孩子学会了宽容、体贴。如果哪个父母发现子女在料理生活上突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不用说,他(她)大概是谈过恋爱了。爱情可以令少男少女们找到自信,而不至于在形单影只的同僚面前产生自卑感。特别是在主持每晚的卧谈会时,他们能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让附庸者佩服得五体投地。爱情可以令学子们勤快,而不至于为选择几件脏衣服中哪一件还可以穿煞费苦心。“恋爱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这是一位男生发自内心的感慨。

由此可知,大学校园中的恋爱有利有弊,这两者之间转换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决断能力。处理得好,爱情、事业双丰收,处理得不好,事业没有建树,感情也常会付之东流,徒留身心创伤。大学生大多在18~23岁之间,并非所有人都是成熟而理性的,个性、素质上的差异,使得他们结局不同,因此,他人的提醒、指点就显得重要,这一责任当然就落在高校教育工作者身上了。

四、当代大学生应如何正确处理爱情

既然我们承认当今高校恋爱现象普遍存在,看到了学生恋爱的特征,清楚这其中的利弊关系,那么作为教育工作

者就有责任利用各种方式、机会,春风化雨,对他们的恋爱实践做出恰当的指导,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首先,帮助学生理清爱情与奋斗之间的关系。在恋爱的过程中,仍然要有独立的自我,保持追求、奋进的志向。当代诗人舒婷《致橡树》说得好,“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而不是攀附他人的藤萝。大学生前途未定,未来充满变数,在前进的道路上需要的是携手而行,并肩努力,藤萝般的依附关系将给双方带来危险。一方自我奋斗尚且不暇,还要带一个,会感到疲于奔命,对另一方来说,感情并不是完全不变的,一旦平地起风波,自己会难以应付。鲁迅先生在《伤逝》当中早就明确指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

其次,要遵守恋爱道德。大学生谈恋爱时,遵守恋爱道德的主要内容是相互尊重恋爱自由,彼此忠诚,行为端正文明。举止文明,有分寸,不可随心所欲,无视社会公德。东方民族一向含蓄、内敛,这不仅是我们民族的性格,也形成了我们的文化特征和舆论、评判环境。我们当然尊重他人的权力和隐私,但共存于同一片天空下,就要考虑大环境的游戏规则,事实告诉我们,人永远不可能完全不顾环境的特征率性而为的。常言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当我们决心冒天下之大不韪时,一定要考虑、权衡清楚,有些事情应该打破习俗,有些事情则没有必要轰轰烈烈。相爱的人可以在自己的小环境中尽情体味爱的感受,何必一定要成为公众的风景呢?

再次,要正确处理爱情与事业的关系。大学生正确认识、对待和处理爱情与事业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和处理恋爱与集体活动、社会工作的关系,正确处理恋爱与其

他同学团结的关系等方面。肩负重任的大学生应珍惜青春，把握青春，使青春更美好，更富有积极意义。很多同学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才觉得人生最好的时光是大学时期，没有负担，时间很多，倘若用来学习知识，它将是最好的吸纳时期，走出校门，方方面面的压力逼上来，虽然仍可读书，但却只能利用边角料时间，忙里分身了，因而很多人发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叹，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是就此而言的。

又次，要端正恋爱动机，这山还望那山高的心态要不得。将“拾麦穗”心态引入爱情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且不说浪费了时间、感情，就结果来看，也是失望居多。恋爱当以志同道合为出发点，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有时是正确的。

另外，要学会正确处理恋爱挫折。莎士比亚说过：“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真诚的爱情不是走一条平坦的道路。”爱情是生活中美好的事情，但在恋爱中遭遇挫折是常有的事。在处理失恋的问题上，正确的态度是做到失恋不失德，失恋不失态，失恋不失志。爱情追求的是感情的契合，如果彼此没有共同的志趣或貌合神离，他们恋爱的成功其实与惨败无异，甚至还会贻误两个人的青春和整个人生幸福。所以，情感不能融洽而分离，应该说是好事。而有些人却做了感情的奴隶，失恋后感到绝望而精神颓废，或因悲愤和暴怒而铤而走险，或发生其他恶性事故，这些都不是明智的行为。

爱情是美妙的，它教会我们许多的人生道理，作为当代大学生，应当树立良好的爱情观，正确处理好恋爱问题，将爱情变成人生奋进的推动力、未来航船的顺风帆，这不仅是大学生们应该做到的，也是教育工作者应该思索的考题。

（作者：柳岳梅，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4.

试婚是婚姻的另一种形式吗？

近年来,大学生同居现象越来越引人关注。2001年1月,某记者就大学生同居的问题走访了西安、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6大城市的一些著名高校,并采用了无记名问卷式随机调查,结果显示:对婚前同居行为表示“可以理解”或持肯定态度的占48.5%，“说不清”的占27%。也就是说几乎75%以上的大学生差不多“认可”或“不反对”同居这一现象。在回答“当您的恋人向您提出婚前性行为的要求,您将采取什么态度”时,其中表示“答应”或“可能答应”的大学生竟占56%;接受“只要确立恋爱关系,就可以发生性行为”这一观念的大学生占23.5%，“说不清”的占35%;在回答“您有过和异性同居的行为吗”时,表示“有”的占52%,而女生竟高达67.3%。^①这份调查答卷显示了当代大学生在两性婚恋

^① 参见东方网 2002年5月24日《每日文萃》。

观念方面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在许多高校周边的出租房里, 98%以上的租户都是大学生“小夫妻”, 这些村因此被称做“大学生夫妻部落”, 他们则笑称自己的“同居生活”为“互助组”。^①面对这种现象, 同龄人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有的认为大学生首先是血气方刚的人, 他们正常的性需求不应压抑, 另外大学生已是成人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外界不应也不需干涉; 也有坚决反对的, 因为害处多多: 一是影响校园学习风气; 二是影响自己的学习; 三是多数大学生的经济来源是家长的血汗钱; 四是婚前同居不受法律保护。

当然, 现实中真正实施同居者毕竟还是少数, 但不容忽视的是, 它对传统的婚恋观念以及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心理成长已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据《羊城晚报》2001年9月5日报道称, 某高校对98级20名男女大学生同居现象的调查显示, 12人认为“同居是个人的权利, 不存在什么对错”; 10人认为“很新潮, 能接受”; 6人承认自己已加入“同居”行列; 只有5人不赞成“同居”。这个调查结果已显示出大学生中的确存在着将“同居”视为时尚而仿效追求的苗头。

大学生正处在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此时他们思想活跃、开放而少禁忌, 情绪敏感、细腻而富于变化, 最容易吸收外来的新信息, 也最容易有叛逆心理, 时时感受到性的强烈冲动, 又受制于传统观念和生活条件的束缚, 因而经常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躁动和“突围”冲动。这个时期任何一种对固有的东西的突破态势, 不论言论或行为都很能赢得他们的好感。再加现代社会资讯的高度发达, 强大的媒体渲染导向作用, 将追新求异的时尚意识深深渗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当未婚同居作为一种满足基本人性、追求个性表达, 同时

^① 《北京晨报》2001年12月4日。

对传统婚姻模式构成颠覆和解构的前卫行为时,大学生认同、仿行或选择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另一方面,大学生正处在自我个性逐渐成型的关键时期,作为成人的尊严感刚刚被强烈地意识到,因此某些具有挑战意味的大胆行为有时也会被当做展示个人权利和标示自我成熟的标杆。

只是在一个人经济尚未独立,社会阅历相对单薄的情况下,这种自我负责的感觉常常有被夸大的成分,因此与对他们进行苍白的道德谴责或行政干预,还不如在大学生中加强现代社会的公民自律意识教育来得更加迫切和必要:在享受自由及多元选择的同时,也要支付相应的代价,承担相应的风险。比如选择婚前同居或婚前性爱,即意味着在人生阅历尚浅的年龄,闯入一个“事故多发地段”,对这种行为的一切后果,是否已具备充足的预见力和承受力?同居的经历会不会给未来人生埋下什么隐患?试婚到底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还是一个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

本文意欲对试婚这一现象的缘起、定义和其中折射出的复杂心态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做一梳理和呈现,可以使当代大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试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试婚将会带来的许多悲剧性后果,以期对大学生在多元震荡的社会转型期重塑成熟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一些参考和辅益作用。

一、试婚心态面面观

同居与试婚,这是两个经常被混用的词。前面所引的大学生材料中就没有做区分。事实上,在许多大学生心目中是在相互都有了嫁娶的意愿后才走在一起同居的,因此他们的行为严格说来也可以叫做“试婚”——顾名思义,就是男女双方以夫妻名义同居一起生活,并为将来的婚姻做准备。

若要追究起来,试婚其实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早在中

国唐时敦煌文献中就有侧面记载。《优先婚前同居书》里提到这种风俗是：试婚期间男到女家，与未婚妻同床而眠，但只能背靠背，不能有性关系，看上去这种试婚方式重在考验对方是否忠贞，这与新西兰毛利人，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和埃塞俄比亚一些地方实行的“床昵”风俗颇为接近。在世界各地，尽管试婚的时间与方式不尽相同，但多是允许试婚期间有性交关系的，如菲律宾内鲁润岛上的伊罗人、北美印地安人等。现流行于欧美的“试验夫妻”、“临时夫妻”比较接近中国大陆近几年出现的试婚现象。不尽相同的是面对这种现象的心态，作为舆论的旁观者和试婚的行为者有不同；作为试婚当事人的男性和女性也会略有不同。概括一下试婚者大概有这样几种比较典型的心态：

其一，不负责——随时准备撤退的藉口。

其实，无意中人们经常对“试婚”这个词做一种偏正结构的理解，以区别于“同居”：如果动机偏于“婚”，那么试婚就是为婚姻做的准备；如果动机偏重在“试”，那么就有可能为试而试的“同居”，结果就有可能是试而不婚，为一些所谓崇尚自由、追求个人享受，缺乏责任感的人提供移情别恋或不负责任的正当理由。下面的例子出自《中国试婚现象调查——21位试婚者采访实录》之二十“无爱无情无恨”篇^①：

其实我根本不在乎试不试婚，反正，时机成熟就结婚。现在我同他这么好，这么相爱，还谈什么试婚呢？可笑的是，这仅仅是我自己的想法。后来我想，他或许从没有娶我的想法吧，要不怎么老是把“试婚”挂在嘴边呢。

^① 李泽川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那天我们是在越秀路的一家西餐厅吃晚饭的,吃到一半,聂华就坦白地告诉我,他要同我分手。我太惊讶了,我几乎以为他在说胡话,但他郑重其事的样子又不像。他很潇洒地耸耸肩,告诉我试婚期到了——因为他给自己规定,同任何女孩的试婚期不能超过一年,免得贻误人家的青春,对双方都不公平。他当时的样子是那样平静,那么不容置疑,我有种下级听上司们说话的感觉,似乎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执行。

在这个故事里,男女双方对试婚含义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是有偏差的。女方的偏正词义在“婚”,所以她关注更多的是试婚的结果,并且以为是必然的结果。而恰好相反,男方是有预谋地只要过程,因此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所以年轻的恋人最好在试婚前就“试婚”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达成共识再决定进入试婚生活也不迟。

另外,也必须树立起一种理性成熟的认知——即使双方为结婚做准备的意愿都十分真诚,试婚的结果也不可能保证百分百通向红地毯。因为这其中牵涉到复杂的变化和责任问题。王凤娟与高健是大学谈的恋爱,感情基础很不错。但由于初上工作岗位,物质底子薄,没房没钱,所以一直没顾得上结婚。听说日本很时兴试婚,两个人就在结婚前往到一块儿,希望通过几年相处,性格啦,思想啦,生活习惯啦,都能有个彻底的了解,为婚后生活打好基础。另外,对高健来说还可趁年轻没有孩子好好享受几年。而对王凤娟来说,“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我真的可以利用这种‘准夫妻’生活来考察他做丈夫的‘能力’。但我没有想过试婚还有另一个意思,假如发现合不来,双方就根本不存在结婚的事

了——这也是‘试’的结果之一，但当时真没想那么细。”然而当几年奋斗之后，物质渐丰之时，人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高健从一个备受瞩目多才多艺的才子渐渐变成意气消沉、患得患失的普通男人，而王凤娟却凭自己的能力和强烈的事业心在商海开拓了一片天地。虽然诚意依旧在，但两人的距离明显拉大，感情出现了裂痕。由于试婚毕竟不像婚姻那样有一个外在的责任的约束，因此他们没有去尽心也不知如何修补这艘触礁的情感小船——王凤娟忙碌而逃避，高健苦闷而消沉，久而久之，当初貌似理性充满憧憬的试婚生活走到了尽头，留下的是无尽感慨和自我开脱。

对于我们的试婚，他当然有了答案。高健有一次曾说，假如我们当初毕业就结婚，或许孩子都几岁了。我信这一点，我想，假如我们从来就没想什么试婚，我们现在也许很好；也许呢，就是很糟。如果结了婚，我至少不会跟剑云有这么一回事的，出于对婚姻对家庭的责任感，我真不会这么做。关键是，我们根本不存在婚姻。^①

“还没有准备好”——是时下同居男女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其实仔细回味一下，王凤娟和高健的感慨说明了在同居和结婚之间，所差的并不只是薄薄的结婚证书，而是更多的承诺、责任和夫妻角色的期望及要求。在美好的同居关系里面，它们不是不存在，就是常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掉，因此悲剧往往难以避免地上演了。

^① 《中国试婚现象调查——21位试婚者采访实录》之八“阴盛阳衰背后的故事”篇。

其二,迷失——“结婚恐惧综合症”。

近年来,不少年轻人染上了“结婚恐惧症”。这些“不婚族”认为,婚姻会带来经济和心理负担,而一旦离婚又会给一方造成极大心理影响或财产损失。于是,“和则聚,不和则散”的同居方式在一些人群中蔓延。不过,追究这些恐惧的深层原因,大多来自爱情的伤害。谁都知道,爱情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心灵体验,每一对真心相恋的男女都会渴望走得更近,行影相随乃至共同生活,但由于年轻,各方面的条件准备不足,于是未婚同居就成了一种很自然的需要和选择。尽管没有婚约,年轻、激情、新鲜的生活最初总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幸福光华。就像郝月当初体验到的那样:

同大多数刚走到一起的男女一样,我和迟亮也是过得很充实很幸福的,他对人的细心和体贴,使我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女人。那时候我开始同他谈结婚的事,但迟亮总是有很恰当的理由来对付我。我也知道,他的事业刚起步,我们双方也都不是很有钱……我们的婚事就这样拖了下来。^①

然而,当背叛和伤害出现时,爱情就变成了心灵的毒药,尤其当伤害来自于曾经是最信任亲密的人时,它对美好人性的摧折和打击是出乎想像的。当郝月发现自己亲手供养栽培成大学生的妹妹与未婚夫通奸时,她的天地崩坍了。

^① 《中国试婚现象调查——21位试婚者采访实录》之十四“爱情鬼话”篇。

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我不会试婚了,真的,我奉劝所有的年轻人,也不要轻易相信什么试婚的鬼话了,爱情的意义并不只是上床那么简单……这些年我也有过同居生活,但不能说是试婚。我根本没想过把自己嫁出去,这算不算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呢?①

然而人性的复杂就在于,有时同一个“因”可以导致完全不同的“果”。在众多悲欢离合的婚恋故事里,对爱情的不信任,对婚姻的恐惧既是促使人们像郝月这样视试婚为洪水猛兽而猛烈抨击,同时却也可能是另一些人刻意进入试婚生活的最深动因。

我不想再为“爱情”这东西劳神费力,所以一开始便与他们约法三章:不谈爱情、不论婚嫁、随时分手,经济上实行AA制。事实上,男人们骨子里是欢迎我的约法三章的,甚至可以说求之不得。而我呢,也省去了不少麻烦。对我而言,爱情是虚伪的,我并不需要,但我需要同属。当然我有言在先,我没有欺骗过谁,也没占过谁一分钱的便宜,我自觉心安。②

发出这番几乎称得上冷酷的试婚宣言的主人公是一个在高中时期就开始初恋的女性,由于过早秘密同居怀孕流

① 《中国试婚现象调查——21位试婚者采访实录》之十四“爱情鬼话”篇。

② 《中国试婚现象调查——21位试婚者采访实录》之十二“缘聚缘散为哪般”篇。

产,导致身心憔悴学业下降,高考落榜,而收到名牌高校录取通知书的恋人却无情地离她而去,从此她再也不相信爱情。但她又是一个十分需要情感慰藉的女人,她怕孤独寂寞,哪怕出于本能,她也需要有人相伴地活下去,于是她选择了不投入情感,不进入内心,不纠缠财产,一种与男人互不相欠的“试婚”模式。也许她成功地保护了自己不再受伤害,但在她强硬的外表下跳动的是一颗怎样孤独凄清的心灵呢?我们无法妄加推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样的试婚并没有使她与幸福结缘。因为无论如何,真正的幸福是需要两个心灵的坦然付出和真诚回应才能收获的。

其三,距离——逃避残缺的保护色。

在众多试婚故事里,一个现象很明显:有过婚姻经历或中年进入试婚者,他们的心态更平和理性,主要表现出两种趋向:一种是深受失败婚姻的困扰,深知婚内相处决非易事,离婚更是伤筋动骨的大手术,索性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坦言害怕旧戏重演,清醒选择有距离的试婚方式,以免重蹈覆辙,劳民伤财。有资料说北京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择偶选择同居而不再婚。这里面除子女的不理解不合作造成结合的困难,财产纠纷的隐患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来自于离婚后再婚心理上的一种畏难情绪。婚姻就像种树,时间越长,伸向地面的枝桠和深植地底的根须就越繁茂交错。离婚就像是砍树,主干再粗也可快刀斩乱麻地一锯两断,但修理枝桠特别是清理树根就是年深月久的大工程了。而再婚就像是在同一块地上再植品种迥异的一棵树,若过去社会关系的枝桠还四处绊脚,过去生活和心理痕迹的根须还盘根错节,这样的土壤怎么可能适宜另一棵树的存活呢?社会学调查也发现匆匆再婚的成功率普遍较低。这也使得如今越来越多的离异者更愿意选择试婚这样一种带有缓冲性的中间

角色。

我是今年春节开始主动搬到他租的这间民房里来的，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觉得水到渠成了，我们都是饱经沧桑的人，也都三十四五了，绝不是因为一时的冲动和快意，而且也没多余的力气彼此游戏。但要说到正式结婚也不太现实，婚姻是一种能力，不是人人都有本事驾驭，比如说我就不行，从心理上来讲，我不是个健全的女人，这辈子注定难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遇到老何已是幸运，我不奢求大多，何况我性格怪癖，也许会有那么一天连老何也会受不了，不如干脆未雨绸缪，到时省点事。而我呢，也只当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反正当初我也不是没有过终生不结婚的打算。至于老何，他刚从婚姻中出来，仍在心有余悸，我们现在这样可以令他更轻松些，也许这种试婚的方式对我们俩都有好处，至少可以缓冲一下。

有过试婚经历的我，现在不会看不起那些试婚的女孩子，她们真的很有道理。因为人的本性的东西，只有在很长时间的共同生活和摩擦中，才能检验是不是真的互相适合。^①

还有另一种趋向是为了防止激情褪色而选择试婚，因为距离可以保持美和神秘吸引。爱情最让人着迷就在于那种激情体验，它使人们感觉充满新鲜的希望、活力和美丽，

^① 《中国试婚现象调查——21位试婚者采访实录》之十三“婚姻是一种能力”篇。

使人们忘却和超越日常的平淡烦琐，达臻创造力和想像力的颠峰状态。然而遗憾的是，人类的激情从本质上来说是短暂的，迸发过后必然伴随平静和疲惫。而日复一日的婚姻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平淡的代名词，另外，社会文化传统一直将缔结婚姻视为成年人的标志；使得人们容易产生一旦抵达这一重要的人生驿站，在两性关系中便可高枕无忧的错觉。再加外在的法律保障又容易加剧人的自我惰性，因此激情恋爱过后的婚姻经常显出令人沮丧的平淡和重复，遂有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一说。而试婚由于不存在法律的保障，可以给双方留出较多的个人空间和危机意识，同时在心理上也不会因固有的对婚姻角色的期待而产生惰性，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各自的发展和美好氛围的营造和享受上，由于有空间有发展，两个人之间就是一个动态的关系，这样相对来说可以延缓激情的衰退。就像受访者小梅所自述的：“观察周围人的婚姻，总有一种如愿以偿后的感情停滞期，而危机就会在这时出现，而我和他之间因为没有一种确定关系，所以仍然有一种忽远忽近的感觉，这样促使我们不停地去了解 and 感觉对方，对感情更加珍惜，也更多地付出心力去培养，使互相迁就成为一种自愿养成的习惯。”

然而这只是硬币的理想化一面，另一面就是前面提到的高健和风娟的故事，没有婚姻的形式也就缺少了相应的责任感，遇到情感危机时难有经营之心，反而更容易导向关系的解体。在更深的心理层面，还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人性冲突——不确定的变化本能与确定的归属感之间也会经常交战，导致自我消耗失去信心，自疑他疑，最终也会因争斗、疲惫、厌倦而渴望结束不确定性，归依一种稳定相属的两性关系。小梅最后说：“我们最近在考虑结婚的事，一方面是为了要孩子，一方面是对这种不确定的自由已不再那么渴望，我

们开始担心一旦再次面对分手，我们是否能像原来那样冷静地对自己交待。”

诚然，如何在婚姻这一古老的制度里真正实现两性相互依属的最深梦想，的确是现代人面对的一大课题。

其四，磨合——经营婚姻的功课。

令人深思的是，“试婚”这一歧义百出的形式，在另一种心态下却承载着实现人类这一梦想的重任。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婚姻就像是大学，必须努力学习和经营，才能修到毕业的正果。而试婚就是此前必须准备的入学考试，期间主要修习的功课起码包括认识自我，认识伴侣，深入了解个性及两性的差异，在磨合中学习包容缺陷，放弃自我中心，呈现真实的自我个性，培植共同生活的习惯和信念等。

章洁在10年的失败婚姻后紧紧关上了心门，幸遇真诚爱人，逐渐复活对爱的憧憬，却固执排斥婚姻，权衡考虑之下，她选择了试婚：

像我这样的女人，要不是受到伤害或者有过这样的经历，怎么会试婚呢——以前，我觉得试婚根本就是不可取的，年轻人游戏而已。但当我碰到邓林涛（林子）后，自然而然地就觉得试婚是非常重要的——我怕再一次重走老路，快40岁的女人了，已经没有再错的机会。……到后来，林子也同意了我的看法。他说，虽然我们的爱情这么真实，试婚仍然是有好处的。他不是指可以相互了解或适应的意思，他认为我可以在试婚中慢慢抹去旧日的伤痕，然后，呈现一个完完全全的我给他。

到现在，我们试婚已经快两年了。实话说，在这两年里我们有苦有乐，有过满足，也有过失落。



有句话叫做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每个人都会有闪光的地方,当然也有缺点。应该说,我在试婚生活的两年里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如何很现实、很客观地看待林子的不足之处,学会了像个妻子一样地面对他的错误。反过来,林子也在努力适应或者包容我脾气不好的一面。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很满意,因为我们走在一起时就有过约定,我们一定要给对方一个完全真实的自我,就像其他所有夫妻一样面对实实在在的生活。^①

章洁的这番心声可说代表了试婚中最成熟的心态。为什么婚姻需要充分的准备?因为婚姻虽然是爱情的结果,却与爱情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爱情是取悦,那婚姻就是妥协。爱情中重要的是相互吸引和激赏,婚姻中重要的是相互尊重和包容。爱情可以是短暂的瞬间的绚丽的焰火,把所有最美好的品质集中燃烧而不必计较散落一地的纸屑由谁打扫;而婚姻却是穿鞋走一生的长路,鞋子质地的软硬,尺寸的大小,款式的风格,都与你的脚掌脚趾刻刻接触,时时摩擦,一粒沙一片叶都会使你停顿不前。而脚是很脆弱的血肉物质体,会酸痛会疲惫会长鸡眼,日日相伴,所有的不美好都将无处逃遁。美丽的爱情童话可以止于“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遐想,而婚姻却绝对会将所有的王子和公主恢复成真实的灰姑娘和小矮人。然而在传统文化中,两者之间缺少应有的过渡空间,人们(女性居多)往往揣着童话型的遐想就一步踏进婚姻的灰色地带,拿浪漫的爱情

^① 《中国试婚现象调查——21位试婚者采访实录》之十九“一场游戏一场梦”篇。

期待直接等同于婚姻期待,就会倍感失望和彷徨。其实,婚姻生活只有在浪漫光环消散后从接纳真实的对方才真正开始。也正因此,试婚就显得很有必要。两个出身背景、成长经历、价值观念甚至日常生活习性都不同的人,要在同一个屋顶下和谐相处,真的非常需要一个磨合期来缓冲,来过渡,并在其中逐渐显露真实自我,观察两人之间的真实自我是否有致命的不合,同时逐渐认识自己对婚姻角色的期待是什么,双方的期待是否能够吻合,基本价值观念有否大的落差,性格脾气能否相互容忍,细小独特的生活习惯可否为对方改变等等。我以为这些才是试婚生活中要重点回答的内容。如果双方都在认可的期限内,能给自己给对方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卷,那么就可以安心地携手走向婚姻殿堂。如果答案是否,那就勇敢地结束,不要用变心、背叛的思路来彼此伤害,你只是在理性地承担起自己选择的后果。毕竟,自我承担和自我负责的能力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成年的基本标准。

试婚是我们双方的意思。我们都有太多的经历,太复杂、太敏感的心灵,我们都不能再受伤害。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发觉他(她)不是我的所爱,我们还可以像好朋友一样的分手,毫无遗憾,毫无怨忿,再去踏上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道路。^①

其五,亲情——婚姻保鲜膜。

还有一种心态是对上面这种“磨合期”的进一步延伸和

① 《中国试婚现象调查——21位试婚者采访实录》之七“相同的人不同的爱”篇。

升华。那就是在试婚过程中实现从激情到亲情的自然过渡，从而保证日后婚姻的永久和稳固。

有人问我牺牲这么多，就敢保证一定值得，而符樵也不会再爱上别人吗？说实话，我不敢保证，因为我也不能为自己打保票。如今这个社会人们的各种机会都实在是太多了，一个人一生中交往、接触的人又何止千千万，百年不变的爱情我想是没有的，但却到处有百年不变的亲情，如果两个人的感情能够从爱情升华到亲情，彼此在对方心目中的位置不是爱人，而是亲人，也许那就可靠多了，毕竟亲人没有隔夜仇啊！我是一个亲情观念极强的人，我相信为了我的亲人我能够做到不惜一切，如果你能意识到符樵在我心里是一个亲人而不仅仅是爱人的话，也许对我的举动你就更容易理解了。^①

记得很久以前听过一个故事，说的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看到亚当和夏娃时，他们相互凝视的眼睛里闪烁着激情的火焰；过了许多年再看，他们手牵着手，眼中的火花已被一种脉脉的温情所取代，又过了许多年，亚当和夏娃垂垂老矣，他们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光，却已是相濡以沫的亲人了。我一直觉得这个故事说的是人类爱情的三个阶段：激情，温情和亲情。只有当爱情实现三个阶段的顺畅过渡，婚姻才有可能走到白头。怀着这种心态试婚的人，请受我最深的祝福。

^① 《中国试婚现象调查——21位试婚者采访实录》之十“爱相随”篇。

二、来自试婚的启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人进入试婚的动机似乎比结婚动机要复杂得多。人们可以由于强烈的难以自拔的激情进入如胶似漆的试婚同居，也可以在感情的基础上经过理性的思考和选择进入两个人的磨合生活；甚至也可能因为对爱情的失望和不信任进入一种不付出真情避免受伤的两性生活；同时也可能仅仅是因为害怕婚姻制度对人性的压抑而逃避用法律的形式缔结永久的男女关系；当然也不排除不愿负责游戏爱情的自私动机等。总之，形形色色的试婚动机和越来越流行的趋势说明了在多元价值的相互碰撞之下，转型时期的社会观念和社会结构出现了急剧而鲜明的变化，因此对试婚这一新生现象再做僵化的道德评判已经没有意义，而应该看到随着经济水平和物质文明的快速提升，两性关系及相关的社会心理也越趋丰富和复杂。尤其需要关注和思考试婚引发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启示一：第三婚姻现象？

自从一夫一妻制确立以来，每一个成年男女都可以用一个两分法来定位：已婚或未婚。在过去，一对恋人从相爱到结婚，总是那么干脆明白，爱就结婚，不然就分手，很少能够转弯抹角大兜圈子的。可是近几年来，在多元价值的震荡冲击之下，许多传统习俗和规范都面临着被颠覆解体的危机：就在相爱男女的海誓山盟的路尽头，竟然还有第三个选择叫“同居”，在白头偕老的终点之前还有第三个驿站叫“试婚”。只是有的人一试便成功，有的人却屡试不中，这也就意味着现代恋人们在迈向红地毯的路上将遭遇更多的变数。

然而，即使有着不确定的变数的风险，在婚前性行为成为普遍现象的今天，同居生活方式也在不可阻挡地呈现扩

大化趋势。首都医科大学社会医学研究室在2001年做北京市民健康状况调查时发现,在“婚姻情况”调查栏内,4%的北京人填写了“同居”。这些人的年龄分布呈双峰现象,即20~29年龄组同居者占全部同居人口的14%,45~54岁年龄组占32%。

由此可以推见,当试婚或未婚同居作为可以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普遍盛行时,现代社会必将面临许多以前从没出现过的新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用以区分和定位个体身份的社会性别是否可以在传统的“已婚”“未婚”之外增加第三个参项——“试婚”或“同居”?现存的婚姻制度、婚姻伦理将会遭到怎样的冲击?同居率的上升与离婚率之间有无关系?试婚能使婚姻更稳固吗?试婚分手的财产如何分割?试婚期间的子女问题如何处理?现存的婚姻法规能够适用吗?这种种问题都亟待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的深入调查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本文在抛砖引玉的同时,还想就试婚引出的“变化”问题再做一点阐发。

启示二:变化——人性的潜流?

在李泽川所采写的21个试婚故事里,中途破裂分手的几乎占到2/3,极易让人产生试婚形式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来源的印象,从而否定这种关系存在的合理性。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地说婚姻解体的风险随同居关系的流行而增大,因为实施同居者和离婚者都来自不愿意负责任的那一类人。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我以为无论同居关系还是婚姻关系的解体,都与情感阅历、角色期待、理性认知能力有关,尤其与变动的人性本质关系密切。

仔细比较一下,试婚者年龄越轻,情感经历越单纯,越容易失败。人们常说,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其实年轻时我们更不懂试婚。年轻漂亮的大一女生热烈追求报社主编,男

人被感动，双双坠入爱河，但迫于女的学生身份和舆论压力，两人只好秘密同居，只等毕业结婚。就在毕业前夕女表示只想做个小女人而不愿意继续完成学业甚而动用有钱有势的兄弟威逼结婚，男觉受辱，无法忍受女的庸俗市侩而心离并爱上别人，女报复伤人而锒铛入狱。在这出两败俱伤的惨剧里，女一直以为是没有保障的试婚关系害了她，而男人也在悲叹为什么这么迟才发现她的真面目。其实悲剧的真正原因在于双方都没有意识到“变化”——这一人性的潜流隐含的杀伤力。

人们都知道世间万物处在不停的变动之中，却经常在爱情里要求永恒。这种矛盾其实就已埋下了悲剧的种子。事实上，由于直接与敏感的心灵相连，情感世界的变化只会比物质世界更加高深难测。相爱的人共同生活就如同在跳双人舞。来自内外在世界的信息都在综合影响着舞蹈的和谐。如果舞者双方的自我还处在变动发育期，那关系就很脆弱。因为他们并不一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或者当初所需所要很快就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了却无力察觉。总之，当双方都属于活跃变动期的主体，如果没有清醒地觉知各自变化的轨迹，理性地调整心理节奏，那么两人之间相吸相契的平衡点就很容易被外力打破。就像故事中的女生无视当初自己爱上男方的才华转而要求物质和形式的极端保证，就说明3年的时间中她已发生很大的改变，而男在得知女的大变化后却无所适从，束手无策，一味地失望、逃避而最终移情。此时他们对婚姻爱情又没建立起一套理性认知，贸然试婚的结果可想而知。假设他们是在结婚后发生改变和错位（也许变化的内容不尽相同）又无力弥补，那一样也是难免情感破败的结局，只怕有了婚姻的责任和义务后更沉重更痛苦而已。所以不是试婚容易导致分手，而



是对“变化”的认识和应对不足导致分手的居多。婚内婚外的情况其实差不多。试婚的好处就在于可以给自己时间演练一种成熟理性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理人性变动的曲线和结果。但试婚也须有相应的期限，否则时间过长出现的问题就可能已经不是试婚引起的而恰恰是类似于婚姻疲惫引发的。

人在年轻时尽可以顺应成长的节奏去尝试爱情，甚至体验性；但不必早早开始试婚。因为爱情是一个很好的课堂，我们可以通过另一双眼睛学习认识自我，认识社会，也学习两性相处的能力和技巧，积累爱与被爱的艺术与智慧。但爱情也很脆弱容易失败，只有学会从中领悟，那么成长的空间和智慧才会与失败成正比。只有那些失败过受伤过却依旧相信爱情并已经对婚姻和人性具有相当深刻的洞察和领悟，具备成熟稳健的理性能力的人，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实践为婚姻做准备的试婚行为。

总之，爱情可以是刻骨铭心的独唱，而婚姻只能是两个人的舞蹈。恒久是永远的梦想，变动才是人性的基本节奏。无论试婚还是金婚，每一对相爱的人，必须时时调整身心，以配合对方的节奏，才能舞出和谐的韵律。因为爱，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

（作者：姜云飞，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5.

性行为纯属个人私事吗？

两 百多年前，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人类两性关系的交往如果不带来任何社会问题，则纯属个人的私事。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大学校园里，往往会听到个别大学生的如此抱怨声：青年男女之间的性行为是基本的人权，而社会、学校、家庭的干预，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传统的性道德过于古板，没有人性自由，它已经离我们很遥远，新一代的大学生不应当理会这些“道德经”。究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一、性行为具有两重性

尽人皆知，性行为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古人曰：“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共焉。”在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有性欲求，都要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性行为虽然源自人的动物性，并使人在满足性欲过程中获得愉快，但是，性行为决不只是寻欢作乐。

所谓性行为是指同人的性器官有关的行为，涵盖纯粹



个人的性行为以及男女两性之间的性行为。前者的性行为(如自慰)属于私人行为,不涉及社会关系,而后的性行为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普遍的意义。性行为不仅具有私密性、隐蔽性和排他性,而且更具有社会性、责任性和道德性。

性行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性行为具有自然性,意指性器官的生物生理特性及人对异性的生理需求的属性。人到了一定年龄,随着生理机能的日趋健全,自然会产生求偶心理和求偶行为。男女两性的性行为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感官需求,它能使人得到一种快感、满足和欢愉。另一方面,性行为具有社会性,意指性行为总要受到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道德的和精神的因素影响。在文明社会,人的性行为一般通过婚姻方式实现。婚姻是男女两性性行为的社会形式。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性行为的内容、涵义和表现形式都会不断发生变化。

不仅如此,性行为的两重性还表现为私人性和公众性。一方面,性行为涉及一个人或两个自愿的成人之间的性行为内容、方式及关系,具有个体性和私密性。性行为是男女两性的生理活动,在进行时要比任何其他活动更加隐蔽,因而是一种非公开性活动。只要符合道德规范及法律规定,性行为就是男女两性之间的一种私事,别人无权打听、观望、指责和干涉。另一方面,性行为毕竟涉及男女两性关系并且有可能产生新的生命,从而具有社会关系,同时,有的性行为,如,露阴癖、性虐待、暴露性行为、强奸等直接影响社会公众,可能给他(她)们造成危害。因此,就其实质而言,性行为具有社会公众性,不能视为纯属个人的私事。

二、性行为的目的是什么

人类的性行为究竟为了什么? 尽管人们对此问题看法

不一,但仍有如下几种基本观点。

第一,性行为是为了繁衍后代。这种把生儿育女作为性行为基本目的的观点,即使在禁欲主义盛行的中世纪,宗教神学也不得不承认。神学认为,性行为的惟一道德功能就是生育,只有那些可能导致怀孕的行为才是正常的、正当的和道德的;进行性行为的人们要为抚养他们所生的孩子提供一切必需的东西;纯粹的一夫一妻制婚姻是抚育后代成人的最好环境。^①

第二,性行为是为了追求快乐。这种观点认为,性行为的根本目的既非生孩也非人与人的爱,而是寻求快乐,实现一个人自己肉体的或情感的快乐意图。主张个人享有寻求快乐的权利,并不考虑这种性关系是否具有任何社会意义。显然,这种观点有点偏颇。

第三,性行为是为了表达爱情。虽然生育是性行为的颇为明显的目的,但在多数人看来,性行为也是男女相爱的深沉亲密的表达方式。在人与人的爱中实现相互自我奉献,是性行为的基本目的。现代社会通常认为,通过性行为来表现爱情,只能限定于夫妻之间,而那些主张通过性行为来表现爱情,可以超越夫妻之间的关系,则是不可取的观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便利,将来似乎会更加凸现性行为的表达爱情的方面,甚至将超过并取代生儿育女和寻求快乐的功能。

概言之,性行为的意义和目的的三个方面,即生育繁衍、寻求快乐和表达爱情不是相互排斥的,实际上是相互包容的。

^① 参见罗伯特·贝克等《哲学与性》,第3页,纽约州,布法罗,普罗米修斯,1975年。

三、性行为需要道德规约

在人类历史上,男女两性的性行为最初纯粹是为了满足生理的需要,繁衍则是这种性冲动的产物。婚姻关系直接产生于两性关系的禁例,相对于杂交来说,群婚制是人类婚姻关系的一大进步,毕竟人类有了对性行为的一定限制。后来,人类发现近亲繁殖、同胞性交给后代体力和智力上造成严重退化,于是开始限制兄弟姐妹间的血缘群婚,实行两个部落之间的班辈婚。进入母权制社会后出现了对偶婚制,它是由群婚制向个体婚,即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形式。对偶婚突出了自行追求配偶,重视性的直觉,加强了性行为的隐蔽性,从而使性关系具有了一定的排他性和嫉妒性。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对偶婚也逐渐过渡到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一夫一妻制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①它是人类婚姻制度的一个进步,其道德意义在于,它要求排除杂乱的两性关系,要求夫妻间保持忠贞守一的性生活,它标志着人类对自己性行为提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制,为人类提供了发展爱情的必要条件。人类性行为的历史演变表明,性行为本质上具有社会道德性。没有社会的禁例、规范、习俗,就没有人类的婚姻。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性行为不仅受生物规律、自然规律的支配,而且受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现实社会,性行为总是通过社会礼仪、规矩、习俗等方式表现,并且受社会道德观念支配和社会制度约束。因此,人的性行为总是需要并且应该遵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原则。一般来说,性行为的道德规约包括几大原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一，生命价值原则。性行为不仅要有利于人类的繁衍，确保新生命的遗传素质的质量，而且要有利于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预防性传播疾病。为此，应该尽量避免不合理的性行为方式以及不符合道德规范的性行为关系，以实现优生优育的目的。同时，从预防性病角度看，避免性行为导致性病传播是性道德的基本原则。在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人们交往日趋频繁，原来散布于不同地区的各种性病，也随着人群的大流动而不断传播蔓延。过去在我国列为性病的病种只有梅毒、淋病、软下疳和性病性淋巴肉芽肿等四种，现在也出现了艾滋病、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非淋菌性尿道炎等性病。性病是一组传染病，主要通过性接触而传染，其中淋病、梅毒、艾滋病，对人类健康危害极大。毋庸讳言，社会上的卖淫、嫖娼、性滥交、性犯罪等现象，助长了性病的传播与蔓延。因此，为了杜绝性病传播蔓延，必须遵守性道德规范。

第二，自觉自愿原则。性行为是男女两性为达到一定目的而进行的活动，涉及一方影响另一方的关系，这样就会有双方主动或愿意或仅仅一方主动或愿意的区别。在实际性行为中，所谓“自觉”意指男女双方的有意识有目的性，所谓“自愿”更多的是指女方自愿。因为无论从生物属性或社会属性上看，在性行为过程中，一般说男性大多处在主动和进攻的地位。所以，在性行为中，男方不仅要满足自己生理和心理上的性需要，也应顾及到女方的意愿和需要。性行为的道德规范要求性行为应该建立在男女双方自觉自愿原则基础上。

在论及自愿原则时，需要把握下列几种情形。其一，没有恋爱、婚姻关系的双方，如违反自愿原则，就构成了强奸行为；其二，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产生的性行为也违背了自愿原则；其三，未婚男女出于交易目的考虑，而随便发生性

行为,虽是“自愿”,也违反了性道德原则;其四,就是自由恋爱而结成的夫妻,如果丈夫违背妻子意愿,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以现行的道德标准来说,也违反了道德原则。

关于在婚姻关系前提下,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婚内强奸罪”的问题,迄今为止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尚有不同看法。持肯定态度的人士认为,妻子有权自主地决定是否同意做爱,丈夫应尊重妻子这一权利;合法的性关系应以双方自愿为基础;法律应当保护、支持符合“人性”的性关系,禁止以强暴、征服为特征的“兽性”性关系。不合意的性关系侵犯了男女平等的性权利,同时,法律只给予一方在婚内进行性生活的自由,而没有给予一方在婚内强迫另一方进行性生活的权利。妇女性不可侵犯的权利,不能因缔结婚姻关系而丧失;无论在婚外还是在婚内,该权利与妇女人身紧密相连。婚内强奸违背自愿原则,以粗暴的性占有为手段,以性欲与爱情相分离为特征,只满足单方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把人的性生活降到了动物的水平,是一种违背性文明规范,也违反刑法规范的性行为。持否定态度的人士认为,丈夫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不能成为强奸罪。婚姻内的性关系是合法的,在合法的性关系中不会构成强奸罪。不管怎么说,违背妻子意志的强迫性的性行为是不可取的。

第三,善良无伤原则。“无伤”主要指男女之间的性行为不会损害自己或对方的身心健康,不会伤害其他人的幸福,不会损害后代的健康,不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发展。一般来说,婚外性行为,如通奸,尽管某人与“第三者”有某种感情,也符合“自愿”原则,但却违背了“无伤”原则,因为他(她)伤害了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倘若未婚先孕,对自己、对孩子都是极大的伤害,也给社会安定带来不良影响。除非履行法

律程序,经法院裁决或协议离婚,再结婚,否则,婚外性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至于其他的婚外性行为,如卖淫嫖娼,则会将性病传染给自己的妻子或子女,使其成为性疾病传播的无辜受害者,显然这是一种违反“无伤”原则的非法行为。就算婚前性行为既符合“自愿”原则,也未伤害他人,但由于男女两性经常处在兴奋、紧张、担忧、沮丧等心理状态,客观上也影响身心健康发展。

第四,平等相爱原则。单纯的“自愿”,如卖淫与嫖娼,由于出于某种不正当的目的,如交易、抵偿债务等,也是不道德、不合法的;在缺乏爱情的性行为中,尽管没有造成明显的伤害,由于没有爱情,只求单纯肉体上的一夜之欢,因而这充其量是一种满足性欲的本能型的性行为而已。只有建立在爱情上的性行为,才符合性道德原则。现代的爱情观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其基本内容主要有:“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到拿生命孤注一掷,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互相的爱而发生的?”^①由于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页。

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种新型的婚姻关系,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真正合乎道德的婚姻关系的诞生。不可否认,在现实社会中,经常存在着“没有爱情的婚姻和没有婚姻的爱情”、“没有爱情的性行为 and 没有性行为的爱情”这些男女两性关系的不完美形式,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不道德的。由此得出,只有建立在自主自愿、自由平等的爱情基础上的性行为,才是男女两性关系的完美形式。

四、走出性行为的误区

主张性行为纯属个人的私事,就会走向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的误区。婚前性行为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之间发生的性行为。一般说来,婚前性行为的特点是双方自愿进行,不存在暴力逼迫现象;没有法律保证,不存在夫妻之间应有的义务和责任。因此,这种性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和反对。

毋庸讳言,婚前性行为已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在一项“你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的问卷调查中,有46.8%的男生和54.7%的女生认为婚前性行为“纯粹属于个人私事”,有10.1%的男生和4.3%的女生认为“性爱是爱情的升华”,有7.9%的男生和4.9%的女生认为婚前性行为“是不应压制的人的本能”,有4.6%的男生和6.0%的女生认为婚前性行为“无所谓”。由此可见,大部分学生对此问题持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态度。相比之下,只有16.6%的男生和17.5%的女生认为婚前性行为“有悖于社会道德规范”,有13.7%的男生和11.7%的女生认为婚前性行为“有害于男女双方身心健康”,由此可见,只有少数大学生保持正统的道德标准。^① 调查表明,大学生在恋爱中发生性行为的比率如

① 《上海大学生发展报告》,第16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

下：挽臂(74.6%)、亲吻(56.1%)、拥抱(59.6%)、爱抚(31.7%)、做爱(3.8%)。^①

造成婚前性行为较为严重的原因主要有：第一，青年人随着生理的成熟，强烈的性冲动需要投射。第二，受性自由思潮、色情文化的影响。第三，认为恋爱时发生性关系属于个人的自由。不言而喻，婚前性行为会导致严重后果：第一，婚前性行为导致过早怀孕和生育，损害女方身心健康，给女方带来极大痛苦和困境。第二，由于婚前性行为没有法律保证，出现以谈恋爱为名玩弄异性现象。第三，性行为的直接后果容易感染、传播性病。鉴此，应该加强大学生的性道德教育，充分认识婚前性行为的危害，用理智战胜冲动。

婚外性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大抵说来有两种情形：第一，为了满足双方一时的性生理和性心理需要，如通奸，这种性行为是一种违背性道德、违反法律的行为，它破坏家庭关系，败坏社会风气，而且很容易导致其他恶性案件，妨碍社会安定。第二，为了满足双方长远的需要。这种类型的婚外性行为多是基于双方相爱而产生的。可能由于父母包办或买卖婚姻，夫妻之间没有感情，也可能由于夫妻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排挤。

毫无疑问，我们决不能以为这种婚外性行为是出自爱情的，因而就变得合法了。如果感情确实发生了变化，那么就应该通过法律来解决。解决这类婚外性行为问题的根本在于：第一，夫妻关系必须真正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第二，夫妻双方在生活中要注意巩固和发展爱情；第三，加强道德修养和法制教育，提高思想道德水平；第四，如果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可以离婚。

^① 《上海大学生发展报告》，第16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人的性行为是越来越受到约束和限制，还是越来越走向解放和自由？这是一个需要加以具体分析的问题。一般来说，西方的“性解放”、“性自由”蕴涵下列意思：其一，破除性行为的神秘感，换言之，要对性器官、性生活抱以科学的坦诚的态度。其二，调适夫妻之间的性生活，也就是要把性生活看成是夫妻生活、家庭生活中重要内容，如果夫妻性生活不协调，家庭生活就不会幸福。因此，夫妻之间要掌握性生理和性心理的知识，相互之间交换意见，相互配合，使夫妻双方性生活中获得最大的欢愉满足。其三，男女双方只要相爱，就可以在一起过性生活。只要是成人，自己愿意，就应当有为所欲为的性行为自由；性行为不一定在履行结婚程序后方可以进行，结婚以前自己可以随意和谁发生性关系，任何人都无权干涉，连法律也无权干涉；性行为是自愿的成人之间的私事，不应受传统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的限制。

不难发现，关于“性解放”、“性自由”的第一和第二种内涵是合理可取的，而第三种含义则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随心所欲的“性自由”，不仅助长了放荡不羁的享乐主义，而且必然带来严重后果，因而不负责任的行为。不管怎么说，人的性行为决不仅是性本能的发泄，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因此，一定要严肃对待，认真负责。

概言之，在现实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满足其性要求的最正常的方式是婚姻，即把性行为限制在夫妻的范围之内，这是合乎道德的；而有些人满足其性需求是通过婚前性行为、或婚外性行为、或强奸等方式实现的，显然这是不合法、不道德的。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人满足其性要求是通过男女两性的性交来完成的，这是合乎常理的，而有些人通过手淫、同性恋、模具或其他变态的方法来满足其性要求，这是不可

取的。不管怎么说,性行为的不同目的和表现方式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意识、道德面貌和文明程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因而,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①

(作者:陈金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博士)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

从绝对美到相对美是当代审美坐标的转换标志吗？

人是爱美的。青年大学生更是爱美的一代。在当代大学生中,伴随着“跟着感觉走”、“价值多元”、“崇尚自我”等思潮的涌动,流行着一种将绝对美到相对美视为当代审美坐标转换标志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美是相对的、个性化的,不存在统一的、绝对的美。于是,标新立异,成为当今青年大学生美化自身的突出现象。大家都是黑头发,我偏染成黄头发;大家都衣着整齐,我偏袒胸露背;大家都遵守纪律,我偏不守规矩;大家都以整洁为美,我偏以邋遢为美;等等。在评价事物的美丑价值时,认为以丑为美或以美为丑是正常的,否定约定俗成的基本审美标准。如何看待当今大学生中存在的这种审美现象呢?

一、古今中外论审美的主观性、相对性

说到认知到审美的相对性,并不是当代人的专利。古代中外美学家早就有过丰富的论述。与哲学判断和道德判断

相比,审美判断由于指涉情感判断,具有更多的主观性和相对性。西方古典美学有一句名言:“趣味无争辩。”中国古代美学说:“诗无达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情人眼里出西施。”说的都是审美的相对性。审美活动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被动反映,而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应。美在向美感的生成过程中会发生若干变异。《吕氏春秋·孝行览》谓之“遇合无常”,葛洪《抱朴子·塞难》谓之“憎爱异性”,刘熙载《艺概·文概》谓之“好恶因人”。黄庭坚《书林和靖诗》举例说明:“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恶止系于人。”这个论断涉及两层意思。一是“女色”——自然美的“好恶”“系于人”;二是“文章”——艺术美的“好恶”“系于人”。一言以蔽之,一切审美活动都是因人而异的。

挖掘这种“好恶因人”现象的心理机制,原因自有多样。

一是由于个性、嗜好各别。人的个性不同,兴趣、嗜好各异,按照“爱同憎异”的自然审美倾向,同一审美对象便会产生不同的审美评价。正如薛雪《一瓢诗话》所说:“诗文无定价,一则眼力不齐,嗜好各别。”由此所带来的“好恶因人”现象,常见的如“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异者闻诡而惊听”(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又“尚礼法者好《左氏》,尚天机者好《庄子》,尚性情者好《离骚》,尚智计者好《国策》,尚意气者好《史记》”(刘熙载《艺概·文概》),亦是典型的例子。

二是因为学问、识见不同。所谓“学问有浅深,识见有精粗,故知之者未必真,则随其所好以为是非”(宋濂《丹崖集序》)。“曲高和寡”的现象就是这样发生的。“夫歌《采菱》,发《阳阿》,鄙人听之,不若此《延路》、《阳局》。非歌者拙也,听者异也。”(《淮南子·人间训》)鉴赏者的知识结构不同,面对同样的对象就会有不同的审美认识和感受。所谓“曲高和

寡”，其心理实质乃是由于普通群众“学问”、“识见”水平普遍较低，不能“深识鉴奥”（《文心雕龙·知音》）、充分理解“阳春白雪”之类作品的奥秘而造成的“深废浅售”（《文心雕龙·知音》）。

三是因为所处的情境、所怀的情感不同。南戏《琵琶记》中《中秋赏月》一折，“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者，言言欢悦，出于（蔡）伯喈之口者，字字凄凉”（李渔《闲情偶记》），这是因为二人所处的情境有安否不同，二人当时所怀的情感亦自不同。常见到，“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淮南子·齐俗训》）。何以会发生“哀可乐者，笑可哀者”这样异常的现象呢？古人指出：这是“载使然也”（均见同上）！对现实的审美如此，对艺术的审美亦复如此。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指出：“……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

四是时运使然。“夫爱憎好恶，古今不均，时移俗易，物同价异。”（葛洪《抱朴子·擢才》）时代不同，人们的趣味好尚也就不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所以同一事物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评价。

五是出于习俗原因。普列汉诺夫在《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一书中以原始部落的大量事例说明，由于民族文化习俗的原因，许多在文明人看来是丑陋的事情，如穿鼻孔、嘴唇，脚腕或全身佩带沉重的铁片等，在原始部落的人看来则美不堪言。

六是出于成见。正如薛雪《一瓢诗话》分析的那样：“诗文无定价……一则阿私所好，爱而忘丑。如某之与某，或心知，或亲戚，必将其声价逢人说项，极口揄扬，美则牵合归之，疵则宛转掩之，谈诗论文，开口便以其人为标准，他人纵有杰作，必索一瘢以诋之。”

七是出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式的审美创造。审美不仅是反映,而且是生发;不仅是接受,而且是创造。这种表现性的审美活动,集中体现为“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简言之即借作品中的语言,作表现自己思想情感的媒介。这种能动的审美表现、审美创造,已超出了对象本身固有的内涵,用古人的话说,就叫“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谭献《复堂词录叙》)。

八是源于审美尺度的不同。如刘昼《刘子·殊好》分析人与动物面对同一对象的不同审美反应时指出:“累榭洞房,珠帘玉宸,人之所悦也,鸟入而忧;耸石巉岩……猿狖之所便也,人上而栗;……咸池箫韶,人之所乐也,兽闻而振;悬濑碧潭,澜波汹涌,鱼龙之所安也,人人而畏。飞鼯甘烟,走貆美铁……人好刍豢。鸟兽与人,受性既殊,形质亦异,所居隔绝,嗜好不同,未足怪也。”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生理结构,因而有不同的审美尺度,不同的感觉反应。就人类而言,尽管人与人的生理结构相同,但由于后天的习染,其审美标准不一定相同,因而面对同一对象的审美反应也就未必相同。《吕氏春秋·孝行览·遇合》举例说:“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谬,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故曰:‘遇合也无常。’说(通悦),适然也。若人之于色也,无不知说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若人之于滋味,无不说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人有大臭者,其亲戚、兄弟、妻妾、知识无能与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悦其臭者,昼夜随之而弗能去。说亦有若此者。”

20世纪以来,人类自然科学的飞跃发展改变、拓展了人们的世界观、哲学观,也改变了人们的美学观。过去,人们相信,人的理性是万能的,人类凭借理性完全可以认知世界的本质,包括美的本质。所以,中外古典美学尽管注意到美的

相对性,但并不否认有一个统一的美的本质存在,并从多方面加以探索和界说。19世纪后期,自然科学研究进入到大量元素组成的具有大量自由度的复杂体系,由于构成这种体系的元素数量庞大,它们呈现出复杂的随机运动,相邻元素之间、元素与整体之间缺少固定不变的联系,人类的理性已无法确定地对其加以认知。伴随着对人类自身理性的缺陷和对客观世界真理的不确定性的确认,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了玻尔兹曼、吉布斯的统计物理学,20世纪30年代前后,量子力学提出“测不准定理”,美国数学家哥德尔提出“不完全原理”,指出即使是最精确的数学也不能提供完全确定的知识。此后,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模糊数学、灰色系统理论等等,都和随机性、概率论、不确定性结下不解之缘。科学的发展终于使人认识到,世界本身并不是完全确定的,科学也不能给人提供完全确定的知识。自然科学尚且如此,社会科学更复如此。于是美学从统一的本质论研究走向形形色色的审美文化研究,美和审美的相对性、主体性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卡西尔指出:“艺术家的眼光不是一种被动地接受和登记事物印象的眼光。它是一种构成性的眼光。也只有靠着构成性的活动,我们才能发现自然事物的美。”^①卡西尔的这一论断在西方现代画家的自白中得到了验证。赫斯说:“印象派只反映瞬间的感觉和主观的情调……这是把纯主观的虚构‘看入’自然现象里去。”^②马蒂斯说:“‘看’在自身是一种创造性的事业。”“人们必须毕生能像孩子那样看世界,因为丧失这种视觉能力就意味着同

①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第1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赫斯编《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第11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

时丧失每一个独创性的表现。”^①艾略特《诗的用途》说：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头脑最简单的人可以看到情节，较有思想的人可以看到性格和性格冲突，文学知识较丰富的人可以看到词语的表达方法，对音乐较敏感的人可以看到节奏，那些具有更高的理解力和敏感性的听众则可以发现某种逐渐揭示出来的内涵的意义”。

如此看来，注意并肯定审美的相对性，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有理论根据的。可是，如果把审美的相对性夸大到绝对的地步，由此取消美丑的客观差异，则又走到另一极端，会产生以偏概全的后果。

二、审美的客观性和绝对性

当人们讲述审美活动中的个性差异时，已包含了对美丑标准的确认。“海有逐臭之夫”所以被认为是审美中的个别例外，恰恰从反面说明，审美的一般情况是以香为美，个别人“逐臭”并不能改变得了“以香为美”的审美标准。“情人眼里出西施”恰恰说明，有一个普遍、共同的人体美标准在，那就是“西施”；并且，美、丑的不同也客观存在着，对象并非西施，但在“情人”眼里则是西施。

美学史上，人们在指出审美的相对性、主观性的同时，也曾兼顾到审美的客观标准和绝对价值，以防止审美滑向无是非标准的相对主义。

中国古代美学家把这种拥有一定客观性、绝对性的审美活动叫做“正赏”、“正鉴”。刘昼《刘子·正赏》指出：“赏而不正，则情乱于实。”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提出“正鉴”的概念。在《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中，他说：“夫观文章，宜若悬衡然，增之铍则俯，反是则仰，无可私者。”这是对“正

① 赫斯编《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第51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

鉴”的具体说明。

审美的绝对性,指尽管审美活动因时、因地、因人、因情等等因素而呈现出个性差异,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个性、情感、阅历、志趣的人面对同一物体产生的美感毕竟会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共通性。因而,审美是有一定的非标准的。从客观方面说,尽管“憎爱异性”、“好恶不同”,但这并不能抹杀“妍媸有定”、“雅郑有素”(葛洪《抱朴子·塞难》)。一方面,如薛雪所说“诗文无定价”,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否认如苏轼所说:“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答毛滂书》)关于审美主观方面“无定价”而客观方面“有定价”的现象,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有一段精彩的概括:“好恶因人,书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损焉。”同样的意思,刘昼、宋濂也曾表述过。《刘子·殊好》曰:“声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恶之分,皎然自露……然而嗜好有殊绝者,则……颠倒好丑……”宋濂《丹崖集序》云:“文之美恶……随其所好以为是非,照乘之珠或疑于鱼目,淫哇之音或比之以黄钟,虽十百其喙,莫能与之辨矣。然则斯世之人,果无有知文者乎?曰:非是之谓也。荆山之璞,卞和氏固知其为宝;渥洼之马,九方歎固知其为良。使果燕石也、驽骀也,其能并陈而方驾哉?”

从主观方面说,所谓“正赏”、“正鉴”即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客观美学属性的普遍有效反应。审美是建立在一定的生理结构上的。同样的物种,生理结构相同,感知结构值相同(如人所见光波波长在400~760毫微米之间,所听声波每秒振动在200~2000次之间),快感的对象也就大致相同,或者说,同一物象也就能引起大致相同的美感反应。可见,美感的普遍性是检验美感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康德指出:美是不凭“欲念”就能“普遍有效”地引起快感的对象。美的反应具有“普遍有效性”。符合“普遍有效性”的美感反应才

是正常的正确的审美反应。他在《判断力批判》中说：“如果一个人觉得一个对象使他愉快，并不涉及利害计较，他就必然断定这个对象有理由叫一切人都感到愉快。因为这种愉快既不是根据主体的欲念（或是其他意识到的利害计较——原注），而是感觉到在喜爱这个对象中自己完全是自由的，他就会看不出有什么只有他才有的私人特殊情况，作为他感到愉快的理由。因此，他就必然认为可以设想：产生这种愉快的理由对一切人都该有效，相信他有理由去假定一切人都能感到同样的愉快。因此，他会把美说成仿佛是对象的一种属性……审美判断既然在主体意识中不涉及任何利害计较，就必然要求对一切人都有效。这种普遍性并不靠对象，这就是说，审美判断所要求的普遍性是主观的。”康德的意思是说，在不受任何情感、个性、爱好、习俗等“私人特殊情况”影响下，个体对某一对象做出的情感反应是最客观、最富有“普遍有效性”的审美反应，也是检验对象是否美的客观（其实是主观）标准。对此，《孟子·告子上》早就指出：“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刘昼《刘子·殊好》指出：“頵颜玉理，眄视巧笑，众目之所悦也，轩皇爱嫫母之魅貌，不易落英之丽容；陈侯悦敦恰之丑状，弗贸阳文之婉姿。炮羔煎鸿，臠螭臠熊，众口之所嫌，文王嗜菖蒲之菹，不易熊肝之味。《阳春》《白雪》，《噉楚》《采菱》，众耳之所乐也，而汉顺帝听山鸟之音，云胜丝竹之响，魏文侯好槌凿之声，不贵金石之和。郁金玄膾，春兰秋蕙，众鼻之所芳也，海人悦至臭之夫，不爱芳馨之气。”这都是由于这些人“性有所偏，执其所好，而与众反”，如果听从他们的审美感受和评价，就等于“倒白为黑，变苦为甘，移角成羽，佩莠当薰”。

三、审美应当兼顾相对性和绝对性

审美既是有相对性的,又是有绝对性的,二者可以同时并存。承认审美的相对性,并不能否定审美的绝对性;承认审美的绝对性,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抹杀审美的相对性。在保护审美的多元权利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审美是有一个是非标准的。这个正确的审美标准就是:不含主观好恶的普遍性快感以及引起普遍性快感的对象呈现的规律。

一种行为自己感到很愉快,但在别人看来很不舒服,那就不是真正美的行为。

一部美的作品,大家都拍案叫绝,如果我感受不到它的美,那就是我的审美素养出了问题。

普遍快感及其对象规律是关键。

引起人们普遍快感的对象规律大体可分为三方面:

一是纯形式。对象在形、色、声、味、嗅、质感等方面的构成或组合符合审美要求,能普遍地引起人们的愉悦,就是美。张柏芝、郭富城的形象能广泛引起人们的美感,也许会有个别不同意见,但我们无法否认他们是金童玉女。

二是道德功利内容。“可欲之为善。”善是人们在实现自己的生存欲求活动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一种行为,如果符合人们的道德标准,被人们的道德思考判断为善,那么,与之俱来的是情感的愉悦。善的普遍有效性决定了愉悦感的普遍有效性,这种善的举动就是美。利他、仁慈、公正、见义勇为等被公认为善,包含这种善的内容的行为和形象也被人们的情感认可为美。

三是真假是非内容。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的契合,是真。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把握对象规律,为的是更好地获取生活资料,为自身的生存服务。因此,人们对于真理总是怀着巨大的热情。真理和探索真理的真诚总是会受到人们广

泛的礼赞,并因引起广泛的好感而被判认为美。通常说“知识就是力量”,就是对包含着真理的知识的审美力量的精辟说明。不是吗?一个其貌不扬的人通过刻苦学习掌握了大量知识,他在人们的情感视野中便会发生由丑到美的微妙转变。这就是知识的力量,是知识产生的审美力量。

中外历史上,某些现象曾在一时、一地普遍当做美而大行其道,但置于更长远的历史、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来看,它们产生的愉快反应并无普遍有效性,所以最终还是被人类的审美实践淘汰了。这就提醒我们,在培养正常的审美素养时,我们还要树立一种“莫为浮云遮望眼”的见识和勇气,站在整个人类审美实践史的高度,来合理地辨别真正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美感规律和标准,不为眼前流行的某些庸俗、怪诞甚至以丑为美的审美趣味所迷惑,吸取中外美学史上关于审美规律的宝贵资源,学会真正地美化自己,以期获得人们的交口称赞。

再回到本文开头。

“跟着感觉走”,但“感觉”并不一定没方向。

“价值多元”,但仍有“普世价值”、“道德底线”。

“崇尚自我”,但“自我”只有在“人人”的认可中才能生存。

不是不可以染黄头发,不是不可以袒胸露背,但对于大学校园中的莘莘学子,不合适。而合适是通行的一条重要审美法则。

而不守纪律、邋遢肮脏,则是公认的丑,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可言。决不能颠倒美丑、混淆黑白。

余此类推可知也。

(作者:祁志祥,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7.

没有声音的音乐究竟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在 为普通高校学生开设的《音乐鉴赏》课程中，西方20世纪音乐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章节。其中，同学们尤其对无声音乐作品报以极大的兴趣和关注。《音乐百科词典》是这样为“音”和“音乐”注释的：音起源于物体振动。振动在空气中形成声波，声波传达于人的听觉器官，使人感知为音。音乐是以音为素材，通过各种表现手段，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以至观念的一种时间艺术。^①既然可被听觉器官感知的声音是音乐的基本素材，那么没有声音的音乐是怎样的呢？一部名为《4分33秒》的作品可以对此做出解答。1952年8月29日，美国先锋派钢琴家图德(David Tudor)在纽约东南部游览胜地伍德斯托克“演奏”这部作品时，静坐在钢琴旁不作一

① 缪天瑞主编《音乐百科词典》，第708、714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

声,只是用闭目点头的方法暗示每一乐章的起讫,三个静默的乐章分别延续了33秒、2分40秒和1分20秒,加起来一共4分33秒!

一、约翰·凯奇与偶然音乐

《4分33秒》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偶然音乐的创始人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所作。偶然音乐(chance music)是美国作曲家使用的术语,在欧洲被称为机遇音乐(aleatory music)。是指作曲家在创作音乐时有意放弃对音乐中某些参数(如音高、节奏、力度等)的主观控制,而采用一些客观的方式,如掷骰子、抛硬币、翻扑克牌、算八卦或由电脑程序给出的随机数据来加以确定,或者交由演奏者在表演时做即兴处理。这种音乐的特征是音乐在某种程度上的不确定性。自中世纪的基督教音乐开始,对音乐作品创作和演奏的高度理性和精确严密控制一直是西方音乐发展的主流方向。尽管如此,音乐创作和表演中的不确定因素始终存在于各个时期的音乐中。巴洛克时期的圣咏前奏曲就是一种根据圣咏主题做即兴变奏的音乐题材。19世纪的贝多芬和李斯特等都是即兴演奏的大师,据说他们即兴演奏的音乐比写在乐谱上的更为出色。偶然音乐作为一种音乐思维的真正兴盛并产生广泛影响是在20世纪50年代,倡导者正是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

约翰·凯奇1912年生于洛杉矶,是美国先锋派音乐的中心人物。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习非欧音乐、民间音乐和现代音乐,后又师从勋伯格^①。勋伯格认为他的这个学生,与其说是一位作曲家,不如说是发明家。其间,他因从事舞蹈伴奏工作而对节奏发生浓厚兴趣,并组织了打击乐队。40年

^① 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作曲家之一。

代,乐队在他的指导下,于纽约举行打击音乐会,演出了他的3首作品,崭露头角。此后,他与美国现代舞演员坎宁安(Merce Cunningham)长期合作,成为其舞蹈团的音乐指导。他在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是为打击乐或为他自己设计的“加料钢琴”^①而写的。40年代末,凯奇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东方哲学和佛教禅学,禅学教师是日本佛学者铃木大拙(Suzuki)。次年,他开始学习中国的《易经》。这个时期,他的创作发生显著变化,从此采用偶然方法进行作曲。他根据《易经》创作了第一首偶然音乐作品《变化的音乐》(1951),依靠扔硬币和查八卦来决定音高、时值等,音与音之间经常没有联系,或停顿很长时间,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同年,凯奇推出为12台收音机而作的《想像的风景第四号》。舞台上摆放12台收音机,每台由两人操作,一人负责电台的变化,另一人负责音量的控制。另有一名指挥,根据乐谱上的精确标记行事。作曲家事先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声音,全由当时电台播放的内容而定。

50年代起,凯奇实验把偶然方法与“混合媒体”结合起来,形成所谓“即兴混合媒体”(happening)。《HPSCHD》是凯奇与人合作的一部大型即兴混合媒体作品。通过电脑混合莫扎特、贝多芬、肖邦、勋伯格、凯奇等人的作品,用7台羽管键琴来演奏。使用51盒录音带,通过51个扩音器进行播放,同时采用彩色灯光效果和电影放映机、幻灯机等仪器设备。演出期间,听众可在大厅里自由走动。这一时期,凯奇和他的合作者、钢琴家图德去欧洲各地演出,大部分观众感到惊奇、可笑。也有一些作曲家认真地对待他的偶然音乐,并在

① 加料钢琴(prepared piano),即在钢琴琴弦之间插入橡皮、毛毡、塑料等各种小材料,以改变钢琴原来的音色。

自己的创作中加以实验。1958年,在纽约举行的凯奇作品回顾音乐会上,演出了他25年中创作的重要作品,反映褒贬不一。有的评论家认为,凯奇和他的几个追随者完全不是现代音乐的代表,而宁可说是一种例外。1964年,伯恩斯坦^①在纽约林肯中心指挥交响乐团演出凯奇的《黄道天体图》,每件乐器都接上了话筒,声音从大厅的6个扬声器传出。大部分观众在音乐会中途退出,最后演奏员向作曲家喝倒彩。此外,作曲家还曾先后在西雅图的科尼什学院、芝加哥设计学院和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并写有《无声》等著作。

《4分33秒》是凯奇的偶然音乐中最极端的例子。它是一首“无声作品”,其意义已不限于采用偶然手法。作曲家放弃对创作的一切控制,只规定作品时间的长度。凯奇认为,音乐厅里在4分33秒时间里可能发生的一切音响就是这首作品的“内容”。10年后的《4分33秒第2号》延续了同一方向的创作手法,由凯奇自己表演,包括在台上切菜,把菜放在搅拌机里,喝菜汁等。观众可通过扩音器听到各种动作的声响。

这些作品体现了凯奇的创作思想,即生活就是音乐,音乐就是生活。他认为,写音乐的目的不是试图使混乱变得有秩序,或表现创造的价值,而仅仅是使人们注意到正在亲身经历着的生活。一旦人们不以思想和愿望去干涉生活而让它顺其自然时,生活是多么美妙啊!放弃理想、信念,无休止地追求应该终结,音乐根本无力承受人寄予的如此沉重的使命。音乐只是生活,声音不是人为的理论或人类感情表现的工具。

除此之外,20世纪西方音乐还有类似的作品。约翰逊

^① 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美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

(Tom Johnson)的《为想像中的小号而作的天国的音乐》，全曲只有一个延长了的和弦，出现在五线谱上加第99线到103线之间。莫兰(Robert Moran)的《为带有钢琴家的钢琴而写的作品》做如此说明：钢琴家上台，直接走向大钢琴。他爬到钢琴里面，坐在琴弦上面。钢琴来演奏他。又如所谓“观念音乐”(Concept music)，音乐不是实际表演的，而是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

二、中国先秦时期音乐美学中的“非乐”观

无独有偶，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也提出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美学观点。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期。随着西周的解体，种族奴隶制的瓦解，各个阶级的代言人，各个流派的思想家，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互相拜论，互相影响，形成了一个学术思想极其活跃的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道家和墨家提出了“非乐”的音乐思想。他们在音乐的社会作用、审美观点、音乐与政治、伦理道德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道家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他们并不根本否定音乐，而是从崇尚自然的美学观出发，反对人为的音乐，提倡一种超物质的，纯主观的艺术。老子的学说里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例如“有无相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第十六章)等，都是辩证思想的体现。同时他又认为事物的矛盾变化是由一种被称为“道”的自然法则所支配。道是无形的，它的特性是使事物的矛盾变化循环往复归之于常。所以他认为“大音希声”，“五音令人耳聋”。这种具有辩证因素的美学观又被庄子进一步发展了，他认为这种音乐是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能靠微妙的精神共鸣与它融为一体，“虽无言而心悅”。道家的音乐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后世音乐观的产生和发

展，如嵇康的纯音乐理论和纯器乐流派都是吸取了道家音乐观的因素而形成的。

墨家的代表是墨子。他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及狭隘的功利观点出发，也提出了“非乐”理论，认为立国之本是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而音乐享乐是对劳动力的最大浪费。他的观点是针对当时奴隶主奢华的生活提出的，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群众基础。但由于他不理解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机械地看待了音乐文化与政治、军事的关系，从而为他的“非乐”思想带来了严重的缺陷。道家虽然在“非乐”上与墨家一致，但实质却不同——超越了功利的观念，摆脱了物质的局限，强调纯自然的审美观，体现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更高、更纯的音乐。

三、无声音乐带给我们的启示

首先，现代无声音乐的出现，有助于我们思考并揭示西方20世纪音乐变化发展的主要原因。

包括无声音乐在内的众多20世纪西方音乐流派的产生，是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和音乐本身的发展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重要因素：

其一，社会动荡、矛盾加剧，引起社会心理发生变化。两次世界大战对物质、精神文化的毁灭性破坏是19世纪任何战争无法比拟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造成经济危机，引起经济萧条、生产力破坏、社会混乱，旧的思想、观点、趣味被否定，信仰危机、精神危机由此产生。敏感的作曲家用音乐来反映残酷而真实的现实社会。凯奇的创作就表达了生活即音乐，音乐即生活的理念。

其二，作曲家自我意识空前增长。在此之前，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作曲家都把自己的创作活动与社会和群众联系起来，尤其自莫扎特等作曲家摆脱“封建主的奴仆地位”而成

为最早的自由音乐家开始。贝多芬的音乐充分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具有强烈的革命性。肖邦也一直用音乐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思念之情。19世纪的民族乐派更将此体现得淋漓尽致。自20世纪中叶,许多作曲家把音乐创作当做与社会无关的个人事业,自我表现、自我欣赏,将音乐孤立起来的现象普遍起来。除了凯奇,还有一些20世纪重要的作曲家明确把作曲当做纯粹的个人行为。勋伯格说:“作曲家力求达到的惟一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表现他自己。”^①“单纯就音乐来说,能够理解音乐需要说出来的东西的人,比较起来,是很少见的。这种有训练的听众从来就不是大量的,但这并不妨碍艺术家只为他们而写作。”^②为此,他组织了“私人演出协会”,只对极少数人举行音乐会。可见,20世纪音乐与普通群众之间存在着巨大隔阂。由此而产生的状况是,没有一种统一的风格,也没有几种占统治地位的风格,而是有多少作曲家就有多少种风格。

其三,社会的发展加快了时代创新的脚步。工业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0年达到顶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影响到了生活的各个层面,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在音乐上表现为追求新的材料、新的音乐语言、新的技法等。有的作曲家把自然界的音响、电子音响、打击乐器的音响作为音乐表现的基本素材;有的作曲家从日本、中国等非欧音乐语言中汲取素材;有的作曲家采用新的记谱法、作曲法以及新的表演形式等。观念的创新在20世纪音乐创作中尤为显著,不同的音乐风格、音乐流派所体现的就是不同的音乐创作观念。无声音乐也是观念创新的结果。

① 富兰克林著《勋伯格和其他人的音乐思想》,第80页,Macmillan 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② 马克《现代音乐概论》,第502页,利斯出版公司,1979年版。

其四，西方音乐在自我否定中继承发展。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到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直至20世纪，西方音乐总是在自我否定中继承发展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创作较之中世纪有很大变化，由于对人和现实生活的强调，音乐呈现出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世俗、明朗和情感化的倾向。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主要思潮，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反对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艺术史用巴洛克一词称呼17~18世纪中叶西方音乐、建筑、绘画、雕塑等艺术新的风格特征，即雄伟、奇异、夸张。巴洛克之后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家则趋于将音乐语言简化和规范化，在他们看来，巴洛克音乐过于夸饰和不够规范。所谓的“古典”，准确地说，原始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的古代”，那是西方文明两个伟大的时期。多少个时期过去了，人们常常回顾往昔，试图借鉴那个时期的文化精华。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已经这么做了，巴洛克初期亦然，但直到18世纪中叶才真正开始重新发现“古典”，特别是考古的发现，展现了一幅简朴、宏伟、宁静、有力、优雅的画面。正是由于信奉“适当的比率”和自然平衡的原则，使得古典时期的音乐风格迥异于巴洛克时期。浪漫主义艺术突破循规蹈矩的古典形式，用个性化的语言，不拘一格地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感受。浪漫主义音乐是一种个性化的、理想化的、富于诗意的、感情重于理智的音乐。先锋派作曲家则把传统的音乐价值毁灭殆尽。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的作曲家们一味地追求艺术表现的完全自由，因而他们音乐那种深奥玄秘的特点使绝大多数音乐爱好者为之瞠目。不仅形式体系与和声体系被摒弃，连整个旋律概念也改变了。虽然旋律只是音乐要素之一，但却是直接影响听众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旋律概念的改变，新的音乐作品使

听众困惑不解,因而与听众疏远了。无声音乐即创作者完全放弃对音乐要素的主观控制(时间和长度除外)。

其次,无声音乐显示了东西方古今音乐相通的现象。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先秦时期道家的音乐观与西方20世纪凯奇等人的音乐观可谓是异曲同工。时间、地域的差异使得这种相通尤为引人关注。东西方古今音乐相通的现象,是有其一定的历史、社会、哲学、美学等多方面原因的。从音乐本身的发展来看,西方浪漫主义音乐发展到晚期,已是日暮穷途。那无比激动的情绪,紧张不安的气氛,冗长繁复的抒情,已无法激起作曲家们的灵感。音乐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在现代美学“还原”观念的支配下,所谓“原始音乐”与非欧音乐被重视肯定下来。西方的艺术家把视角投向东方,如19世纪末,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多》中,运用了相对完整的中国曲调(包括民歌《茉莉花》旋律在内)共有6首之多。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交响声乐套曲《大地之歌》,对李白、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唐诗加以取舍,处理为歌词。凯奇的偶然音乐以及西方20世纪无声音乐所体现的创作思想也是受到了东方文化的影响。凯奇本人就曾学习过东方哲学、佛教禅学以及中国的《易经》。也正是这个时期,他开始采用偶然方法进行作曲。西方近现代音乐的复古现象是音乐思维发展的必然走向,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无论是西方音乐史上的“文艺复兴”还是“新古典主义”都证实了历史是沿着螺旋型上升的轨道向前发展着。西方近现代音乐思维是在一个更高、更新的层次上的回归。

再次,当代无声音乐的产生,会进一步引发人们对音乐的思考。

也许你对无声音乐无法想像,也许你不能接受这种音乐表现方式,但古自中国先秦,今至20世纪的西方,都有思

想家和音乐家提出了这样的音乐观念并付诸于创作实践。这些没有声音的“音乐”，为人们带来了诠释音乐的全新方式，并向传统的音乐观念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什么是音乐？应如何给音乐下定义？音乐究竟表现什么？什么是音乐的美？人们通常认为，音乐的美与音乐表现情感及音响运动本身的悦耳相联系。那么，如何对没有声音的“音乐”进行审美？如何评价这种音乐？是作曲家发展了音乐艺术，还是陷入了危机？

作曲家和听众对此众说纷纭，或许只有时间来评判这类作品是为后人披荆斩棘开拓新道路的先锋，还是在传统崩析、缺乏方向的历史时期出现的过眼云烟。通过对无声音乐所影射的西方20世纪音乐变化发展的主要原因及其所揭示的东西方古今音乐相通现象的论述与分析，笔者以为，这类音乐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是音乐观念脱离一般轨道的结果；是西方浪漫主义音乐发展极至的一种另辟蹊径；是意识观念领域的一种创新；是创作者表现生活本身的一种方式。同时，也给予听众以更多的想像和诠释空间。艺术历来被视作经过创作者、演绎者、欣赏者三度创作的过程。无声音乐显然较之以往更注重听众的第三度创作及对音乐的参与性。尽管无声音乐是音乐存在的极端方式，但也由此体现出音乐以任何形式存在的可能性。近现代音乐思维正向着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发展。这并不是个别、偶然的现象，在相同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经济基础以及姐妹艺术相互影响的状态下，其他一些艺术门类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再观中国音乐的发展，这类无声音乐所体现的音乐观念的创新，也可为其提供新的视角。求新求变始终是人类审美观念的重要法则，也是推动音乐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从

中国传统音乐的时空流变中可以发现,传统音乐始终是在“异化”和“同化”的辩证统一过程中逐步发展的。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原音乐和西域音乐开始了双向性的交流;至唐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歌舞音乐荟萃中原,在多种民族音乐并存的基础上,造就了中国音乐新颖的时代特色,其深远影响波及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我们今天所认定的“民族乐器”,如琵琶、胡琴、管子(笙簧)、唢呐、扬琴等,在历史上却都是外来乐器,它们在历史时空流变中被同化而逐步演变为我国的民族乐器。可见,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变异发展和借鉴并吸收外来音乐的技法是中国音乐文化的优良传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音乐界就出现了有关中西文化“大碰撞”的争议,90年代末更趋激烈。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其内在独特机制的固有衍变规律,同外来西方音乐文化不断冲击和交融,从而向近现代化转型。历史和现实证明,21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西方音乐之所长,从中西音乐的交融中开辟新路,同时融入时代生活的动力。

(作者:阮弘,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生)

8.

网络文化是现代青年话语方式的新时尚吗？

自 从凿石结绳时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均与器物的变化紧密相关。抑或可以说，正是显在器物的变化与发展反映了人类深邃文明的进步。历史直观地告诉我们，每当人类发现、发明某一种具有重大影响作用的事物时，人类的发展命运就面临一次全新的抉择，旧有存在会在惯性中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生事物造就的新存在方式。印刷术、蒸汽机、无线电技术、有线技术，直到上世纪末风起云涌的网络技术，莫不再改变和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感觉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话语方式。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作为社会结构中最不稳定的人群之一，对新生事物最为敏感和最感兴趣。他们通常是整个社会中实践新生事物、改变旧有生活的领军人群，几乎也成了最早受惠新技术好处的一大重要人群。网络诞生以后，当代青年以其特有的热情方式，比较早地接纳了这一新生事物，受其影响，

也对其发展进行能动创造。

一、网络之于当代青年

从青年在互联网用户中的数量和质量可以看到网络对于青年成长的重要性和青年对于网络发展的重要性。1994年5月21日,NCFC(National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开通与国际互联网的专线连接,并完成我国最高域名CN主服务器的设置,真正实现TCP/IP向全部NCFC提供完整的国际互联网服务,标志了互联网在中国正式登陆。时至今日,不过短短10年,用户已是成百上千倍递增,其中增幅最大的人群莫过于青年。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3年7月公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用户的年龄分布是:(见表1和图1)

表1

18岁 以下	18~24 岁	25~30 岁	31~35 岁	36~40 岁	41~50 岁	51~60 岁	60岁 以上
17.1	%	39.1%	17.2%	10.3%	7.4%	6.0%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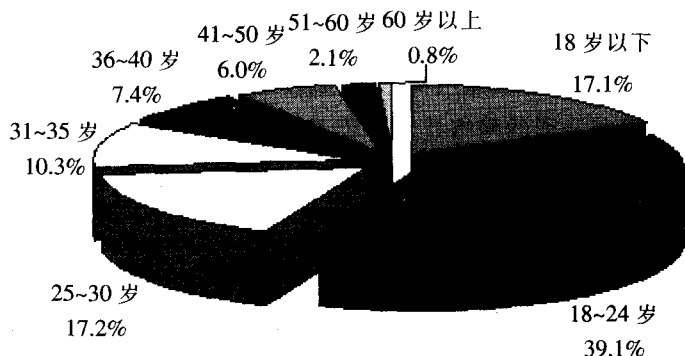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现有上网用户总数已经超过6800万人(2003年6月30日国家公布的统计结果)。而根据上述数据分析,这些用户中,18~24岁的青年所占比例最高,达到39.1%,其次是25~30岁(比例为17.2%)和18岁以下(比例为17.1%)。30岁以上的网民随着年龄的增加所占比例相应减少:31~35岁的网民占到10.3%,36~40岁的占到7.4%,41~50岁的为6%,只有2.9%的网民在50岁以上。若按人们一般认同的14岁以上、35岁以下的人群均归为“青年”的话,那么我国上网人群中超过80%的人都属于青年,可见网络对于青年影响之重要了。事实上,自互联网在我国正式登陆起,35岁以下的青年人始终就是网络使用者中的绝大多数人群。(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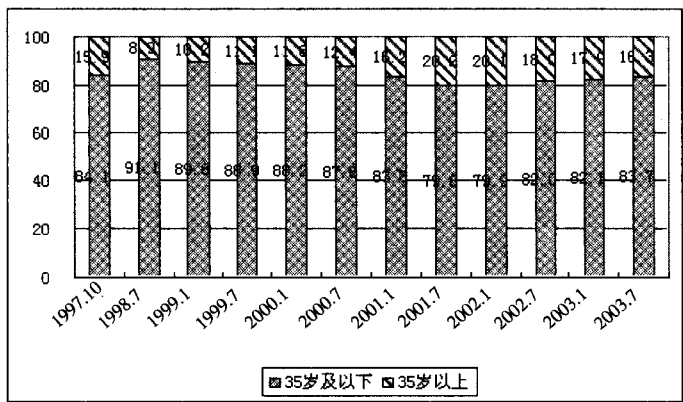


图2 历次调查网民年龄分布(%)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进一步分析了网络用户的职业分布情况:(见表2)

这些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网民中学生所占比例最多,达到了30.1%,远远超出其他职业的人群,使得每三个上网的人中,就有一个是学生。(见图3)而学生自然是青年人群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子人群。其他人群中,亦有不少以刚刚

略出学校大门的青年人为人群主体。

表 2

国家机关、党群 组织工作人员	企事业单位管 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教师
8.0%	7.9%	15.9%	7.7%
办事员等协助 人员	商业、服务业 人员	农、林、牧、渔 工作人员	生产、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 及有关人员
9.0%	9.1%	0.9%	5.8%
军人	学生	无业	其他
0.8%	30.1%	3.7%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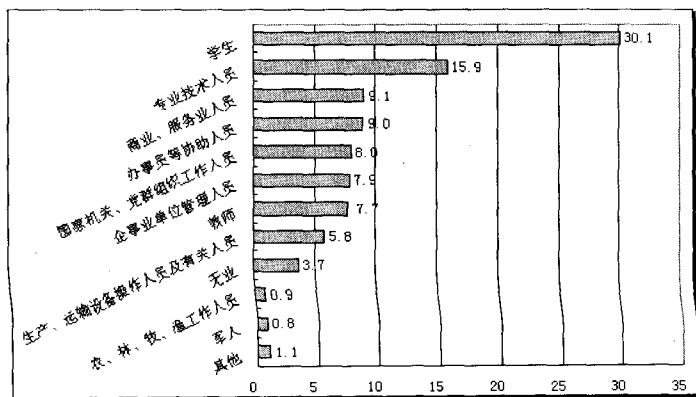


图3 网民的职业分布 (%)

之所以青年学生所占比例会高居榜首，远远超出有关的专业技术人群，并且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主要是因为，与其他人群相比，青年学生思想更为活跃开放，更易受到新生事物的影响，更易跟随时尚潮流的步伐前进。在客观上各类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平台的构筑也为学生上网或者接受网络文化的洗礼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各种商业性、非商业

性网站上到处可见的信息获取、聊天交友、电子购物和网络远程教育也对学生进行网络操作和网络思考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正是因为这些有利因素影响,接触网络的青年学生在不断增长。就在2003年里,学生上网人数在比例上又比上年末增加了2.1%,绝对数量增加了392万,这一上扬趋势是历年的延续。(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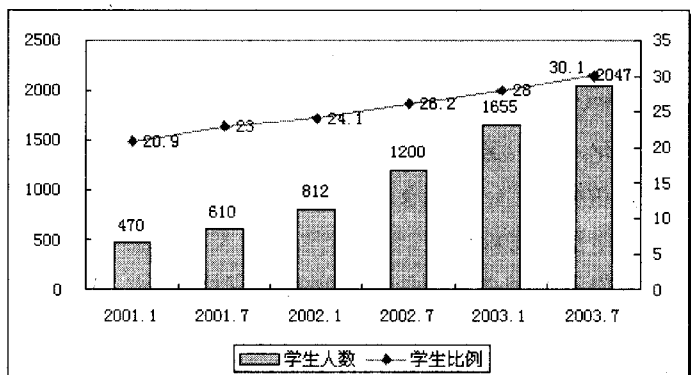


图4 历次调查学生人数(万人)及比例(%)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的上网学生人数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在校学生总数(至2002年底,包括普通小学、初中学校、各类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学校、普通高中、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在校学生共22678万)的9%,与半年前相比增加了1.6%。这是就全国整体范围而言的,在发达城市和大专院校中,比例将远远突破50%,部分高校学生上网已经达到100%。这说明网络在青年中的影响程度正在飞速提高。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在频繁接触中形成和沉淀的网络文化必然在青年中生根发芽,并日益对其生活、思维、行为以至话语方式发生重大影响。

二、网络文化中话语方式的特点

网络文化是网络发展的必然产物。网络在狭义上,仅指

局域网(LAN:Local Area Network)、广域网(WAN: Wide Area Network)、高速局域网(high-speed LAN)和互连网络(Switched Internetwork)等通过中间网络设备连接多个独立网络的集合。网络文化却不可如此狭义地理解。什么是网络文化,它的根本意义何在,至今学家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地说,网络文化绝非网络应用过程中所显现的物理实在的派生物,它是另一个世界文化特质和文化产品的集合体。网络文化源自网络,以网络为原始依附,它又超出网络,回归人性。更深层次地说,真正的网络文化,意义要远远超出文化本身,因其消灭了文明社会以来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等级差异,而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诸多领域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不能用现实文化的眼光理解网络文化,正如地球人不能理解外星人在想什么。这两种文化根本上不是在一个维度中相提并论的事物,只不过目前我们的理解力尚处于“青春成长期”,所以对于未来真正网络文化中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以至话语方式只能姑且用我们的方式去理解。关于未来的话语方式及其存在价值,早在网络时代到来以前,许多智者学家已经在呢喃和思索。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演绎的“语言与世界同构”,^①到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中概括的规范言语主体、显现语用规则是交往的基础;^②从康德中世纪式的律令式话语,到福柯思考话语如何改变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各种思想纵横交错,而其研究的核心不外是:人类话语方式终极关怀在哪里?

① 维特根斯坦著,郭英译《逻辑哲学论》,第38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② 哈贝马斯著,张博树译《交往与社会进化》,第63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网络文化下的话语方式多少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特点。正如网络文化苦苦寻求消除人在物理特质上的个体差异而真正体现人的平等性一般,网络文化中的话语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消除了话语与生俱来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进而为实现人类本质解放奠定基础。这是网络文化的话语方式革命性所在,它无意间撕碎了传统话语“符号暴力”的丑恶嘴脸。法国人布迪厄不无感慨地叹息:话语暴力天生就是一种特殊的工具理性,其实施过程是由暴力对象以他者的自我异化方式来进行,被统治者协助统治者统治自己,被剥夺者协助剥夺者剥夺自己,被阉割者协助阉割者阉割自己。^①

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话语方式,它们所内涵的意蕴各不相同。早先的蒙昧时代以至黑暗的中世纪,话语是一种权威的表征。由于缺乏足够的精神反抗力量、物质反抗力量和制度反抗力量,居于下层的民众通常只能心悦诚服地顶礼膜拜于权力颠峰的话语恫吓。话语此刻占据了图腾象征的宝座地位,它为它的主人亲手炮制了一具具活生生的精神镣铐。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言,话语是概念出现的地点,是概念的网络,话语的常数只是它的系统性,它不给概念命名,但是它却偷偷地把它的触角伸向概念的理想化结构,改变概念的内涵,当然也改变其外延。^②福柯的意思是话语已非本原的话语,而是异化的话语。——这是早先时期话语方式的总体特征。

晚近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昌明,人们的民主意识

① 皮埃尔·布迪厄·康华德著,李猛等译《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第320页,1998年版。

② 米歇尔·福柯著,谢强等译《知识考古学》,第77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和人性逐渐复苏,话语的方式和性质也在悄然演变。解构主义的大师们不止一次呐喊道:今日的话语仅仅只能被视为一种平和的叙事,它的功效也只是在于传达某种信息。受话者仅仅是受话者,他并不需要对所受的话语言听计从,更不需要将“受话”和“行事”必然地挂起钩来。而说话者则是每每陷入话语的悖论,他们不再明白自己的话语到底是内心的独白还是某一种包装的产品。此时,人类话语方式凸现的特征是:在“符号暴力”与“内心独白”间扭曲与挣扎,并且日益闪放出后现代理性的光芒。

网络时代以后,虚拟空间与物理实在空间的本质不同为人们思维方式的革命带来契机,也为话语方式更惟一体体现本体的意识搭建舞台。在网络的世界里,人们再也感觉不到习以为常的上下、左右、前后的方位概念,也完全不可能触摸到屏幕内闪现的网络事物。当全副感官输入装置起来的网络操作者坐在我们面前时,他们仿佛是,而且的确是不再属于我们的物理实在空间了。他们的思维悬浮在虚拟空间当中,摆脱了肉体的束缚,沉浸在充满数字情感的虚拟世界中。^①网络为话语者提供了太大的自由空间,这里全然没有物理实在空间无法摆脱的心灵悸怕与外部指令,话语方式变得前所未有地轻松自如和随心所欲。网络交流中没有政治上的强者,没有经济上的富者,没有文化上的巨人,每一个人都可以任意挥洒来自内心深处率性质朴的原始萌动。语言的文法结构和意识形态已经退居次要,也不再需要违背心意地迎合与顺从。这是网络话语方式的魅力所在,——网络亦即成了展示人类后现代文化的魅力舞台。

^① 刘玉祥《关注现实,体现时代性》,载于《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概论》,第166页,谢海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三、网络文化中话语方式对当代青年的影响

网络是个全新的事物，网络文化亦是千万年来人类所不曾感悟过的全新文化模式。饱含后现代性的话语方式对人们一贯的传统思维产生巨大的冲击。人们在无所适从中又不得不承认：人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网络和自己的依存了。有人做过一个实验，调查若是将一群人隔离起来一年不准直接和社会接触，他们将首先选择什么方式作为主要的信息沟通渠道。结果有半数人(49.7%)选择了一台能够浏览互联网的电脑，其中不乏有人进一步提出最好能够提供互交服务，即收发电子邮件、开放聊天室、允许登陆BBS等。而选择传统交流方式广播电视的只有28.4%，选择报纸的只有26.8%，选择电话沟通的只有8.1%，而选择另一种网络形式——手机短信交流的竟也有9.4%的人。^①

可见，网络交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尤其在青年人心目中更占据压倒性优势。2003年4、5月份“非典”肆虐期间，各高校执行“外地返校学生隔离制度”，学生从疫情地区返校，不论什么情况，都要进入隔离楼进行为期一两周的隔离观察。被隔离的学生并没有觉得枯燥无聊，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各高校都给被隔离的学生配备了可以上网的电脑，学生虽然足不出户，却能及时了解外界信息，并和外界进行不见面的畅通交流。这里面，网络起到了以往任何一种传媒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是，人们在庆幸找到一种更有效的沟通交流手段的同时，不得不冷静地思考越来越普及的网络交流究竟会对人类、特别是青年带来什么福祉和问题；标注上后现代理性记号的网络话语方式对青年又会有什么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① 数据来源：《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情况分析报告》。

第一,增强了民主意识。生活在当代中国的青年,基本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接触世界的一代。在现实社会中他们已然灌注了较强的民主意识。网络文化不再弘扬权威人物,也鲜有强权政治,更加主张个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其话语方式出发点明确定格在了以“我”为主思维格局上,并且被染上了浓郁的“平民”色彩。青年在网络文化的熏陶下,有利于消除历史传统凝聚在心底的些许“权威意识”,从而锻造民主品质。这一点是现代社会的必备素质。

第二,培养了平等观念。中国人传统观点中,长幼有序、尊卑分明,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异化人性的桎梏。网络文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网络面前人人平等。网络上没有,也不应该有强人一头的人或事,话语对象对于说话主体而言理论上是陌生而平等的(抛去现实中的实际接触因素)。正如网络上的一句名言,你不知道你的话语对象是人还是一条狗。既然对象的属性都是陌生的,自然不会贸然揣测他是权威还是卑微,最好的话语方式就是灌注平等观念。平等观念同样是青年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的根本。

第三,塑造了创新精神。当代青年生活在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每时每刻拥有知识洗礼的机会。他们本身又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和善于吸收养分的素质。后现代性很强的网络时代话语方式并不强调逻辑的合理,少有循规蹈矩,相反追新逐异的意识比较强。青年在这样的话语氛围中久经熏陶,便常会用批判和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遇见挫折也会独立地思考改善、改进的新方案。方兴未艾的原创网络文学则是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网络赋予人们创新的机遇。而这种由网络话语而帮助塑造的创新精神在现实社会中将展示强大的冲击力,为整个人类创造更大的精神、制度和物质文明做出贡献。

第四,汇聚了现代品质。当今时代是个透明的时代,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大众化传媒和小众化传媒的交互传递,大大加快了人和人接触与了解的频度。单个的人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加受到他人的关注。拥有优秀的现代品质成了人人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网络文化中的话语方式为锻造和汇聚人们身上的优秀现代品质提供了工具和舞台。无可选择地与陌生人进行熟练的交流锻造了青年开放活跃的个性;推心置腹地与话语对象交换各种意见与看法形成了青年率真质朴的品格。而责任感、守时、果断、诚信等等优秀的品质都会在网络文化特有的话语方式中一一得到塑造。

当然,万事均有利弊良莠的两面性。网络与网络文化并非没有负面性。批评网络与网络文化的声音从来也没有间断过。过滤掉一些并不真正了解和懂得网络文化的声音之外,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网络背景下的话语方式对于青年而言,确实存在不良引导的潜在倾向,比如:痞、否、丑。网络话语的漫不经心、随意调侃往往会养成青年“痞”的不良品质;过度地批判现实,甚至仇视现实,会让青年沉迷于虚幻的网络世界,从而简单地“否”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而网络虚拟无法验证孰是孰非的巨大漏洞,会让一些心术不正之徒利用网络话语方式的特征传播一些丑陋信息,对青年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然而网络毕竟只是网络,工具毕竟只是工具。是利是弊,是良是莠,归根到底还是看具体的使用者。就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样,网络文化下的话语方式已然客观地放在人们面前,它的特征、特性也不会因为人们的主观意志而随意更变。接下来的问题只能是,作为万物之灵、网络的创造者和主宰者的人是去选择“载”,还是去选择“覆”了。世间

的许多道理原本就是相通的。

(作者:刘玉祥,上海交通大学教师,硕士;徐国权,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处处长,副教授)



9.

“黑客”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吗？

一个小小的病毒程序，或者说一组很不起眼的邮件炸弹，就会导致证券交易中心的突然休克，国家安全人员的躁动不安，大型社会设施的全面瘫痪。这一切对大学校园的学生来说，惊讶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后的黑客。不了解黑客的青年大学生对黑客的直觉往往是：很酷，也许还跟犯罪或者破坏有一定的关系，总之不是什么正面角色（这与媒体报道的关于黑客的骇人听闻的破坏力有关）。可是当被问道“黑客是不是创新人才”时，突然发现问题不是想像的那么简单，居然把“黑客”与“人才”、还是炙手可热的“创新人才”联系在一起，问题就变得严肃了。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先弄明白“黑客”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对黑客的面目有了一个全面与客观的认识，才能做出接近于事实的判断。

一、黑客、经典黑客、新一代黑客

长期以来关于黑客的各种问题与争论就没有停止过。

比如闯入计算机是恶作剧行为,是轻微的过失,还是犯罪?如果闯入者还是少年,他们只是一些误入歧途的少年犯还是难得的电脑神童?不论闯入者年轻或是年长,是应该表扬他们的创造性呢,还是惩罚他们的邪恶用心?通过暴露网络中的缺陷,黑客们实际上从事的是推动信息共享和推动网路安全化运动的公共任务吗?计算机系统本身存在着安全漏洞与安全隐患,难道能把黑客活动发生的原因全部归咎于他们吗?如果一个黑客曾经攻击过某家公司而又想申请成为该公司的安全顾问,这是一种勒索行为还是这家公司的幸运?黑客只是进行无害的智力探险的浏览者,还是践踏隐私、患有窥视病的打探者?应该把他们视做潜在的间谍或是工业密探吗?所有这些问题引发的责任是不是都要由黑客来承担,这是不是黑客的群体特征?围绕这些问题产生过无数的争论,似乎现在也没有个定论。

毫无疑问,黑客已经被看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被赋予了很多特殊的东西。从文化角度讲,“黑客”主要源于英文单词HACKER,HACK的原意是劈斩、开创,做一件漂亮的事情。在美国校园里,它往往是恶作剧的代名词;而《现代英汉词典》对HACKER的解释是:(1)在数据安全领域,一种未经授权、又企图躲过系统存取控制程序的检查而进入计算机网络的用户(In data security, an unauthorized user who tries to gain entry to a computer network by defeating the system's access controls);(2)一个未经许可“侵入”计算机程序系统的人,他或是怀有恶意破坏计算机程序系统,或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而制造计算机病毒(In computer virus, a person who “breaks into” computers without authorization, either for malicious reasons or just to prove it can be done)。而如果把这些解释归纳为一个定义,黑客就

是指那些自身拥有深厚的计算机知识，并以此为手段进入其权限以外的计算机系统的人。对于这个定义，我们应该注意：首先，黑客要掌握深厚的计算机知识，这是最基本的前提；其次，黑客是利用技术手段而不是通过非技术手段来达到目的；第三，进入自己权限以外的计算机系统。还有一点应该给予特别关注——黑客进入计算机系统做了些什么在概念里并没有明确说明，也就是说，黑客本身应该是一个中性词，并不包含贬义和否定的价值取向。采用黑客手段进入权限以外的计算机系统既可能做了破坏，也可能仅仅是发现系统本身存在安全漏洞而已，而破坏并不是成为黑客的必要条件和群体特征，而通常把那些存有破坏目的的称为垮客(CRACKER)。强调这一点在于全面掌握黑客的特征，防止错误理解，进而带有偏见地看待黑客。或者可以换句话说：“黑客”也应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单纯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无害探索的是为狭义的或者经典的黑客；而带有破坏目的的只能属于广义的黑客，或者称为“垮客”(CRACKER)，在新闻界的推波助澜下，他们使得黑客成了“口令大盗”和“电子窃贼”的代名词，是阴险恶毒的侵略者，公众对黑客的印象也由此变为负面，这是不全面的。

黑客最早始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的计算机于1946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现，而最早的黑客出现于麻省理工学院，包括贝尔实验室都有。最初的黑客活动一般都是一些高级的技术人员，他们都是计算机高手，有研究系统漏洞、进入别人网络的嗜好。当时的黑客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广义黑客(或者垮克)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他们往往被认为是电脑史上的英雄，没有他们骑士般的探索就没有我们今天如此廉价的信息资源。他们的行为准则与理念包括：对计算机的使用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和完全的；所有的信息都应当是免费

的;怀疑权威,推动分权;你可以在计算机上创造艺术和美;计算机将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好(引自利维的著名的“黑客道德准则”the Hacker Ethic)。没有人把这些准则写进宣言,但是,它们却成为早期黑客们在塑造计算机技术时的行为方式。大名鼎鼎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黑客的原产地,还包括贝尔实验室。而现在已成为许多人的崇拜偶像和追求目标的比尔·盖茨、保罗·艾伦等计算机精英几乎无一例外地出身于早期黑客家族,沃兹(乔布斯创业伙伴,苹果机的发明者)就是一个黑客组织的成员,他曾经回忆说自己非常怀念过去在黑客俱乐部里的日子和那时的日日夜夜的工作。由此看来,在那样的组织或是俱乐部里面生活应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而他们的活动对我们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共产主义所设想的生产资料的共享,就目前来看还难以实现,但是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信息的共享,却因为黑客的探索而变得更接近共享,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早期经典黑客受到推崇的原因。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今天的黑客聚焦地到了网上。黑客们再不是像二三十年前那样面对面地传递信息和工作,而是通过网络,他们仍然在干一些有趣的事,如开发免费软件、免费测试一些软件,传递自己的技术成果等等。可以说,像我们熟知的许多免费软件(包括盗版的)都是由这个新时代的黑客们所开发或提供的,如Linux、Winamp等等。这时,黑客的队伍不断扩大,黑客的外延也进一步扩大,垮客(Cracker)这样的“黑客变种”就是在这时大量进入黑客阵营的,黑客们也越来越多地被冠以“信息大盗”、“盗窃者”、“侵略者”的名声。这一批黑客的特点是,数量比以前大为扩张,而且多半不再自己动手研究技术,而是直接以第一

代经典黑客开发出的工具为武器,随兴而至,做一些有谓或无谓的攻击。而且在这一代黑客中破坏目的成分在增加,或者说黑客们行为阵地的转变也带来了行为准则的改变,老一辈经典黑客的行为准则已经不再约束他们,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能得到真正的经典黑客的承认或是尊敬。尽管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也被人们视为“神秘人物”或是得到崇拜。现在虽然仍然有技术高超、致力于探索的经典黑客,但是人数正在日减。随着许多“资深”的经典黑客的离去,意味着真正怀有恶意的电脑入侵者(CRACKER们)越来越多,而与此同时电脑入侵的次数也在日益增加。

二、黑客推动了网络安全的发展

当今社会,商业、交通、公用事业、国防、航天以及其他重要活动的进行都离不开计算机网络,而网络是安全的吗?如果没有网络的持续和正常的运转,我们的社会将陷入怎样的困境?随着社会对计算机网络的依赖日益加深,人类是否在蒙受更大的风险?在黑客出现之前没有人问这些问题,或者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黑客活动恰恰暴露了电脑安全的不足之处,提高了公众的安全意识。客观地说,黑客行动对网络安全起到了启蒙作用,没有黑客,就没有网络安全这个概念。

不可否认,网络的漏洞不是因为黑客而存在,而是本来就有的,万无一失的安全系统是根本不存在的。黑客运动从开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推动网络安全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迄今为止,所有的高技术方法都几乎立刻遭到黑客的反击,如果不及时发现,会给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风险,就像北美大停电一样,电网的漏洞也是本来就有的,只是没有人重视、主动去发现漏洞并加以解决而已,结果可想而知。这就好比再完善的法律总会受到更精明的罪犯的嘲

弄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犯罪推动了法律的完善。同样,黑客推动了网络安全的发展也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个意义上

说,网络安全产业的兴起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要不哪会有“趋势科技”的异军突起?

1995年9月,两位加州大学的研究生黑客伊恩·戈德伯格和大卫·瓦格纳一起发现了网景公司设计的用于人们通过环球网进行信用卡购物的软件程序中的一个漏洞。他们将其公布于众,网景公司随后推出了该程序的修正版。但紧接着,他们又公布了新的漏洞,向商界发出公告。由于各公司都抢着将酝酿中的交易输入互联网络中,人们很快就发现那些声称金融交易安全无虞的公司的声明受到了现实的考验。戈德伯格和瓦格纳遵循经典黑客文化群由来已久的查获缺陷并予以公开发表的传统,这样做的目的是无休止地要求完善软件。这与官方或企业的做法不同,他们对其发现的缺陷守口如瓶,或者对别人发现的缺陷保持缄默。要不是黑客们不断发现微软的漏洞,很难想像微软会主动公布自己的漏洞。没有人怀疑或指责过这些黑客们的探索行为,甚至包括网景公司本身,后来网景甚至悬赏发现漏洞。

一批批的黑客高手已转变为网络安全专家,他们发现安全漏洞,研发出众多安全技术和安全软件,对计算机或网络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一份调查还透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近1/3的电子商务网站甚至没有使用防火墙。对此,专家们指出,导致黑客攻击愈演愈烈这种恶果的其实正是身为受害者的IT(信息技术)管理人员,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安全问题重视不够,不愿意花费额外的时间和金钱保护公司网站的安全。所以,是否能把网络受到攻击的责任全都归到黑客们承担呢?显然不能。客观地讲,要不是黑客们一再的提醒网站存在安全漏洞,最后一旦漏洞爆发,受害的还是普通

的用户。

应该看到,在现实的背景下,信息安全人员和不愿利用计算机进行盗窃、复仇及其他明显的犯罪活动的经典黑客,已经开始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合作。很多公司在招聘网络安全人员时对黑客青睐有加就是黑客已经渐渐融入主流的一种表现。

就如同汽车的增多必然导致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一样(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任何一场战争),没有人因此认为要消灭汽车、由汽车承担这一切,或者司机承担所有的责任,只能是让汽车的性能更好,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更强。网络与黑客也是如此。

三、黑客与计算机犯罪有必然联系吗

不得不说一说使得黑客失去最初的浪漫英雄主义色彩而背上不良名声的计算机犯罪。让我们看看计算机犯罪到底跟黑客有什么关系。

一个医学上的隐喻把黑客描述成为病态的电脑瘾君子,他们无法控制自身的不负责任的强迫性行为。这样的认识不应该把我们导向一个误区,即把黑客看成病态的一群,这对黑客是不够公平的,因为将其等同于“瘾君子”,可能会使我们的心目中产生一个头脑麻木的病态极端的形象,而忘记了黑客活动中具有创造力的激动人心的一面。在很多人(尤其是搞技术的人)看来,黑客是网络安全界里非常高的、象征着荣誉的称号。在网络的世界里也许很难用法律去监督和约束,但在经典黑客们当中流传着一种精神,一种善于挑战,坚忍不拔的精神,在黑客守则里,还有一条不恶意破坏,不随便翻动别人文件的规定。事实上黑客针对商业犯罪的行为不多(尤其是在中国),媒体上出现一些所谓的商业黑客犯罪行为,实际上多属采用物理手段,而非真正意义

的黑客手段。

再来看看那些利用电脑犯罪的人动机何在。根据最新的对电脑犯罪的研究发现,电脑犯罪的动机不外乎:(1)怨恨。比如,电脑罪犯感到其雇主本该提升自己、增加薪水或以其他方式承认他/她的工作,电脑犯罪活动成为他/她反击雇主的方法,也希望借此引起别人的注目;(2)赌性。与电脑安全人员作对或是突破障碍进入电脑软件系统成了一场赌博游戏。(3)挑战。与上面的情况相似,黑客认为自己是在与“他们”作战,从破坏电脑系统中获得极大的精神快感;(4)金钱。有相当一部分电脑犯罪是为了赚取金钱。

从这些动机可以看出,采用电脑手段犯罪(或者称为黑客手段)与以其他手段犯罪的动机并没有区别。或者换句话说,犯罪的动机没变,变得只是手段更先进了。并不是只有电脑高手才会报复雇主,安然与世通的雇员不也是因为被解雇才反戈一击的吗?如果他们官运亨通,大概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看到这些“说谎公司”的真相,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可怜的投资者们上当受骗呢。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些犯罪动机归为黑客的群体特征,或者认为黑客更容易犯罪,这是不公平的。

美国一家安全顾问公司的总裁菲利普·金说:“我的工作就是阻止黑客侵入计算机,所以别人可能会认为我的态度很奇怪,但我觉得,大部分黑客都是好人。”金是一个电脑犯罪专家,但他说他的目标“不是抓住黑客然后把他们关起来,而是理解他们,利用他们的知识阻止真正邪恶的破坏分子。”这应该是对黑客们的接近于客观的评价。

而目前电脑入侵者的增多,与电脑技术和网络的发展是相关的,电脑的普及和技术本身的发展使得成为广义上的黑客更加容易,特别是只是利用别人的黑客手段进行无

谓攻击的垮客。将电脑犯罪和电脑受侵犯的增加归为黑客本身的问题,让黑客来承担这一切是不公平的。事实上那只不过是电脑普及带来的犯罪工具的多样化而已,与黑客本身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

那些让媒体过分渲染的黑客犯罪,在我看来与做假账的会计师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手段不一样而已,而就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而言你能说假账更小吗?可是却没有人问你会计师是不是人才。

四、黑客与创新人才究竟是什么关系

再回过头来看看所谓的“创新人才”应该怎么理解,跟黑客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

人才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不同的环境对人才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表述。一般来说,“才能杰出者”即为人才。上升到人才学角度则认为,以其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较大贡献的人就是人才。由此可见,人才应具有创造性、社会性和进步性。

近年来创新人才成为新宠。因为知识贬值的速度在不断加强,创新人才被认为是未来社会中最稀缺的人力资源。但事实上,创新人才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学术界对创新人才并没有一个清楚而准确的界定。要评价和界定是否是创新人才或者是否具备创新的能力和素质,这本身就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

有专家认为,所谓创新人才,就是异质性创新知识的拥有者。这里的异质性创新知识,通常表现为个人所拥有的独特经验、技能和心智模式。未来的创新人才都必须在某一专门知识上进行持续不断的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够逐步形成。创新人才的特征也更多地体现为独立思考、敢于冒险、敢于怀疑和具有挑战精神等等。

此外,把这些对创新人才的要求具体化就应该是:创新人才首先要拥有坚实广博的基础知识;其次,创新人才也应拥有精深的学科专业方面的知识,这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而创新能力则最能体现创新人才的素质。创新能力是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能力,具体而言应该包括:(1)极强的自学能力。由于当前社会知识的更新和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为了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创新人才必须要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以便及时更新自己原有的专业知识。因此,自学能力是创新人才必备的一种重要基础能力。(2)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知识的最终目的在于应用,创新人才在知识的运用方面应尤为出色,这也是创新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基础能力,他们应能够综合运用自身的各种知识去及时准确地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3)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是创新人才的核心所在。创新人才应具有强烈的创造欲望和创造冲动,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正因如此,他们才会主动地捕捉灵感和机遇进行创造活动。“人才”是人力资源市场最活跃的部分。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只有得到市场认可的才是人才,换句话说市场认可的就应该是广义的人才。通过前面对黑客们的论述,与“创新人才”的标准再一一对照,似乎发现,黑客与创新人才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这并不是我要说的结论本身,因为就此得出结论一定会有人跑出来指责我对人才的理解还少了最重要的一条——德才兼备。我不得不承认,“德才兼备”是多年来一贯坚持的不可否认的人才标准。而正是基于对黑客们道德的怀疑,才会产生“黑客”与“人才”关系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一个具有一定创造能力的人到底是不是人才也只能采用动态的观点,当他脱离了道德就要被人才名册除名,而回归了道德就可以重新入册。

“黑客是不是创新人才”看来永远不会有答案,因为这本身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问题,没办法回答,就像问你大学生、会计师是不是人才一样,没有意义。你只能从发展与辩证的角度来看待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将一个群体与人才联系起来,试图建立起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子集关系,这本身就是不太科学的。

综上所述,经典黑客们无畏的探索精神和广义上的垮客们的侵犯行为已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甚至让很多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但是黑客活动绝不是一些精神变态者的简单破坏行为,它不可能因为社会不加理睬就自行消失,也不会由于把几个元凶关进监狱就不复存在。相反,它是信息时代围绕知识和权力而展开的一场根本性斗争的反应,这一斗争还在日益扩大,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今日的少年黑客是未来的德才兼备的创新人才吗?我们没有办法笼统地告诉你是或者不是。给他们一些时间与合适的环境,也许他们会,当然他们也可能成为天才罪犯。

(作者:王贤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副教授,博士)

10.

为什么今天有些科学家相信宗教,而宗教似乎在某些方面又能容纳科学?

在崇尚科学已经成为时尚的今天,对于大学象牙塔里的大学生这一知识群体来说,科学就是真理和进步的化身,宗教就是迷信和落后的代表。巴黎科学院院长、“细菌论”的创立者——法国科学家巴斯特,一次在旅行的火车上默默祈祷时,被身边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大学生鄙视为老不死的迷信鬼。但这位年轻的大学生知道祈祷者就是他所景仰的大科学家时,又显得是那样的惊讶和疑惑——科学家居然也相信宗教?可以说,这位惊讶和疑惑的大学生只是青年大学生群体中的一个代表而已。要消除大学生的这种惊讶和疑惑有必要弄清楚科学家信仰宗教的深层次原因、宗教接受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和宗教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科学和宗教之间关系的扑朔迷离

论及科学和宗教,人们自然会想到,乔尔丹诺·布鲁诺和他为科学真理而勇于献身的罗马教廷的火堆,伽利略和

他为坚持“日心说”所受到的罗马教廷的残酷审判与监禁，以及罗马教廷直至1996年才停止公布的，为扼杀所有违背《圣经》教义的自然、人文科学思想而编制了22版的《禁书目录》。在这里，我们看到，科学与宗教是如此的水火不融，可谓是一对你死我活的宿敌。并且人们总是把宗教与迷信、巫术、愚昧以及“精神鸦片”等同起来，这一定程度上使科学与宗教相互对立的意识在人们心理上更加得以强化。

然而，奇怪的事实是，科学和宗教却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是生死仇敌，相反，却也有奇迹般的“相互承认”，“握手言和”的情景。伽利略就赞誉数学是上帝用来书写宇宙的文字。牛顿把“上帝”看作是日、月、星、辰运行的“第一推动力”。发明大王爱迪生声称，科学与宗教同一根源，其间决不会发生冲突。甚至是当代的一些世界级著名科学家，如，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现代航天科学之父——威尔诺·冯·布劳恩等都表示对上帝的信仰，虔诚地拜倒在上帝的脚下。美国《新闻周刊》(News Week)1998年7月刊登的报道说：“去年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40%的美国科学家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们相信的不仅是一个不可言表的超常力量，而是一个他们可以祈祷的神”。

无独有偶，宗教也似乎改变了对科学的敌视态度。1936年，梵蒂冈罗马教廷成立了“罗马教廷科学院”，邀请普郎克、波恩等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参加。从1990年开始，梵蒂冈每两年一次组织国际性的系列讨论会，论题涉及物理学、哲学、神学、混沌与复杂性问题、量子宇宙学、进化论、大脑与精神问题以及量子力学等等。更有甚者，1979年4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敦促全世界神职人员钻研科学，要求他们“既要有科学的训练，又要有世界水平的专门知识”。最为突出的是，梵蒂冈大公会议宣布为他们迫害过的科学家平反昭

雪。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科学和宗教就真正走向和解、相安无事了呢?否也。即使在21世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不还是有某些地方以宗教为由要求禁止讲授进化论吗?2002年8月,美国堪萨斯州将“进化论”的内容从中小学课程中取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

二、科学家相信宗教的社会、心理原因

探究科学家信仰宗教的深层原因,不仅要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而且还要从科学家的心理、情感视角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考察。

当代科学家所信仰的宗教有其不同于传统宗教的特殊内涵。传统意义上的宗教都拥有一个人格化的“上帝”或者“真主”或者“释迦牟尼”这样永存不灭、无所不在的终极存在体。这种人格化的终极存在体创造了和创造着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象,以超乎人类情感意志的能力驾驭着人类的命运和行为。而当代科学家所信仰的宗教则消解了“上帝”、“真主”、“释迦牟尼”等等的神性,认为宗教所拥有的终极存在体就在这个世界鲜明可见的美与秩序之中,把传统宗教所拥有的终极存在体非人格化,实际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即认为自然界规律本身就是宗教所拥有的终极存在体。这同传统宗教强调创造者与受造界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是截然不同的。爱因斯坦指出,他信仰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这个上帝自启其井然有序之和谐于万物中,而不信仰那个身系人类命运与行为的上帝。在史蒂芬·霍金那里,他把上帝和物理定律联系在一起,认为现代物理学寻求的能够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起来的统一理论,是“上帝”的意志。这里的“上帝”,其实是指“一种秩序与和谐的抽象原则”,是一组方程式,是自然规律本身。对“上帝”的敬畏,实

质就是对自然本身的敬畏。科学家信仰宗教不同于普通人的宗教情感。普通人信仰宗教是希望得到“上帝”、“真主”、“释迦牟尼”的庇护和保佑，而科学家信仰宗教，的确是相信一种宇宙宗教精神，即自然界中存在的普遍的因果关系。

科学家信仰宗教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原因。自从科学理性和基督教信仰在进化论问题上产生重大危机以后，科学理性和宗教信仰处于一种紧张的平衡关系。在制度层面上，西方民主国家有政教分离的法律保障。这样，个人把自己的宗教信仰与科学研究活动区别开来，在作为个人精神追求的信仰与作为个人世俗追求的科学研究活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因此，科学研究活动没有因为这种拯救信仰的活动而遭受压制；同时宗教信仰和结社的自由，保证民众有活跃的宗教活动，也维护了宗教与科学的对话。正如J·D·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揭示的那样，“只要人们不再正式要求他们（科学家——引者注）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后来的科学家是极其愿意回到宗教那里去的，因而就是回到遵奉时尚的作风上去”。^①也就是说，当代西方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过去科学家要么肯定自己的宗教信仰，要么肯定自己研究成果的明白含义的这样一种二难选择的尴尬境地，为科学家信仰宗教腾出了社会空间。

科学家信仰宗教同现代社会人们的普遍情感危机紧密相关。这一方面表现为对科学技术发展价值的怀疑和担忧。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地球气候变暖，森林面积锐减，沙漠化程度日益增强，河流的污染等，甚至带来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比如，核威胁等。科学研究所取

① [英] J·D·贝尔纳著，陈体芳译《科学的社会功能》，第51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得的巨大成果,并不能使人类真正地获得自由。因此,在有些科学家看来,科学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它并不能保证自身的发展符合有利于人类自身利益的目标。测不准原理的发现者——海森堡就认为科学技术只是用做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结果取决于人们使用科学技术的目的是否善良。而目的本身不能由科学技术来决定,只有在宗教这种精神形式中,才能找到自己行动的正确指针,才能具有明确的分辨善恶的能力,社会才有进步的希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物质上的福祉的同时,也使人们在精神上日益表现出纵欲、暴戾、急功近利的现象。理想、信念、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人生的意义、个人的社会价值追求变得是前所未有的飘渺和遥远。社会和个人越来越像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揭示的那样,成为“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人们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感到一片茫然。这就促使科学家对科学本身价值和自己所从事的科学活动进行深刻反思。他深深地感到,自己所从事科学研究最终不能够解决人生问题、命运问题、幸福问题以及宇宙的终极目的问题。为此,科学家往往“求助于一切与科学无关的当代各种有影响的事物:宗教、神秘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或美学”。^①他们希望从宗教中找到克服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在宗教想像中获得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

科学家信仰宗教是科学家内在情感体验的产物。在有些科学家看来,人所能体验的最美和最深刻的东西是充满神秘的感情。宗教、艺术、科学无不体现着人们对这种神秘情感的深刻追求。因为在人的经验之外,隐藏着为人的心灵

^① | 英 | J·D·贝尔纳著,陈体芳译《科学的社会功能》,第51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所不可企及的东西。人们将心灵所不可企及的东西的美和崇高赋予上帝，正是在这意义上，人才是一个有宗教感情的人。这种宗教实际上是科学家内在情感的异化。费尔巴哈指出，“被人的情感祝咒过的、与情感息息相通、符合一致、趋于同化、因而本身充溢情感的自然，就是成为宗教的对象的自然，就是成为神性的实体的自然”。^①可见，这种宗教性的东西，就是对科学所能揭示的世界结构的无限敬畏，就是对宇宙中无限高明的精神所怀有的一种五体投地的崇拜心情。科学家信仰宗教希望从宗教那里得到从事科学研究的精神动力。有些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虽然不是一种宗教，但它却是一种宗教行动。它蕴含着对宇宙之美丽和意志的信仰。因此，宗教情感对于伟大科学家来说是毫不希奇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现代固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19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威廉·亨利·布拉格（W.H.Bragg, 1862~1942）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他把宗教看作是从事科学活动的“伟大的驱动力”。他的“实践的宗教观”认为，如果你有一个好主意，你会努力地去实现它。如果结果证实了你的想法，那么你就将这个结论作为更进一步的基础。在实验室中是如此，在教育、文学、烹调的任何训练中都是如此，在宗教中也是如此。宗教信仰使人们甘愿冒毕生风险假定基督是正确的，并通过终生博爱，以实验去检验它。1958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洛克菲勒大学演化生物学家李德伯格也认为，目前并无法推翻上帝。而毫无疑问的是，宗教的激励可以鼓舞我们的科学研究的动机。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臆测。

科学家信仰宗教还在于人类有追求自身“心理完整”的自然倾向。瑞士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在《论神秘现象的心理学

^① 费尔巴哈著《宗教的本质》，第42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及病理学》一文中指出,现代物质文明的进化并无法掩饰人类内心所具有的原始民族之心灵特征。他认为,现代人的精神之所以苦恼,是由于缺乏宗教的信仰寄托所致。每个人的潜意识中,不仅蕴藏着他的个体从胎儿、幼儿到童年时期的记忆,而且还包含着他的种族发生和演化的心理文化历程。童话、神话、幻觉、梦等表现出来的原始宗教意识是每个人本能所具有的,换言之,彻底无信仰心理的人是不存在的,世界上至今也没有发现那个民族是有宗教免疫力的。日本学者小田晋在其《“现代宗教热”之迷》一书中也从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科学家信仰宗教的心理原因。他认为,人类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精神心理结构。这种结构常常会处于不平衡的或称“病态”的状态。为了克服这种状态,达到正常的心理结构,人都有追求“上帝”或“神”之类的信仰的倾向,这就为产生宗教现象留下心理空间。

三、宗教接受科学实质是把科学宗教化

在当代,宗教接受科学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宗教接受科学,这种“接受”并不是说科学在宗教那里取得了平等的地位,或者说因为科学的发展,宗教已经幡然醒悟,放弃自己的教义,相反,宗教接受科学是为了通过科学来论证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把科学看做达到信仰的途径和手段。可见,宗教接受科学是以理性服从信仰,科学服从宗教为前提的。

首先宗教接受科学是为其在科学主导的社会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创造条件。科学与宗教在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斗争与较量之后,科学在今天更是日益深入人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科学已经居于主导性地位。这样,随着人们关于自然与社会知识的广泛和深入的发展,如果宗教还一味撇开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来谈论神学、信仰、启示和上

帝等等，显然是没有市场的。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说就是宗教的自杀行为。因此宗教从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出发，为了拥有更多的信徒，逐渐改变了以往与科学进行斗争的策略，不再像过去那样死守写在古老圣书上的每一句教条，愚蠢地反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取得的新的成果，而是竭力把自己装扮成科学的倡导者。新托马斯主义的领袖人物马利坦就曾经批判鼓吹蒙昧主义的神学家，他认为，“这是十字架上的智慧，对于纯理性的智慧来说，这是一种疯狂”，并且指出，“现在理性应当反对将基本的和本能的力量非理性的神化，因为后者使一切的文明受到毁灭的危险”。^①不仅如此，新托马斯主义者——麦西埃（比利时的神父、红衣主教）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卢汶大学不仅讲授托马斯哲学，而且把心理学、生理学和宇宙学等自然科学也搬进哲学课堂。

其次，宗教对科学的接受是以肯定科学服从宗教，承认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为前提的。马利坦把人类知识分为专门科学、哲学、神学三个级别。在他看来，专门科学虽然“独立于形而上学，它们事实上仍以形而上学原理为前提，并归属于这些原理之中”，并且哲学可以把任何同自己的结论相抵触的科学假设斥之为错误。同样，哲学与神学的关系也是如此。他说：“作为上级科学，神学判决哲学，正如哲学判决科学一样。对于后者来说，它起着指导或支配的作用，虽然是一种否定的支配，它把任何与神学真理相抵触的哲学论断斥之为错误”。^②由此可见，科学知识必然以宗教信

① 转引自《现代西方哲学》下册，第481页，刘放桐等编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转引自《现代西方哲学》下册，第482~483页，刘放桐等编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仰为基础。之所以如此,新托马斯主义认为,科学所涉及的领域只是限于人们的感官可以知觉到的范围,即现象世界。科学只是向人们描述了科学家所感知的现象世界的存在状态。科学知识不过是科学家对现象世界的测量、实证所得到的一些概念和符号,它并没有揭示现象世界的本质属性。例如,尽管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但他们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万有引力?相对论存在的原因又是什么?而人们要获得关于现象世界的本质,就必须超出现象世界,因而就必须超出科学之外,走向信仰的领域。马利坦说:“科学(即现象科学)只认识可以观察的东西的时空联系,并不认识存在……对于任何一个事物存在的问题,如灵魂、上帝、自由和定数、自然和奇迹方面的问题,人类理性都只能以经验论科学方式,亦即它寸步不能离的那种方式回答说:我不理解这种问题。它对我没有意义,然后把嘴闭住,这种问题对于信仰才有意义;必须回答这些问题的是信仰”。^①Calvin College哲学教授,Del Ratzsch博士则进一步把新托马斯主义的观点具体化。他认为创世纪所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和上帝“照他的形象”创造人类则分别提供了科学的两个基本假设:一是神创造了万物说明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并且神做事很有条理,所以他所创造的东西应该具有“一致性”,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二是由于上帝“照他的形象”创造人类,则说明人类可以和上帝有关系,思想会和上帝相似。所以人类对上帝的创造是“可以理解”的。并且Del Ratzsch还认为,上帝教导亚当和夏娃要生养众多,统治这地,管理有生命的东西,实际上是给人类布置认识自然,研究科学的神圣任务。这实际上是强调人类的科学研究

^① 《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432页。

活动都是在神的启示下进行的。荷兰的科学史专家R.霍伊卡就认为科学的基础来源于《圣经》。他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多数科学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一切都已经世俗化,但他们的学科的形而上学基础,却主要来源于《圣经》关于上帝和创世的观念”。^①

最后,宗教所接受的科学,实际上是为宗教所歪曲了的科学,是按照宗教的尺度进行了诠释,使之合乎宗教思想的科学。也就是说,宗教接受科学不是在原原本本地接受科学成果,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把科学纳入自身体系,把它作为证明自身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工具。基督教就把现代科学对各种自然规律的肯定当做是合乎上帝的目的证明。他们认为,太阳系各行星各按自己的轨道运行、互不碰撞正是出于上帝根据其天才的计算所做的合理的安排。如果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不承认造物主,便不能承认由经验所认识的东西的存在,世界的过程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只能是甚至上帝本身也追求的目的,即上帝本身。在对待进化论问题上,宗教改变一开始对进化论的竭力围剿态度,企图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神学,调和达尔文主义和上帝造人的神学说教的矛盾。他们认为,由于上帝内化于一切生命之中,所以达尔文认为人是猴子的后代,并不妨碍《圣经》里所讲的上帝造人的教义。在对待相对论的问题上,宗教认为它关于时间和空间有限性的结论恰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对于“宇宙大爆炸说”、“宇宙热寂说”、“测不准原理”等等都从宗教的需要出发进行了解释。马利坦就认为,现代科学成就比牛顿的物理学更适合论证他所主张的神学唯心主义

^① R.霍伊卡著《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第3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当代大学生关心的75个理论问题

DANGDAIDAXUESHENGGUANXINDEERSHIWUGELILUNWENTI

哲学。

四、科学与宗教的辩证关系

从科学家相信宗教和宗教接受科学的深层原因来看,科学和宗教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用对立、矛盾、冲突或者用统一、共处、和解来描述。它们之间的矛盾和统一状况受制于具体的历史社会现实背景,是具体的、历史的矛盾和统一,因而不能把它们之间矛盾和统一绝对化和抽象化。

一方面,科学产生和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科学并非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仅仅是从实验室中走出来的。虽然它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由于社会的需要而产生。但同时科学也是它自身同诸如神话、宗教乃至伪科学等等的思想斗争的产物。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认为:“从发生上说,伪科学态度比科学态度更为原始、更为在先,就是说,它是一种前科学态度。”又说,“因此,科学必然开始于神话和对神话的批判;既不是开始于观察的集合,也不是开始于发明实验,而是开始于对神话、对巫术技巧和实践的批判讨论。”^①在欧洲历史上,教会倡导文化教育,大量兴办教会学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诸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海德堡大学等。这些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传播宗教神学,但客观上也孕育了近代科学和文明。特别是宗教改革后,新教派迫使神学逐渐适应科学,为科学提供了一种较为自由的环境和宽容的精神。并且新教伦理对世俗职业的功利主义的倡导,把研究自然看做是基督徒的责任,增加知识看做是为了健康和获得财富,这对英国和北欧等国的科学走向体制化和对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另一方面,科学和宗教又有着本质的区别。科学探讨和

^① 《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第71~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假设,一个人要么宗教地要么科学地理解宗教,而不可能同时宗教地又科学地理解宗教。然而,当代对宗教性的宗教之解释要求我们明确地做到二者合二为一”。^①实际上,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是可以用来为科学研究服务的。但是,对那种自我私欲膨胀和盲目偶像崇拜的“伪宗教”所带来的对人类前进方向 and 目标的误导更是不可掉以轻心。否则,科学研究会走向歧途,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克隆技术、基因技术、网络技术、核技术等等无论如何都是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柄达摩提克斯之剑。

(作者:范宝舟,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博士)

^① 约翰·希克斯著《宗教之解释——人类对超越者的回应》,第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1.

科学研究绝对自由，科学实验没有禁区吗？

在当代人类生物科技研究的最新成果序列中，已经赫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克隆现象，甚至人类的无性繁殖也已经进入了个别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计划编目中。人们担心，科学发现的逻辑会不会成为人类生存世界的伦理炸弹？科学的发展会不会成为人性进步的枷锁？更为严峻的问题还在于，科学家们那种难以遏止的追求新发现、新发明的创造欲望，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情结”，时时令人心有余悸，忧心忡忡。为此，法国、意大利等19个欧洲国家签署了严厉禁止克隆人的协议，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克隆人的法律文件。许多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也明确表示反对克隆人，并制订有关法律。我国政府多次强调，在任何情况、任何场合、任何条件下，都不赞成、不允许、不支持、不接受生殖性克隆人的实验，赞成联合国制定有关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国际公约。但是，政府对科学

研究的表态,似乎难以平息大学生对“科学研究是否绝对自由”的讨论热情。科学研究真正的自由边界如何认定?科学实验应不应当外加社会因素的约束?有必要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一、应当承认,科技互动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科学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获得的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本质及规律的正确认识,是人们借助于抽象思维并以概念、判断、推理及假说等逻辑形式表现出来的知识体系。科学不仅是一种真理性知识系统,也是一种人类观察、探索和研究世界的精神活动。

科学活动的发生和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其中包括一定的组织机构以及共同遵守的规范等,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观察、实验、证实等科学实证方法,还包括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历史和逻辑等理性方法。可以说,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是奠基于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方法之上的。

科学和技术始终相生相伴、互联互通。科学是技术的基础,技术是科学的应用。技术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技能技巧、工艺流程、方法方式、操作规范以及相应的工具、机器、设备、仪器等手段。从根本上说,科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水平的表征。

追溯历史,可以看到,人类的进步发展是一个伴随科技的进步发展的过程。远古社会,人类最初所使用的天然石块、瓦砾、树枝、木棍等,可以说是“科技”发展的源头和雏形。随后,人类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并用火来御寒取暖、照明引路、驱兽避害、烧烤制陶;把粗糙的石块磨制加工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新石器,从事剥、切、砍、劈、挖、刺等活动;开垦荒地,种植庄稼;建造房屋,兴修水利;狩猎捕捞,饲养

牲畜；不仅制陶，而且冶炼金属制造弓箭、铁器，等等。原始科技发展为人类最终摆脱动物状态，提供了物质基础。

进入文明社会后，科技发展步入一个新阶段。中国古人运用水利知识建造了都江堰，同时为人类贡献了充满智慧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技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带来了真正的自然科学以及技术的广泛运用。“日心说”取代了“地心说”，行星运动规律修补了“日心说”，“星云说”初步说明了宇宙天体的起源；“万有引力规律”揭示了万物间的引力和斥力及其运动规律；“地层渐变论”以及“板块构造说”和“大陆漂移说”说明了地球地质的运动变迁；元素论、原子论展现了物质结构的多层次性；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揭示了生物演进的源泉和阶梯。

科学进步引发技术应用从而导致工业革命。18世纪中叶的热力学引导了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从而使生产劳动从手工操作进入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大机器生产时代，19世纪后期的电磁理论引发了电动机的运用，从而把人类带到了电气化时代，20世纪以来，科技发展取得了卓越成就。在世纪初的物理学的一系列发现（电子、X射线、铀、镭等）基础上，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引导下，科技发展呈现为“高新尖”走势，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激光技术、通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航天航空技术、生物医学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等等获得深入发展和广泛运用，使人类走进了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社会时代。

纵观科技发展史，不难看到，科学和技术水乳交融、相辅相成。一旦人类在生产劳动基础上获得了对外部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后，就会马上将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运用。科学通过揭示事物发展规律和本质使人摒弃偶像崇拜，破除迷信教条，增长知识智慧，开发智力能力，革新思

想观念,提升精神境界,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解放。

二、科学研究没有禁区

科学的生长和进步离不开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一般来说,“科学研究”涵盖“科学实验”,而“科学实验”只是一种“科学研究”。不过,有时两者内涵也不尽相同。“科学研究”更多是指基础理论研究,而“科学实验”更多是指实际操作和应用研究。如果说,基础理论研究是自由的、无禁区的话,那么实际应用研究则是有限制、有禁区。

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在性质上有着“中立”的特征。因为它只是对事实的判断,而并非是对价值的决定,它所反映的只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这种认识是理解和解释,目的是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作为观念形态的科学,其研究应该是自由的,不仅思想可以自由地想像,达到无限的时空领域,而且其目的也是为了使人类达到自由的境界。因此,在科学作为理论形态的精神探索这一层次上,“科学研究绝对自由”这一命题是成立的。这种“绝对自由”,可以被理解为没有什么事物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任何课题都可以被探讨。从纯学术研究的角度说,“科学无禁区”,科学研究应该是自由的。从学理上说,在未经证明的时候就预先为科学研究划出一个禁区,这是不公平、不科学的。只要是真正的合理的科学研究就不应该设置限制和禁区。科学上的问题,只能在自由讨论中,鼓励各种不同的意见,提出各自的论证,经过反复的争辩,而谋求解决。凡是用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来禁止科学研究探讨,都是有害的。如,20世纪50年代,由于受苏联的影响,我们尊崇米丘林——李森科,将其学说视为无产阶级的惟一正确的学说,而打击魏斯曼——孟德尔——摩尔根,将其学说斥为资产阶级的荒谬绝伦的学说。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一部

科学史表明，人类正是在不断冲破种种障碍、限制、禁区、束缚过程中，才不断取得进步，达到自由。

三、科学研究没有绝对自由

尽管从理论上说，科学研究应该是自由的，然而，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那种认为“科学研究绝对自由”、“科学实验没有禁区”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主体上看，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其一，研究者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有一个价值取向问题，即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对象来研究，这种研究为了什么目的？实际上，科学研究课题的选定以及科研的可行性论证总是受到一定社会条件制约的，其中包括社会的财力、物力、人力等条件，而这客观上使研究者不可能有“绝对自由”；其二，一定的科学研究还要受研究者本人条件的限制，研究者的知识、能力、思想道德、精神状况等因素总体上制约着研究者的研究，从而使其研究不可能“绝对自由”。今天的科学研究早已不是过去那种为科学而科学、满足研究者的好奇心、单纯求真的研究了，相反，需要确立科学研究的价值目标，考虑科学的社会后果。换言之，如果科学家不思考科学研究到底是为什么，不考虑科学的社会功用和后果，那么就会带来不堪设想的结果。例如，20世纪初，德国因为备战，急需大量硝酸。化学家哈勃经过潜心研究，发明了由氨催化氧化制硝酸的流程。他因此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个人荣誉到达了顶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哈勃企图利用自己的化学知识，用化学方法消灭敌人。在凡尔登战役中，哈勃指挥德军对法军阵地使用了氯气。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化学武器，从此，“化学武器”这一名词就此成为人类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战后，由于其科学声誉，他逃脱了战犯的名号，但哈勃这个名字成

了科学史上灰色的印记。事实说明,科学家的道德心和责任感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及其发展前途。科学家的研究需要考虑人类的幸福和利益,遵守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当科学家个人道德水平不高时,若任其“自由研究”,就有可能走上反人类的邪路。所以,对科学研究加以限制,正是为了保障科学为全人类服务,为人类谋幸福。

其次,从客体上看,也有两种情形,其一是,研究对象限制、制约研究者,使其表现为不自由状态。例如,涉及人体实验的医学研究,就不能接受“绝对自由”、“没有禁区”的观念。否则,医生就可能随时随地对任何病人进行试验,这显然侵犯了病人的生命权利,违背了生命价值原则。从经济学视角看,医学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医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候会以欺骗、牺牲病人为代价,而名义上却冠冕堂皇地打着“科学研究的需要”的幌子。其二是,研究者所研究的对象及其成果应用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因而有必要约束研究者的研究,不容许其肆无忌惮地“绝对自由”,不允许其实验领域成为“无禁区”。当今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签署了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生化武器试验条约,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如前所述,基础理论研究与实际技术应用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由状况。尽管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其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而禁止一切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有些科学研究及其后果存在严重的社会危险及危害性,为了预防灾难和不测发生,有必要限制一些科学研究,禁止一些科学实验。或许有人会说,用成果应用的小概率后果作为给科学研究设置禁区的理由是很荒唐的,这就好像因为汽车轧死人而禁止研究内燃机一样。但是我们认为,不



仅要分析不同后果发生的概率程度，而且要区分不同性质的应用后果，汽车压死人与核弹毁灭人毕竟不能同日而语。鉴于任何科学研究都具有两重性，可以将科学研究区分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研究，对纯学术的基础研究不应预设“禁区”，而对技术应用研究则应有所限制。

同样，在现时代，那种以“科学研究绝对自由”、“科学实验没有禁区”观点来支持克隆人实验的论据，在科学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科学家即使从纯科学角度进行克隆人研究，也必须对于克隆人问题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等问题给予充分注意，不要回避或忽视现代科技发展对社会产生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影响，否则，这就是一项有科学性缺陷的研究。克隆人实验究竟是否可行？有些科学家宣称“科学上可能的就要在实验中实现”，执意进行克隆人实验。不可否认，利用克隆技术可以复制人体干细胞，制造人体器官，也可以用患者本人细胞培育出新组织，用来治疗神经损伤、糖尿病、帕金森氏症等多种疾病，解决移植组织来源不足问题。但是，我们支持克隆技术研究，并不意味着赞成克隆人实验。虽然随着克隆技术的发展，克隆动物成活率有望大幅提高，但克隆人实验有可能产出人类怪胎或是DNA有先天缺陷的人类。克隆人实验在国际上已经受到大多数国家的反对。法国、意大利等19个欧洲国家签署了严厉禁止克隆人的协议，许多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也明确表示反对克隆人，并制订有关法律。我国政府多次强调，在任何情况、任何场合、任何条件下，都不赞成、不允许、不支持、不接受生殖性克隆人的实验，赞成联合国制定有关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国际公约。

为什么科学界对克隆人实验基本持抵制态度？说到底，为了防止生命科学研究误入歧途，预防克隆人可能带来许

多伦理、道德、法律等方面的问题。如若克隆人被大量复制,人类的两性繁殖是否会被无性繁殖取代?如若仅仅克隆“优良基因”,人类的基因库是否会减小,或是这种减小会到达使人类面临基因灾难的地步?如若大量复制基因结构完全相同的克隆人,生物多样性是否会锐减?是否可能诱发新型疾病的传播?克隆人技术是否可能被滥用,成为恐怖分子的工具?克隆人使人类繁殖后代的过程不再需要两性共同参与,这将对现有的社会关系、家庭结构造成怎样冲击?家庭是否仍是我们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如若克隆人出现了,克隆人的身份如何认定?克隆人会否因自己的特殊身份而产生心理缺陷?克隆人与被克隆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纳入现有的伦理体系?现存的法律会否陷于完全的瘫痪?可见,克隆人问题远非是生物问题,而是需要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各国政府、社会机构与生物学家之间通力合作的复杂社会问题。在种种问题解决以前,克隆人的研究被视为有潜在危险性而被禁止,是理所当然的。对科学研究进行适当的限制,正是为了将科学研究引向造福人类的轨道。

最后,从条件上看,任何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研究者总是要受到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如研究经费多少或代价是否昂贵等因素)、政治法律制度(如统治者的意图)、文化习俗和道德规范等因素的限制和制约。可以说,今天的科学研究总体上还是不自由的,或者说,不是绝对自由的。在当代,科研越来越受到伦理、道德、法律等因素的“纠缠”。科学上“能够做的”并不都是伦理上“应该做的”。基因组学及其应用将会给个人、家庭和整个人类的健康和幸福带来巨大的利益,然而,当我们弄清基因与疾病的某些关联或者基因的其他功能时,就可能断言某些具有“好”基因的个人或种族是“优秀”的,而



“坏”基因的则是“劣等”的，从而会出现基因歧视。因此，在基因研究和基因服务中，应该遵守知情同意或知情选择的原则，需要制订法律，防止或打击基因歧视现象。

生命科技研究必须遵守国际普遍公认的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行善原则（生命科学要为人造福，增进人类健康和幸福）；自主原则（尊重人的尊严、价值，尊重实验对象，做到知情同意）；无伤原则（科学研究不能对实验人群、实验者造成伤害）；公正原则（资源分配的公正，利益分享的公正和风险承担的公正）。我们崇尚科学研究自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向未知领域大踏步迈进，将人类引向更为文明的社会并且去探索无边无际的宇宙的奥秘。但是科学研究不可能绝对自由，因为它涉及人类的道德伦理、文化习俗、社会法律制度等许多问题，进而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不可分离

当今时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与道德、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不再互相分离，而是紧密相连。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创造活动，社会价值标准对它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均与价值有密切的关系，因而科学不是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总是要受价值观念的关照，科学实验总是受到伦理、道德、法制的约束。在当代，不少科学家已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不能只是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应当担负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爱因斯坦曾告诫青年学生：如果想使自己一生的工作都有益于人类，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至于成为祸害。

当代科技的进步发展不仅带来科学知识的深刻变革,也引起人文观念的变革,科技研究中渗透着人文因素,人文因素中也渗透着科学技术。“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天,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研究,并不像我们通常想像的那样与伦理道德无关。虽然物理学基础研究阶段多半不存在伦理问题,因为物理学研究对象是原子、基本粒子、夸克、场,但是物理学研究成果应用时多半会产生伦理问题,如原子能是用于和平还是用于战争的争论。人类基因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伦理问题:在遗传学家取血样作DNA分析时就涉及当事人的知情同意伦理问题。21世纪的生命科技将造福于人类和生物界:植物基因工程有利于解决温饱、营养问题,干细胞克隆有利于濒危人种自体器官移植,动物基因工程有利于保护和抢救濒危动物,基因治疗有利于防止衰老、根治癌症、脑心血管病、艾滋病等等。基因干预和辅助生殖技术,将生老病死的人工安排在更大程度上代替自然安排,应用药物、电和化学刺激、脑芯片、脑移植、基因操纵等技术,使人体结构、心理、行为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人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生命科技的发展将会更多地牵涉人权、隐私权、个人的自主权或自我决定权等社会伦理问题。

此外,科技的两面性效应也内在需要人文关怀。科技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科技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并不是万能的。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不仅社会生产力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而且科技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给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以深刻影响。人们在得到科技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种种困惑和担忧。汽车给人类带来方便,也引起大气污染;医学的发展解决了优生优育等问题,但接踵而来

的是亲子关系、家庭结构等社会伦理问题；农药化学能最有效地杀死害虫，同时也把益虫杀死了，并污染了水体；信息科学技术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如，不法分子利用信息网络传播电脑病毒、垃圾邮件、各种非法或不良信息，入侵、干扰或攻击他人的信息系统，窃取国家秘密、侵犯他人隐私等问题；工业化所带来的大气污染、能源危机、生态失衡等问题，无不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巨大威胁。

“9·11事件”后，恐怖分子对美国实施的炭疽热病毒进攻引起美国全国性的恐慌。由于炭疽热病毒容易散布而且杀伤力强，一些国家使用炭疽病毒制造生化武器，想以此来威胁文明社会。现实生活中，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总会将科学成果用做牟利、报复甚至毁灭世界的工具。如，像催熟剂、膨大剂、雌激素这样的科研成果，已广泛被水果商或生产者利用，牟取暴利，抑或像盐酸克仑特罗（一种兴奋剂）、避孕药用以猪、鳙鱼等的速肥，或大米用有毒矿物抛光，银耳用硫磺漂白……更有甚者，先用工业烧碱处理海产品，继而用甲醛浸泡，以求增重保鲜。这些都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倘若对此类的研究不加控制、不设“禁区”，给它“绝对”的自由，那么地球的末日就不远了。事实表明，科学研究应该受社会法律、道德的约束，科学家应该具有社会道德责任，对自己的科学研究负责，对于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科学实验应当加以严格的控制，使之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作者：陈金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博士）

12.

未来科技发展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后果？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世界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大学校园里,莘莘学子们在享受科技发展便利,体验生活时尚的同时,严肃思考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提出的种种问题。有同学认为,科学可以医治具体的疾患和创伤,却解决不了人心中的惆怅;也有同学认为,科技在为人类进步高奏凯歌的同时,也同样可以给邪恶的心灵以魔鬼般的力量,人类有可能毁于科技;还有更多的同学认为,科技是保护人类最坚固的盾牌,科技的不断进步,必将把人类带入一个更加美好和神秘的境界。科学发展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是魔鬼,还是福音?是增加福祉,还是增加毁灭的力量?我们有必要从当代科技自身的发展趋势谈起,分析科技创新和进步对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反思科技发展造成“人类困境”的根源和“科技悲观主义”

的警钟意识,促进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一、当代科技发展新趋势

2001年4月23日,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教授在“广州新华科技论坛”上预测未来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时指出,未来30年,全球化的趋势将继续推进,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将以计算机的广泛应用、通讯工业和生物工程为火车头,学术的定义将有显著改变,专业将会越来越多,科技发展带来的诸如道德、社会、经济问题,都将引发一些新的学科。的确如此,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出全面推进的新态势,无论广度和深度都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其热点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上。

首先,信息科技正在酝酿新突破。21世纪是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在信息资源、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方面实现微电子与光电子结合,智能计算与认知、脑科学结合等,其应用将更加广泛和多样,给人类带来全新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计算机技术正孕育着重大变革,将出现以全新的理论和技术、材料设计的新一代计算机。此外,计算机的智能化趋势已经显现。网络的发展赋予信息科技全新的生命,全球高速宽带网已崭露头角。网络将成为大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网络将逐渐渗透到所有的经济活动领域,成为21世纪知识经济繁荣的重要前提。

其次,生物技术前景无限。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正在步入“后基因”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发展趋势是功能基因组的破译。运用最先进的生物技术,不仅可以将遗传密码破译无遗,还可以对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进行结构模拟和药物设计。正在发展的生物信息技术、生物芯片技术、干细胞等关键技术,加上已经成熟的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等不仅使生物技术产业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产业,也将深刻改

变人类的医疗卫生、农业、人口和食品状况,同时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也向人类社会和伦理道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再次,新材料科技将在新世纪引发新的产业革命。所谓新材料是指最近发展或正在发展中的具有比传统材料更为优异的性能的一类材料,目前世界上的传统材料已有几十万种,而新材料正以每年大约5%的速度增长。目前新材料研究的前沿和杰出代表是纳米技术。这项技术通过对原子和分子进行加工,并且将其组装成具有特定功能的结构,控制小到肉眼看不到的一种材料,它为人类进入微观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手段。有人认为,纳米科技将引发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成为21世纪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发动机,其作用可使微电子学在20世纪后半叶对世界的影响相形见绌。纳米技术所引起的世界性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甚至会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对社会经济、政治、国防等领域所产生的冲击更为巨大。环境材料和智能材料的发展也引人注目。环境材料也称绿色材料,指具有优良性能,又能与环境相协调,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一类材料。智能材料则是能随周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其性能的一种材料,它可以满足人类的特定要求,达到自诊断、自适应甚至自修复的目的。此外,有机功能高分子材料、低维材料、生物陶瓷材料、原位复合材料等也将有较快的发展。在新世纪,材料科学技术将和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及航天技术进一步交叉融合,共同发展。

我们从以上几个科技热点的发展态势可以发现,新世纪的科技发展既遵循过去一些规律,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科技发展出现群体突破趋势,并且不断突破人类的传统认识极限;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使重大创新更多地出现在学



科交叉领域;科技创新、转化和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原始性创新的地位日益突出;科技与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紧密。

二、科技创新和进步对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

科技创新和进步的深刻影响,广泛表现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上,突出表现在对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作用上。

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20世纪以前,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基本特点就是生产的实际需要刺激技术的发展,并进一步为科学理论的形成奠定基础。例如: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下,人们在1782年制造出往复式蒸汽机,但作为蒸汽机理论依据的热力学原理,直到19世纪中叶才建立起来。20世纪以来,科学理论不仅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而且为技术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各种可能的途径。比如,先有了量子理论,而后促进了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运用相对论和原子核裂变原理形成了核技术;运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最新成就,发展了生物技术。现代科学技术这种特点,决定了它在经济发展中必然成为主导力量。特别是过去20多年来,信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结构的变革。信息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已成为世界第一位的支柱产业,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有机结合,有力地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达十余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其中35%来自于新兴产业的发展,而65%则是由于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和生产率的提高。近几年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美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其生产率却继续保持飞速增长,2002

年达到5%(1991~1995年为1.8%,1996~2001年为2.6%)。高新技术在对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还将带动劳动力结构的重大调整。据美国兰德公司预测,到2020年美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将由目前的20%下降到5%左右,而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将占到总就业人口的90%以上,其中多数将工作在各种知识服务业领域。此外,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能源技术对经济的影响,更主要的也是体现在新技术与现有传统产业的结合上,从而引发农业、医药、材料、能源等产业结构的新一轮变革,加速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

科技全球化和社会知识化进程加快,新一代网络通讯技术进一步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科技全球化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科技全球化的主要目标是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来加强本国或本企业的研究开发工作,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获得更强大的竞争力。这一方面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方面合作最多的就是国际大科学工程,如人类基因组、核聚变、空间站、全球气候变化等国际合作计划的实施;另一方面表现为跨国公司加速在不同国家建立研发机构,如近年来跨国公司为实现生产经营的本土化,在我国建立研发机构近百家,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30多家。总体上看,R&D国际化强化了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在全球科技生产和消费方面的强势地位,也使欠发达国家获得相应的人才和技术溢出效应。社会知识化是与经济全球化同样显著的另一个重要发展趋势。这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产业的知识含量日益增加,知识经济的社会形态正在成为现实,知识资源正在成为主要的财富源泉。以科技创新为主的知识创新活动,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社会活动。国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将越来越高,终身学习成为必然要求,整个



社会将成为学习型社会。

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今天,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市场竞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针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胜者全得”理论,即参与竞争的一方只要关键技术上领先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有可能占领该领域的大部分市场份额,进而赢得竞争优势,其他竞争者将很难生存。最为典型的是英特尔和微软,他们分别占有世界微处理器(CPU)、系统软件90%的市场份额,后来者似乎连参与竞争的机会都没有。实际上,这种“胜者全得”也越来越显著地体现在国家间竞争的层面上。在世界产业体系中,居于“中心”的少数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科技优势,向不发达的“外围”国家转移低端技术及低技术含量产业,并通过资本力量、金融手段、舆论引导甚至军事手段来固化这种“中心—外围”格局。其结果是强者恒强,弱者愈弱。东南亚金融危机、拉美经济危机等的相继爆发,表面上看是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的问题,但更深层上则是对外技术依赖、市场依赖和资本依赖的结果,核心是国家创新能力不足的结果。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生产和应用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处于依附地位,面临着日趋严峻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军事安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知识鸿沟不断拉大的趋势,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挑战。

尽管差距在拉大,但是科技进步毕竟在持续全面而有力地推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这种推动首先表现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上。现代科技广泛渗透进生产力的各要素之中,并成为凝聚各要素的核心力量,引起生产力各要素及其系统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变革,从而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使现代科

技成为名符其实的“第一生产力”。其次表现在促进人类智力和精神的革命性变化上。现代科技作为一种革命的精神力量,有力地促进着人类智力和精神的革命性变化,包括促进人的智能化,推动思维方式的变革,加速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的培育,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科技发展对社会的推动还表现在促进社会关系的不断变革上。现代科技的发展,使社会关系得到不断的变革,促进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缩小,促进社会关系的现代化、文明化。

三、科技发展中的“人类困境”与“科技悲观主义”

科技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悲喜交集”。毋庸讳言,科技发展已经造成了并将继续造成十分棘手的“人类困境”和科技悲观主义情绪。愈演愈烈的“人类困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粮食危机,生态破坏,环境恶化,南北差距拉大。这些使人类感到十分棘手的“全球问题”,不仅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正是出于对这种现象的焦虑,近代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对科技进步的价值持悲观主义的态度。他们断言,科学技术不再是给人类带来光明的普罗米修斯,而是烧毁神庙的恶魔海洛斯特拉特。

科技发展为什么会给人类社会造成种种“困境”,甚至形成悲观主义的科技价值判断?这里需要客观审慎地分析。

科技发展之所以会带来“人类困境”,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认识和运用上的误区。人类没有认识到科技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盲目地陶醉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巨大成就之中,一味误用和滥用科技成果,使其副作用和消极后果日益严重。二是片面的“人与自然关系

观”的作怪。人类自视为自然界的征服者、统治者、索取者，违反自然规律地对大自然滥施淫威，过度“压榨”自然。三是诸种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主要有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习惯、管理方式、政策法规等的作用。

当代西方悲观主义的科技价值判断的出现，有一定的思想渊源和历史背景。早在18世纪启蒙时代，思想家卢梭开启了反理性、反科学的先河。他在《论艺术和科学》论文中把科学视为道德的敌人，认为科学剥夺了人所故有的淳朴和善良的天性。他要求人类终止科学的发展，回到原始自然中去。19世纪下半叶，哲学家尼采将卢梭的观点引向非理性主义的更深窠臼。他断言科学和理性扼杀了生命意志，他指出，由于工业的“非人格化”，由于错误的“分工”经济，生命便成了病态的了，作为达到文化之手段的现代科学活动，产生了野蛮化。直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这种反理性、反科学的观点还驻足于意识形态的局部范围。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广岛原子弹的爆炸，把多数西方人从崇尚科技的甜梦中惊醒。人类借助科技相互残杀，使本来对天国失去信心的西方人对地球也丧失了希望。于是，技术恐怖论、技术悲观论的思潮应运而生。它既流向市民社会的“街头巷尾”，也波荡着科学文化研究的“象牙之塔”。人们似乎为昔日卢梭的观点找到了注脚。由此可见，当代西方技术悲观论的出现，导源于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它是西方传统文化中反理性主义思潮在现时代的突出表现，暴露了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制度本身所带来的科学主义原则与历史主义精神严重背离发展的状况。同时也反映了一些学者在科技进步导致社会转型时的心理态势的失落感和价值的迷惘。

不过，反思科技悲观主义，在当代西方技术悲观论中不



乏某些科学反思精神，它为人类从现实走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警钟意识。它要求人们不但能看到科技进步给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而且也能全面地评价与之相联系的消极现象。今天，科技进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扩大了生产规模，并在驾驭自然力方面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果，但这些胜利又伴随着许多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当代世界储存的核武器，足够把人类毁灭12次以上；自然资源枯竭的危险性在增长，相当大的地区土壤肥力在下降。另外，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在加深。对这些消极现象的关注，有助于科学真理价值的全面实现。在今天，科技以高、精、深、快地发展，其社会功能的两面性展现得十分鲜明。对此采取不同的措施，将直接关联着当代人与未来人生存的利益。倘若人类缺乏科技进步的警钟意识，我们将犯下不可宽恕的世纪性错误。

列宁说过，真理和谬误只相差一步。对科技进步消极因素的思考，既可导向合理的警钟意识，又可滑入荒谬的思想幻觉中。警钟意识内涵着辩证否定的理性批判因素，这种批判易于发现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关系及其转化的根据，从而抓住其间的否定，推移转化的辩证运动的本质，以便于更完善、更充分地发展科学技术。但是，如果抛弃这种批判的“两点论”内核，用“非此即彼”的一点论来裁决它，换言之，把科技进步的消极因素绝对化为整个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内在矛盾的惟一根据，并加以无限膨胀，势必导致极端的技术悲观论。如当代技术悲观论所宣扬的“技术魔鬼论”、“技术恐怖论”、“科学与道德势不两立论”、“人类被科技判了死刑论”、“自然永远不可再生论”、“人类将毁于电脑论”等等。持有这种幻觉的西方学者，对如此事实视若无睹：科技进步的消极因素只有借助于科学技术才能克服，而这

种科学技术又必须是在人应得到的那种社会条件下发展的。某些消极后果并不是科技进步本身所造成的，而是科学技术在广度和深度上发展得不够，它们变了形，偏离了人道主义的目标这些情况所引起的，而这种偏离是由于社会因素与这一目的不相适应所造成的。马克思说得好，科学技术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建制。如果这种社会建制不够完善，那么科技进步的消极因素在所难免，如果这种社会建制失去了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那么科技进步的消极因素就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有时甚至出现整个社会难以驾驭的地步。

科学技术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并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的重要力量，科技进步将推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我们弘扬科技进步的观点，必须剔除种种认识幻相。既要反对科技无用论，又要防止技术悲观论，更要具备三个方面的认识：科技进步的道路不是直线型，而是曲折、迂回地前进过程；科技进步不是机械式的进步，它需要全社会成员实践力量的投入；科技进步应当具有社会系统，全球利益的眼光。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因为现代发展观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既要同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也要有利于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协调，以保证后代人的持续发展。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就必须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只有这样，科技发展对于人类才意味着“福音”，而不是意味着“魔鬼”；才能不断增加“福祉”，而不是增加“毁灭的力量”。

（作者：汪传发，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王蕾，上海交通大学教师）

13.

“非典”爆发给我国国民生活带来了哪些启示？

2003年春天对世界上不少国家尤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时期。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非典型性肺炎)疫情在中国广东、北京、香港、台湾等地爆发流行。经过几个月的惊心动魄的艰苦斗争,我们国家终于取得了抗击“非典”的伟大胜利。“非典”过后必有反思。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给国民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和冲击,同时波澜壮阔的抗击“非典”斗争也使国民从中获得重要启示,包含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损失的哀思和胜利的喜悦。那么,SARS爆发究竟给国民生活带来哪些启示呢?

一、重视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持生命健康为重的价值观念

“非典”疫情的爆发及蔓延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安全,直接侵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不管是“非典”患者还是疑似病例,抑或是健康人士,都感到恐

慌。尤其当死亡降临或危险逼近时，人们越发感到病毒的可怕和生命的可贵，进而更加重视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倍加珍爱生命。

“非典”使人们有机会冷静地思索有关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这些古老而严肃的话题。事实上，只有当“非典”疫情严重威胁生命健康的时候，人们才真正理解“生命只有一次”这一命题的深刻蕴含。人们在思考生命与事业、健康与财富、工作与休息等问题时豁然开朗，为什么年轻时总要拿健康去挣钱，到老了才去花钱买健康呢？倘若为了金钱、财富而不顾身体健康甚至危害生命，这是多么愚蠢啊；没有健康，一切将无从谈起；舍弃生命，名和利、金钱和地位、安逸和享乐，还有什么意义？珍爱生命，重视健康，就要注意自身的亚健康状态，就要在繁忙工作之余，多参加健身运动，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增强肌体免疫能力。

令人欣喜的是，“非典”疫情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这样的“形而上”问题带入国人的视野，重视安全与健康已成为国人的最深刻的内心体验和最突出的思想共识。同样令人满意的是，“非典”爆发时，党和国家再三强调，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当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突出体现。事实证明，我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为人民服务当做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宗旨。

二、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高效、透明、责任政府

在现实社会，个人的存在和发展始终离不开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个人生命价值的尊重和维护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它需要社会政府组织的管理和协调。面对“非典”肆虐，人民呼唤一个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民主政府。

然而,毋庸讳言,“非典”疫情突袭之初,由于信息不灵,管理不力,社会公众弥漫着一种慌乱情绪。“非典”暴露出我国政府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弊端,同时也为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政府管理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

“非典”考验和锻炼了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和社会调控能力。我国政府迅速建立了统一指挥系统;建立健全重大、紧急疫情信息报告系统;建立和完善疾病预防控制和急救治体系;建立一支机动应急医疗卫生队伍。这些措施对控制疫情蔓延和维护社会稳定起了关键作用。面对“非典”爆发这一社会性危机事件,中央统一指挥,协调各个部门的关系,地方政府迅速反应、决策、及时处理问题,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例如,不到10天,建起了一座有千张病床的野战医院——小汤山医院;不到两天,成功止住了一场大抢购——北京食品药品抢购风潮。抗击“非典”的斗争明显改变了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些弱点和弊端。形式主义方法、官僚主义作风得到了迅速纠正。花架子会议少了,推诿扯皮少了,公文旅行少了,取而代之的是雷厉风行的多了,身体力行的多了,真抓实干的多了。

抗击“非典”斗争也加大了政务公开的力度,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有利于建立一个民主的透明政府。“非典”疫情出现初期,政务公开不够明朗,个别部门和官员隐瞒、封锁信息,引起了民众的恐慌和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事实表明,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如果政府信息不公开,如果公众未能及时获得正确的相关信息,那就会引起群众恐慌,造成社会不稳定。抗击“非典”斗争客观上需要政府信息公开,决策民主,管理透明,即重大事情要让人民知道。由于政府非常重视公民的“知情权”,及时地准确地对外发布“非典”疫

情的最新信息，所以很快平息了社会谣言，稳定了市场物价。由于信息透明，公众知晓，政府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和理解。面临危机，不仅政务要公开，而且要建立“官员问责制”。“官员问责制”既是防治“非典”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非典”肆虐的早期，有些官员从自身利益出发，对疫情的信息层层作假，瞒报、漏报，报喜不报忧。政府官员所负责任的对象不是百姓，不是工作，只是自己的“官职”。弄虚作假的劣行导致政府公信力和威望的严重受损。后来中央高度重视，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撤换了一些不得力的官员，这为实施“官员问责制”提供了一个范例。

不难看到，抗击“非典”的斗争，突出了公民的知情权，加强了决策的透明度和民主化，促进了政治文明的建设。

三、强化依法治国理念，提高国民道德素质

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过程中，法治与德治的作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建立公开、公平、公正、合理的法制体系，加强法制建设，树立法制的权威，严格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这次抗击“非典”斗争充分证明，健全完备的法律制度对规约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控制“非典”疫情蔓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面对“非典”，国务院颁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为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事件，打赢防治“非典”这场硬仗，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而广大医务人员主动学习并熟悉国家法律，特别是《传染病防治法》，也为防治“非典”起着积极作用。由于随地吐痰、乱扔垃圾、随地大小便等不良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疾病的传播，因而受到人们的

猛烈抨击。为此,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修改了原有法规,专门对随地吐痰、便溺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将罚款最高额由原来的50元提升到200元。

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明知自己患有这种传染性疾病,而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所采取的各种预防控制措施,就要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甚至是死刑。为了消除传染病爆发时期给社会公众造成的威胁、危险或者是有效地预防危险,每个公民都应该做出某种程度的放弃自己权利,或者履行“自我隔离”的义务;同样,医疗卫生机构依据《传染病法》,有权对那些已经患有传染病的人或者病源的携带者采取隔离治疗措施。此外,政府官员的行为也纳入法律轨道。国家人事部、监察部发出通知强调,对那些在防治“非典”工作中思想不重视、措施不落实的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程度不同的惩治。如北京市纪委、市监察局发出《关于严明纪律确保非典型性肺炎防治工作顺利进行的紧急通知》规定,凡在这场特殊斗争中擅离职守、临危退缩的共产党员,一律开除党籍。而龟缩起来的公众人物也受到了舆论的批评。

如果说法律是外在的“他律”,是一种强制性的手段,目的是“惩恶扬善”,那么道德则是内在的“自律”,是一种自觉性的要求,目的是“扬善抑恶”。现实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实际上都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都是社会群体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每个人既需要借助社会群体来享受自己生命和健康的权利,也需要履行一个公民的社会义务并承担必要的责任。

抗击“非典”的斗争要求国民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具有自觉、自律的精神及社会公德。应该看到,当“非典”灾难突然降临时,大多数国民为了国家的、民族的、



人民的利益，表现出高尚的道德觉悟，闪烁着人性的光辉。素不相识的人互相施以援手；忙碌冷漠的人也突然温和起来；人们互相慰问，守望相助；为了彻底战胜“非典”，国人自觉自我隔离，诚实填写“健康申报表”，不再强调公民的“自由权利”和“隐私权利”。真可谓“患难见真情，日久见人心”。

抗击“非典”斗争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面临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百姓，社会各行各业的民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谱写了一曲曲“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伟大民族精神的英雄壮歌。当北京市场出现市民集中购买生活必需品，部分商品脱销时，全国许多地方紧急支援北京，在几天内3500吨大米、200吨面粉、50吨食油迅速调运进京。仅仅7天，在北京就奇迹般诞生了一座拥有1000张床位、全国最大的专科传染病医院——小汤山医院。而来自军队和武警的医护人员，在接到征召命令后迅速踏上征程。真正展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事实证明，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力量源泉，是我们战胜各种困难的强大动力。在抗击“非典”中所形成的伟大民族精神将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98抗洪精神”一样载入史册，永放光芒。抗击“非典”斗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国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能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非典”疫情对国人来说的确是一种道德和精神上的洗礼，成为考验国民人性的试金石。“非典”时期，一些人露出了贪婪自私的嘴脸，有疑似病人逃避隔离，一头往人堆里扎，有医院将因没有交足治疗费的“巨毒级”传染病人拒于门外，有好事者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散播小道消息惟恐天下

不乱,有奸商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仅五一期间,中国质监系统检查制售防治“非典”物品,查处违法案件就有1400多起,另查获伪劣口罩、消毒液等数十万元。一些人乘车船坐飞机拒填表格,一些领导瞒报、谎报、缓报,导致疫情一度扩大,扰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非典”凸现了我国公民公德意识、社会责任感以及个人道德素质教育与培养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为我们加强公民道德素质教育提供了良好时机。人们在思考:如果每一个公民都能抛弃自私与懒散,不做损人利己之事,以诚相待,相互信任,友好合作,做到说实话、不说谎,讲真诚、不作假,守信用、不违约,那么,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将镇定自若地战胜任何突如其来的灾难。

四、培养良好卫生习惯,改进生活方式

经过“非典”的洗礼,国人不仅对生命的本质和社会的道德及法律有了更深的感悟,而且开始反思自身的卫生习惯及生活方式,进而对公共卫生、环境保护以及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有了深刻认识。

由中国科协发起,人民网、光明网、新浪网、搜狐、中青网、中青在线、中国公众科技网、天极网等协办的“我最深恶痛绝的生活陋习”公众评选活动,经过近十万公众通过因特网、声讯电话、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参与评选,“随地吐痰擤鼻涕”被评为最深恶痛绝的生活陋习,其他生活陋习按得票依次为:“随地便溺传疾病、乱抛垃圾倒污水、公厕卫生不维护、滥捕食野生动物、咳嗽喷嚏不掩饰、公共场所吐烟雾、手蘸唾液点钱物、喝酒劝酒不节制、饭前便后懒洗手。”

毋庸置疑,“非典”的爆发与蔓延,与国人的上述生活陋习密切相关,因为这些陋习为病毒流行提供了土壤;同时,“非典”蔓延也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卫生习惯中的某些弊端和危害,反映了国人一定程度上社会公德意识的丧失与欠缺。

令人欣喜的是，国人已经从“非典”肆虐中汲取沉痛教训，坚决洗刷种种不道德的生活陋习，确立起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调查发现，“非典”过后，一些良好的卫生习惯开始在民众中复苏或者萌生，国人的一些行为习惯不同程度上有了改变，比如，人们对随地吐痰等一些不文明行为不再漠然了，对经常洗手、每天清扫房屋，早睡早起、锻炼身体，保持室内空气流通等一些卫生健康常识不再忽视了，开始重视和维护公共卫生，喷嚏要用手巾盖，换洗衣物太阳晒，果皮纸屑不乱扔，等等。

“非典”使国人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开始反思爱吃生猛海鲜、乐于大吃大喝等一些饮食习惯。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林业局联合发出紧急通知，立即停止猎售野生动物，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港澳台地区的3000名厨师填写了“绿色厨艺大使”的申请表，参加“拒烹珍稀动物宣誓”。广东省人大二审《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草案）》，将原有的“不吃野生动物，切断由野生动物引起的病媒传播疾病的途径”这一条款修改为“公民应当养成文明、卫生的饮食习惯，不滥吃野生动物，预防动物传播疾病”。

不难发现，防治“非典”的过程伴随国人革除卫生陋习，改进生活方式，树立珍爱和维护公共卫生意识的过程。可以说，防治“非典”的斗争已经成为国民培育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和精神面貌的良好机会。

五、完善政府应急机制，提高国民对突发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

“非典”疫情无论给国家还是个人都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如何建立政府应急体系及机制？怎样提高国民对突发事件的心理承受力？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自然界和人类

社会的发展总是充满着变幻莫测的偶然现象。尽管人们总是期望风调雨顺,期望在一个宁静、安全、有序、可预见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生活,但是,突发的、难以预测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如特大洪涝灾害、严重瘟疫、战争叛乱、经济危机、政治骚乱、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却经常不断袭击人们的生活。每一次突发事件在给人们带来严重冲击和危害的同时,也使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这次“非典”爆发是一次社会性危机事件,作为应对这场危机的指挥中心,我国政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尽管“非典”流行初期,政府管理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与弊端,由于信息不灵,疫情报告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力,要求不严等,一度出现了部分地区抢购药品与物品现象,社会公众弥漫着一种慌乱心理。但是不多久,政府就迅速做出决策,建立了一套对付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理机制。比如建立统一的指挥中心;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健全重大、紧急疫情信息报告系统;建立和完善疾病预防控制和急救治体系;建立一支机动应急医疗卫生队伍;紧急出台了一系列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一手抓抗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要求凡是传染性很强的疾病,都要及时收集、及时报告,并向社会通报疫情发生的实际情况,提醒广大群众注意自我保护,等等。应该说,所有这些措施增强了政府应对危机的调控能力,对控制疫情蔓延并维护社会稳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非典”事件促使政府积极探索构建应对危机的机制。政府建立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将“非典”列入法定的传染病进行依法管理。由于政府始终把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努力建立一个“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政府,

所以赢得了国民的拥护和满意。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在考察北京、上海等地后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的防治“非典”体系是很有成效的,不愧为一个高度负责、措施得力的政府。

与此相应,“非典”事件也凸现出国人应付突发危机的心理准备严重缺失,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相当脆弱的问题。国民心理问题比较突出地表现为怀疑、担心、害怕、恐惧和恐怖等方面。比如,有些人对“非典”过度恐惧和焦虑,本来什么症状都没有,却怀疑自己得了“非典”,还担心会降临到自己家人身上。住院的医护人员心理受到的打击和创伤远远大于其肉体的折磨,远离亲人和朋友,有的甚至得不到家人和社会的理解和关心,情感的休克使他们感到焦虑和恐惧。有的护士患者,在经受疾病折磨后,出现了精神分裂症状。几乎大部分“非典”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倾向和精神抑郁情况。“非典”灾难使人感到个人力量的单薄微弱,无法与自然力量抗争,进而在无力无助、自惭渺小的心态下,有的人产生求助外力的念头,燃放鞭炮驱赶“非典”。有的地方出现了巫婆神棍大行其道,封建迷信死灰复燃,一时间,谣言甚嚣尘上、恐慌性抢购成风。

有鉴于此,有必要构建一个健全社会所必需的应对突发事件和危机的心理预警和创伤救助机制,换言之,当出现突发事件并预见到其有演变为社会性危机的可能,或者出现社会性危机的某种征兆的时候,应由权威部门及时向民众发布尽可能准确的信息,使他们及时做好预警,并了解民众的社会心理,及时预测和引导他们的社会行为。这次“非典”留给人们的深刻教训是,社会信息越是模糊和不确定,人们就越有可能产生焦虑和恐慌心理,以至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事实证明,个体的情绪对群体有感染性,而社会的恐慌更会加剧个体的恐惧。因此,每一个国民都必须从自觉

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定团结的高度出发,对社会负责,也对自己负责,主动地控制和调适自己的情绪,提高自己的心理承受力,保持从容乐观的态度,理性地对待突发事件。

六、尊重科学、崇尚理性

“非典”留给国人的重要启示是: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首要前提,政府管理是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法律制度是控制疾病的权威手段,道德素质是重要的精神动力,良好卫生习惯是防治“非典”的必要条件,科学理性是战胜疾病的关键。

抗击“非典”的斗争,使国人经受了一次尊重科学、崇尚理性的教育和洗礼。据媒体报道,“非典”的首发地在中国广东,第一位患者是某餐馆的厨师,这使人推测“非典”病毒的传播可能与广东人大吃野生动物有关。后来专家们从蝙蝠、猴、果子狸以及蛇等数种动物体内检测到冠状病毒基因,已测出的病毒基因序列与SARS病毒的基因序列完全一致。这一成果为人们防治“非典”、战胜“非典”提供了依据,指明了方向。同样,尊重科学、崇尚理性对政府的决策至关重要。防治“非典”期间,政府领导亲自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与抗非科研和医疗专家进行座谈,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不时与专家交换意见和看法,共商抗非大计。实践证明,只要依靠科学,崇尚理性,充分发挥科技人员和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就一定能赢得这场抗击“非典”的战斗。

总而言之,抗击“非典”的斗争已成为国民确立科学理性精神,提升悟性智慧,形成科学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契机,并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宝贵经验。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政府高度重视,果断决策,认真负责,靠前指挥,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全民动员、群防群控,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社会各方

面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形成了强大合力；依靠科学、运用科学，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和科学技术的力量，使科学技术成为战胜疫病的有力支撑；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制定和运用有关法律法规，使法律成为战胜疫病的有力保障；全民族万众一心、迎难而上，伟大的民族精神得到锤炼和升华，形成了凝聚人心、克敌制胜的强大精神支柱。（参见《人民日报》2003年7月29日）

（作者：陈金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博士）

14.

寻找新的家园,人类的未来命运究竟会走向何方?

妥 思陀耶夫斯基说,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从近期的物质生活角度来说,这似乎是可以被证实的。尤其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运动过程中,人类正运用智慧和理性不断改造着世界和自我本身。科学、技术、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全球化被我们理所当然地看作是文明的具体含义。但正如艾凯所说,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然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的确,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能力上如日中天,与此同时却也失去了固守的家园。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精神家园中,战争、污染、生态系统的破坏、人与人的尔虞我诈这些病态的问题都成为人类世界的灾难。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认为,启蒙理性在向“工具理性”的转化过程中,造就了科学的神话和知识的极权,由此而带来了许多危害,最为严重的就

是现代社会和人的“物化”。面对这样的“二律背反”性的存在，智慧的使命就是解构现实世界，探究人类家园的理想境界，把握人类的未来命运。

一、后工业社会中失落的人类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技术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生活，同时，也破坏了人类生活的环境、水源、空气。约翰·奈斯比特说：“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曾经经历了自己的中世纪——高技术的发展和以用机器取代人为特征的高度工业化时期，极权政治和战争摧残了人和人类文化。”^①确实，科学技术的极度发展使人类社会发展处有一种危机四伏的状态中，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自然环境的威胁。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说，技术虽然成功地解决了经济领域里的诸多问题，可在解决关于人的问题时却是日趋失败的，人类在工业体系中“正面临着失去它活生生的人的本性的危险”。^②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类历史自从打开新技术革命潘多拉魔盒以来，便走上了一条和自然互相抵触的道路。科学理性精神拓展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同时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造成了人对自然的征服与自然对人的报复的恶性循环。生活在都市的高楼大厦人工环境中，人们不再关注自然，也失去了人的自然的本性。而人口过剩，环境污染，既是人与自然疏离的原因，也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拥挤的城市空间，堵塞的交通状况，剧烈的生存竞争，使人们长期处于紧张的焦虑和烦躁之中。心理学研究表明，当生物体集中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出现形

①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第66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② 转引自祖朝志《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批判》，第37页，《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5期。

色色的病态行为。

另外,由于激烈的竞争,新的发明创造不断地推出不顾及长远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问题随之产生。比如,洗涤剂已经普遍代替了肥皂,但合成洗涤剂的主要成分是各种磷酸盐。磷酸盐随洗涤废水进入水源,大大加速了微生物的生成,造成富营养化。水生环境的这些有害变化,将使湖泊迅速衰老,寿命大大缩短,使湖泊变成沼泽,沼泽又完全干涸。同样,化学除草剂、化学肥料、农药广泛用于农业,在产品大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极大的副效应。地力减退,土壤盐碱化,并且使食品严重污染,甚而造成食物中毒。^①世界性大范围疾病的暴发,水灾、旱灾的频繁出现,生态环境的失衡,我们应该反思:人类的发展是否以人类本身为代价?人类的未来命运究竟指向何方?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现代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技术社会。在现代化生产中,对现代机器设备和网络系统的依赖造成了人的自我封闭,使人与人之间难以真实地相遇,一切社会关系都变成了单一的技术关系。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技术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中,科学技术成为惟一真实的代表,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尺。^②科学技术以其非凡的伟力解决现代社会工具理性问题,却对价值理性问题从来就显得无能为力,并且还使社会生活出现了道德文化生长的断裂。面临道德失范甚至道德沦丧的困境,本来科学技术是人的本身力量的显现,可是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它却获得了主体性,变成了一种独立于人的异己力量,并反过来与人作

① 余秉旄、郭海文《科学与文学的困境》,《理论导读》第43页,2003年第3期。

② 吴刚《科学技术的伦理学反思》,《学术论坛》2002年第12期。

对，剥夺人的自由。大众传媒的广告夺取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真实的认知，隔断了人与社会的直接的联系。医院中，现代化机器设备越多，医生与病人的距离越远。学校中，信息、网络平台拉开老师与学生之间传统的教学与沟通距离，思想的交流越来越困难。其中还有人口膨胀后带来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贫困、污染、交通阻塞、城市设施陈旧失修、就业不足引发犯罪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发展。

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却扩大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功利化，冷漠化，商品化，总之变得非人道化。汤因比说：生活在巨大公寓群中的人们，彼此只是物理意义上的邻居，个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接触。

从人与自我的疏离来看，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容易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物质条件的改善和财富的增长上，而造成人对亲情和精神世界的忽视。在技术设备的威力和建筑环境的冷漠面前，使人自身的价值遇到挑战。沉迷于物质消费、单纯的功利原则和商品化，使人丧失精神家园和理想的推动力。另一方面，社会的许多罪恶起源于人的贪欲，即无节制地占有财富和享乐的欲望。科技文明创造的财富扩充了人的贪欲，由于相互的攀比使现代人在富足中反而更加不满足。科技手段既可用于防范犯罪，也可用于犯罪。这是科学无力解决的问题。

二、共生与和谐是人类家园的理想境界

世俗世界中存在的问题，不仅直接影响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问题还直接关系着人类未来的发展前途和命运。

西方关于人类未来命运存在两种观点。以后现代主义兴起为标志的关于人类家园、未来命运的反思性讨论，始于

20世纪90年代。讨论波及了各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未来学家等,讨论的中心是怎样看待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和派别,即以D·梅多斯为代表的未来学悲观派和以J·西蒙为代表的未来学乐观派。

悲观派的代表梅多斯是麻省理工教授,自然科学家。他在《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中,研究对象放眼于全球,重点研究了人口、工业发展、资源消耗、粮食和环境污染5种因素之间的变动与联系,认为这5种因素的共同特点是指数增长,也就是说它们都以并不相同的百分率逐步增加。而指数增长的结果必然要达到极限。要解决这种“增长的极限”,必须停止人口增长和工业投资的增长,以达到“增长为零”的全球性均衡。按照梅多斯的观点,既然人口、工业发展、粮食、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最后都必然要达到极限,那么,人类未来的发展也必然要达到极限,人类的命运也会终结,人类的家园,无论是物质家园还是精神的家园也就根本无从谈起。

乐观派的代表西蒙发表了《最后的资源》,以《增长的极限》为对立面,对其观点进行批驳,同时系统地论述了作者对人类资源、生态、人口问题的乐观看法。他认为,增长是没有极限的,因为增加的人口通过创造新知识和经济规模性而不断发展的技术可以超越增长的极限。

目前关于人类未来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的两种不同观点的论战仍在继续。霍华特等以平衡态热力学为理论依据,从自然科学角度支持“增长的极限”论点,得出更为消极的结论:人类的历史是一个衰亡的历史,人要走向死亡,地球将从崩溃走向毁灭。

应该说,无论是“增长的极限”观点还是“没有极限的增长”观点都是片面的。首先,悲观论者把地球视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只强调限制社会发展的自然因素,没有看到促进社

会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和精神力量。其次，“没有极限的增长”只是把未来社会的发展完全寄托于技术进步和市场调节，认定新的技术革命会使自然资源为人类提供无限量的供应从而保证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没有认识到任何既成的社会发展形式都有它的极限，而极限的突破，首要前提是社会发展形式的突破。^①

西方学界苦于找不到人类社会理想的发展模式，中国古代却早已出现了关于人类理想家园的架设，即“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中的天，指“自然”）。这种思想包含了对人与外部世界、人与其自身之间关系的极为深刻的思考。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可以说是代表著作之一。“世外桃源”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没有王权、没有战争的人类生活场景。在这一场景中，人们“日入从所憩，菽稷随时艺”。桃源人日出而作，日没而息，顺应四季的变化和谐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与同样因季节变化而有枯荣的芳草、竹林等自然界获得了生存意义上的统一。同时，桃源人已然摆脱了世俗社会中的利益关系的羁绊，以天然的心境与其他人共处，将人与人的关系还原成一种本真的状态，描绘了一幅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共生与和谐的理想画卷。

“世外桃源”所构想的理想中的人类家园，体现出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沉关怀，特别是在工业文明已经带来过多负面影响的今天，更显得尤为受用。我们期待用桃源式的理想安慰荒芜的心灵，并用桃花源虚拟一个心灵的家园和归属。但“陶氏构想”毕竟是不能超越时代的，我们别无选择地需要立足于现实，反思人类家园的何去何从。

^① 康忠、汤再林《现代社会问题与人类未来发展的思考》，《社会科学研究》，第87页，1996年第6期。

归纳起来,现实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分为两大方面:第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主要有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能源危机、资源消耗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第二,人与人及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主要有战争、拜金主义、信仰危机、非道德主义、利己主义等问题。

问题的灾难性已经开始凸现,“9.11”带来的慌乱,核武器的恐慌,恶劣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紧迫,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科技的异化”、“人们社会不合理化”的观点,及他们对科技的极力诋毁,又稍显偏激,使我们从一个极端滑向了另一个极端,阿多诺甚至认为,科技的进步带来人与自然的日益分离和对自然的支配,并不能推动人类的解放,“科学与其说是人类进步的忠诚助手,毋宁说是包括了新的人类异化的种子”。^①后现代主义批判科技的危险,讴歌自然的原始性,鼓吹人类应回返那个原始、自然、和谐、自由的家园。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局限,因为现代化仍是中国目前正努力追求的目标,此刻在中国谈科技批判尚且为时过早。这些矛盾和问题都促使我们必须马上让理性跳出现实的困惑和樊篱,并且意识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类社会的共生与和谐才是人类家园的“命定性”回归。

三、重建人类现实世界和精神家园

找寻人类新的家园,完善社会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复杂而严肃的课题。正确的态度是,既不消极悲观,丧失信心,也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而应立足于现实,做些有益的探索。后现代思潮显然是对当代西方文明进行自我反省的产物。它所提出的应变主张,既有解构和摧毁的一面,也有重构和建设的一面。虽然后现代主义摧毁性的一面非常彰显,过于

^① 马木·杰《阿多诺》,第113页,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

激进，但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确实可以让人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危机有清醒的认识。可喜的是，目前我们在人类发展模式上正在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技术非常关注，并对技术进步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马克思称赞科学是“一本打开了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①并把科学技术看做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的力量”。^②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整个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正确地看到了科技的作用。毕竟，人类每迈出一步都依靠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众所周知的科教兴国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历史性任务。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后现代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以西方为鉴，警惕科学技术的负效应，力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目前，世界各国纷纷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81年美国科学家布朗创办的世界观察所出版了《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可持续发展”一词正式公诸于世。80年代中期，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首先提出，并将可持续发展概念定义为：“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几代人的需要。”然而，究竟要用多久才能让这济良方妙药发挥其应有之功效，让生态环境的疮痍尽快痊愈，人类不能做出明确的回答。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合理使用科学技术。这是人类走出生存困境的出发点，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况。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页。

大。因此,人类必须重视科学技术,因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仍然要依靠科学技术这一强有力的基础;但同时,对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也应给予客观的评估。在合理使用科学技术的前提下为人类创造财富、创造文明,这是人类走出生存困境的首要前提。

其次,以人类的根本利益为目标。目前,人类的目标是走出生存的困境,获得和平、安宁的生存空间,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创造最佳条件,实现人类的和谐发展。人类的任何活动包括科学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必须以这一目的为目标。人类必须正确预见科学技术活动的社会后果、经济后果、生态后果,以关爱人类、关爱大自然的胸怀,掌握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并且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伦理责任感无疑具有关键的作用。

再次,寻找科学技术新的生长点。开发利用新兴的科学技术,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把适应和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可行的,正如20世纪科学技术曾解决了人类面对的一个个难题。因此,在人类走出生存困境的问题上,科学技术仍有无限的潜力,关键是如何有效开发利用科学技术,让科学技术发挥其最大效用,成为人类解决生存困境的推动力。比如针对环境污染严重、人类应发展高质量的绿色科学技术项目,补偿自然界的消耗等。这是人类摆脱生态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走出生存困境的一条明智的路途。^①

如前所述,科学技术拉开了人与人的情感距离,超越自我的欲望现象非常严重。现代人成为被科技异化的孤独者,

^① 李赫亚、娄和标、徐景芝《走出生存的困境——关于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哲学反思人与人及人类社会和谐存在》,《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页,2001年6月。

流浪在精神家园之外。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特征，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人的心理产生变革性影响。其所带来最大的负方面影响就是，进一步加大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距离。因此，培育人与人之间共同的文化感知、互动的精神情感，是凝聚人与人、人与社会，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必要路径。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呼唤诚信，拉进情感。

诚信通常被看做是一种文化，一种意识，是拉近人类情感的捷径。我国古代圣贤关于诚信方面的论述就很多，历来倡导为人处世要诚实、诚朴、诚心、诚意、诚恳、诚挚，认为人“无信不立，操守为重”，强调诚信是立身之本，立国之基。诚信，不但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大力褒扬的美德，更是建国后主流文化推崇备至的规范。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诚信无论是在经济活动中还是在政治生活中，也无论是在人际交往中还是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凸现其无可替代的巨大价值。诚信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承载着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历史重任。

首先，人与人良好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培养诚信意识、诚信精神会推进人与人之间坦诚相见，撇除人类之间的障碍。其次，诚信必须与现代社会的管理工具相结合。建立健全的社会诚信制度，培养公民的诚信品德是事关人类精神家园重建能否顺利推进的重大问题。从制度方面进行深层次分析，为诚信制度及体系的建立提供方略是解决重建精神家园的关键。

第二，回归人类精神家园，弘扬传统美德。

传统美德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标志。但由于后工业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少有人谈起价值、美德、友爱等字眼了，而这些财富的缺失也恰恰是人类精神家园的贫瘠所



在。但这也正表示,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在今天这个人人自封、物欲横流的时代,在人类精神世界重建过程中显得更有价值。尤其是,在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中,尊敬师长、团结互爱、谦虚礼貌、诚实守信、惩恶扬善等都具有超越时代、超地域的可继承性。

弘扬传统道德重建人类精神家园需要两方面的重要内容:其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注重民族气节、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重视道德价值以及尊老爱幼、婚姻爱情的忠贞专一等等;其二,人类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传统,如纯朴善良、诚实守信、助人为乐、扶危济困、谦虚谨慎、文明礼貌等等。可以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至今仍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也应该是人类经过精神流浪后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

没有人可以否认科学技术在人类走向文明之路中的重要作用,现代工业文明也是现代化的结果。但正如后现代主义学者所批判的,我们也不能对工业文明的弊端视而不见。要消解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必须对现代化实践做出深刻的反思。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现代化,制度、道德、文化等各方面的更新以及全面的社会变革的全方位发展过程。可遗憾的是,人们对现代化获得这样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绝大多数国家选择了一条以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道路。污染严重的工厂被作为“朝阳”工业加以推崇。只要经济发展,可以不择手段,一时间成为许多国家的价值取向:毒品、色情、卖淫业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①追求片

① 顾玉兰《后现代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观之比较》,《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面现代化或片面发展的后果是：道德沦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膨胀、资源匮乏。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严正地指出：“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受害。”所幸的是，《寂静的春天》在1962年问世以后，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从深层次上对现代化过程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进行反思、检讨和总结。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醒世的呼唤，已经让人们逐渐意识到：首先，人类必须与自然界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如此才能长久居住在自然界的现实家园；其次，人与人之间也需平等对待、讲究诚信、弘扬传统美德，抛弃自私和功利主义，找回本我，回归美丽的精神家园，从而到达人类与世界和自我共生和谐的理想境界。

（作者：吕江英，上海交通大学教师，硕士；陈猛，上海交通大学教师，硕士；张红梅，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总支书记）

15.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究竟新在何处？

当历史叩开21世纪大门的时候，富有理论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并在全中国兴起了学习贯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新高潮。在学习和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有些青年大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三个代表”中无论那一个代表，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似乎都说过，有什么新意看不出；“三个代表”并没有突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意识、也不明确共产主义理想目标，是不是远离了老祖宗？既然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什么还要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述青年大学生的疑问，值得我们去思索。的确，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有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当代中国

改革开放的鲜活实践有机结合、如何评价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价值，存在着种种疑惑，确实有必要对此做出我们应有的探索和解答。

一、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意，我们不能回避如此事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毫不动摇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讲了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新话；体现了用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实践始终不断地向前发展着，是没有止境的，这就要求理论必须随着实践一道向前发展，否则就可能沦为理论的化石。任何理论（马克思主义）都不可能是提供一切问题现成答案的学说，凡是自称终极真理体系的学说，就像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室，而不可能兴盛于世。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以其远见卓识向人们宣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发展着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一方面是指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植根于实践、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又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在坚持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具体历史的辩证统一中生成着的活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已经一个半世纪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它的个别结论、某些提法确实存在明显的失准、落后或过时，而一些新的时代特征也不可能被其所涵摄和论析。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没有过时，仍保持着科学性和有效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跨越时空的一般性。而正是这些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和实

质的东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思想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我们必须坚持和继承,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发展和创新,因为它不是教条而是科学方法和行动指南,是由实践赋予其活力并由实践来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理论。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实际,自觉地植根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的发展,大胆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

从这个角度看,任何只要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其在本质上不可能背离或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相反,必然表现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内部一脉相传的发展、丰富和深化,是同一个科学思想体系内部的传承与拓展,继承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生命力的展开和体现。当然,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不断发展着的实践相结合,并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时代和实践的特征,认真总结经验,积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进行探索 and 理论创新,不断开拓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及其生命力,也是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责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这种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毫不动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的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光辉。例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

的决定因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强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至为紧要、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强调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强调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意义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强调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价值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强调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强调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等。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密不可分;强调要处理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关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关系,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关系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讲了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新话,勇于突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不能用死的本本去框活的实践,而只能根据变化的实践去发展本本。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毫不含糊;同时,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也毫不含糊。一是从民族、国家、政党、社会的发展需要出发,论述了创新的意义,指出创新是“灵魂”、是“不竭动力”、是“源泉”、是“先导”、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二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

度论述了创新的客观必然性,指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三是强调用实践来检验一切和“三个解放出来”。13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讲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新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崭新的科学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成就辉煌。什么是新实践?新实践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这样的新实践,以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为国际背景;以改革开放为国内背景;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总目标。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审时度势,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进行理论创新,通过对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印证、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总结、当代世界与当代中国的深入研究,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通过开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育,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和与时俱进品质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通过考察时代主题,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研究党员队伍状况,明确党的中心任务,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创造,从而使我们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新高度,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客观真理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江泽民同志指出,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创新、开拓前进的过程。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进一步结合,坚持并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的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实践的更新而更新的开放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内在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质。“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不是在简单地重复老祖宗的话,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话新说,而是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创造性地回答时代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中,建构的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进一步结合,坚持并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翻开中国的近现代史,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凝固不变的教条,而是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一开始就注意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这个科学理论,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因此,在中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是统一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

族近代以来独立富强民主文明梦想,探索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史进程中的。

实现现代化,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它体现的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大趋势。中国只有实现现代化,才能重返世界发展的主流。

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索与奋斗,光荣与梦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新的起点,开始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艰辛探索。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认识中国国情,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以改革开放新政策为巨大历史杠杆,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由毛泽东等人所开始探索的但没有成功解决的中国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航道,由邓小平打通了。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地继承由邓小平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着力把这条道路推向前进。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挫折,中国国内面临严峻挑战的转折关头,党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在党的十四大上,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重要标志,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引导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高高举起,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到一个新

的阶段。

当人类来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折点上,我们看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许多情况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客观环境给党和国家工作提出新的要求。我们究竟应该锻造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引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把邓小平开辟的道路向前推进?

实践表明:在继续推进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认识的同时,我们必须联系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又一个基本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相互联系、相互制肘,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关于党的基本问题的解决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说过,治国必先治党。如果不把党的事情办好,不能在新的环境下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解放全党思想,提升全党思想,需要继续解决的关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方面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便无从解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时而生,应运而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仅只是三句话,而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其丰富的内容不仅包括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也不仅论证了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坚持“三个代表”,而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基础,深刻阐述了怎么坚持并做到“三个代表”这一重大问题。因此,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深化了对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党的认识。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当代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执政党的建设为重点,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社会全面发展为基本内容,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全面体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新的思维框架重新解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体现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理论高度

胡锦涛同志在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明确指出:“这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标志。”

怎么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论证,但如果我们把视点聚焦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何创造性地回答了建

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新的思维框架重新解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就不难发现“三个代表”这个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包含了极其厚重的底蕴,表明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实事求是地说,真正自觉地把执政党的建设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出来的邓小平。早在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邓小平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并在后来的十几年里,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总结历史经验,从方方面面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初步回答。并且,邓小平高瞻远瞩,专门把“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交代,寄厚望于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来解决,为后来对执政党的建设问题的探索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是一般地要求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建设,其实质上是要把党的执政活动,提到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在学会尊重这些规律的基础上,自觉地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切实把我们党建设成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并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执政党。

什么是规律?规律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政党执政的规律,就是政党在控制和行使政治权利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反映政党政治本质和必然性的法则和客观要求。研究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就要研究执政党的特点和任务、执政的方式和能力,以及执政基础等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和解决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在本质上就是执政的共产党如何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关系,使党能够得到人民的理解、拥护、爱戴、信任和支

持,更好地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对党的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新的觉悟。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我们党的这一认识成果来之不易。著名学者冷溶先生说过,我们党有个好传统,每逢重大决策的关头,都要总结历史经验。“通鉴”可以资治。治国是这样,治党也是这样。总结150多年来共产党发展的历史、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特别是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深化认识和掌握执政党建设的客观规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十分有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历史经验总结的直接产物。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90多年历史的老党、大党,它曾肩负人类进步的希望,具有坚强的战斗力,领导着苏联人民突破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在近30年间把一个农业国建成具有初步工业化、能打败法西斯强敌的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随后又领导国家第一个征服太空,以国防实力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相抗衡。但是,在走过不平坦的执政道路后,最后不仅失去了政权,而且连自身都陷入瓦解的境地。当然,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人们的认识也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党与人民的关系发生了危机,党失去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斯大林曾经说过一则希腊神话故事:有一位英雄叫安泰,是地神盖娅的儿子,每当与敌人决斗遇到困难时,便往他的母亲身上一靠,立即可获得新的力量。因此任何敌人也不能战胜他。后来,敌人获知了这一秘密,便设法把他举到空中,在空中把他掐死了。斯大林引用了这则故事后说,布尔什维克很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维克也同安

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育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就有一切把握,始终是不可战胜的。看来,斯大林似乎明白这个道理,但显然他最终没有实践好这个理论,而以后的苏共领导人也没有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执政的苏联共产党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心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痛定思痛,使我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今天党的生存死亡,并不在于党实行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控制了多少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权力,而是在于赢得了多少人心,赢得了人心,就掌握了最大的权力,这是被实践屡次证明的一条真理。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超越思辨的实践品性,把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内在有机地统一起来,体现了一种伟大的实践创新

一般说来,人们在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时,比较注重分析和研究它提出了哪些新观点、新论断,达到了什么样的理论新境界等等,当然,这本身并不错。但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更重要的是发掘实践的原创性。发展生产力、坚持先进文化和代表群众根本利益的思想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论述过的基本原理,但把代表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要求,代表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写在旗帜上作为纲领,把原来只是作为理论原则和共产党人伟大理想的东西,变为实际行动,与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的方向全部凝集在它上面,从而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社会主义的再度辉煌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这个意义就非比寻常。如果我们考虑到十年“文

革”动乱,考虑到我们经历过20年“左”的路线和干扰,就更能体会“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离开了中国实际,离开了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只是着眼于哪句话在哪里说过,是不可能理解“三个代表”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的。

任何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以一定的现实生活和生活在一定的现实中的人们的实践为观照,是严密历史逻辑的论证和高度时代本质的概括。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思辨的东西,高于生活又必须超越思辨,回归生活,回归实践。理论的目的和价值都在于实践,理论的生命力归根到底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实践。马克思说过:“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①马克思主义是在证明自身的效用和价值中,确认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和依据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是统一的,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实践“三个代表”思想是一致的。事实上,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提出并坚持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因为它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困扰我们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新的回答,扫清了继续发展的思想的、制度的障碍,并为不断开创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和实践舞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在当前,实践“三个代表”就必须把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内在有机地统一起来,当然,这种统一也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

客观地说,在怎么认识党的先进性上,过去我们的理解

是有偏差的。即往往停留在性质层面上,停留在静态的定性的分析上,似乎保持党先进性,主要看它的性质、成分、指导思想没有变化就行了。事实上,这是远远不够的。先进是对后而言的。一个党是不是先进最终要看它的实际行动,要看它是不是真的走在了时代的前头。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集中、全面、凝练、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所应该具有的先进性,而且把党的先进性看作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把党的先进性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中的作用。

以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要求作为思想武器,重新审视我们的现实社会状况、现实客观要求和现实的发展任务,可以说在我们习惯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仍有许多方面是不能够适应“三个代表”的先进要求的,因而必须改变,必须摒弃,必须更新。我们必须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深化各方面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是改革,努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我们必须正确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民族凝聚力,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一句话,我们必须在21世纪头20年紧紧抓住这个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全面建设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无疑,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极高的要求,它不是什么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可以任意使用的标签,而是非常实际的东西,需要实实在在地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因此,当我们把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就使“三个代表”理论具体化了,具有了实际的可操作性。显示了在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伟大的实践创新。

总之,只要我们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就能够更加冷静、更加客观、更加辩证地洞察世界风云变化和天下大势所趋,能够更加理智、更加周全、更加现实地把握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未来,就有了面向未来、应对未来、创造未来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就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作者:耿志敏,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政治系副主任,副教授)

16.

雷锋精神在当代世界究竟还有没有价值？

DANGDAIDAJIESHENGUANGXINDEERSHIMUGELLUNWENTI

雷锋精神在当代世界究竟还有没有价值？

雷锋，生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的战士，1939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安庆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童年受尽了苦难，父母被地主逼迫而死，7岁就成了孤儿，党和人民的培育使雷锋从一个苦大仇深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五好战士。雷锋在参军前就曾因努力工作而受到过乡、县级的嘉奖，在部队，雷锋不仅勤学基本功，还无私地为集体和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曾经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是这样说的——“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1962年8月，在一次执行任务中，雷锋因公殉职。次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周恩来同志也曾为此题词并对雷锋精神做了概括：“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朱德同志的

题词是：“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也作了题词。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

从1963年至今，雷锋的名字响遍大江南北，雷锋的形象也深深地印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中。这40年来，涌现了许多以雷锋名字命名的单位，雷锋班、雷锋列车、雷锋小学、雷锋储蓄所……全国各地还成立了学雷锋研究会、学雷锋基金会等各种机构，各地在不断地组织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学习雷锋和雷锋精神的座谈会、研讨会，宣传的形式从图书、报刊扩展到创办网站。20世纪80年代还曾经讨论过西点军校是否有过学习雷锋和雷锋精神的举动，然而“西点军校学雷锋”不管是否真有其事，这场争论也恰恰说明了雷锋精神中有着一种普适的人文精神。因此我们可以说，雷锋精神是中国人民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确实，雷锋代表着一个时代，雷锋精神和学雷锋活动带有很深的时代内涵。如今，雷锋生活的年代和成长的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雷锋的优秀和雷锋精神所代表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有人提出，60年代大力提倡雷锋精神是政治需要，在国家政治机器控制一切资源的时代，找一个听党的话、助人为乐的学习典型，能够建立起符合执政党要求的社会伦理体系。而在社会经济转型之后，社会生活的政治色彩日益淡漠，雷锋精神褪色了，学雷锋活动也难以顺利地推行了，只有在每年3月5日的学雷锋纪念日才有各种学雷锋活动，因此也有人说“雷锋同志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里走”。

雷锋精神真的失灵了吗？雷锋精神是政治的产物呢，还是社会的道德要求？在今天这个以市场经济和价值多元化为特征的时代，雷锋精神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呢？本文

从分析时代的特征和要求入手，阐述雷锋精神的含义与时代价值，并力图结合当代社会特征提出如何与时俱进地实践雷锋精神。

一、时代的要求与雷锋精神的本质相通吗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逐渐改变计划体制的经济运行模式而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使得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加快了融入世界的步伐。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随处都可感受到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给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广泛而复杂的影响，感受到人们在增强适应和改造环境能力的同时也在加快改造自身的思想和行为。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宏观环境的变化，经济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程度以及国内改革的力度必将逐步加大，在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外资的不断进入之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面临着多种经济成分的不断冲击，而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又势必要求多元的利益表达途径并形成多样化的利益群体，这是产生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优厚土壤。

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时代经济与社会的建设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国家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需要社会能为其提供公开、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需要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惯例、习俗以及人们对此的遵守来建立和完善市场秩序。然而，脱胎于计划经济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既成的市场体系，经济的转轨和各项机制的形成主要在政府的干预和主导下进行，由此，我们已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框架和维持市场秩序所必须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但是，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又是以自由选择、自愿交换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除了通过法律法规的引导、规范、制约与保障来实现国家对经济活动

当代大学生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

DANGDAIDAXUESHENGGUANXINDEERSHIMOGELILUNWENTI

的宏观管理和调控之外,市场的良好运作还需要除了正规制度的强制力量之外的约束力,即亚当·斯密曾经指出的“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①这种非强制性的自我约束力不仅可以降低执法的成本,也常常成为诱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因素。

这种非强制性约束力的形成虽然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但它并不会自发地起作用,而从另一方面看,由政府来推动建设和培育各类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国情,这样,政府也义不容辞地承担了一部分开发和完善市场文化的功能。坚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战略,在传统中国社会,道德教化的任务历来也是由国家承担的。当然,在市场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政府也有一个如何把握好干预尺度的问题,把政府对于社会道德要求的积极倡导内化为个体主动的道德要求则是更为重要的。

市场机制是一个分散决策的机制,每一个主体都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根本目标,但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和信息的不充分,导致市场常常“失灵”,以致发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和存在一方面要依靠法律的手段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则要求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和企业在做谋求利益的“经济人”的同时,必须也是担负社会责任的“道德人”。公平、公正、诚实、守信是稳定市场秩序并促成主体之间合作从而取得效益的

^① 亚当·斯密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第38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最基本道德要求，来自法律的外部强制力和来自道德的自我约束力所形成的市场机制使市场能不断地排斥阻力并为自己开辟道路。

雷锋精神的本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要求，也是集体主义原则和价值观的具体体现。雷锋精神中所包含的勤勉工作、忠于职守、乐于助人的品格因素和一种宽容、和谐、互助、奉献的社会伦理，正是市场经济时代所需要的。在市场条件下，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市场主体要在竞争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恪守道德原则，才能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升社会效益，从而实现为他人的与为自己、服务与谋利的统一。因此，市场经济是需要道德去滋养的，市场经济同样需要雷锋精神，当然，在现阶段我们还不能要求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能像雷锋那样不计报酬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如果大家都能发扬雷锋精神，努力实践为人民服务，杜绝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行为，那也必然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出空前的生机和活力。

二、雷锋精神的内涵与时代的需要相符吗

雷锋精神可以狭义地理解为雷锋的精神，即雷锋的思想、言行、事迹中所体现的人格品质与魅力。雷锋精神更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以雷锋的精神为基本内涵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民族精神。

从雷锋同志日常的言行中我们能总结的雷锋精神的内涵是多层面的，从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至今40年以来，在我国社会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里雷锋精神的内涵又是与时俱进的。

雷锋精神中最闪光的是“爱”，雷锋把人性中至善的一面提升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工作

充满着无私的情感,并为之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雷锋以他的爱心升华了善意,以他的奉献弘扬了美德,也因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对这种爱的奉献的高度概括。

雷锋自幼就成了孤儿,饱尝了旧中国的辛酸,他的成长得到了乡亲们的照顾,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因此他服务人民、回报社会的情感也是十分强烈的。他说: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加美好,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①雷锋之所以感人,不仅在于他表达了这种崇高的人生见解和道德情操,而且把自己的思想认真而持久地贯彻到日常的行动之中,无论是在工作岗位还是社会活动中,他都倾注对人民、对党、对国家、对工作的热爱,把责任和无私奉献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和言行一致的实干精神相结合,使雷锋和雷锋精神由平凡升华为伟大,也是雷锋精神巨大魅力的源泉。

“螺丝钉”式的岗位精神是雷锋精神丰富内涵中的又一闪光点。雷锋在日记中曾说“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机器由于有许许多多螺丝钉的连接和固定,才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才能够运转自如,发挥它巨大的工作能力。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②雷锋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曾经当过机关工作人员、鞍钢的推土机手、部队的汽车驾驶员,他不论干什么工作都兢兢业业、精益求精。雷锋驾驶的汽车曾是全连有名的耗油大王,雷锋通过钻研书籍、虚

① 《雷锋日记》“1961年10月20日”,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1990年。

② 转引自《做坚定的青年共产主义者》,《中国青年报》1983年3月5日。

心请教，把它改造成了节油车。

螺丝钉精神既是谦虚谨慎、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又是把个人融入集体之中、并服从集体和组织的需要的精神，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地精益求精，是在具体岗位上的无私奉献。做一颗螺丝钉就是要先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恰当地估计个人的作用，把个人的发展目标和对社会的责任结合起来，把自己的岗位责任和人生追求结合起来，热爱本职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勤学苦练、探索创新，既实现自我价值也为社会做出贡献。螺丝钉的作用体现在机器的运转中，个体的作用体现在社会的实践中，个体一旦离开了集体，他的能力和价值就无从体现，只有满足社会的需要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

“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则集中体现了雷锋精神的品德层面。雷锋一生做了数不清的好事，而且做好事的动机是自觉的和超越功利的，他乐于助人，尊敬长辈，爱护弱小，对同志、对人民像春天般温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雷锋精神中得到了丰富的体现，雷锋精神又把传统美德升华到无私的境界。雷锋精神中爱护公物、关心和帮助同志、宽厚待人的一面是它的平凡性，是雷锋精神有着广大群众基础和可实践性的体现；而超越功利、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乐于奉献则是其崇高的一面，雷锋精神也因此能成为社会的榜样力量和道德模型，它真实、感人，而且高大。从这个意义上说，雷锋精神和它所体现的崇高品德是整个人类的财富，它已经超越了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和地域的限制，它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既属于过去，属于现在，也属于未来。

雷锋精神中既蕴涵胸怀宽广、志存高远的理想，又有永不就满足、脚踏实地的步伐；既有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又有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实践。雷锋精神是一个完整

的、动态的体系,“为人民服务”是贯穿其中的核心与精髓,“集体主义”是其最高的行为准则,助人为乐与无私奉献是其道德境界。因此,无论是雷锋精神中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还是超越自我的道德感悟和人格魅力,都闪烁着雷锋精神与历史同行的时代价值,它深刻地根植于现实需要之中,又能广泛地昭示大众的价值取向。

雷锋精神既可以外化为社会实践又可以内化为个人修养,它的价值和意义在新时代同样也是显著的,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基础。虽然时代发展了,雷锋精神中体现的爱祖国爱人民、勤劳勇敢、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艰苦朴素和自强不息是依然存在和需要的,我们的生活不再艰苦,但我们依然提倡节俭反对浪费,市场也需要节约一切资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虽然在竞争中追逐利益,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对自己对他人负责并提倡奉献精神;我们强调个人的创造和发展、重视个人的价值实现,但更需要螺丝钉一般的岗位精神;爱心、敬业、勤勉、钻研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因此,正如李长春同志所说“雷锋已经成为真情与爱心的化身,成为时代的楷模,成为我们社会衡量道德行为的标准。雷锋的先进实际和崇高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①

三、究竟如何实践雷锋精神呢

有人说,40年前的学雷锋因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而轰轰烈烈,相比起来,今天的学雷锋显得有些尴尬了、黯淡了,更多地被赋予了纪念的意义。那么,学雷锋、雷锋精神为什么会受到质疑呢?是我们对雷锋精神的理解有误,还是我们的

^① 《李长春同志在纪念学雷锋活动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3年2月28日。



实践环节出了问题？或者说，既然雷锋精神还具有如前所述的时代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实践雷锋精神呢？

先要澄清理论认识。雷锋精神是从雷锋的事迹中提炼出来的，它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雷锋时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大环境决定了人们对于社会理想、人生价值的具体理解与现时代是不同的，决定了雷锋事迹中所体现的勤俭、助人、奉献都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学习雷锋不是要我们简单而苛刻地模仿雷锋的一言一行，而是有必要超越雷锋精神的具体时代限制，学其灵魂，学其精髓，在发展的角度上弘扬雷锋精神。时代在变化，体现雷锋精神的行为也不是永恒的，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出新的方式来学习和体现雷锋精神的精华，通过建立一个又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先进典型，丰富和延伸雷锋精神的生命力。

雷锋精神重在实践。雷锋精神之所以能历经40年而薪火相传，就在于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学习、继承与创新，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平凡的身边小事做起，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雷锋精神、开展学雷锋活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也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需要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把学雷锋活动同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力量，用甘当永不生锈螺丝钉的敬业精神脚踏实地地艰苦创业，把雷锋式的爱心与公民道德建设相结合，促进公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实践雷锋精神，需要我们不断丰富其思想内涵、拓展新领域、探索新形式、树立新典型。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志愿者行动，可以看做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雷锋活动的

深化和发展,志愿者行动是一种自愿的、不计报酬地参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社会公益事业的行为,它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主要内容,与雷锋精神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团中央发起青年志愿者行动,并把它作为“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的一项内容在全国推广至今已近10年了,如今这项活动在全国各地正呈蓬勃发展之势,志愿者们在城镇深入社区为孤寡老人排忧解难,到农村向农民推广新技术、扶贫支教,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当然,作为对雷锋精神的一种发展,志愿者精神不能取代雷锋精神,比较而言,雷锋精神的内涵更为丰富,同样是无偿的服务,自愿者行动更多地是有组织的集体行为,而学雷锋则更多地是自发性的。

雷锋精神的实践和延续还需要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树立新典型,使之能不断地焕发出时代的光彩。40年来,社会哺育和涌现了千百万个雷锋式的人物,孔繁森、李国安、徐虎、郑培民……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彰显着示范和辐射作用,感染和引领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追求。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学雷锋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雷锋和雷锋精神因为其高大而和我们有了距离,也因为这个距离而美丽,更因为美丽而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雷锋精神需要新的历史舞台上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创新的实践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新的时代更需要雷锋精神不断鼓舞人们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成为开创和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论雷锋》,《中国青年报》1963年5月4日。

《再论雷锋》,《中国青年报》1981年3月5日。

《三论雷锋》，《中国青年报》1983年3月1日。

江泽民《接见“雷锋团”的讲话》，1990年10月29日，载《求实》杂志1991年第6期。

朱伯儒《弘扬雷锋精神是时代的需要》，《人民日报》1990年3月9日。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3年3月5日。

周强《弘扬雷锋精神 推进青年志愿者服务》，《人民日报》2003年2月28日。

《李长春同志在纪念学雷锋活动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3年2月28日。

（作者：徐蓉，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部教师，博士生）

17.

在当代,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更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吗?

“在当代,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更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在大学校园中,持这种观点的大学生不乏其人。理由有三,一是人类进入智能化时代,精神的作用特别是思维方式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二是在地球上信仰宗教的人有增无减;三是我们通常把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加以等同,把资本主义与唯心主义加以等同,但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似乎比社会主义发展更具有吸引力。提出这个观点,表明有些学生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质和作用,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演变等问题还认识不深,对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根源认识不清。同时,也表明他们对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有关世界观的理论问题,缺乏正确的分析和批判的能力。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和解答,以有助于我们对这个观点形成比较正确的看法。

一、作为思维方式，唯物主义比唯心主义更有吸引力和感召力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人类哲学史上产生和存在着的两个哲学基本派别。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概念的本意来说，仅仅是表明对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还是精神这一问题所持的主张。唯物主义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物质，唯心主义则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精神，这既是这两个哲学基本派别根本对立之原因，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质之所在。除此之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概念别无更多的含义。

然而，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它又是人们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的方法论。当持有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人，在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时，就会把自己的世界观转化为方法，并用它来理解 and 处理现实问题。一般说来，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要求“从事实本身的联系”来理解 and 处理现实问题。^①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现象只是物质世界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对现实的物质世界的反映，那么对现实问题的理解 and 处理就必须“从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而不能“从幻想的联系”出发，^②否则就不能正确认识 and 处理好现实问题。而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精神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总是“从幻想的联系”来理解 and 处理现实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的本原是精神，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精神的产物，因此对现实问题的理解 and 处理必须从精神出发，“从幻想的联系”出发，也就是说，从哲学家们的幻想出发，从哲学家们所设想出来的上帝

①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同上，第242页。

的意志或者“绝对精神”出发。由此可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又表现为对现实世界的两种理解方式或思维方式的根本对立。“从事实本身的联系”来理解现实世界的思维方式和“从幻想的联系”来理解现实世界的思维方式,不仅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对立的实质的表现,而且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作用的实际体现,这种作用具体表现为影响人们对现实问题采取什么样的理解方式或思维方式。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表现为两种思维方式及其作用来看,我们无论如何是得不出唯心主义会比唯物主义更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结论的。因为,唯物主义“从事实本身的联系”或“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①总要比唯心主义“从幻想的联系”来理解事物更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有利于我们处理好现实问题。我们不能设想“从幻想的联系”出发可以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任何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幻想不等于现实,幻想的联系不等于客观事物真实的内在联系,因而“从幻想的联系”出发无法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好现实问题。对于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尊重事实而又不带偏见的话,是不会持否定态度的。

当然,从哲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能够真正做到“从事实的本身联系”或“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的,并非是历史上曾经出现和存在过的所有的唯物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由于旧唯物主义无论是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还是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都不懂得人类的实践活动及

①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其对现实物质世界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作用，因而脱离人的实践和人类历史发展来理解现实世界，从而不能真正做到“从事实的本身联系”或“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例如，它们把人类面对的并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不是理解为经过人的实践活动改造并随实践发展着的自然界，而是理解为自开天辟地以来就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自然界；把人和人类社会不是理解为人的劳动实践的产物并随人的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是理解为生物学上的抽象的人，人类社会则是伟人的或者上帝的意志的产物；把人的意识不是首先和始终理解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并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是仅仅理解为人脑对物质的直观反映。这样，旧唯物主义就不能正确地反映在人的实践基础上生成和发展着的现实世界。但是，唯物主义的具体形式是发展变化的，正如恩格斯所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①19世纪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及其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自然科学（特别是“三大发现”）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为新的唯物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历史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这些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现代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重视人的实践对现实世界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作用，因而它也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在承认世界是物质的这个一般唯物主义的前提下，把自然界理解为是经过人的实践活动改造并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自然界；把人和人类社会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实践是人和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方式，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和人类社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把人的意识理解为人的实践的产物、社会的产物，并随人的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才真正做到了“从事实本身的联系”或“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理解和改造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由此可见，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比旧唯物主义更能正确地反映现实世界，并且它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因此，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要比旧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更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

唯心主义在历史发展中有两种基本形式，其一是客观唯心主义，它主张世界万物是客观精神例如“绝对精神”或上帝意志的产物；其二是主观唯心主义，它主张世界万物是人的主观精神的产物。这两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在人类的哲学史上都曾经有过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它们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甚至比旧唯物主义曾经有过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更大更强。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家，近代的笛卡儿和休谟，以及后来的康德和黑格尔等等，这些主观的或者客观的唯心主义大哲学家们，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并且对后世的哲学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自20世纪以来，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都纷纷开始对这些曾经有过巨大吸引力和感召力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唯心主义大哲学家们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指出他们的思想或者犯有把现实世界两重化为实体世界和现象世界的错误，或者犯有把真实的客体消解在作为绝对主体的精神或思想之中的错误，或者因为没有正确理解人的实践及其对现实世界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而不能正确解决重大的

哲学问题。因此，从唯心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它在当代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不是在强化，而是正在遭到怀疑和消解。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由于其正确地把实践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人们能动地改造现实世界的客观的社会的物质活动，以及正确地揭示了人的实践活动对于现实世界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基础作用，从而克服了以往旧哲学所存在的上述种种重大的缺点和错误，因而它对人们愈来愈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愈来愈显示其震撼人心的感召力。

二、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多，并不说明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更有吸引力和感召力

有学生说，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还有这么多的人信仰宗教，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对邪教执迷不悟。这难道不正是说明，在当代，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更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吗？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看法和结论，是因为对这些现存的现象缺乏历史知识和正确的分析、批判能力。其实，世界上仍有这么多人信仰宗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还有人们的心理原因。但是，所有这些原因都不能归结为或推导出“在当代，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更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结论。

从宗教产生的历史原因来看，宗教在产生时是“被压迫者的运动”，^①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斗争运动。例如，基督教“最初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是这些被压迫者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的压迫的斗争运动。为此，基督教遭受过罗马帝国统治者的迫害和排挤，“信从者遭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当做人类的敌人”。^①但是,基督教“甚至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而“胜利地、势不可挡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②因为,在基督教所宣传的“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的思想和所进行的斗争背后,“隐藏着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③“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奴隶们的生活“无限痛苦”,人民中最低阶层的“受苦受难的人”昔日曾经拥有过的种种“天堂”,“都被罗马征服者用荡平一切的铁拳消灭净尽了”。^④由于这些作为“历史的先决条件”的“现世利益”,基督教“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只能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中,在即将来临的‘千年王国’中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现世里。”^⑤由此可见,在基督教的早期,之所以有许多人信仰它,并不是因为基督教本身的唯心主义性质具有什么吸引力和感召力,而是因为在这基督教的这种虚幻反映的形式中包含着被压迫者希望在将来得救的愿望,这种由于“现世利益”促成的、强烈要求改变受苦受难地位和谋求解放的愿望,才是真正具有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的东西。

从现实来看,宗教也今非昔比,宗教借助科学的力量已发生了一些新变化。自近代以来,由于自然科学卓有成效地和迅速地发展,使人们对科学和人的理性的作用有了越来越清晰和深刻的认识,进而加以肯定和推崇。科学的进步和人们对人的理性的作用的肯定和推崇,迫使宗教不得不改变以往排斥科学、否定理性的粗暴而独断的做法,开始承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同上,第457页。

③ 同上,第459页。

④ 同上,第472、473页。

⑤ 同上,第458页。

人的理性的作用，并利用一些科学成就来粉饰自己的教义，以期维持其对人们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例如，罗马教会在1979年11月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上，提出重审“伽利略案件”，并正式宣布为伽利略的沉冤昭雪，认可科学真理的胜利。又如，由欧洲中世纪最重要的基督教哲学体系——托马斯主义演变而成的新托马斯主义，则把世界分为两个，一个是经验世界，其真理由理性来认识；另一个是超验世界，其真理要由信仰来把握。新托马斯主义以承认科学和理性的作用的方式来重新打扮基督教的形象。再如，一些自然主义宗教的倡导者也从原先反对进化论转而试图用进化论为其宗教信仰服务，把生物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说成是造物主的意志的体现。此外，在伊斯兰教中，以宇宙“大爆炸”理论来证明宇宙之所以能“从无到有”是因为有造物主的作用，而这个伟大的造物主就是真主阿拉。伊斯兰教还以反对克隆人的态度来证明和宣扬自己的教义的正确性。在佛教中，以肯定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笔者注：这是马克思的观点）的观点来论证佛教教义的正确性。宗教的所有这一切做法，并不证明宗教以及唯心主义更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恰恰相反，这只是证明了科学和人的正确理性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从人的心理原因来看，个人在遇到重大困难而自己又无力克服时，非常希望能得到他人的帮助，从而能摆脱困境。然而，当这种可能性确已成为不可能时，有些人又往往会希望因出现奇迹而获得帮助。这是这些人的一种“侥幸心理”或者叫“盼救心理”。宗教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来宣传和扩大它的影响。那么，当人们一旦认识到这种“侥幸心理”或“盼救心理”是不现实的和靠不住的时候，宗教的所谓吸引力和感召力也就会随之消失。

至于有些人对邪教执迷不悟,那就更不能说明,在当代,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其理由是,第一,邪教不是宗教。宗教对人的生命在总体上是采取“拯救”的态度,尽管这种“拯救”只存在于来世而不是现世。但是,邪教对人的生命不是采取拯救的态度,而是采取摧残和灭绝的做法。第二,对邪教执迷不悟的人,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范围来说,都只是极少数人,而不是极大多数人;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都在积极地同各种形形色色的邪教展开有力的斗争,证明邪教不得民心;第四,宗教的教义是历史地形成的,而邪教的所谓“大法”、“教义”等等都是对其他各种学说的剽窃和歪曲,并且还贬低被剽窃的对象。例如,“法轮功”所鼓吹的“真、善、忍”,实际上是对哲学的“真、善、美”的篡改和歪曲;它的“忍”,实质是对儒家和佛教关于“忍”的思想的剽窃;它的所谓“白色的功德”和“黑色的孽障”胡说,实际上是对弗洛伊德的两种“本能”说的剽窃;它的所谓“高能物质”和“多层空间”的胡说,是对高能物理学的“基本粒子高能量”学说和物理学的“物质结构层次”说的剽窃和篡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惟如此,“法轮功”邪说还把自己打扮成是超越以上所有学说的最高的“宇宙大法”。由此可见,像“法轮功”这样的邪教是最卑鄙的反人类和反科学的胡诌。如果用有些人对邪教执迷不悟来说明唯心主义更有吸引力和感召力,那是对人类智慧的贬低,是根本没有说服力的。

三、社会主义发展的暂时挫折,并不证明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更有吸引力

今天,由于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使得社会主义发展遭受暂时挫折而处于低潮。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却在较长的时

期里取得了较稳定的发展。于是，社会主义发展遭受挫折就是提倡唯物主义的结果，而资本主义的繁荣正是信仰唯心主义的产物，就成为一些大学生经常引以为据的话题。事实果是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对待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上，坚持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在历史观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之，用政治运动代替发展生产力，搞腐败，搞特权，脱离人民群众，置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不顾，就是在历史观上搞唯心主义。综观前苏联和原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上的一些错误做法，以及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教训，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在历史观上没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而搞了历史唯心主义，才使今天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暂时挫折而处于低潮。

从生产力角度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原有的生产力水平本来就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低，科学技术也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再加上长期来连续不断地用政治运动代替发展生产力，使得即使已有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也不能很好地同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相结合，因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远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生产资料同劳动者在名义上的结合和在实际上分离，计划经济体制下按劳分配不能真正体现，再加上一部分干部搞腐败、搞特权和严重脱离群众，从而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被严重地压抑。长此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就必然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得不到较大和较快的发展。这种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代替生产力发展的做法，以及忽视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的做法，恰恰证明搞的是历史唯心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发展遭受暂时挫折而处于低潮也就势在必然。然而，这些问题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并不是不能解决的。只要我们能及时认识到，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政治运动代替生产力的发展，一句话，搞历史唯心主义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并且能够认真地吸取教训，坚持发展生产力，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搞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就能重新兴旺发达起来，不断地走向胜利。我国在汲取了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后及时地纠正了这些问题，通过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改革，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不断地注意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因而在短短的20多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社会主义事业正在中国大踏步地前进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足以证明由于搞历史唯心主义而造成社会主义发展遭受暂时挫折是可以克服的，搞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社会主义事业永葆青春的正确选择。

对于资本主义现实的认识，也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作指导来获得正确的认识和理解。现实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有较大的发展，从生产力角度来分析，乃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运用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的提高；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是由于资本家采用了让雇员获得公司的一部分股份的方式缓和了劳资关系，调整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关系，从而调动了雇员的劳动积极性。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就能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和较协调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所当然就能获得较大的发展。但是，也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对自身内部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是有限度的，

资本家不可能最终放弃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把公司的所有股份都转交给雇员，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私有制，消除两极分化，使广大人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同时，由于资本的剥削和扩张的本性规定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也不会有所收敛，更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随着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推动，进一步发展了的生产力必将同有所调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尖锐的矛盾，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也会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而不断地加剧，资本主义在它所面临的这些内外矛盾的综合作用下，最终将导致在世界范围内的灭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繁荣并不是信仰历史唯心主义的产物，恰恰相反，这是资本主义自发地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并且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也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发生作用的必然结局。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动力问题上，自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后，一直存在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以往的旧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始终坚持的是历史唯心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它们或者主张伟人的意志决定历史发展，或者认为神的意志安排了人类历史的一切，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无力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正确的动力和指明正确的发展方向，从而也无法为人类社会解决各种现实的重大问题，使人类社会真正走向美好的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强调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社会主体即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强调人民群众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类本身的社会

实践中,能够最终自觉地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自身的发展规律,并把这些规律统一起来,成为驾驭客观规律的主人,从而使人类社会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历史唯物主义者昌,逆历史唯物主义者亡。这就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的结论。

四、唯心主义是人类认识之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有些学生之所以认为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更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因为他们对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不了解,不懂得唯心主义是人类认识之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这个道理。列宁指出: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①“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②人的认识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只要把其中的任何一个片段加以夸大并绝对化,就会使原本是正确的认识变为脱离实际的谬误。例如,把人的理性认识加以夸大,并且以此来否定实践和感性认识的作用,那就会在认识论上导致唯心主义的唯理论。又如,人的认识是有能动性的,但是,如果把这种能动性加以不适当的夸大,以至否定物质客体对人的认识有制约作用,就会导致主观唯心主义。如果把人及其认识的能动性不仅夸大,而且将这种能动性赋予给上帝或客观精神,那么就会陷入宗教神学或客观唯心主义的泥潭。所以,列宁又指出:“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

^① 《谈谈辩证法问题》,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② 同上,第412页。

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①

从唯心主义因夸大人的认识过程的某个片段而最终不能真实反映客观世界而言，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唯心主义“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②因此，我们又必须正确对待这朵“不结果实的花”。过去，我们有过简单化的做法，对它不是采取辩证的批判地吸收的态度，而是“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把唯心主义简单地看成一派“胡说”，予以全盘否定。这是不对的，应该纠正。就唯心主义毕竟是人类认识之树上的一朵花而言，它还包含可以加以批判地吸收的合理因素。我们只要克服它对人的认识的某个片段的不适当的夸大和绝对化，那么这些包含于其中的合理因素就能被发掘和吸收。例如，我们对客观唯心主义者柏拉图的理念论采取批判地吸收的态度，那就会发现它所包含的关于事物具有本质的思想和有关辩证法的一些思想是有价值的。又如，对康德的先验哲学，如果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就能汲取它所包含的肯定主体能动性的思想，从而有助于我们正确地高扬人的能动创造性。再如，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赞他是第一个自觉地揭示和阐述辩证法思想的人，^③还说辩证法思想是黑格尔哲学体系这座大厦所包含

① 《谈谈辩证法问题》，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2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② 同上，第4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的“珍宝”，并且“就是在今天也还保持充分的价值”。^①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能如此正确地对待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所以才能拯救出其中所包含的“珍宝”——辩证法思想，并经过改造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用。由此可见，对于唯心主义，既不能因为它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而简单地加以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它包含着人类认识的某些合理因素而不加批判地夸大它的作用，为它所迷惑，甚至认为唯心主义比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更有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就是我们对唯心主义所持有的科学态度，也是对“在当代，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更有吸引力和感召力”这一观点的总的回答。

（作者：宓文湛，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哲学系系主任，副教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

今天的人类是否进入了 无意识世界？

随着现代西方社会对理性主义传统文化的批判，意志、情感、无意识、潜意识等非理性观念、思想充斥在西方大众传媒、文化载体、话语系统和人们的行为方式中。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等一批心理学家的无意识理论，受到了一些年轻人的追捧，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如在情感的认识上，追求人的本能的“酒神精神”，追求梦的感觉和一刹那意念，把行为的判断简单地看成当下的心理反应，视理性思维为一种束缚、刻板、守旧和杀伤人性的工具。所有这些倾向，随着我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它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大学校园的一些青年人。跟着感觉走，牵着梦的手，只管今天活得痛快、自在，不管明天将会怎样；有的大学生十分崇拜尼采的一句话：“上帝死了”，人的生命冲动所表现出的权力意志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有的大学生十分赞赏福柯的一句话：“人也死了”，文明残杀了人类的自由，人类应当倒退到原始

丛林的动物世界。还有的大学生特别赞成费耶阿本德的一句话：“怎么干都行”，我的意志、我的感觉、我的无意识是我活着的惟一依靠和标准。

究竟什么是无意识？人类是否已经真的进入了非理性的无意识世界？

这是我们需要搞明白的问题。

一、今天的人类是否进入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世界

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以来，意识就始终伴随着人 and 他周围的物质世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被哲学家们区分为物质和意识两大类。奥地利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20世纪20年代创立了精神分析学，它向世人揭示：在意识的背后，还有无意识存在，无意识对意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把人的心理比做一座流动的冰山，意识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充满理性和逻辑的。在水面下还有巨大的冰山体，这一部分潜藏不露，但却躁动不安，充满了非理性的冲动。“心理冰山”就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形象描述。有人认为弗洛伊德比哥白尼更加伟大，因为哥白尼只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弗洛伊德发现的却是人类心灵的新大陆。自从有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人类意识的研究就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心理冰山”理论为人类认识自己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并提供了研究人类心理、行为的新方法。

弗洛伊德“心理冰山”理论是建立在神经病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1885年秋天，立志做一个精神病专家的弗洛伊德拜医学史上空前未有的神经病学专家沙考特为师，并在他领导的沙尔彼里哀尔医院实习，这个医院是当时神经病学的圣地。在这里，弗洛伊德第一次看到了精神刺激对于身体的控制作用，以至人的肉体可以不自觉地、无意识地接受

精神刺激的摆布。只要出现肉体上的病症,就可以引起各种行为的反应,而这些反应都是未经深思熟虑的。弗洛伊德参加了沙考特的一系列试验,从这时起,他开始思考无意识存在的可能性,而这种无意识的精神活动所起的作用是和意识的思考根本不同的。弗洛伊德沿着自我分析和梦的分析两条渠道,经过大量的临床试验,提出了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分为三个层次,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有时称“下意识”或“潜意识”)。意识是人的心理状态的最高形式,如果把人的精神世界看做一个大家庭的话,意识就是人的心理大家庭中的“家长”,它统治着整个大家庭,使其协调一致。正是在意识的指挥和管辖之下,人的精神生活才得以正常进行。

意识的下面是前意识,它曾经一度属于意识,只是因为与目前的实际生活关系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关系,被驱逐出意识的领地,而滞留在意识的周围。在意识的活动过程中,前意识可能会伺机溜出来参与意识的活动,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则又很快退回它所在的地方。比如你正在有意识地看书的时候,突然有人问你某个朋友或亲戚的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曾经留在你的意识之中,但后来被储藏在前意识领域。现在有人问起,它可以被意识召唤回来,在你回答完问题后,它又很快退回到前意识领域。

在意识和前意识的下面,隐藏着无意识。它是人类精神心理的最原始的因素,它被压在心理的最深处、最底层,又是最不安分、最活泼躁动的因素。无意识会经常企图冲出前意识和意识的层面,赤裸裸地表现自己。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在本质上是原动的,它是精神活动背后的原动力,它又是本能活动的源头,也是性冲动和感情经验的起源。无意识

是人类社会的法律、宗教、道德所不能允许的种种原始的欲望和冲动,其中最根本的是性欲冲动。

弗洛伊德认为,在人的心理活动中,有一种保护意识不受无意识干扰和侵犯的“压制作用”,它可以强迫无意识的冲动留在原地。弗洛伊德早期在研究歇斯底里症时曾对此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将“压制作用”比做“检察员”。如果把心理结构比做三层楼的住宅,在最高一层住着心理家庭中最高尚的分子——意识先生。在它们的下面是前意识,它们是比较安分守己的人,可以随意地访问最高层的意识先生。有一位“检察员”,它像警察一样站在楼梯口,一般来说,它是不会禁止前意识到最高层去的。住在最底层的无意识是一群未受教化的、爱骚动的捣乱分子,它们经常吵吵闹闹地妄图躲过那个警察似的“检察员”,通过那个楼梯,进入到最高层。“检察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制止这些捣乱分子进入最高层去打扰“意识先生”。于是这些捣乱分子就千方百计地伪装自己,或者把自己打扮成前意识的形态,或者乘夜深人静“检察员”因疲劳而疏忽的时候蒙混过去。这些无意识因素在白天就表现为语言和行为的失误,在夜晚就表现为梦。

以后,弗洛伊德又把他的无意识理论发展为“里比多”论。所谓“里比多”就是性本能的能量和驱动力,性本能依靠“里比多”这个能量来达到其目的。

弗洛伊德认为,用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作为分析心理活动的概念是必要的,但是还不充分,这些概念容易给人一种心理静止性的印象。因此,弗洛伊德在较晚时期又发明了三个概念与上述三种形式的心理状况相对应,即原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可以说,这是弗洛伊德从哲学的角度剖析人的心灵的尝试。“原我”是指那些包含着不合理的、荒谬的内容的心理,更确切地说,“原我”就是一种本

能的冲动，大致对应于无意识，指人的心理中的非理性因素。它遵循“快乐原则”，不问时机、不看条件、不顾一切地要求自我满足和发泄。现实社会不容许“原我”为所欲为，所以在正常人的心理活动中，“原我”总是受到压抑。

由于“原我”在与外界的接触中不断受到打击，它得到了修改。这部分得到修改的“原我”就是“自我”，它是有别于本能冲动的、受到社会教化的心理（有人称之为“自我意识”）。它遵循着“现实原则”，限制和驾驭着“原我”在适当的时候，在不违背“现实原则”的基础上，满足“原我”的一些要求。弗洛伊德将“自我”和“原我”比做骑马人和他的马的关系。骑马人决定着运动的方向，而马为骑马人提供动力。

“超我”指由道德、宗教等社会规范所形成的心理积淀，它表现为是非观、良心等。“超我”遵循“至善原则”，阻碍着“原我”的欲望冲动，严格禁止“原我”进入“自我”的范围。“超我”和“自我”大致对应于意识和前意识，指人的心理中的理性因素。

“自我”在“超我”的指导下控制着“原我”，当这三者的关系协调得很好的时候，人的心理就表现得正常、健康；当三者不协调时，无意识“原我”中的欲望，尤其是性欲一旦找不到宣泄的渠道，就会淤积起来，从而导致精神病、强迫症、性变态等疾病。当然在大多数人那儿，“里比多”都成功地找到了释放的渠道：或者通过对异性的追求释放“里比多”，或者通过对文学艺术的创作、对宗教的信仰、对科学的研究使无意识冲动得到升华。

弗洛伊德“心理冰山”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它找到了精神病的心理根源及其治疗途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它揭示了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内容和层次，发展了关于意识结构的理论；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

来看,它以独特的方式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病态关系,为社会学家们描述社会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

今天的人类是否已经进入了弗洛伊德所说的以性本能为特征的无意识世界?回答是否定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只有原始人才是健康的,他们不需要任何压制、挫折或升华就能满足自己的本能要求。如果人类真的走进了无意识时代,岂不是退回到了原始公社时期?这是违背进化规律的。弗洛伊德还无限夸大了性本能的作用,他认为在人类的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等一切文化成果的背后,无不潜藏着性本能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可思议的。正是由于他的泛性欲主义,使得他的学生及其仰慕者与他分道扬镳。当然,弗洛伊德在后期也修改了自己的关于性本能的无意识学说,将性本能扩大到性欲冲动之外,提出了“生存的本能”和“死亡的本能”的概念,前者指人类保存自己并繁衍后代的本能;后者指人类所具有的施虐和破坏的本能。当“生的本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人类历史就表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反之,当“死的本能”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人类的历史就陷入疯狂的战争灾难。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两种本能相互冲突的结果。当然,这样理解历史,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新视角,但是,将人类历史进程完全归之于心理本能的冲突,这着实将人降低到了非人的地位。

二、今天的人类是否进入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世界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格式塔夫·荣格创立了分析心理学,他以“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取代了弗洛伊德以性本能为核心的无意识概念。荣格曾经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后因学术观点与弗洛伊德相左而决裂。在弗洛伊德那里,无意识是可怕的怪物,一旦处置不好它,就引发精神性疾病;而在荣格



看来,无意识是一个宝库,是人类创造精神文化的源头,它比弗洛伊德所认为的神经症幻想要高级得多。

荣格的最大兴趣是在对梦境和神话的分析上,他曾经有过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梦,在梦中荣格向地底下沉,穿过一系列地下的房间,每个房间代表了一段早期的人类历史。这就是荣格对无意识的理解:它是考古学家对已逝文明的梦,这些文明一一相继,无意识也层层深入。在更深层积淀的无意识不是个人的无意识,而是对全人类而言都适用的“集体无意识”。弗洛伊德认为荣格的理论有玄学的味道,而荣格则认为,在性本能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和更广阔的领域值得注意和研究。

在荣格的心理学中,人格作为一个整体被称为精神,精神由若干不同的然而彼此相互作用的系统和层次组成,它们是: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意识被荣格用“自我”来命名,它是由能够自觉到的知觉、记忆和情感等组成。意识在全部心理总和中只占一小部分,但却承担着重要的任务,它通过对数不清的个人体验的选择和淘汰,使其中的一些成分达到“充分自觉”这一心理水平。那些不能被意识认可的 personal 体验并没有从精神中消失,它们变成了个人无意识。个人无意识是被压抑或忽视的种种心理体验,例如一段痛苦的思想、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一种内心的冲动、一次道德的争端,可能它们在当初被体验到的时候,由于不重要或不适宜而被忘却,它们达不到意识层面,但又并没有消失,统统被储存在个人无意识之中。一旦以后它们变得至关重要,这些以往被压抑或忽视的体验就会被从个人无意识中召唤出来;有时在白天未经注意就过去了的体验,可能会在夜晚的梦中出现。荣格意识和个人无意识概念带有弗洛伊德的意识与前意识的痕迹,



这些都不是他的新思想。荣格的创建在于他的“集体无意识”的概念,“集体无意识”的发现为心理结构理论提供了新的蓝图。

意识和个人无意识来源于人的后天的经验,集体无意识则与人的后天经验无关,它是人从祖先那儿继承的一系列意向,既包括从人类的祖先那儿继承的意向,也包括从前人类祖先和动物祖先那儿继承的意向,荣格将它们称为“原始意向”。这是一种依赖于遗传而独立存在的心理要素,它使所有的人都能采取与自己的祖先同样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和做出反应,例如,对蛇的害怕和对黑暗的恐惧。人们并不需要通过亲身体验去获得对蛇的害怕和对黑暗的恐惧,这些心理倾向是先天的,它源于人类原始祖先对这些恐惧的千万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深深镌刻在人的头脑中,作为一种心理倾向世代相传。集体无意识被储藏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在特定的条件下它可能会被激活,如在梦境中、在神经心理症中、在艺术创作中,一旦被激活,就会出现在意识层面上,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原型,如上帝原型、大地母亲原型、英雄原型、魔鬼和精灵原型等。“原型”是指最初的模式,它不是人生经历过的若干往事所留下的记忆的表象,而是一种十分神秘的东西,荣格对此有一段描述:“人生中有多少典型情景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之中。这种镌刻,不是以充满内容的意向形式,而是最初作为没有内容的形式,它所代表的不过是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为的可能性而已。”^①正是基于此,荣格不同意尼采说的“上帝死了”,他认为上帝没有死,也不

^① 霍尔等著,冯川译《荣格心理学入门》,第44~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会死,它作为一种原型永远存在于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集体无意识既是人类经验的储藏所,又是个人经验的先天条件;既是人的本能之源,又是人的创造性冲动之源。集体无意识表现出来的原型对于所有的人都具有普遍一致性,即每个人都继承着相同的基本原型意向。如果说意识和无意识是人的主观精神的话,那么集体无意识就是一种客观精神,它存在于人的意识背后,不为意识所知,同时它又超越所有文化和意识的共同基础,作为人的一种本能性的东西,通过一系列原型意向有所表现。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大大拓展了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空间,使人们用充满惊讶与好奇的眼光去认识自己的精神世界。

今天的人类是否已经进入了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的世界?回答仍然是否定的。首先按照荣格的说法,集体无意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的本能的力量,那么,人类对此无所谓进入或者退出;集体无意识对于人类来说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有害的一面。由于原始意向具有无限多的变体和重新组合的可能性,因而它的创造能力是无限的,它是人类灿烂文化发展的本能性之源;如果意识或理智压抑了人的心灵中的自然力量,后者便会千方百计地寻找补偿,而一旦理智完全失去了效用,它便把意识生活加以颠覆,如人类历史上基督教各民族所进行的血腥战争,荣格认为就是由于基督教教义过分压抑人的自然力量的结果。其次,冲突是生命的基本事实和普遍现象,意识的理性力量和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力量共同存在于人类的精神领域,它们之间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人类的精神世界不可能只有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本性而再无其他的内容。当今世界,科学和理性仍旧在迈着坚实的步伐前进,同时,在局部地区仍有战争和社会动荡存在,分析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向世人揭示

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使本来无意识的东西成为有意识的东西，使个人和自己的天性保持更大的和谐，使社会了解其自身的本质，从而为社会发展方向进行校正和引导。

三、今天的人类是否进入了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世界

出生于德国的心理学家、社会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埃里希·弗洛姆是另一个不满意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的人。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是指由个人的生活状况、环境而造成的对个人压抑的内容，这一理论很少注意无意识的社会性。弗洛姆研究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并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相结合，创立了“社会无意识”理论。

弗洛姆认为：每一个社会都能决定哪些思想和感情能达到意识水平，哪些则只能继续存在于无意识的层次。“我所说的‘社会无意识’是指那些被压抑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一个社会的最大多数成员来说都是相同的。当一个具有特殊矛盾的社会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共同的被压抑的因素正是该社会所不允许它的成员们意识到的内容。”^①弗洛姆认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千真万确的，是自己思维活动的产物，而实际上在这些思想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些客观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或体验到的，但在其中却潜藏着人和社会的真实的本质。如果不去了解它们，仍旧不能获得一种对社会的真正批判的眼光。

社会怎样使人们只意识到他们被允许认识的东西，而压抑那些他们本该意识到却不允许意识到的东西呢？弗洛姆提出了“社会过滤器”的概念。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决定

^① 弗洛姆著《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第9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认识形式的体系,它就像一个过滤器,经验能通过这个过滤器,就成为意识,否则就不能成为意识。

使意识成为可能的第一种过滤器是语言。弗洛姆举例说:“‘清晨,空气中仍带有一丝凉意,太阳正冉冉升起,一只小鸟在歌唱,这时你看到了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上面有一滴露水’——在某种文化中,这一经验很容易转变成意识(例如在日本),然而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同样的这一经验并不能成为意识,并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这不是十分‘重要’或重大的事情。”^① 也就是说,在一种文化中某些经验能够通过语言过滤器成为意识,在另一种文化中,则不能通过这个过滤器,它们就被赶进无意识领域。另一种情况是:语言通过它的词汇、语法、句法,通过固定在其中的整个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人们的意识之中。语言是经验生活的一种表述,但由于语言无法描述许多丰富、细致的体验,这些体验就不能进入意识领域;或者由于人们对词语的误解,或者人们把词语和实际内容割裂,使得语言中的重要内容无法进入意识。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社会有意无意地描述的事件,很可能将一些重大的问题掩盖起来,使人们不能认识真相,使真相变成了无意识的内容。

使意识成为可能的第二种过滤器是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中直接指导人的思维的“规律”。在习惯于“A不等于非A”的思维规律的文化体系中,人们能够体验到“同样的属性,在同一情况下不能同时属于又不属于同一主题”,当他们遇到“A与非A并不是相互排斥”的逻辑的时候,会认为后一种逻辑是荒谬的。将这种思维移入现实之中,会造成对生活中很

^① 弗洛姆著《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第12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多矛盾的现象无法体验的后果。比如说让一个生活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传统中的人,在同一时间、同一事物上同时体验爱和恨,他会感到这是荒谬的、不可能的。由于无法体验,从而就无法使相应的经验上升到意识的层面。

使意识成为可能的第三种过滤器,也是最重要的过滤器,就是社会禁忌。“这些社会禁忌宣布某些思想和感觉是不合适的,被禁止的,危险的,并且阻止这些思想和感觉达到意识这个层次。”^①比如说有些人每两年换一次新车,如果有人意识到这是浪费,并将这一思想传播开来,就会出现汽车经济停滞不前的危险。于是报纸加大宣传力度,赞扬新车的优势,歌颂购车者的气派和眼光,从而促进了汽车经济的发展,而“浪费”的思想就受到了压抑,就不能上升到意识的层面。

对于有组织的社会来说,凡是通过三重过滤器的经验人们就能够意识到,反之就成为社会无意识。特别是社会禁忌这一过滤器,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规定着人们应该做什么、想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想什么;应该怎么做、怎么想,不应该怎么做、怎么想。为什么人们普遍接受对事实认识的压抑,而拒绝认识自己周围的许多事情?弗洛姆认为主要的原因是恐惧:人们害怕孤立和受排斥,他们必须接受社会的塑造,接受社会共同遵从的显意识。弗洛姆认为,要解除对人们事实认识的压抑,必须遵循人道主义的原则。通过人道主义的社会批判,洞察无意识中隐藏的人的生存问题,从而在健全理性的引导下,实现社会内部的和谐以及社会和自然的和谐。

① 弗洛姆著《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第12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进一步拓宽了无意识的研究范围,弥补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学无意识理论的缺陷,将无意识学说与社会问题结合,带来了了对现代社会的审视和批判。

人类社会是否进入了弗洛姆所说的社会无意识世界?回答依旧是否定的。弗洛姆所说的社会无意识,是指那些被社会所压抑的认识,弗洛姆以批判的眼光谈到了西方世界的很多社会无意识的内容:“当世界上千百万人民正在挨饿,我们却花费成千上万的美元来储存农业的剩余物资;当武器被用来摧毁我们的文明的时候,我们却将国家预算的一半经费花费在武器的制造上;……我们一方面极力反对那些不能容忍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自由的制度,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与这些制度结成一个军事同盟的话,我们就会说,这些制度或那些更无情的制度是‘热爱自由’的;一方面,我们的生活非常富有,另一方面,我们却没有欢乐;……所有这些不合理之处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几乎不被任何人注意到。”^①社会无意识理论的使命,就是唤醒人们的被压抑的认识,使社会无意识上升为社会意识,从而达到批判社会、促使其健康发展的目的。

按照弗洛姆的理论,人们所认识到的东西都是虚假的,每一个人都在受到社会的欺骗,社会故意使人们不知真相,以维持其运转的秩序。诚然,希望人们透过社会现象去认识社会的本质,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社会批判如果按照弗洛姆的思路进行,那将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一切的批判。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文明都是真实的存在,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经验着、感受着、享用着文明的成果。不可否

^① 弗洛姆著《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第129~13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认,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某些传统的东西的失落,也不可否认,世界至今仍存在诸多的不公平现象,但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自己前进的步伐,社会的进步,就是在与不公平的现象作斗争中取得的;现代与传统的斗争与互补也一直在矛盾中持续着,对传统的继承和对未来的开拓使人类社会的世代的延续中生生不息。因此,对社会的批判应持辩证否定的态度。弗洛姆甚至说,马克思也认为人们的意识都是虚假的意识,因为马克思认为意识是受客观力量决定的,在意识的背后,隐藏着社会和经济的动力。弗洛姆完全误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确认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但并不因此就认为社会存在是真实的,而社会意识是虚假的。事实上只有社会意识在实践中不断地接近社会存在,而没有两者的真假之分。

从以上对弗洛伊德、荣格和弗洛姆的无意识理论的辨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人类不可能进入一个纯粹的无意识世界。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自觉的意识并不是惟一的,弗洛姆有一句话说得很中肯:“事实上,无意识和意识归根结底是不可分的。”^①如果说意识是主体能够用语言、逻辑思维表述的被知觉到的精神活动,那么无意识则是主体无法用语言、逻辑思维表述的、未被知觉的精神活动。它们在大脑里储存的层面不同,但两者可以相互转化。意识可以向无意识转化:如对有意识的反复操作达到了“运用自如”、“熟能生巧”的程度,以后对这种有意识的操作和运用已形成了“定势”和“习惯”,这时有意识就转化为

① 弗洛姆著《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第13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了无意识；又如储存在大脑中的有意识，以后很少或不再有机会去操作和运用它，天长日久，便成为无意识的存在。无意识也可以向意识转化，只要人们觉察、认识到自己的无意识，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唤醒或激活它，无意识就成为了有意识。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有的时候，无意识甚至在人的精神认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日内瓦大学曾做过一个调查，69个数学家中有51个（74%）说人的无意识能解决问题，有83%的人说他们从无意识的非理性思考的状态中得到帮助。有人曾做过统计，人的大脑每秒可接受14~15条信息，每天负载8600万条信息，但实际上只有1%能经过大脑加工成意识，绝大部分被思维筛选掉成为了无意识。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无意识具有大容量的储存功能，它的作用在于可以同时提取与许多对象有关的大量的信息。

我们应该承认无意识现象的存在，将意识和无意识完全割裂开来是错误的；但是任意夸大无意识的作用，放言人类已经进入了无意识的世界，同样是错误的。

无意识是非理性精神的深层构建。当无意识理论在20世纪汇入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以后，就为非理性主义提供了心理学、生物学的依据。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与17、18世纪西方传统哲学把理性作为人的本性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理性主义主张人是理性的社会动物，非理性主义则站在批判和否定的立场上，认为理性主义把人类带进了灾难：由于理性主义以实证科学为依据，从而把人的价值、人性、人本身的意义等问题排斥在自己的视野之外，长此以往，使人们忘记了对它们的思考，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只注重对物质利益的追逐，造成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非理性主义者把工业文明带来的劳动的异化、道德的沦丧、人文精神的丢

失、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疏离等,统统归结为理性主义发展的结果,所以他们认为,理性的人死了,剩下的只是人的感情、性欲、本能……非理性主义关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生活中的阴暗面,其论点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非理性主义呼唤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这是它的理论贡献,但是,如果将人的本质归结为无意识,或者以为无意识支配意识,这是与现实不符的。

我们当然应该关注人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也应该承认无意识对意识的作用,但是,人毕竟是社会的人,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理性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惟一源泉。社会生活有无意识的成分,但是人类没有、也不可能已经走进了无意识的世界。

(作者:王晖,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两课”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教授)

19.

现代生态伦理为什么又回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文 化命题中？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命题，属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范畴。“天人合一”思想表达了中国古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考和关注。生态伦理则是当代由于全球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而被人们所重视和主张的一种新型伦理，并为此建立了一门新兴学科——生态伦理学。^①然而，生态伦理学要得以确立，还必须寻找到自身的哲学依据。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主席罗尔斯顿指出：“环境伦理学正在把西方伦理学带到一个突破口，所有的伦理学都在寻找对生命的一种恰当的尊重……在这方面东方似乎很有前途”。^②许多西方学者纷纷把视野转向东方，对古代中国哲学

① 也称“环境伦理学”，见王国聘《伦理学》，第93页，2000年第7期。

② 邱仁宗《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第2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的“天人合一”思想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把“天人合一”思想作为生态伦理的前瞻而推崇备至。那么,生态伦理中究竟有无“天人合一”思想?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态伦理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对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有什么启示?研究这些问题,对推动生态伦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及其基本观点

人类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但是,在人类不懈的创造过程中,由于采取了向大自然无节制开发和掠夺的方式,使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江河污染、水土流失、草场退化、酸雨区扩大等一系列“黑色怪物”横行肆虐,沙漠化的“黄龙”飞速吞噬着大片良田,许多昔日的“绿色走廊”已经不复存在或面临着被毁弃的危险,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的旱水飓风等各种自然灾害频频发出“红色警告”,人类伤亡和损失惨重。面对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们开始了深刻的反思,并清醒地认识到: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赖技术、经济、政治和法律等手段,还必须诉诸伦理信念。人们只有树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道德观念,才能从内心深处尊重和热爱自然,从而驱动自身行动的自觉性、自律性和责任感。

20世纪50年代末,莱切爾·卡森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向我们描述了技术滥用、生态环境恶化,人类遭到大自然残酷报复和惩罚的悲惨景象,并表达了朦胧的生态伦理意识,极大地震撼了世人,现代环境运动由此开始蓬勃兴起。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首次提出要改变人们陈旧的价值观念,倡导一种新的全球伦理观念。70~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生态伦理学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它是由环境科学与人的价值学说综合而成的一门新兴伦理学科,是如何对待生态价值、如何调节人们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伦理学说,^①一般认为它是由德国哲学家、医生施韦兹(A·Schweitzer)和美国环境学家莱奥波尔德(A·Leopold)创立,并由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系统建立了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构架和体系。几十年以来,生态伦理学大体上经过了由现代人类中心论、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再到生物中心论、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以及自然价值论的一个发展过程。尽管当代生态伦理学的代表性观点有12种之多,^②但是它们都一致认为,生态危机的实质并非技术和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和价值问题,人类并不缺乏解决生态危机的技术能力,而是缺乏恰当看待自身、看待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意识。正如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所说:“在决定对待自然的方式时,人类的欲望及其满足是惟一值得考虑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一种掠夺性的伦理学:人们不必去顾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内在价值。”^③生态伦理学者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认识论及功利主义价值观,他们以自然法思想、后现代主义、东方传统文化及其他人文主义的思想等作为理论来源,以现代环境运动作为现实基础,以进化论和生态学作为科学依据,力图建立一种包括人和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创建一种全新的生态伦理学来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纵观历史和当代各生态伦理学派,它们都包括了两个共同的基本观点:

① 曾建平《试论生态伦理观》,《伦理学》,第75页,1998年第4期。

② 叶平《关于环境伦理学的一些问题——访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教授》,《哲学动态》,第32页,1999年第9期。

③ 阎孟伟《环境危机及其根源》,《天津社会科学》,第17页,2000年第6期。

首先,在世界观层面上,生态伦理学认为人与其他存在物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在自然之中,人和自然乃至宇宙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系统内的一切事物都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人类的生存依赖于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谐,依赖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存在状态。

其次,在价值观层面上,生态伦理学不仅承认人的价值和权利,也承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强调人与自然伦理关系必须建立在自然的内在价值基础上,而不仅仅出自人的道义愿望。在此基础上,生态伦理学突破人类的圈子,把伦理的正当行为的概念扩大到包括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把道德权利概念扩大到自然界的一切过程,并将人类活动的更深远的需要着眼于后代、文明、人类的普遍进化以及整个宇宙的普遍进化,从而使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的实现统一起来,将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实现也统一起来。

基于上述两个基本观点,当代生态伦理学确定了五项基本内容,即(1)尊重生命和自然界;(2)维护生态平衡,珍惜善待生命和自然界,特别反对生态灭绝性的战争,反对掠夺性开发资源;(3)尊重自然规律,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相结合,促进生命和自然界的发展;(4)有节制地谋求人类自身的发展和需求的满足,不以损坏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代价;(5)关心人类公共利益,关心人与自然的共同利益。进而把保护环境、保护资源、合理消费、适度发展、维护和平、消除贫困、计划生育、科教兴国等作为生态伦理学的主要道德规范。总之,生态伦理学把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尝试通过给予人类共同拥有的自然界以道德上的关心和保护,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整个人类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

二、“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生态伦理内涵

我国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形成了发达的农业文明，促使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体验和思考，逐步形成了“天人合一”思想。“天”就一般而言是指自然界，“人”指人类自身，“天人合一”指的是自然界和人类有着统一或协调的关系。“天人合一”的观点起源于西周，经先秦至明清，在2000多年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过儒、道、墨、佛思想家们的宣扬和发展，“天人合一”思想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完善，成为中国古代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具有深邃的生态伦理意蕴。

儒家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贡献最为引人注目。《周易》最初的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代表了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些自然界最重要的物体（现象），进而代表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表达了祖先对大自然的一种直观的认识。《易传》有“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上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文言传》），意思是说：天地最伟大的德行是生养万物，圣人应该善待宇宙间的一切生命，让天地万物永葆生生不息之活力，并将此提升到大德的高度。孔子的“仁者乐水，智者乐山”（《论语·雍也》）、“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等，把自然界的山、水、生物与“智”、“仁”、“孝”等美德联系起来，体现了人对自然界的伦理关怀。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把仁者爱人扩展到爱物，并主张对自然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认为如果保护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就会丰富，反之，就会枯竭。张载首次提出“天人合一”命题：“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易说·系辞上》）认为圣人

因为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而掌握了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因为掌握了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所以能够正确地认识自然,达到人的认识与世界的统一。并在《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把百姓视为同胞兄弟,把自然万物视为伙伴朋友。因此,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非常重视人的道德扩展和道德自觉,其最终目的是“参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

道家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代表学派。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天与人皆源于道,二者是统一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有机部分,认为人与自然都遵循着道本身的运动规律而“周行”。“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第25章),人要明智地按自然行事,不按自然规律而轻举妄动就会招致凶险的结果。要使人的行为不违反自然规律,必须做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第44章),人们应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要无止境地开发利用自然。庄子也主张以道观物,反对以“我”观物,反对人类的妄自尊大,以自己为中心。他所推崇的圣人,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由此可见,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崇尚自然,主张师法自然、以人合天。

墨家、佛学也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并发展了“天人合一”思想。墨子认为天有意志,天之意推崇“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因而人应当“顺天之意”以求得天之赏,避天之罚。佛学则坚信“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众生即佛”,在佛的面前,人与其他所有的生物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生命,包括没有情感意识的山川、河流、草木、土石,都有天赋

的佛性,都有生存的愿望,都要求达到佛的最高境界。人类应善待万物、尊重生命,普度众生、拯救众生,帮助所有生命提升修行的状态和境界,从而帮助自己修得正果。

由上不难看出,“天人合一”思想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内涵,如:天地乃万物之父母,人与自然万物同生共处、相互依存;天地万物具有一定的规律,人要道法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保持“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能使万物生生不息是大德,要尊重、热爱万物,将仁德推及于人、推及于物等等,这些思想与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令人不禁对古老的东方生存智慧叹服不已。

三、“天人合一”思想对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启示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哲学的产物,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精华。由于时代的局限,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思辨性、直观性和内容的多元性,缺陷非常明显。但是,它所包含的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都超过了同时代的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施韦兹在他的伦理学著作中多次提及中国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等人,评价他们是深刻而富有活力的伦理思想的创立者和宣传者,^①许多西方生态伦理学者也都坦言自己受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启迪。1988年1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聚会巴黎,会议主题为“面向21世纪”。汉内斯·阿尔文博士(1970年物理学奖获得者)发言说:“如果人类想继续生存,那么,就必须回到2500年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是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地位和意义的高度赞扬。在当代,“天人合一”思想仍有其不可估量的价值,对生态伦理的发展有着深

^① 余谋昌《我国历史形态的生态伦理思想》,《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85页,1999年第1期。



刻的启示。

启示之一：“天人合一”思想是生态伦理学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资源，挖掘和整理“天人合一”思想，可以为生态伦理学提供理论来源和哲学框架。生态伦理学理论上的发展和突破，也都可以从博大深湛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找到启发和借鉴。我们要站在现代科学文明的高度，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鉴别和取舍，剥离出其中有价值的、可以支持生态伦理的成分，加以理性的提升，使之古为今用。比如，我们可以从“天人合一”思想中寻找当代生态哲学中的合理论据，寻找各种生态保护理论的一致点，形成一种比较有说服力的普遍共识，从而完善生态伦理的哲学论证体系。

启示之二：“天人合一”思想在世界尤其是东方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为生态伦理的普及和推行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尽管西方是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学术中心，代表了目前生态伦理学发展的主流，但由于西方传统文化中人类中心主义、功利主义的泛滥，生态伦理学的真正推行面临着诸多的阻力和困难。中国具有几千年的儒、墨、佛、道传统文化底蕴，使得“天人合一”思想深入人心，许多地方人们一直保持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的生产、生活习俗。生态伦理学从一种“精英文化”化解为人人知晓的生活常识，人们更易于理解和接受生态伦理观念的潜移默化。重视和加强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创新，用“天人合一”思想来解读、宣传和教育当代生态伦理学的科学观点，唤起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和生态伦理观念，是推动我国生态伦理实施的一条有效途径。

启示之三：科学考察和评价“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生态

伦理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坚定我们走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信心。从这一意义上讲，“天人合一”思想为我国生态伦理的建设提供信心来源和支持。人类著名的五大古代文明，有的已经毁灭或中断，其根本原因都是因为资源开发过度，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而失去支持生命的能力。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绵延不绝，薪火相传，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当时的条件下，客观真实地记录、归纳了自然法则，以善辨睿思的理性，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辩证唯物智慧创造了“天人合一”等深邃的生态智慧，用于指导华夏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华夏子孙后代能够不断地研讨自然法则的变化情况，传承、发展、归纳、调整并阐释这一经典，始终保持她的源头活水流向未来。因此，加强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考察和理解，整合历史和现实的优秀文化成果，大力发展我国的生态伦理学研究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超越之路。

生态伦理学的出现揭开了人类伦理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必将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日益走向深入和完善。伴随着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发展，人类社会必将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①真正实现“天人合一”。

参考文献

曾建平《试论生态伦理观》，《伦理学》1998年第4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

DANGDAIDAXUESHENGGUANXINDESHIWUJILILUNWENTI

当代大学生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

李培超、周俊武《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的理论渊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6期。

叶平《关于环境伦理学的一些问题——访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教授》，《哲学动态》1999年第9期。

余谋昌《惩罚中的醒悟——走向生态伦理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叶平《生态伦理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余谋昌《我国历史形态的生态伦理思想》，《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吴宁《论“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意蕴及其得失》，《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12期。

贾毅平《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念及其当代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专刊）2002年。

姚俭建、仇睿《“天人合一”命题的生态伦理学解读》，《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

（作者：凌惠，上海交通大学教师，硕士；徐国权，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处处长、副教授）

20.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关系？

每当我们端坐在电脑桌前，通过网络与大洋彼岸的网友联络或者聊天的时候；每当我们乘坐快速交通工具，在不同地域穿梭行进的时候，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随着当代科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快了，人类在哲学、科学技术和社会各领域的文化共同性也越来越多了。面对这种局面，当代大学生不但没有随波逐流，放弃思考，而且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理论问题。诸如：文化的一体化是否会导致人类几千年创造的文化的多样性的丧失？或者说，文化的一体化或共同性是否意味着文化的单一性？未来文化发展究竟是单一的，还是多样的？如果人类坚信，人类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是人类生活赖以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基础保障，先进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前进方向，那么未来的先进文化系统中，传统文化还有没有新的生命力？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



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关系?怎样看待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地位?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应该是一种怎样的文化?等等。大学生的思考,既体现了文化问题的复杂性,也反映了文化问题如同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一样,有着人类不可避免与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我们有必要从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开始谈起。

一、文化问题的重要性

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文化问题的重要性。他于1993年发表的文章《文明的冲突?》,以及1996年出版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再造》,曾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极大的争辩。在亨廷顿看来,“文化”和“文明”基本上是同义词。不论人们怎样为文化或文明下定义,它的内涵基本上都会包括种族、语文、宗教、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等,而宗教是世界主要文明中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和内容。亨廷顿认为,在21世纪,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的大分裂以及冲突主要将是来自文化(或文明)。文明或文化的差异才是人类的各种差异之中最根本性的,这种差异基本上是不可更改、不可消除的:如富人可变成穷人,穷人可变成富人,但是,俄罗斯人不能成为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成不了亚美尼亚人。一个人可以是半个法国人、半个阿拉伯人,甚至可以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但是,却很难成为半个天主教徒和半个穆斯林。

尽管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亨廷顿的观点,但是毋庸置疑,文化问题确是人类一个最常见的,也是一个争议最多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文化问题之所以重要,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因为文化与经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任何一个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是三位一体的,三者

的协调发展构成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经济和政治影响并制约着文化的发展。经济是整个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只有经济发展，才有文化繁荣。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第一个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理由所在。同时，社会的政治制度对文化的发展也有深刻影响，文化的繁荣需要一个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做保障。在欧洲中世纪专制制度下，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十分艰难，甚至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只是在以文艺复兴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神学的禁锢，开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之后，才使科学和哲学获得神奇的力量，迅猛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文化对经济、政治也有巨大的影响，以科学技术为重要内容的文化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直接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当代世界经济的事实表明，科学技术对经济的推动已经取得了第一位的作用。邓小平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也十分明显。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完善，政治民主程度的高低，政治理论是否成熟，与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不仅与政治决策者的文化水准有关，而且与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有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总目标就体现了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富强是经济建设的目标，民主是政治建设的目标，文明是文化建设的目标。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我们必须全面把握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在当代中国，发展



先进文化,实际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二、优秀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发展的前提

传统文化通常是指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传统文化是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文化,那些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但并未保存延续下来的东西不能称为传统。其次,传统文化也是指本土的民族文化。一般说来,只有植根于自己民族的土壤中、代表本民族的整体意识和价值取向的文化现象,才具有巩固性、持久性、相对稳定性,才能从历史上延续下来。传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是在历史的延续中积淀起来的,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的。没有延续和积淀就谈不上传统,同样没有发展和变迁也就没有传统,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传统,其内涵是有发展变化的。如果我们对传统做历史考察的话,那么将会看到,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些传统会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被送进博物馆,另一些传统则在经过扬弃以后,与新生的文化因素和社会环境相结合而被承继下来,并发展为新的传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待传统文化有两种不同的观点。陈独秀曾经主张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他在“五四”时期曾十分明确地说过,“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其后,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一切照搬外国经验,言必称苏俄,其否定传统文化尤为激烈。抗日战争时期,在清算王明等教条主义时,毛泽东等提出了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注意到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总结说:“所谓‘全盘西

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又一次强调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这些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论,在当时发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现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然叫做中国特色,则当然不能是与中国的传统毫无联系的。应当说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确对待和积极吸收传统文化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形态,如果不能积极融合、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要想真正在中国扎下根也是不可能的。

建设先进文化应当包涵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例如,儒家文化中的某些思想理念经过调整和转化后,在某些领域或某些人的行为规范中,就能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当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高度工业化后带来种种社会问题,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思想理论资源时,正是我们探讨传统儒家文化自我更



新并向现代化转化的良好时机。

传统究竟是前进的包袱还是财富？是实现现代化的阻力还是动力？如果现代人能正确认识到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传统与现代是有着血肉联系的，从而主动地去改造和吸收传统，使其实现自我更新，以适应时代，为时代服务，则传统绝不会成为包袱，而只能是宝贵的财富，绝不会是阻力，而只能是积极的动力。相反，如果不能正视时代的发展而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或者无视传统与现代的血肉联系而一心只想割断历史，抛弃传统，那么传统也确实会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成为前进的阻力。中国传统文化因其生存土壤的封闭性，其中的糟粕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以文化的开放性为由，用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判断、评价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并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以文化的全球化来取代文化的本土化，以文化的普遍性否定文化的民族特性，则不仅是一种殖民文化心态的体现，而且只能导致中国文化的民族特征丧失，这无疑不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正确处理文化的继承性与文化的创新性的关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面临的严肃问题。文化的继承性指文化作为历史的产物，同以前的成果有着承袭的关系，它是历史的沉淀，具有积累性。每个历史时代的人们，都不是凭空创造自己的文化，而是在继承自己已有文化精华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文化的创新性指文化作为现实的反映，在继承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同时根据新的生活和生产实践补充内容，发展和创造出新的精神产品。文化的继承性和文化的创新性，从纵向时间的角度表明，任何一国的文化都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停滞于历史，既不能无视现实又不能只关注现实。文化作为联接历史和现实的纽带，维护传统文化和创造崭新文化的工具，是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应当是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因此它的文化建设，既应继承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必须不断创造出顺应时代潮流、符合时代要求和标准的新东西。

正确处理文化的继承性与文化的创新性的关系，首先需要坚持科学的历史主义原则。文化是对特定社会存在的反映，既受制于一定社会的客观条件和客观关系，又受制于社会实践主体主观价值选择的影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将中国传统文化置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去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既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不能脱离、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反对牵强附会地把现代科学才有的成果挂在古人名下，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名行文化复古之实；又要看到文化的某些适度超前性及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引导作用，反对不负责任地视民族文化瑰宝为文化垃圾加以清除，以文化的现代化为名制造民族文化荒漠。其次要坚持科学的价值论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既要如实地反映、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从当代中国的现实出发，以反映和符合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需要作为判断文化价值的基本标准。

三、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定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已经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定会消除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可能加剧不同文化传统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因此，关于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存的讨论在世界范围内有愈演愈烈之势。是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还是因文化的隔离和霸权而导致战争，直接影响到21世纪人类的命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殖



民体系的相继瓦解,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也逐渐随之消退,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文化上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目前,世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两股不同方向的有害潮流:某些西方国家的理论家从维护自身利益或传统习惯出发,企图把反映他们继续统治世界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仍然在坚持“西方中心论”;与此同时,某些取得独立或复兴的民族和国家,抱着珍视自身文化的情怀,形成一种返本寻根、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的回归民族文化传统的部落主义。如何使这两股相悖的潮流不致发展成大规模的对抗,并得以消解,实是当前应当引起重视的一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又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提,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各民族、各群体,甚至每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少世纪以来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和互相影响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为前提,批判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狭隘心理。人们应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当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多元的新格局。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而且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在某种

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2000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据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因而经济全球化将有利于使文化多元的发展。从今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看，将会出现一个在全球意识关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局面。在这个新的“轴心时代”，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联成一片，因而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各种文化将由其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贡献的大小。原先的“轴心时代”的几种文化在初创虽无互相间的影响，但在其后的2000多年中，却都在不断地吸收其他文化，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说到西方文化的发展，他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到17、18世纪西方又曾吸收过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它能不断地吸收不同文化的某些因素，使自己的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同样中国文化也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得到发展的。在历史上，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文化诸多方面的发展。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并由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而且在朝鲜和日本又与当地文化相结合而形成有特色的佛教。近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激荡，通过不断地吸收西方文化而获得更新。百多年来，西方文化的各种流派都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或仍然在产生着深刻

的影响,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面貌。显然,正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相影响构成了今日人类社会的文化宝库。新的“轴心时代”的各种文化必将是沿着这种已经形成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相吸收的势态向前发展,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相渗透的局面。我们可以预见,在21世纪哪种传统文化最能自觉地推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和整合,它将会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我们应该看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任何学说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也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决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作为当今人类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她既有能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有价值资源的方面,又有不适应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方面,我们不能认为中华文化是可以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因此,中国文化应该在和其他各种文化的交往中,取长补短、吸取营养,充实和更新自身,以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人们常说,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在21世纪如果要实现“和平共处”,就要求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就是要求解决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儒家的“仁学”思想和道家的“无为”思想大概可以为这方面提供某些有价值的资源。人类社会要共同持续发展,就不仅要求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且还要求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儒家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的“崇尚自然”也许能为这方面提供某些有价值的资源。当然,西方文化也有西方文化的价值,并且在近两三个世纪中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人类社会有了长足的前进。当今人类社会各民族、各国家大概都能从其文化传统中找到某些贡献于人类社会的资源。不过各民族、各国家都应看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只能在某些方面做出贡献,而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多种文化的一种,我们应该清醒地给它一个适当的定位。中国文化要想在21世纪走在人类文化的前列,必须在充分发挥其自身文化内在活力的基础上,排除其自身文化中的过了时的、可以引向错误的部分,大力吸收其他各种文化的先进因素,使我们的文化“日日新、又日新”而不断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和人类终极关切的哲学问题上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通过以上问题的阐释,我们现在有必要对何谓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做一简明的揭示。关于“先进文化”这一范畴,首先,我们应认识到所谓“先进文化”,应该是健康的、科学的、向上的,既是人类思维成果和精神创造的精华,又与现实时代和未来发展的方向相一致。其次,先进文化之对立面是落后、颓废文化,区分之标准是看其能否顺应和促进社会历史的进步。具体而言,凡是顺应并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有利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文化便是先进文化,反之则是落后、颓废文化。再次,“先进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个动态系统,其总是处于历史承传与现实革新、更替的辩证统一过程之中。为此,我们应该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以及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过程中先进文化战胜、取代落后、腐朽文

化之历史经验加以梳理和总结；应该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中领导全民族所创造的“先进文化”做出历史总结；应该对当前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格局中符合中国社会、文化战略发展目标的“先进文化”之价值定位、体系建构做出准确的内涵阐释。这种先进文化应该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先进文化应当是兼容并蓄的文化。先进文化有着对其他文化慷慨吸收、鉴别采纳的特点。这种文化的宽容特征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中国唐代的文化、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都具有这种特征，因而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先进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先进文化更应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兼容并蓄的文化除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外也带来国家的强大，所以兼容的文化是强盛的文化。古罗马文明源于欧洲、北非及小亚细亚文化，后来向世界敞开大门，以至罗马人后来强大到把地中海称为“我们的海”。中国唐朝时代具备对域外文化取舍由之的从容，使得长安城成了世界文化博物馆，造就了人类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反之，中国清初皇帝一句“片帆不得下海”铸成国人400年遗憾。日本明治维新以文化开放为先导，放弃闭关锁国，到甲午战争打败清朝不过区区30年。中国改革开放不过20多年，成绩之大，世人皆见。由此可见，敞开文化大门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民富国强的根本。

第二，先进文化应当保持本文化的优良传统。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优良传统，人之所以成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就是因为人能够吸取前辈的文明，通过语言文字或者其他形式传递下去并且加以发展。同样，一个国家如果摒弃了优良的文化传统，就谈不上发展先进文化，也必然妨碍经济发展。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现代化不应以抛弃传统为代价，建新楼不一定拆老屋，谱新章未必不能弹旧曲。

中国传统文化在信息时代、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出了独特的生命力,是凝聚全世界华人的精神财富,也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牢固壁垒。应该珍惜、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对外开放和保持传统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先进文化是在竞争中产生的。

第三,先进文化是有着灿烂未来的进步文化。先进文化不应当受固有的文化糟粕和外来消极因素的影响,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自己,不断更新和完善自身,以宏大的气魄,把人们引向光辉灿烂的未来。先进文化是现代文化,不是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简单重复,而是现代人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并且面向未来的创造。先进文化的现代性与传统性并不矛盾,而是现代与传统磨合的产物。这种文化接受传统、检验传统,也能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先进文化的发展上,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历史的选择,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另一方面离不开正确的支持和引导,如果不进行正确的引导,那么优秀的文化因素很可能会被商业浪潮所吞没。国家有责任在政策中反映先进文化,既推动文化创新又保护传统文化,协调不同的文化层面,督促发展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的进步文化。

第四,先进文化必然要和先进生产力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联系。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它会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先进文化与先进科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目前而言,不与先进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文化就不可能是先进文化。信息革命目前暂时处于休整阶段,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与其他科技领域结合,创造出新的奇迹,没有人能预料今后20年科技将有何等突变。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结果遗憾百年,现在决不可错过已经开始的信息革命。与工业革命不同,这次信息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化领域的革命。先进文化

恰恰就是这场革命的先导,先进文化也在参与、反映并利用这场革命。先进文化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紧密联系。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是其他领域进步的基础,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保证。所以,先进文化是民主的文化,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文化。

第五,先进文化是保证人民身心健康的文化。古罗马有一句名言:“健康的思想基于健康的身体。”先进文化必然要对人民的身心健康负责,必然引导人民走向健康与安宁。先进的文化保证群众的利益,包括全民健康。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群众文化的集中体现之一,其本质是发展群众性的业余体育运动,而不是把宝贵的资源全部集中到竞技体育方面。现在中国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还比较低,2008年奥运会成功的标志应该是中国有多少人经常参加业余文化体育活动,多少人有机会、有时间、有心情参加健康多样的文体活动,离开酒杯、烟缸、牌桌到海滨游泳、球场驰骋、林间散步、山中远足。

(作者:汪传发、范静,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21.

怎样看待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概念会消失吗？

作为大学生，许多同学对非公经济的概念及其历史来源把握不清楚，认为非公经济不是一个纯经济学概念，对它有很多误解。其实搞清楚非公经济的来龙去脉，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目前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有更深的理解。

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今天为止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中国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性的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改革的里程碑，对旧有经济全面拨乱反正，提出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了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在向着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不断迈进。作为公有经济的补充，非公经济含义的诞生始于党的十二大，但是，当时只是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明确的非公经济概念，之后10多年之间，作为公有经济以外的其他经济形式，实践范围一直得到不断的扩展，理论上得到不断的拓展，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作用不断得到肯定。一直到党的十五大,非公经济的概念才最终形成,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提升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确认了利用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非公有制经济为实现现代化服务的原则。其间,非公经济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这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改革与非公经济概念的发展息息相关。

非公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补充,肩负着补充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非公经济还将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非公经济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终将被新的概念取代,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回顾和总结非公经济的发展过程,对我国的非公经济发展轨迹的把握不无益处,从而可以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前景是任重而道远的。

一、非公经济的概念辨析

根据国际金融公司于2000年对我国进行的一次调查,如果将社会经济部门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大块,则到1998年,国有经济活动总量已降至GDP的38%。如果扣除国家控股的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则国有经济部门、真正的集体和农业部门、私营经济部门等三大块经济活动,将分别占同期GDP的37%、30%、33%。

非公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以及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国有、非集体成分。非公有制经济,是从经济活动单位的财产所有权意义上定义的概念,主要阐明的是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按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除国有、集体经济之外的经济成分均属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现实中的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以及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国有、非集体成分。实际上,也就是指经营活动中的个人所有权部分。

非公经济在现实使用中经常和民营经济混合使用，其实二者有着不同的指向和内涵。

民营经济只是特指生产方式，非公有制经济不等于民营经济。非公经济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的，而民营经济是相对于国有经济而言的。在国有经济总量中，扣除了国有集体经济以外的部分，就是非公经济，主要包括股份制经济、股份合作制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等，而民营经济主要是从生产管理经营的角度而言的，是私营老板管理还是由公家派人来管理，所以，国有、集体、“三资”企业也可能是“民营企业”。

在实际使用中，有时既用来表述所有制，又用来表述经营方式，有时还直接与私营经济替代使用。但是，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说，民营经济是不能和私营经济混用的，前者的内涵更宽泛，也不能和非公经济混淆，二者所强调的重点不同。

二、非公经济概念的历史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从“对立论”、到“限制发展”、到“有益补充”、再到“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过程。可以说，非公经济理论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特别是自80年代起，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鼓励和理论支持。

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只有多种经济形式的合理配置和发展，才能繁荣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生活。”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现在的个体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个体经济，它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

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当前要注意为城市和乡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并给予法律保护。”

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鼓励它们发展。”

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的发展,并依法加强管理。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

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提升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确认了利用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非公有制经济为实现现代化服务的原则。这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既为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也为思想观念和政策突破提供了前提。

尽管如此,对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们总是有这样和那样的顾虑和议论,导致在经济改革实践上缩手缩脚。于是,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的论证,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

明确提出了“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解除了人们长期以来对非公有制左右徘徊、瞻前顾后、缩手缩脚的思想疑虑。

至此，回顾非公经济从限制发展到充分鼓励和保护的过程，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经济的改革是在逐步突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实践过程中稳步推进的。非公经济的概念得到逐步的承认，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期间，旧有的计划经济的历史沉疴是很重的，观念很难在人们的头脑里改变，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阻力是很大的。可喜的是，经过十多年的奋斗，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在以新的面目融入世界的经济体系。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大的挑战正在到来，如何改革既有的体制弊端，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游戏规则，调整那些不适合经济发展的法规，机制观念等，正是当下中国的发展的瓶颈。

在世界经济逐步融为一体的背景下，我国的非公经济究竟应该如何发展？非公经济的概念是否也该有一个适应发展的调整？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三、非公经济的现状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巨大发展可以从以下一组数据中看出，据统计，个体私营经济年增长速度达到20%以上，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个体工商户由1978年的14万户、15万人发展到2001年底的2433万户、

4760万人,注册资金3436亿元。私营企业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起步,1992年以后一直以15%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01年底已达到203万户,从业人员2714万人,注册资本18212亿元。2000年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共纳税1177亿元,占全国工商税收的9.3%。个体、私营经济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30%,东部沿海省市更高达60%以上。实践证明,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之一,它不仅对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吸纳了大量社会闲散人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据统计,1992年到2001年,个体、私营经济新增就业人员4774万人,2000年全国360万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中,有250万人在个体、私营企业就业,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国家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一条重要渠道。个体、私营经济已从最初的“拾遗补缺”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不仅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活跃市场、方便人民群众生活的生力军,而且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重要增长点。

然而,非公经济在目前的发展还受到很多的制约,在许多领域还受到许多政策和法规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这将有待社会的发展及国家政策的逐步调整加以解决。

四、非公经济未来发展探析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道路。非公经济如何发展,未来的方向如何?非公经济在市场经济中能否扮演真正的市场角色,能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优越功能,关系着非公经济的未来发展的命运。特别是我国已经加入WTO,经济活动必须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进行。

非公经济在未来中国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非公经济这一概念是否会被其他概念所取代？我们认为，非公经济的概念的存在有其历史特征，首先，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独特背景的概念，也就是反映了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在突破以往经济体制弊端所走过的艰难旅程。其次，这一概念涵盖了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成分，故而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个体，私营，外资，股份，各种混合经济等的发展壮大，将有效地促进中国经济体制的优化，资源更加有效地得到配置，市场的功能更加有效发挥，非公经济将被越来越多的具有独立自主产权的经济实体所取代。这个过程可能要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我们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应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非公经济概念下的各类经济形式只有发展壮大，非公经济的概念才会消失。如何走出目前非公经济的发展困境，笔者认为，应该依据非公有制经济产权明晰，机制灵活，机动性强，决策快，利益的激励和约束强的特点，避开非公企业规模太小、实力弱、技术落后、管理差、信息不灵的不足，在应对加入WTO后面临的形势时必须扬长避短，有进有退，主动地进行结构调整。

其一，在产业结构方面，扬长避短，主动退出没有竞争力的部门，或者调整经营的方向。在那些具有优势的部门，非公有制经济应加快发展，有能力的企业应努力扩大国外市场，目前国有经济正在对其布局从战略上进行调整，将要竞争性领域逐渐退出，这是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的机会。在竞争性领域，非公有制经济与国有经济相比具有优势，在与外国企业竞争中也比国有企业更具竞争力。原则上，在国

有企业退出中非公有制企业应以不同方式进入,这对中国应对加入WTO后面临的与外国企业竞争的形势是有好处的。但是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实力弱,即使在国有经济将退出的领域,在短期内也难以替代国有经济,有些非公有制企业也难以具备能与外国大企业竞争的實力。但让非公有制经济尽早进入这些领域将更有利于应对以后的国际挑战。

其二,在技术创新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应向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进军。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的高新技术产业是应对加入WTO后在这方面的激烈竞争的需要,因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制度、经营机制比公有制经济更适合于从事风险大、发展快、企业淘汰率高、创业成功后回报也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在技术结构方面,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技术水平已刻不容缓。

其三,在规模结构方面,在有些部门需要发展一批规模大的有雄厚实力的非公有制企业。无论是占领国内市场还是扩大国外市场需要有一批大型的非公有制企业去竞争,单靠国有大企业去应对是不够的。尽管非公企业要与庞然大物的国外大公司竞争目前还是困难的,但是非公经济的灵活性和成长性,将在未来展现强大的竞争实力。

其四,尽快适应WTO的游戏规则。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将进一步与国际经济接轨。非公有制经济的人员必须了解和学习WTO的基本原则、基本目标、基本结构、贸易政策审议和贸易争端解决的机制,其基本协议和附加协议、协议,与中国签定的双边协议,承诺清单等。这些协议、协议和承诺清单就是各会员单位之间经贸交往中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一方面使我们知道如何按这些规则行动,不致违规;另一方面使我们知道如何用这些规则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对非公有制企业来说需要按照这些规则来对照自己以往的

行为,对那些不符合的地方,应切实纠正。

其五,加快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制度。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已经具有较大规模,但是至今其产权归属仍是无法确定。许多企业名义上仍属于“国有”、“集体”,但国家、集体从来没有投资。由于产权错位,民事主体错位,在激励机制上不够有效,经常发生法律纠纷,并造成误判,引起许多损失,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其六,非公经济应依靠行业协会发挥作用。为应对加入WTO后的形势,非公有制经济之间需加强合作。应大力发挥协会和商会的作用。中国至今没有全国统一的商会。为此,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人士关于WTO的培训,提供有关的法律咨询,在非公有企业的利益受到国外企业的侵害时,逐渐适应以各种方式维护其利益。

其七,给予非公经济更多的国民待遇。为使中国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应对加入WTO后面临的形势,应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必要的条件。加入WTO后,中国将给外国企业以国民待遇,因此,首先应给予非公经济以国民待遇,以加强其竞争力。例如,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等极少数国家必须控制和垄断的部门外,其余部门应向非公有制经济开放,或者退一步说,凡允许外国企业进入中国的部门(例如,银行业、保险业、电信业、证券业等)也允许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只有这样才能使非公有制经济在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大陆的部门中与国有经济共同应对外国企业的竞争。否则单靠国有经济,力量是不足的。对此,还应在融资方面给非公有制经济疏通渠道。市场准入的门开了,融资的渠道通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道路就宽了,非公有制经济也就更能应对进入WTO后面临的形势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非公经济这个概念为什么在将

来会消失,而在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有了一个历史和未来的分析,并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省。我们认为,首先,非公经济需要进一步发展,夯实基础,才能得到更多的政策和法律保护。非公经济目前还面临许多的困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有许多路要走,非公经济的概念在短时间是不会消失的,它还需要承担中国公有经济改革推动器的作用。中国公有经济的改革直接是非公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公有经济历史上沉淀的许多包袱需要时间去消化,公有经济改革的成果需要制度去保证,这样才会为非公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由于一些公有经济逐步要退出许多竞争性领域,而非公经济要进入填补这些空白,我国的经济结构也将会有适当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

其次,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非公经济的发展壮大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力补充,它更加体现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活力,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非公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以往的体制弊端,非公经济的壮大,将会逐渐引导我国经济走进世界经济循环的大舞台,并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适应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符合非公有制企业的自身利益,也是对国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非公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也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估计它将伴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而结束。

(作者:段刚,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副总编,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

22.

怎样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相对繁荣和发展？

有人说，当代大学生是“政治冷漠”的一代。其实，在不少大学校园里，都有着学生自发组成的时事政治研讨会，读书会等兴趣小组。他们把课堂上的有关政治理论的争论经常带到宿舍里，校园咖啡屋里，操场上，甚至饭厅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讨论话题之一就是：“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够繁荣发达？”

有学生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那套理论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如今西方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已经与马克思的描述有了很大的不同，资本主义不仅不会走向消亡，可能会伴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消解自身的内在矛盾和阶级冲突，直入共产主义；还有学生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上个世纪的概念，21世纪的人类历史进化将会用新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概念来替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所以，当代资本主义的繁荣发

达,意味着传统资本主义的消解和转换,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

应当承认,19世纪中叶,被誉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在他的名著《资本论》中预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①

20世纪初叶,无产阶级革命家、全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在他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断言:“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然而,当人类历史发展到了20世纪末叶,上述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而且仍然具有巨大的活力,正在创造着空前发达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而且发生了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的历史事变。面对这种历史事实,上述大学生发出的种种疑问还会有很多,如: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历史命运的科学分析是否正确?人类社会将要向何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将来会不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西方学者与政治家们对此提出了各种理论,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本主义胜利说”,认为上述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永恒。例如,福山发表“历史终结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社会制度,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资本主义具有不可抗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831~83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拒的优越性,对社会主义“不战而胜”。另一类则是“世界新分裂”说,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是错误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不是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等等社会矛盾,而是种族冲突、文化冲突等等“文明冲突”。^①

这些问题与理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到底是不是真理?当代资本主义到底吃了什么样的灵丹妙药,获得了如此活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回避这些问题,更不应否认事实,而应当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对此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

一、资本的巨大力及其代价

其实,在人类思想史上,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第一次深刻地指出了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旷古未有的巨大动力作用。历史上的各种经济形态中,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只是追求生活资料的消费与积累,因而社会生产出的过剩劳动产品(社会劳动总产品减去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物质资料还剩下的劳动产品)都被人们消费了,浪费了,或者作为豪华的生活设施(如宫殿、陵墓等等)而保存下来。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基本保持原状,发展速度极其缓慢。资本主义不同,它追求的不是生活资料的消费,而是以货币形态存在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积累,为达此目的,它不断地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除了极少部分被消费之外,都尽可能地又转化为资本,这个循环过程没有止境。于是,整个资本主义经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Summer, 1993.

济体系处于无限地追求经济扩张的过程中,并且“随着投机与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①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于是成为一部疯狂地赚取剩余价值的机器,从而具有其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强大优势。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积累,是促使这部机器疯狂运行的巨大的内在动力。而各个资本之间的市场竞争,则是迫使各个资本以及被“资本化”了的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不断追求高效快速运行的外在动力。追求最大利润的内在动力与市场竞争的外在动力相结合,构成了驱使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巨大的动力源泉。正因如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直到今天,资本主义的这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仍然在起作用。

然而,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不断扩张的作用,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一,市场竞争压力与最大限度地赚取剩余价值的动力,必然驱使资本家追求微观生产过程的“合理化”,尽可能减少工人工资总额在全部资本总额中的比重,由此产生出一支失业队伍,其成为进一步降低在职工人工资的筹码,由此导致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造成产品过剩。其二,自由竞争会自发地产生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生产失衡。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失衡,但其调节具有滞后性、不公平性(对大小资本及不同行业不均衡)和局部性,因而其消除失衡的能力十分有限。这就是说,资本主义企业的微观合理化与有序化是以社会总体经济的失衡为代价的。产品过剩是这种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5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失衡的发端,它不仅造成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与浪费,而且还引起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行上的一系列障碍。首先,产品过剩必然导致社会投资减少,部分资本闲置,形成“资本过剩”。而资本过剩必将使一部分劳动力失去就业机会,导致社会劳动力总体过剩。劳动力过剩在造成失业队伍扩大的同时,引起劳动力价格(工资)下跌,由此导致社会总体购买力下降,进一步加剧产品过剩。于是形成了“产品过剩——资本过剩——劳动力过剩——进一步产品过剩”的恶性循环怪圈。于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机体的内部,生成了一个过剩性赘疣,它通过这个循环怪圈越长越大,不断把资本主义机体中的生产要素吸引过来,处于闲置积压状态,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本身则不断萎缩。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造成经济危机。这种过剩性赘疣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原有生产体系中无法容纳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不久的早期,走出这种经济危机的途径,是割除这个“过剩性赘疣”,也即对这些过剩产品、过剩资本和过剩劳动力进行自发破坏,以重新恢复资本主义机体的正常运行。其具体表现是:资本家宁愿销毁过剩产品,也不愿将其用于救助穷人;工厂倒闭,以消除过剩生产能力;失业加剧,工人生活状况恶化,平均寿命降低,以减少过剩劳动力,等等。显然,这种破坏性治疗过剩性赘疣的方法代价高昂,其治标不治本。旧的赘疣被割除之后,新的赘疣不断产生。于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垄断程度越来越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突出,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来势越来越迅猛,割除的困难越来越大,最后终于酿成1929~1933年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其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性之大,已经到了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总体崩溃的边缘。

上述对资本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既深刻地揭

示资本主义巨大的动力机制，也深刻地揭示了由此产生的致命缺陷：资本无休止地追求剩余价值的增殖与资本的扩张，必然导致“过剩赘疣”的不断产生与积累，由此导致一次次经济危机。它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是马克思对人类的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其基本原理至今仍然完全正确。在这一伟大贡献的光辉面前，人类思想上一切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贡献都平庸无华，黯然失色。这种贡献至今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它使人们在充分发挥和利用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作用的同时，正视资本产生的过剩性赘疣。近现代经济思想的焦点，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焦点，都集中于如何消化过剩性赘疣上。对这个问题的各种解决方式，成为关系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命运的核心问题。

既然追求无止境的扩张与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过剩性赘疣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本性，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早期资本主义的自发力量用简单的摧毁社会生产力的方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产生的经济赘疣，造成了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创伤，导致资本主义不可持续。正是基于对于这种巨大危害性的认识，马克思根据自己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做出了对于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命运的科学断言，认为盲目的资本力量将会被人类理性力量所取代。马克思主张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全社会的生产纳入到理性的计划经济模式中，以彻底消灭过剩性赘疣的产生源头。这是他所设想的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最根本的途径。从人类长远的社会发展史角度说，马克思的设想是正确的。同样，列宁根据走向垄断时代的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及其发展趋势，做出了对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估计，这种估计并非空穴来风，没有根据。发生在

1929~1931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由资本主义矛盾激化而产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罹患了马克思指出的痼疾，而且的确出现了列宁指出的发展趋势。当时，世界革命风起云涌，穷人与穷国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席卷全球。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面临的重重矛盾中迅速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催生了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世界历史的确出现了一种趋势，它昭示着马克思和列宁的预言正在迅速地变成现实。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自动产生的过剩性赘疣，则是资本主义的总病根。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作为刚刚诞生不久的社会形态，还有相当巨大的发展空间，还有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消化过剩性赘疣的巨大能力。马克思也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离其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成熟还有相当遥远的路程。这就导致马克思有两点估计不足：第一是对资本主义消化自己产生的过剩性赘疣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二是对建立理性的计划经济所需要的社会条件，以及这种计划体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估计不足。

因此，马克思在创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伟大而正确的理论的同时，由于上述两点估计不足，导致他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预言不太准确。我们决不能因此否认马克思的伟大，否认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任何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正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的上述两点估计不足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人类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数百年的实践,经历了1929~1931年最深重的经济危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创,并且经历了数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之后,经过无数次理论探索与尝试,才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

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秘诀:消化过剩赘疣的三条途径与两大浪潮

在经历过无数次惨痛的教训与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之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终于逐步找到了消化“资本赘疣”的基本途径。概括起来说共有三种,这就是扩大公共产品生产、科技创新和经济全球化。通过这些途径,大大地增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容纳能力,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繁荣,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途径之一:扩大公共产品生产,增加发达国家的国内总需求。

凯恩斯将过剩性赘疣的产生原因归结为在私人产品消费行为上的惜购心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原理)和投资行为上的惜贷原理(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原理)。这是对过剩性赘疣产生原因的现象层次的剖析,因为它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两极分化,它使社会购买力集中到富裕阶层手中,通过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定律,造成社会总需求不足。但不论怎么说,凯恩斯得到的结论是正确的:通过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生产的私人产品必然过剩,由此必然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必须通过扩大公共产品的生产来弥补其不足,才能实现社会经济机体的正常运行。为此,凯恩斯主张加大公共产品的生产,强制性地增加社会消费结构中公共产品中所占比重,同

时用公共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政府投入，通过乘数原理来带动私人产品的生产，以消化过剩资本。罗斯福总统等西方政治领袖接收了凯恩斯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过剩的资本赘疣，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然而凯恩斯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我们知道，资本是人类劳动的结晶，是能够通过生产过程增殖的劳动价值。而资本实现其增殖的条件，是它的社会性的实现——注入到社会的市场网络中流动。增殖的劳动价值（即剩余价值）又会转化为资本，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因而需要新的市场网络来容纳新增资本，如此无限进行下去。因此，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循环过程，就是市场体系不断扩张的过程。这是资本在市场中的必然逻辑。凯恩斯主义企图通过扩大公共产品的生产来容纳新增资本和刺激国内市场扩张，其作用必然有限，因为新增资本注入于原有市场网络的内部，必然造成滞胀，形成用通货膨胀形式表现的隐性赘疣，并且滋生出新的显性赘疣。具体地说，因为增加公共产品的生产，必然要增加政府税收，导致企业生产私人产品时成本过高，由此进而导致市场萎缩，引发社会经济“滞胀”。这就是说，凯恩斯主义在消化过剩性赘疣的同时，引起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收缩了私人产品的生产，导致新赘疣的产生。

因此，必须开辟新的市场，以容纳新增资本，消化由其形成的赘疣，使其执行其资本的职能，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内在要求。那么，如何进行市场扩张呢？其途径只有两条：科技创新与经济全球化，它们形成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浪潮。

途径之二：资本的纵向扩张：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纵向的市场扩张。被阻滞的资本的积累，虽

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赘疣,但同时也是推进技术创新的强大动力与压力。这些积压资本迫切需要寻求出路,于是尽一切可能将沉积的科技成果开发出来,使其实现产业化。另一方面,这些被积压的资本和劳动力等等也给技术创新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流动提供了客观条件。当这些被积压的资本投资于风险性的科技创新,一旦成功,便会开辟新的消费领域,并且进而通过产业链带动着一系列新兴产业,给新增资本开辟了新的投资渠道——总而言之,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型市场:汽车、广播电视、个人电脑与因特网、移动电话等等都是如此。于是,那些闲置资源找到了出路,自然界更多的资源被圈入到市场化的旋涡中,变成为人类服务的产品。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产业又通过市场竞争压力使旧产业面临解体,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被困于落后产业中的生产要素将会被解放出来,经过改造与转型,又被重新吸收到科技创新产业中,并且获得新的价值,旧的社会产业体系被提升为新的产业体系。这个过程,即熊彼特的“创新-毁灭过程”。它是解决资本危机的有效途径。

途径之三:资本的横向扩张:经济全球化。

从资本诞生的那一天起,其扩张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必须不断向全球扩张,以维系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早期的全球扩张采取军事上的“炮舰政策”开路,用侵略和征服殖民地人民的方法来带动经济扩张。这种血腥野蛮的扩张方式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反对而被迫终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叶之后,资本主义的扩张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利用科技势差,将过剩资本和过剩产品推向发展中国家,同时从发展国家获取其所需要的资源与初级产品,从而将全球各国纳入到共同的国际市场之中,形成全球性资本流通与资源配置机制。由此

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为发达国家内部的沉积资本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市场空间，缓解了发达国家经济体系的内部矛盾。

现实的市场扩张过程是上述两大浪潮——科技创新浪潮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辩证统一。科技创新必然会生成和诱导经济全球化：由技术创新产生的技术势差是推动市场扩张的巨大动力，引起一轮又一轮高科技产品与产业推向全球。全球化过程也诱导和支持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没有国际市场开拓的支持，科技创新产业不可能有巨大的出路；没有国际市场竞争，也将缺乏科技创新动力。而因特网和电子商务技术等等，使科技创新浪潮与全球化浪潮交织。全球成为信息上的“地球村”，各国之间在信息上距离趋向于零。而交通的便捷，为全球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逐步形成创造了技术条件。由此构成的全球性经济扩张过程，是资本经济扩张力的最宏大的表现，形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历史潮流。

一旦这些被积压在经济赘疣中的生产要素通过上述三条途径释放出来，转化为社会经济体中的运行要素，必将带来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是战后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发达起来的基本原因。必须注意，这种繁荣与发达是有条件、有代价的。条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适度的技术势差与经济势差，使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扩张成为可能。代价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以及资本的无限扩张过程对社会资源的无限开发与掠取。这些代价总有一天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阻力重重，最后将不可持续。因此从人类历史长远的发展过程来看，资本主义并不能避免必然衰退与灭亡的命运。人类社会一定要建立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

展的公平的经济形态，而这正是未来社会主义理想之所在。

(作者: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导)

23.

“讨价还价”是当代国际政治的流行色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历史巨轮前进的速度日益迅猛，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人类社会迎来“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是国家谋求发展和创新理论的根本依据，也是当代大学生开阔视野和探求知识的重要源泉。面对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国际政治局势，当代大学生关注最多和疑问最多的是：“国际政治的流行色到底是什么？”

一、从战争走向理性的讨价还价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轴心，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法国红衣大主教黎塞留提出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和英国外交大臣帕巴斯顿提出的“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利益是永久不变的”名言，目前已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美国地缘政治学的代表人物摩根索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实际上最后



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近年来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影响渐增的新古典派学者认为，国家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尽管国家利益的定义方式有多种），尽力营造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追求本国“影响力的最大化”：国家相对力量上升，它便在国外追求更大的影响力；而随着国家相对力量的下降，国家的抱负和行动也便会相应地收缩。

国际战争的目的无非都是谋求或维护国家利益，但人类战争一再证明一句至理名言：“动刀者必死于刀下。”好战者没有永久的利益，因为通过发动侵略战争谋取国家利益只能激化国际矛盾，导致国际社会的动荡和更大规模的战争，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日不落帝国”。早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一国，尤其是强国，往往无视他国，尤其是弱国的利益来谋取一己之利，谋求自身安全或权力的最大化。虽然人们早就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的哲理，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关系实践中，讨价还价的妥协原则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国际社会盛行的是“强权即真理”，对于当时争当世界霸主的西班牙、英国、法国、奥地利、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强国来说，弱国不存在什么国家利益，它们可以随意侵犯、侵害，甚至吞并弱国，各国都把扩大自身的相对力量作为获取国家利益的最佳途径。“强权即真理”的原则是通向战争的必由之路，无数次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最终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

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大多数学者对人类自身的状况、道德进步以及建造一个和谐世界的人类理性的能力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悲观态度。对话或讨价还价的相互妥协原则为国际社会所承认和遵循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

是经过无数次残酷的战争的教训才逐渐确立下来的。讨价还价的相互妥协原则最初只局限于列强之间的均衡外交。均势的实践由来已久，但是真正的有意识的按照某种原则构成均势是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最早的均势主要是世界少数列强之间的均势。由于不同时期所形成的对国际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势”或“力”的不同，各国对均势的理解和主张也有不同。早期资本主义列强的均势外交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强权外交，列强在国际会议上对话的同时都竭力推行以武力和强权营造自己主宰下的均势。第一个实践是梅特涅建立的英国、法国、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五大国主宰下的欧洲和平，它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五大国的“对话”以实现“欧洲协调”。梅特涅的均衡体系是在打败拿破仑之后建立起来的，当时各国都渴望社会的稳定和战后的恢复，均衡思想容易被接受，均衡体系较容易维持。但是，梅特涅的均衡体系的基础是少数列强的均势，列强间的相互妥协并不顾及新兴势力的利益、理性、道德和国际准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相互平等和国际秩序等基础上的妥协原则。梅特涅创造这种体系，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梅特涅创立的均势体系维持了30年的和平。打破梅特涅创立的均势体系的是普鲁士的宰相俾斯麦，它通过铁血政策领导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帝国。德国的铁血政策下，更没有欧洲的平等对话和协调可言。俾斯麦并没有恪守梅特涅体系的教条，去创造什么“欧洲协调”，而是力图孤立自己的主要敌人——法国，将它排除在欧洲均势体系之外，营造德国主导下的欧洲均势。俾斯麦的战略思想同样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所处的时代环境出发所做出的选择，它促进了德意志帝国的强大和繁荣。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和德国皇帝威廉一世的世界政策激化了与其他列强的矛盾，各国的

国家利益极端膨胀,终于碰撞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花。

正如防御性现实主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国家可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约束自身行为。直到人类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越来越多的政治家认识到,战争的胜利者永远是暂时的,只有通过“讨价还价”的“相互妥协”,才是谋求国家利益的根本原则,只有尊重他国的利益,己国的利益才能最大限度的获得。从而,“讨价还价”的“相互妥协”原则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准则。

巴黎和会虽然从本质上来说是战胜国瓜分战败国的分赃会议,但国际联盟的建立和国际理论的产生也反映了国际政治家对讨价还价妥协原则重要性认识的提高,有机会到巴黎和会上“对话”的,在形式上并不局限于英、法、美、意、日五大强国,参加国达27个。随着“对话”范围的不断扩大,指导国际政治的理论也随之诞生。巴黎和会期间,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等相继成立,国际关系理论开始诞生。

具有不同实力的国家对妥协的理解是不同的,“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有深远的影响。作为古典现实主义代表的摩根索清醒地认识到了在当代世界政治地理环境中,不平衡状态的发展与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同时并存是客观事实,强烈反对把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绝对化、凝固化。他认为,“一个在其他方面软弱无力,按照传统的强权来说无足轻重的国家,可以对掌握着除石油储藏以外的一切强权手段的国家行使巨大的、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决定性的强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倡“民族自决”和“贸易自由、航海自由”为主要内容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开始对

近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及国际政治理论产生重要影响。但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尚不及英法，所以美国的国际政治思想只能作为理想主义而难以实现，“强权即真理”和“强权即利益”的观点在国际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中仍然占有重要位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都向美国转移，国际政治学研究也不例外，美国的国际政治思想也逐渐由理想主义发展为现实主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基础上，讨价还价的妥协原则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得以最终确立。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尽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但国际政治的主流是讨价还价的冷战而不是热战，联合国的作用不断增强，逐渐成为世界各国通过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途径以谋求本国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舞台。欧洲之所以在过去40多年保持和平，除了联合国的作用不断加强和国际关系准则不断制订之外，其他主要因素还有：这段时期欧洲处于两极体制之下；构成两极的美苏两国军事力量大致平衡；大量核武器的存在，等等。

20世纪90年代之后，尽管由于东欧原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秩序的崩溃以及苏东巨变使原来被压制的民族冲突和边界争端有可能重新凸现出来，地区性的冲突加剧了，但欧洲并没有回复到以前战乱频仍的时代。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增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讨价还价的妥协原则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国家所接受，终于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下来，成为国际政治的流行色。

在国际关系史上，对话形式的讨价还价的相互妥协不仅是国际政治的实践，也是国际政治的理论研究的主要内

容。在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粗线条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每种理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都有各自独特的特点。但是,从欧洲的均势理论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的实践,再到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直到现在多元化的国际政治流派,从本质上来说,都反映了国际政治理论对战争的反思和对讨价还价妥协原则认识的不断深化。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强调国际体系的霍布斯主义性质,在他们看来,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结果便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指出的,国家最初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但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国家去作进攻性的思考,有时则是采取进攻性的行动。米尔斯海默告诉我们,要理解一国为什么会有某一特定的行为,人们首先应该考察该国的相对力量和外部环境,因为这些因素将决定国家以何种方式来维护其自身的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实力有限,他只能在“罗门主义”的招牌下把自己谋求利益的范围局限于拉丁美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自己实力的增强,他把扩张的视野从拉丁美洲转向全球,竭力倡导“民族自决”和“门户开放”政策,企图打开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的大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国家实力强大到足以可以不使用均势的手段而能得到追求国家利益的目的,以至于均势原则一度遭到主导国际政治理论的美国学者的唾弃。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并没有完全抛弃均衡原则,美国所理想的均势也不过是美、苏两大国主宰世界的均势和美国霸权基础上的欧洲均势。所谓现实主义的学者们在强调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时,更多地是强调权力的决定作用,尤其

对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强调的是实力基础上的“遏制”。

美苏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给世界带来的动荡和灾难: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等,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直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衰落,独立支撑已经不可能完全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建立美国操纵下的均势形势成为指导美国行为的主要国际政治理论基石。即使对社会主义国家,尼可松主义在强调“实力”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谈判”和“伙伴关系”;基辛格重又提出了均势理论。而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新干涉主义”的提出为美国进行全球扩张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克林顿提出的以“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三个支柱”、“领导世界”的思想对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的变动刺激着国际政治理论的创新。为了自己的“霸权稳定论”张目,美国的一些国际政治理论家更多的是强调世界的冲突和美国的责任。米尔斯海默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多极格局的回归和欧洲各主要大国之间冲突的重新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伊拉克问题尤其是科索沃问题上采取新干涉主义的立场,把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强加于他国,不承认发展中国家有独立自主的处理国内事务的最高权力,并公然绕过联合国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这不仅对中国主张和坚持的以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构成了挑战,而且也欧洲本身的利益形成了潜在的威胁,因为他们助长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

二、谋求国家利益“和为贵”

国际关系实践和理论告诉我们,谋求国家利益“和为贵”,只有在尊重他国利益和遵循国际关系准则的前提下通

过讨价还价的对话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没有讨价还价的相互妥协就不可能有世界和平,就不可能有国家利益的最大化。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经历无数残酷战争的教训,“坚持对话,不搞对抗”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原则终于为人类社会所普遍接受,成为国际政治的流行色,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双赢、合作、共处和依存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常用语。

长期以来,“坚持对话、不搞对抗”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基础和大力倡导的国际关系准则。“坚持对话、不搞对抗”的外交指导思想不仅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安全,也有利于保证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实现。例如,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遏制中国的呼声对中美关系形成了短期难以克服和解决的重大障碍,人权冲突,贸易磨擦,美国国内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呼声时有高涨,中美关系存在出现重大摇摆的可能。冷战时期形成的北约和美日军事同盟这两个最主要的军事结盟组织不但没有消失,反面有扩大的趋势。美国对中国驻南使馆的轰炸,大大恶化了国民对美国的情绪。从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出发,从中国现代化的外部环境,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大局,从中国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这样一些中国最高层次的国家利益出发,中国始终坚持“对话,不搞对抗”的外交原则,更加理智和谨慎地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

的确,历届美国总统,从里根到布什再到克林顿,都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领导人也不会放弃这一目标。但是,美国在世界事务中起的作用是复杂的,很难单用霸权和单极世界来说明。在美国的所谓领导作用中,首先包括了美国的霸权和强权政治的倾向,美国把西方国家拉在一起,把自己

的意志强加于发展中国家，是造成当今世界许多问题的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外交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单极世界倡导建立多极世界，的确带有明确的反美色彩；但另一方面，“领导”的含义也是多重的，不单是对别的国家发号施令，强加意志于别国，也有带头就某些国际大事与他国进行协商的含义，具有主导、牵头的含义，实际上任何一种国际秩序的建立、维护和更新，都需要某些大国出来起引导作用，任何体系都是不可能自发建立的，即使中国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大国出来牵头，不会是自然建立的过程。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实际上就是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并拥有一定特权的国家。联合国机制本来就是建立在大小国平等与大国特权基础上的。所以，美国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既有强权政治的表现，也有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必然要体现作用的含义。同时，也不能把美国认定为破坏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主要因素，认定美国就是要推崇战争政策，把美国等同于当年的德国法西斯，而应客观地看到美国对世界的安全，对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也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美国动不动就把某些国家列为恐怖国家，肆意践踏国际法准则，对一些主权国家进行制裁、封锁，这是赤裸裸的霸权政治，但美国也在维护和平、制止地区冲突方面起了一些作用；美国冷战后继续进行新武器的研制和开发，尤其是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武器的研制上的所作所为破坏了已经达成的协议，是引发军备竞赛的刺激因素，但美国也在反对国际恐怖行为、国际犯罪行为 and 贩毒行为，反对和制止核、生、化武器的扩散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总之，中国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炮



艇政策，但也要承认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否则中国谈与美国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就完全是没有基础的，要与美国对话和进行合作也是不可能的。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中国要从中美关系对中国所具有的三个战略性意义来认识：一是中美关系是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能否维持这样一个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一定责任的大国，必然会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维护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不光是对维护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不管世界各个地区局势多么动荡，只要维护住大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就有基本保障；二是中美关系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直接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中国所需要的外部市场、资金、技术、管理人才、信息来源、管理经验，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三是中美关系直接涉及中国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这些利益对中国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如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都把建立、维护、发展中美的正常关系放在中国外交的第一位。

中国只有坚持“对话，不搞对抗”才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多极化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放在争取美国转变立场上来，多极化进程与美国的关系是一个矛盾的关系：多极化进程首先是一个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所谓美国领导世界的进程；但另一方面，仅反美也难以建立多极化，因为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影响力是很大的，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要做什么事不一定都做得成，但要反对什么事情那这事就很难办成。所以，多极化要实现，关键还

是要通过对话让美国参加到多极化中来，因为对话机制下的多极化符合所有大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减少因美国试图独霸世界而多管闲事使美国承担的许多不必要的重担。美国政府和领导人虽然一再宣称美国要承担在世界的领导责任，但在实际的国际事务中也没有排除与欧洲、俄罗斯和中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美国国内有不少人宣扬和鼓吹建立单极世界，但这并没有成为美国国内的共识。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美国国内在如何对待多极化格局上至少有三种态度和立场：一种是前面所说的，维护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领导国的地位，使美国成为一个全球警察。但大多数美国人一般不把美国新近取得全球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看做一件特别可喜的事；第二种立场认为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国际参与；还有第三种立场，这就是：现在是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了，美国甚至应为此交出部分主权。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在权力分配方面，我们将从一个单极世界走向多极世界，在未来的几年中，美国将不再是惟一的超级大国”。还有些美国人宣扬建立美国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多极化体系。总之，美国转变立场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在这一方面如果进行更多的工作，有可能使美国逐渐放弃独霸世界的单极化倾向。同时，多与美国战略界人士接触，多进行交换意见的工作，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实际表明，美国人对多极化也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过去中国的多极化战略重与俄的合作，注重于发展中国家的壮大成长，这些是不够的，现在应当把重点放到争取欧洲与转化美国的工作上。争取欧洲能加快多极化的发展，同时也能促进美国的转化，因此争取欧洲是推动多极化的关键。

在全球化时代,讨价还价成为国际政治的流行色。中国、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在核不扩散,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国际走私贩毒,在保护世界生态,维护世界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又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可以对话和进行合作,可以参与到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世界进程中去。中国应参加到所有的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去,融入其中,参与其中,参加各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进程,在体系内部维护中国的利益,维护国际和平,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主流国家,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三、讨价还价与博弈论

当前国际政治的讨价还价现象,从理论上说,实际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博弈论所讨论的重要内容是:在允许共同得益或者共同损失的“博弈”中,通过讨价还价的途径寻求合作以实现共同得益(或避免共同损失)是否“理性”?或者,采取侵略性的行动以寻求私人利益而不顾共同得益或共同损失,这是否是“理性”的?

在博弈论中,“博弈”始终是针对人类社会严肃的互动行为的一个隐喻。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是使用严谨的数学模型研究冲突对抗条件下最优决策问题的理论,主要是运用数学方法,研究在某一特定条件下如何针对别人的选择做出自己的决策。就好像下棋一样,双方你走一步,我走一步,每个人都要根据对方的选择来决定自己下一步的策略。博弈论就是要把所有这些可能出现的对策一组一组排列出来并进行分析,为决策和制度构建提供参考。当然这些博弈论分析是有前提条件的,如:博弈的目的是为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博弈双方都具有充分的理性,并具有充分的选择的自由;博弈的规则是平等的,因而可以保证合理的预期能够实现,等等。

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博弈论是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博弈论根据其所采用的假设不同而分为合作博弈理论和非合作博弈理论。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团体理性；而后者主要研究人们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如何选择策略使得自己的收益最大，即策略选择问题，强调的是个人理性。目前经济学家谈到博弈论主要指的是非合作博弈，也就是各方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如何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最后达到力量均衡。

1950年和1951年纳什的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论的重要论文，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竞争和市场的看法。他证明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解，并证明了均衡解的存在性，即著名的纳什均衡。从而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纳什的研究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纳什均衡的提出和不断完善不仅为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军事科学等领域，也同样为博弈论广泛应用于政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前国际政治中讨价还价的原则不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博弈论的道理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一方面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日益加剧；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协调机制加速发展，国际组织空前活跃，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加深，连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整体，所有国家、地区和国家集团的所有经济集团和经济环节都成为这个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不遵守博弈论所提出的“游戏规则”，离开合作和讨价还价的对话，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

不可否认，目前政治的本质仍然是一种利益的冲突，而

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要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但在全球化时代,在国际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不再仅仅是传统国际政治理论所关注的不同民族、国家和政府等,更有众多的非国家主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环保组织、女权组织、恐怖组织等超国家和跨国界的集团与势力,在国际政治中各种利益集团和势力相互制约,离开合作和妥协,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共同问题,如环保、恐怖主义、难民、毒品、核扩散等,就不可能解决。

在冷战之前和冷战时期,国家或国家集团追求自身利益或国家安全往往坚持“损人利己”的理念而诉诸无休止的战争,其结果却是与自己所追求的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南辕北辙,给他国和世界带来灾难,也使自己陷入困境之中。正是这种教训,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以新自由主义而著名的新的国际政治理论学派对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以国家为中心的认识模式提出质疑。该学派超越民族国家中心论,注重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国际合作,注重国际环境和相互依存。该学派关注的是与经济和政治因素有关的权力,追求在合作、互动中发展富裕,促进自由价值环境。在此基础上,冷战后出现的建构主义学派进一步提出关于国际体系的建构理论,以国际生活集体主义本体论对传统的个体主义本体论提出尖锐质疑。并通过阐释“施动者——结构”的互动关系,得出了国际生活具有“社会”和“建构”的性质,因而,国家发展了一种团体或集体意识,并在国际社会的公共领域里得以发展和得到表现。建构主义更强调“对话”和“共识”,认为国家行为应由思想信念、集体规范和社会认同所决定。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学派对国际政治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与博弈论有极为相似之处。

近年来，博弈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国际合作机制模式”的提出和研究不断升温就是证明。该理论分析和研究的是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合作问题，特别是国际合作的组织形式、规则和规范以及国际合作的结构功能问题。这一理论模式的主张者大都认为，国际关系中并不只有冲突，还存在着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所及的每一个问题领域都存在着某种合作机制，只要存在着行为的规范性，就必然存在着适用于这种合作机制的某些原则、准则或规则，同时，作为以国家间多边协议方式体现的合作机制又是可以用来解释国家行为和国家间合作的因果性或构成性的变量要素。

自觉运用博弈论中积极促进多种利益关系达到某种相对平衡和统一的方法，有利于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博弈论告诉我们，参与竞争的一方不遵守妥协的原则、不顾他方的利益，是不可能谋得自身最大利益的，它所启示的深刻哲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不失不得，大失大得”，“损人利己”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既害人又害己”。正如“纳什均衡”所提出的：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但它必须符合以下黄金律：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必须怎样待人。这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作者：李平民，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政治系副主任，副教授，博士）

24.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给了我们哪些启示？

目前,我国由于经济模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等诸多因素影响,有大量下岗职工和社会富余人员需要安顿;住房、医疗和教育的迅速市场化,使民众的负担加重而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因特殊的人口结构和独生子女政策,人口老龄化问题将迅速到来;市场化导致的利益重新分配和贫富不均,使很多人的心态失衡,弱势群体增大;因劳动力加速流动而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却不够,将直接影响到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稳定,等等。这些难题需要党、国家和社会去面对,如果解决不好,将直接撼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这些问题也是当代大学生身临其境,非常关心的问题。

那么,解决好上述问题的切入点和关键在哪里呢?答案是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应根据国情,借鉴一切有效经验,改革相对滞后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并完善有自己特色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规定,为公民提供一系列基本生活保障,使公民在年老、疾病、失业、灾害及丧失劳动力等情况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制度。社会保障一般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及医疗卫生事业等方面。在文明世界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被称为一个国家社会安全的“稳压器”,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同时也是衡量文明水准的重要标志。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或多或少都搞自己的一套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有上百年的实践经验。在这里,特别关注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经验与教训。研究其得失,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有一些重要启示作用。

一、为什么要特别研究借鉴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首先,美国现在的社会保障支出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8%,相对于英国的24.5%和瑞典的49%(他们是高保障、高福利国家的代表),美国的费用支出较低,而且灵活多样,具有诸多优点。我国因生产力水平所限,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建立一个与高保障、高福利国家比肩的社会保障体系,只能从国情出发,目标是建立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在我国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比之其他发达国家,对我们更有参考价值。

一般认为,有效和成功的社会保障模式,应该达成以下几方面的目标:

- (1) 社会安全网的建立;
- (2) 社会进行储蓄与积累的重要手段;
- (3) 维持对工作的积极的激励机制;
- (4) 建立一个相对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体制;

- (5) 确定恰当的收入分配目标;
- (6) 能够解决失业救济及劳动力流动问题。

如果从以上几个角度看,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甚至某些方面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我国正进入市场经济的关键阶段,而相对滞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经济体制的羁绊。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保障对象主要是全民和集体的企事业单位职工、国家机关干部和军人。社会保障和福利在其保障对象的就业环节上一次完成,如工资由国家统一规定,公费医疗等等。人人都是“单位人”,形成了单位、企业办社会的局面,一个单位或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样样管,加重了单位、企业的负担,对企事业的发展十分不利。而企事业一般又以国有为主,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是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并且也有欠公平,限于生产力水平,往往农村中广大人口都没有享有社会保障,只有五保户、优抚人员等极少数人可享受一些低标准且不固定的社会保障。市场经济迫使“单位人”演变为“社会人”,要解决国家负担问题,关键是让企事业职工在福利待遇上同企事业剥离,通过参加各类社会保险来保证自己的切身利益。只有做到国家、企事业、个人共同负担社会福利开支,才能真正减轻国家、企事业的负担,又使个人利益不受损失。上述因素均要求我们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任务迫在眉睫。

相比之下,美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已有70年的历史,它在实践中日益完善,既具有经验的积淀,又富有理论的创新。如1935年颁布实施的《社会保障法》就是根据实际不断地修正,到现在,已进行了22次修正。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保障种类逐渐增多,给付水平逐渐提高,社会保障制度

也从不完善逐渐趋于完善。又如美国施行的投资互助式养老保险制度,虽然资金管理难度较大,但保险金来源比较丰富,层次较多,利于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还有社会覆盖面宽等优点,是比较科学的。

如今,美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较宽,几乎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它的社会保障也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变的,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一) 社会保障的起步时期。美国早期的社会保障主要由私人 and 慈善机构兴办,政府发挥较小的作用。其主要目的是维持被救助者的生存,为社会提供从事简单再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到19世纪30~40年代,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厂制度逐渐代替了以手工生产为主的工场制度。工业革命的完成,对社会劳动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人来从事复杂工作。于是,美国的社会保障又发展了一步。对被救助者的健康水平、道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都加以考虑。各州纷纷立法,建立贫民收容院。法律规定,收容院要负责贫民尤其是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和道德教育,并给予一定的文化教育,以使他们成为社会有用的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美国人口迅速向城市聚集,到1920年城市人口已超过了总人口的50%。由于经济波动剧烈,城市失业人口大增,直接威胁到社会的安定。因此,一些新兴资产者和学者呼吁国家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逐渐使社会保障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1915年,阿拉斯加准州首次提出了《老年雇员退休金法》,到1933年已有28个州通过了类似法案。1932年威斯康星州首次提出了《失业保险金法》。这些立法为后来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二)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时期。1929~1933年,美国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数千万美国人生活无着落。到1935年美国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占总人口的32%,社会动荡日趋严重。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掀起为社会保障和福利立法的一次高潮。美国公众开始要求建立规范的、有法律保证的、职责分明的社会福利制度。面对严峻局面,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实施“新政”,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强调社会保障最大化,并由联邦政府承担起更大的责任。1935年8月14日,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社会保障法》。该法主要规定了老年人保障、失业保障、未成年人保障和残疾人保障等。从形式上看,分为国家、地方和民办几种形式;从对象上看,保障又分为自助性和公助性两种。自助性保障就是受益人应参加相应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让其承担一定的义务而扩大资金量;公助性保障主要针对未成年人和伤残人,资金由政府无偿援助。《社会保障法》的颁布实施是一个里程碑,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而且也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调控和干预。如规定企业主的工资税和企业裁员直接挂钩,裁员多纳税就多。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颁布实施,在美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标志着美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三) 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继续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不断修改《社会保障法》,增加保障受益人,1960年得到这一法律保障的已达5800万人,到1980年约有2/3的劳动者受到保护,目前已达社会总劳动人口的90%以上。1965年7月30日,美国国会经过长期辩论终于通过了《医疗保险法》。其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医疗保险,要求居民先交纳一定的保险费用,然后才能享受相应的医疗服务;二是医疗援助,由政府出资主要援助

那些无助者。该法的颁布,使美国居民的医疗卫生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其社会意义也是显著的,但也使政府的财政压力日益严重。同时,联邦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入,在大学是以奖学金和贷款的形式支持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196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初等和中等教育总纲》,着重帮助贫困地区的学校发展教育,规定国家拨款视学校吸收来自贫困线以下家庭的学龄儿童多少而定。由于政府的重视,战后美国教育发展的速度相当惊人。1900年美国17岁的青年中,高中毕业生仅占6%,23岁的青年中,大学毕业生还不足1%,到1970年,这两项的比例已分别上升为76%和22%。教育的发展不仅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也扩大了受教育者的就业门路和机会。1964年,主要针对低收入家庭颁布了《食品券法》。该法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向政府购买折扣食品券,差额部分由国家补贴。这维持了美国民众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除上述主要的社会保障措施外,美国还颁布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全国劳工关系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等一系列法律,实际上建立了全社会的安全保障体系。纵观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美国联邦政府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不可否认在客观上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有重要影响。其鲜明的特点在于:(1)将社会保障作为扩大有效需求的手段;(2)管理体制灵活有效。社会保障项目由政府和社会各组织团体分别管理;(3)资金来源多元化。采取个人账户、财务自理的原则;(4)根据地区和个人经济发展和需求的不平衡性,实行差别化的社会保障等。这些特点都是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美国特色福利思想的渊源

资本主义世界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其保持了相

当长时期的稳定和繁荣,但进入20世纪70、80年代,其积极作用逐渐走向了反面,先后出现了“英国病”、“法国病”、“瑞典病”等,国家花巨大代价养了一批靠在社会福利大树上的懒汉,政府不堪重负,经济停滞,老百姓不满,政治显现危机。各国纷纷掀起改革潮。而在其中美国的改革力度最大,老百姓接受的程度最高,成效似乎也最显著。其原因何在?

这得从美国人形成社会价值观的殖民地时期说起。英国人从1607年起,沿北美东海岸陆续建立了13个殖民地。到1770年时,白人人口从210人增加到220万人,也就是说,在一个半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内,人口增加了一万倍。其原因是,这片“新世界”各种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潜力都很巨大,有能力供养更多的人。

首先,“新世界”有用之不竭的肥沃土地,适宜种植多种作物和饲养家畜。移民们只要努力耕作就能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身处“旧世界”的欧洲人一般把土地同权力、地位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也传播到新大陆,由于一般平民获得土地比较容易,使他们在这里第一次有机会以占有土地而成为社会的重要成员。^①养成了天然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其次,北美东部的大部分地区被密林覆盖,商业性的伐木业得以发展。东海岸还有铁矿,由于木材和木炭充足,铁矿得以冶炼成生铁制造工具和机械。东部海岸有良好的港口,为运输提供了廉价和方便的条件。

资源的富足使他们能够举办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如学校、教堂等。就连“契约奴”,这些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以换取去新大陆路费的人,在为代他支付船钱的人服务4~7年后

^① 1 Robert Kelley,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Past, the 5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Inc., New Jersey, 1990, Pp6.

也能得到自己的一份土地，从而变成一个独立的土地所有者。那些并不富裕的移民和同时代的欧洲贫民相比，其生活要好得多。因此，在欧洲广泛存在的贫困现象在“新大陆”并不存在。

然而，这一切的获得也并非易如反掌。初到新大陆的人大多过着相当艰苦的开拓生活。生活非常孤独，这反而导致了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紧密团体感的发展，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是社会联系的主要纽带。当时，最流行的济贫方法，是在每年固定的一段时间内，把穷人接到自己家庭中共同生活。每个家庭往往都会在支出上留出一定的数目作为救济穷人的费用。^①大量的人都是小业主。雇主和雇工一起工作，他们的利益有相当大的一致性。殖民地工人的实际工资比英国同类工人高30%~100%。富兰克林在1743年乐观地写道：很多居民已经处在“自由自在的享乐之中并有余暇从事艺术创作和丰富知识宝库”。^②

因此，殖民地的民众渐渐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态度和价值观。大多数移民相信财产权利和个人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反对封建的社会和欧洲盛行的严格等级制度。美国也有等级制度，但一般说来，人们的社会地位比在欧洲有较大的可变性。对一个人的评价和酬劳，不是根据他的出身或家族关系，而是完全靠自己，根据他所完成的工作或成就。大多数人相信，自己通过努力工作，勤俭节约就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这种态度又激发起一种乐观主义精神。这

① George T. Martin, Jr., *Social Policy in the Welfare Stat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0, Pp41.

② 吉尔伯特·C·菲特、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第54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种信念和传统一直延续着。^①

说到底,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化的产物。美国革命爆发以后,随着新疆土的开拓,快速的工业化和大量靠挣工资谋生的劳动力的增长,殖民地时期相对稳定和有序的社会改变了。伴随而来的是不断上升的贫困人数。年复一年,为了脱贫的开支连续占据着各乡镇和城市预算的首位。^②

各州都通行的殖民地时代的《济贫法》开始遭到持自由放任思想的经济学家们的抨击。他们认为贫穷是工薪阶层的自然特性,贫穷和拥有财富,都是一种自然的权利,国家不应该干预。《济贫法》向富人大肆征税,并用来救济穷人的生活,从道义上说是错误的,因为它冒犯了个人的权利。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旧体制在经济上也是不协调的,因为《济贫法》中有不可改变居住地的条例,而自由市场要求劳动力有迁徙的自由。《人口论》的作者马尔萨斯认为,《济贫法》在社会学上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导致人口泛滥、低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它所导致的社会负担比它能够减轻的社会负担要多得多。强调重商主义原则的《济贫法》,必然会让位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

美国人认为,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并且工作机会如此之多,没有人应该是贫穷的,更不用说是四肢健全的人。而导致贫困的惟一原因是个人的软弱。总体上来说,大多数人开始对贫困者持鄙视的态度。在19世纪初纽约人权委员会《不道德的和不幸的根源》报告中指出:“通过一个公正的不可更改的天意法典,不幸应该被认为是不道德的附属物和对

① Robert Kelley,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Past, the 5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Inc., New Jersey, 1990, Pp69.

② Martin Rein, Social Policy: Issues of Choice and Chan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Pp83.

它的惩罚。贫困,明显是由于懒惰、浮夸、不道德以及其他一些德性因素而引起的。”^① 贫困被看做是个人的问题了。

产生这种社会看法的另一个因素也不可忽视,就是大量涌入的新移民。在1800~1860年间,大约有600万人进入美国,其中大多数人是贫困的德国和爱尔兰天主教徒。起初,外来的移民同当地的中产阶级文化格格不入,被当地的大多数人所歧视。人们认为要救济这些“没有教养的,不信任基督教的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②

因为以上原因,有很多美国人成了废除济贫制度的支持者。他们认为,那些想工作但却陷入贫困的人将会得到私人慈善机构的救济。私人志愿机构会更好地行使道德上和世俗上的影响力,最终,会使穷人变为“努力工作的人”。

关于济贫机构的效用一直存在争论。学者们认为,当时政府建立起来的大批济贫院是失败的。在那里,没有使被收容者改过自新,也没有治愈他们的病人,而维持这些济贫院的费用却很大。建造济贫院的目的是治疗人,但很快就会降级为“保管”人。

19世纪中期起,美国社会福利中的联邦基金部分被取消,一直到很多年后才有进展。与此同时,社会和私人慈善机构的数目却在增加。他们的目的“在于通过改变需要救济的人们的性格来鼓舞他们的斗志而不是向他们提供直接的物质帮助。”其途径是向穷人们不断劝导宗教信仰、道德、清醒和勤奋等德性。于是,许多美国中产阶级就忙于投身到对

① Martin Rein, *Social Policy: Issues of Choice and Chan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Pp14.

② Walter I. Trattner, *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A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n*, 4th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52.

穷人们进行精神教化的“正义运动”中。^① 这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第二次宗教觉醒运动”。这次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有美国特色的社会福利思想的确立。

实事求是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学说,在南北战争以前对美国的影响并不大。然而他的继承者所提出的放任主义在内战后却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强大影响,“管事越少越是好政府”,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没有立即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变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却有一定的市场。其鼓吹者英国人斯宾塞的学说对美国思想界的影响巨大。斯宾塞把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观点应用于社会学理论。他认为社会内部各个成员之间也是“适者生存”。他极力反对国家兴办学校、管理卫生保健事业和管制住房等。^②斯宾塞的学说很容易地被企业家接受了。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既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又有用科学名词表述的哲学作论据,因而一直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

三、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确立,向“伟大社会”的理想迈进

1929年,“大萧条”突如其来,挥之不去,打击沉重。失业的日益严重,甚至连最坚决主张自由放任的人也觉得需要对失业者进行某种救济。“从通用电气公司的大老板到比尔德这样的大学者都赞成‘计划’了”^③大危机震撼了资本主义

① Joel F. Handler, *The Poverty of Welfare Refor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2.

② Thomas A. Bailey, David M. Kennedy, *The American Spirit*, Vol.2, 3rd edition, D.C. Heath and Company, 1998, Pp84.

③ Paul Johnson. *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Eighties*. Harper and Row Publishing House, 1985, Pp247-249.

世界,宣告了自由放任学说的破产。全局性失控需要全局性调控来补救,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总统时,美国全国约有1500万人失业,约有1/6家庭领受社会救济金。这样庞大的救济开支使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源枯竭。美国人急需联邦政府采取行动。

罗斯福“新政”意味着政府开始大规模介入社会事务,期望“人人都可以受惠”。^①1933年5月,国会设立联邦紧急救济署。1933年11月,成立民用工程管理局,直接救济和以工代赈大规模展开。到1934年1月,仅民用工程管理局就雇用了430万名工人。1935年5月,罗斯福成立发展工程管理局。该局主办了各种各样的工程项目,如:修建公路、桥梁、机场、公园、校舍、公共厕所等等。在1933~1939年,各个救济机构总共支出了180亿美元。

在各项“新政”改革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立法。一般认为,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推行,标志着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最终确立。在大萧条之前,大多数美国人相信:通过个人平日省吃俭用的储蓄,就能够在年老或失业期间养活自己。现在人们彻底改变了这种想法。根据法律,联邦政府成立了社会保障署,并规定社会保障包括下列四大方面:(1)养老金;(2)失业保险;(3)老年保险;(4)对盲人、需赡养的儿童和其他遭遇不幸者的救济。以后对《社会保障法》又作了多次修订,救济的条件放得更宽了,救济金额也不断增加。

美国政府在实行“新政”时,为个人和国家的福利承担

^① Thomas A. Bailey, David M. Kennedy, The American Spirit, Vol.2, 3rd edition, D.C. Heath and Company, 1998, Pp305.

了一定的责任,美国民众受到了鼓舞,恢复了对本国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的信心。美国尽管遭到了大萧条的巨大冲击,但仍然经受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考验。1935年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障法》一直沿用至今,成为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石。

罗斯福“新政”的许多措施本来是权宜之计,后来逐渐演化为长期国策。由此,美国逐渐形成新的政治传统,这就是罗斯福“新政”的传统,即通过政府干预来改善社会机制,推动经济增长,通过扩大社会福利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从罗斯福“新政”到里根当选总统之前的半个世纪,美国历届民主党政府,从杜鲁门、肯尼迪到约翰逊基本上都仿效罗斯福的政策,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的共和党政府曾试图作些修正,但谁也无法改变这一势头。

“新政”改革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措施,而反对这种改革、坚持自由放任主义则被称为保守主义的主张。这场自由主义改革的成绩是显著的,从战后到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空前繁荣与富裕的年代,经济学家称这一时期的美国是“丰裕社会”。^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的地位也被确定下来。

从实际来看,战后最重大的立法就是1946年颁布的《就业法》。“该法令表达了政府在维持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方面的责任。这实际上是把凯恩斯的政策变成了法律。”^②运用凯恩斯思想,刺激有效需求的政策到约翰逊时期达到了顶峰。他一面将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用大规模军费开支刺激美国经济。一面在国内推行“伟大社会”的各种福利

① Irving L.Horowitz. Ideology and Utopia in the United States:1956~197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Pp141.

② 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第96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事业,如对老年人的医疗照顾,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援助,地区发展、食物券和幼儿营养计划,城市复兴计划,住宅补贴,职业训练等等。

约翰逊总统试图实施全方位、高水准的全民保障计划。但大炮与黄油并举的结果使国民收入的分配超过了美国的国力。这是70年代“滞胀”并发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运用和演变的历史,反映了美国政府推行赤字财政政策走向滞胀的历史。^①

这种寅吃卯粮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美国,成了负债最多的国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已不再适应当时的形势。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亟待改革,也期待着新的指导理论。

四、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70年代开始,“滞胀”现象成为困扰美国经济和政治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当时任职的历任总统都必须面对这个头痛的难题。在经济措施方面,他们忽而紧缩银根,提高利率,以反通货膨胀;忽而又大胆采取扩大信贷,扩大赤字的政策,以对付生产停滞。政府的政策措施大起大落,反复折腾,有时甚至在同一时期实行作用相反的措施,以致矛盾百出。形成一种东边扶来西又倒的局面。学者们惊呼“政府调控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可怕”。^②流行口号从“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变成“市场万岁!打倒国家”!^③

① 黄绍湘《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应用与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1-9页,1995年第3期。

② K.Button and D.Swann ed..The Age of Regulatory Reform.Cllarendon Press,1989,Pp33.

③ R.Boyer. The Regulation School: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p24.

里根一上台,就于1981年2月5日发表电视讲话,阐明他的施政纲领。他声称:“我们受到了一次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灾难,按老办法办事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①他说,“更加公平分配财富、收入和权力,这些词句对我来说,只意味着征收国家中有工作、进行生产的人的所得,重新分配给没有工作和不生产的人”,因此,“过去半个世纪中,人们得到的只是‘新政’,‘伟大社会’以及产生了一个拿走45%的国民财富的政府”。^②“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因此,“是让政府回到它原来意义上的时候了,是减轻我们惩罚性的税务负担的时候了”。^③里根的一系列改革举措,被美国学者们称为“里根经济学”。

其最大的举措之一就是对福利大砍大削。在被削减的83个政府项目中,从失业补助金到食品券,从学生贷学金到对铁路和邮政的补贴,涉及范围很广。惟一的例外是国防开支。它标志着里根政府同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以来历届政府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根本决裂了。

到1982年12月,美国经济开始回升。国民生产总值1983年增长3.4%,1984年增长达6.9%,1984年下半年起虽然增长势头减弱,但一直到里根任期结束,美国经济都在持续低速增长。由此可见,美国经济的确一时摆脱了“滞胀”现象。

里根政府的福利改革的具体做法包括:

第一,用购物券代替现金补贴。以前的购物券只限于购

① 卢·坎农《从演员到总统:罗纳德·里根》,第403~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 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第185、193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③ 同上,第234页。另见傅殷才主编《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Mary McNeil. Reagan's First Year.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82, Pp109~121.

买食品,里根总统建议把购物券的使用扩大到住、医、就业等基本生活需要方面。此项改革的目的是使受益人把救助款用于奢侈性消费。

第二,把参加义务劳动作为有劳动能力的社会保障享受者的基本资格和条件,以迫使他们减少对社会保障的依赖,鼓励他们选择劳动和就业的方式来摆脱贫困。

第三,从1986年起,冻结和延缓一年因通货膨胀而增加的社会福利生活费用支出。仅此一项,每年就可削减财政开支约70亿美元。

1996年8月22日,作为民主党人的克林顿总统签署了《社会保障改革法案》,从而继续自1935年《社会保障法》颁布以来规模最大的福利改革运动。

其基本精神和要求仍然是里根时代福利改革思路的继续,即把参加工作、积极寻求工作机会作为享受福利援助的重要资格和条件,以刺激福利受益者逐步摆脱对福利的依赖。如该法案规定穷人在一生中最多只能享受5年的福利资助,并限制在两年之内找到工作;18~50岁身体健康的食品券受益者被要求积极寻找工作,每星期至少工作20小时,或参加职业训练计划。食品券开支在6年中将被削减240亿美元等。

这正符合了美国广大中产阶级的利益和传统价值观,被社会普遍接受。他们认为贫困者和移民依赖国家福利保障,花了过多纳税人的钱,过多地侵蚀了他们的利益,已经影响到他们向更高生活水平迈进,它败坏了美国社会固有的竞争精神,会是美国实力地位下降的根源所在。这一切必须改变。

1993年2月17日晚,克林顿向国会递交了一份长达145页的经济发展计划,其“综合保障经济”政策部分认为,社会

保障应让个人、家庭、社区、市场共同发挥作用,强调福利制度的非国家因素。提出了一些直接用来转移国家保障开支的手段,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智力投资、个人对未来保障开支进行投资、加强家庭及社区自愿者的作用、发挥私人机构的作用等等。

克林顿整个经济政策的推行收到了一定效果。美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从复苏发展到较高速度的增长。他执政的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新经济”时代。

在美国,社会福利问题历来是热烈争论的话题,概括起来,有保守主义、革新主义和自由主义三种具代表性的社会福利观念。

(1)保守主义观念。它是美国的典型风格,主要强调个人义务和私营机构对社会福利所起的作用。奉行的原则是放任主义,认为那些依靠自我力量和有能力强的人将获得物质财富上的回报。推崇的具体福利政策有三:一是减少税收和开支;二是私营化,主张把公共事务转由非政府机构管理,减少政府干预;三是分散化,如果政府必须介入,也应尽可能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联邦政府少管。

(2)革新主义观念。它强调社会责任和政府机构对社会福利的重要作用。其主要哲学基础是考虑平等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认为公民有权享受公平的社会分配,它不仅仅是机会的均等,也包含生活条件的平等。自由市场本身无法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如医疗保健、教育、住房等,因此政府必须出面平衡市场。市场和私营福利机构起着一定作用,但必须由社会和政府加以约束。

(3)福利自由主义观念。它是保守主义和革新主义观念折衷妥协的产物。是现今美国福利政策的主导思想。它认为,人总会有不平等存在,所以政府采取公共措施是克服机

会不平等和达到富裕生活标准的合适途径。政府的作用是缓解压力,通过解决问题手段的有效运作,来提供机会和调节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它反映了为不同阶层和社会提供多层次服务的思想。

总之,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剖析研究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完善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规范势在必行。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在立法基础上,具有保障的制度化和社会化特征,而我国的社会保障仍带有随机性和不连贯性。我们要充分利用法律这一重要手段,整合目前普遍实行的分散式社会福利,逐渐将它同全面的社会保障协调起来。使社会保障逐步由短效的行政手段为主向长效的法律手段为主转变。

(二)社会保障改革要量力而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每年可分配的国民收入还很有限。只有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的经济承受能力,共同负担社会福利开支,才能使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循序渐进,与经济的发展层次相适应。美国的经验表明,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过分增长,势必会影响国家积累基金的增长,导致经济增长缓慢或通货膨胀。因此,适度的社会保障对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最有利。

(三)社会保障要多样化。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积极鼓励个人、慈善团体、社区兴办社会福利事业,逐步形成全社会办福利的氛围。社会保障的改革还应做到多层次,有重点。所谓“多层次”,是指通过国家立法建立起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制度,再以地方和行业的更为具体的保障做为补充,还应发展保险业来为更高需求者提供服务。所谓“有重点”,是指根据国情确定当前优先发展的保障内容。目

前社会保障的重点是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障。

(四)应加大教育投入力度。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的就业机会往往同受教育的程度成正比。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提高国民的素质非常关键。鉴于此,我国各级政府应加大教育的投入,尤其要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儿童进行教育资助,为他们今后的发展提供机会,为他们摆脱贫困创造条件。另外,要对成年人实行终身教育,让他们不断补充和更新知识,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五)对特殊困难要特殊解决。鉴于社会保障的全面性,要设立一些大病重病基金,重大自然灾害基金,贫困基金等,让那些遇到暂时特殊困难的人能有一个固定的、正常的渠道来排忧解难。在任何社会,都还有一些无助者自己无法解决遇到的种种困难,如孤寡老人、孤儿等,他们需要全社会伸出援助之手。一方面,国家应兴办各类福利设施;另一方面,每个公民也应献出自己的爱心,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实质是一种现代的社会互助,刚性较强,上易下难。做过头了政府会被“套牢”,做得不够“稳压器”不稳。美国的做法比较灵活多样。虽然我国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现行的社会保障水平还不高,传统价值观也不尽相同,但比较研究美国的经验教训,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牛文光,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博士)

25.

美伊战争向传统的战争 样式究竟提出了哪些挑战？

美伊战争是发生在人类新世纪的第一场具有相当规模的战争，也是一场全新的战争。战争的全过程不断通过现代传媒展示在亿万人的眼帘中。在大学校园里，战争有一种激发青年大学生尚武精神的暗示，但也给大学生的脑海中留下了一连串的疑惑和思考：美伊战争爆发为什么联合国对此束手无策？美伊战争伦理为什么使得现代一些军事伦理著作成为“古董”？美伊战争为什么使得一些外国军事将领对这场战争的样式的解读瞠目结舌？甚至电视机里对战争现场解读的某些军事专家总是对后面战争预测的连连失误感到窘迫和尴尬。看来，人类已经到了该告别传统战争样式的时候了。究竟怎样看待美伊战争模式对传统战争理论的挑战，这是大学生们颇感兴趣的话题。

一、美伊战争模式带来了传统战争伦理的挑战

美国总统布什宣称这次战争“是一次新的十字军东



征”，其中的一个隐意就是：这是一场区别于传统战争样式的新样式战争。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说：布什的行为是“牛仔作风”。“牛仔作风”就是，一只手执快马缰绳，另一只手握着冒烟的手枪，横冲直撞，“谁挡我的路，我就打死谁！”从战争的爆发到战争过程再到战争结束，结合美国总统布什的风格，我们姑且不把这场战争称为“牛仔战争”。但是，从美伊战争所表现的种种特点来看，的确对传统战争伦理提出了不少挑战。

挑战之一：不求合法——叫板国际规则，看你怎么样！

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最基本的内容。正是依靠这些规则，国与国之间才保持和谐稳定的关系。《国际战争法》也规定：战争行为要遵循合法性原则，除“自卫”、“民族独立”和“联合国采取的维和行动”外，其他战争行为都视为非法。

布什政府发动的这场“美伊战争”的第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利益优先，不求合法。它的要点有三个：

第一，利益第一。伊拉克对美国来说有重大的战略利益，推翻萨达姆，建立亲美政权，在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树立民主国家样板是美国的既定战略目标。首先，伊拉克拥有大量的资源。石油资源（储量占世界的第二位）、天然气、北部的水资源以及万顷良田，都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觊觎已久，控制伊拉克资源对美国至关重要；其次，战略角度考虑。近年来，美国出于自身全球战略利益考虑，一步一步实现其战略的合理部署。立足西欧，掌握东欧，控制中东，渗透中亚，挤压俄罗斯和遏制中国。所以，它进行一系列“倒”字号的战争，从1999年“倒米（洛舍维奇）”，到2001年的“倒塔（利班）”，再到今天（2003年）的“倒萨（达姆）”，从西向东、从南

向北,美国从不停息;再次,安全问题。相关国家和地区在美国霸权的侵扰下没能力和美国抗衡,采取一些极端方式进行对抗。恐怖袭击是最主要的方式。遏制恐怖袭击于萌芽,杀一儆百,美国拿萨达姆政权开刀;最后,宗教冲突。伊斯兰世界和美国一直存有芥蒂。全球各地都有伊斯兰世界反对美国的声音,袭击美国公民的事件也常有发生。这些都是美国处心积虑的问题。所以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不是有无问题,而是时间的早晚问题。

第二,法为我用。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也是个法制国家。在国际事务上还是遵循一定的规则的。因此,美国对伊战争需要一定的借口。美国最初提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假设。尽管仅仅是个假设,但安理会还是通过了1441号决议,满足美国提出来的要求伊拉克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要求。但此决议并不包含动武的成分。此后,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对伊拉克进行了近4个月无限制、自由的检查。但结果一无所获。

为了使伊拉克战争达到合法化的目的,布什政府也采取政治压力和经济拉拢的两手,想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支持,但最终未能如愿。

第三,当国际法和利益有冲突时,利益优先,不求合法。未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布什决定绕开联合国发动战争。布什的说法是:“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履行它的职责。所以我们决定去履行我们自己的职责。”3月20日,英美飞机开始对伊拉克进行轰炸,拉开了战争的序幕。

美国“美伊战争”给新世纪国际关系开了恶劣的先例。关于战争合法性问题,国际社会也不是首次面对。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就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远的如1956年英法攻打苏伊士运河也没得到联合国批准,但都不

了了之,这些给美国提供了发动战争的实践依据,美国因而仿效。发动战争的无理由性、不求合法性,不由得使人们担心,一个国家的安全要靠什么维护?国际关系如何维持?大国在国际上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下次战争要落在哪个国家?虽然短期内“国国”自危的局面不可能出现,但是战争的随意性、国际安全的无保证性显然加剧了国际矛盾。

挑战之二:“自愿联盟”——我“单边主义”,我无所畏惧!

为避免因推行“单边主义”而变成“单枪匹马”,联盟战略就构成了美国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美伊战争中美国组织了一个新组织“自愿联盟”。“自愿联盟”的组建,一方面因为美国自恃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之匹敌,越来越不把联合国甚至北约放在眼里,一意孤行的趋势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也因为美国也想摆脱如此下去可能出现的“单枪匹马”式孤立局面。其实布什认为,美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单边主义,而是应该扫除推行这一主义的障碍。建立“自愿联盟”就不再显得孤单。

在具体做法上,美国抛开固定联盟,根据不同的目标和任务,开出不同的利益诱饵,组建“自愿联盟”。这次伊拉克战争中,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推出“老欧洲”和“新欧洲”之说,以万事有求于美国的“新欧洲”,作为新型“自愿联盟”的样板。西班牙、丹麦、波兰等国家派兵支援美英作战,而法国、德国、加拿大等美国盟友则持不赞成或反对意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愿联盟”的原则。

“自愿联盟”其实表面上是自愿的,但是实际上美国会根据各国的表现秋后算账——不小心站错队伍的国家会付出相应的代价,而支持美国的国家则会得到一定的好处。那些沉默的、骑墙的国家也会受到美国的敲打。一个明显的例

子就是,4月9日(萨达姆雕像被推到日)到5月19日的40天内,布什在白宫和得州农场会见了20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些国家都曾支持美国对伊战争。而反对战争的智利与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签约时间则因“技术性问题”而被推迟。加拿大、法国、德国、俄罗斯等都遭遇过类似情况。

它表明,美国不但可以绕开联合国,而且可以绕开法国、德国这些传统的北约盟友和俄罗斯这样的新生盟友,而只要能够组成一些惟美国马首是瞻的“自愿联盟”,照样可使其战略大行其道。

挑战之三:先发制人——预防无罪,进攻有理!

与历史上所有帝国一样,为“永葆帝国青春”,美国也需要进攻性军事战略。从克林顿时国防部长佩里倡导的“预防性战略”到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硬件系统化”变革,美军的战争机器日臻完善。美国新保守主义智囊团于2000年9月就为其制订了所谓“新美国世纪计划”。该计划的核心主旨是:美国要事先排除任何竞争对手,建立在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美国总统布什于2002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提出“先发制人”论,主张对恐怖分子及庇护和支持恐怖分子的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同年9月20日,布什政府在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先发制人”作为美军新的战略指导方针。布什政府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美将在敌人的威胁完全形成之前就采取行动”,使敌人遭受决定性失败。

3月20日战争爆发后,美国防务信息研究中心主任布鲁斯·布莱尔接受《华盛顿观察》专访时对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做了如下解释:“如果你细读‘小布什主义’,你会发现他所讲的‘先发制人’从概念上更接近于‘预防性战争’,

而不是真的‘先发制人’。”所以,为了“预防”萨达姆可能发动恐怖袭击,美国就“先发制人”开战了。伊拉克战场成为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第一场试验。

这一战略如果在国际上得以实施,将产生严重后果。它可以成为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第一个环节,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极大地提高了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和现实可能性,而且为战争行为打开了绿灯,不仅使发动战争的国家会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走下去,而且也将刺激其他对现存利益格局不满的地区军事力量,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实行军事扩张,将会使地区乃至国际军事形势更加复杂。

二、美伊战争模式对传统的战争样式提出挑战

挑战之一:斩敌首领——政治暗杀禁令,见鬼去吧!

“擒贼先擒王”。虽然在战争史上,捕杀敌方首领的例子并不少见,但自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暗杀是一种非法行为,不管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非战争期间。据1907年海牙国际惯例四的第23条,暗杀被认为是一种战争罪行,明文规定“禁止恶意杀害或伤害属于敌对国家或军队的某个人”。按照国际法,在战争以外暗杀一个国家的官员或代表,本身就构成恐怖主义行为。美国前总统福特在1976年签署的总统第12333号行政令上,也写明“禁止任何美国政府雇员或代表美国政府利益的人从事或密谋从事暗杀行动”。此后的卡特、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总统也签署了类似的行政令。国际社会已经认定,政治犯罪的审判权应交由国际审判机构,交战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权任意处置对方首领。

但这次美伊战争,“斩首行动”贯穿整个过程。斩首行动意味着美国直接捕杀伊拉克国家元首萨达姆及其他高官。为达目标,美军一方面运用全维侦察监视系统,从卫星、飞机、舰船到地面侦察设备和特务间谍,全面搜集光学、语音

和电子信息,追查萨达姆及其他高官的行踪;另一方面运用精确制导“点摧毁”武器,对敌领导人藏匿之地进行“点杀”。

可见,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借助“反恐”也在实施政治恐怖主义。虽然美国中情局在20世纪60~70年代在越南的“火凤凰行动”中曾派出特训暗杀队暗杀了数百名越南干部;另外也曾637次暗杀古巴领袖卡斯特罗,但那些活动起码是“暗杀”。但这次实施的恐怖主义变成赤裸裸的“政治明杀”,让国际社会大跌眼镜。

挑战之二:信息技术——我就是潮流!

与波斯湾战争“鲍威尔”式的战法相区别,这次战争被人称为“拉姆斯菲尔德”式战法。“鲍威尔”式战法遵循的作战样式是:在战争爆发后,美国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投入最大的、占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消灭敌人。形象的说法就是用“牛刀杀鸡”。它的主要特点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老布什当时曾说:如果需要两个人去完成一件事,那就派4个人去。而这次美伊战争,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没有采取“鲍威尔”式的作战样式。用拉姆斯菲尔德的话说,作战所遵循的作战思想就是:部队要“更灵活”(更敏捷)(more agile),“用较少的军事力量做更多的事情”(todomore with less);要“根据作战需要来决定所派遣军队的数量”。

其实它的本质在于:用信息战对决机械战——战争主角发生变化,美国在打的是一场“隔代战争”。

有人认为,近代军事发展史上共发生6次军事变革,第六次就是信息化新军事变革。^①也有人认为,^②人类战争形态共划分为六个形态:第一代步战,第二代车战,第三代骑战,

① 皮明勇《世界近代六次军事革命》,《党员特刊》第7期。

② wctv:伊拉克战争的新军事特点,新华网,2003年4月16日。

第四代大规模火器战(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五代机械化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而第六代就是以美伊战争为开端的智能化战争。名字不同,但实质一样,那就是信息化占主导地位。

信息技术在这次战争中主要影响美军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武器装备。到目前为止,美军在这场战争中使用了几乎所有最先进武器装备系统,包括:侦察、预警、导航、定位等强大的卫星天线系统;远射程、抗干扰的精确制导武器、大功率电磁干扰、网络干扰和无线电干扰侦察系统;隐形战斗轰炸机等隐形战略攻击武器等。美国在天、空、海、磁等领域的绝对控制和远程精确制导打击优势,充分表现了出来。

第二个方面是军队编制体制结构。美军主要通过对部队的组成部分进行改革和重新组合实现编制体制上的调整。伊拉克战争中已经表现出两点与这种调整有关:一是对技术含量更高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能力更加重视。拉姆斯菲尔德认为,高技术下的局部战争更加强调军队的精确打击力度和快速反应能力。因此,在战争中需要的是信息权、制空权和少量步兵的配合。二是在军队编制数量上更加强调低配置密度/高需求和资源与增强部队能力的力量(如运输机)之间的要求。

第三个方面是军事理念。美军进一步强调联合一体作战理念。美参联会《2002年联合构想》主要思想就是,提出影响今后20年军事发展的重要因素有二:一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军事行动带来的影响;二是适应信息技术革命的能力,即美国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军事上的优势的能力。具体言之,战争的胜利不再仅通过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来取得,而主要是要通过利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打击敌人的指挥、

控制、通讯与情报系统等关键设施来取得。

此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指挥控制系统使军事力量与中枢神经得到了有效的结合，使联军和兵种之间的行动得到了高度的协调。以通讯和协调为基础的联合一体作战思想在战场上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可以想见，美军以信息化部队对伊军机械化、半机械化武器为主战武器的部队打的这场“隔代战争”，结果是注定的。

从这场战争中，人们或已经看到未来人类社会信息化战争的某些趋势。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看，信息技术将处于战争形态发展的主导和核心地位，信息化国防、信息化军队将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主要特征和各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必然选择。伊拉克战争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了信息战争的地位和作用，各国必将更加注重以信息技术为先导，加强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努力实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

挑战之三：我威吓你，我挖墙脚，我诋毁你！

心理战，就是交战双方在心理层面进行的、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争夺心理态势和心理走向的主导权，通过形成一种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心理态势和心理走向，最终屈服敌人的意志的战争。它包括认识控制、情感控制、意志控制、个性心理控制等。心理战古已有之。中国古代军事家可谓心理战的鼻祖。“不战而屈人之兵”、“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孙子兵法》中对心理战有过精辟的论述。心理战作为特殊的作战样式，随着高技术的注入又有了新的发展，被称为“区别于现代陆战、空战、海战的第四种作战样式”，继陆、海、空、电子战之后的“第五维战争”。

过去我们很少看到心理战成为主导战争进程的例子。

但是,这次美伊战争中心理战却自始至终主导着战争的进程。伊拉克战争中,美伊双方采取心理宣传、心理欺诈、心理威慑等手段,展开了一场拉锯式的心理战对抗,并上升到战略层次。开战之初,美军从国内紧急抽调200多名心理学专家、心理医生和精神病专家协同1万多美军特种部队组成庞大的心理战大队,分赴伊拉克战场,展开各种心理攻势。美军实施“斩首”行动当天,就展开心理战宣传萨达姆已被炸死;其后的“震慑”行动,更是企图通过狂轰滥炸摧垮伊军的心理防线,进而促变、促降;美军还向伊境内投撒了大量传单和收音机,对伊军进行策反,其间又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对伊军官劝降等等。伊军则利用传媒和其他手段,揭露美英联军的种种谎言,鼓励军民斗志。美伊双方通过媒体散布的战场消息,更是真假难辨。其实严格意义上说,伊拉克战争的开始时间可以追溯到美国“9·11”事件之后,标志起点是2002年1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伊拉克是“邪恶轴心”国。此后,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活动,包括政治利诱、外交施压、经济制裁、军事威慑及宣传上对伊拉克的“妖魔化”,都是围绕使伊拉克意志屈服这个核心来进行的。

由此可见,在未来的高技术战场,心理战这一特殊的作战样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随机运用,而将成为有计划、有组织、有巨大智力投入和雄厚物质基础作支持的现代战争新样式。心理战不仅贯穿战争始终,而且还在向战前延伸,向战后扩展。

挑战之四:现代媒体已成为战争的重要构成部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新闻媒体一向被称为“独立王国”——不管事实上是不是独立,新闻记者也被称为“无冕之王”,社会赋予新闻媒体至高的地位。这一方面新闻媒体以其客观真实的信息精神向

世界及时报道最新的新闻动态；另一方面媒体也以其掌握的资源制造舆论氛围，发布某些倾向性信息。社会厚爱媒体，尊敬是一方面，畏惧也是个因素。新闻媒体记者属于非战斗人员，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应当遵守《日内瓦公约》中有关保护非战斗人员安全的内容，保证记者的人身安全和采访自由。一般来说，没有任何个人或者团体和新闻媒体叫板。但是，美伊战争中“倒萨联盟”却“勇敢地”向新闻媒体挑战。

这次战争，美英等国汲取1991年海湾战争中限制记者采访而招致世界舆论批判的教训，有选择地批准了600多名记者随军“采访”。日本媒体报道：这样做只是为了垄断新闻传播渠道，迫使记者只能按军方的口径进行报道。

然而对待伊拉克新闻媒体却直接采取了“哑巴战术”。4月8日，当美英联军在巴格达市中心展开军事行动之际，美军对伊拉克新闻部大楼进行了轰炸。伊拉克国家电视台的转播信号8日上午也突然中断。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被炸毁后，外界对伊拉克特别是巴格达真相的了解越来越少。

在对待第三方媒体方面，美军采取“精确误炸”战术。同日，美军在巴格达同时向新闻界开火，各国记者聚集的巴勒斯坦饭店遭到美军炮火“精确误炸”。遭到美军坦克炮击的巴勒斯坦饭店，实际上是“伊拉克战争新闻中心”，在巴格达采访的西方记者大多住在这里。

与此同时，及时向阿拉伯地区乃至全世界直播巴格达真实状况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阿联酋阿布扎比电视台遭到了美军“精确误炸”。

悲剧发生后，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当即谴责美军坦克袭击巴勒斯坦饭店的行为。该联合会秘书长艾丹·怀特说，把袭击的目标对准记者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该联合会要求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三、结束语

战争容易善后难。现代战争是高科技战争,炸弹的威力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大,更具有破坏性。掩体粉碎机可以把掩体摧毁,更不用说一般建筑了。物质上的破坏倒在其次,不合法的战争规则和先发制人的作战原则使受害国人民心灵的创伤更大。因此,战后重建将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以美国为首的“倒萨联盟”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经过40多天的战斗、很小的人员伤亡代价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是,要在这座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政权却并非易事。

对美国来说,要重建一个比萨达姆政权更优越的政权才能使战争更具有说服力,才能称得上战争最终胜利。但是它却面临各方面的挑战。

第一大挑战是:美国将如何赢得战败国伊拉克的民心?美国在巴以冲突中偏向以色列一方,使阿拉伯人对美国非常的失望;多年来美国对伊拉克不停的轰炸以及经济制裁,使这种仇恨更加深刻;这场非法的战争使亡亲之痛的伊拉克人民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倒台的萨达姆政权组成人员短期内也不会偃旗息鼓。如果美国得不到伊拉克人民的支持,美国将很难在伊拉克立足。

第二大挑战是:庞大的重建资金从何而来?战后的伊拉克遭受破坏的基础设施,有待重建;经过联合国十几年的经济制裁以后,伊拉克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所有的这些需要巨额资金,但资金从何而来?由于美国经济的低迷,战争开支巨大,本来是要捞好处,现在要掏它的腰包,岂不是与虎谋皮?

第三大挑战是:如何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一是和联合国的关系。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伊宣战,美国对联合国的权威已经形成挑战,但战后伊拉克重建也必须让联



联合国发挥一定的作用才能使美国减小国际和国内的压力；二是美国和“老欧洲”的关系。“老欧洲”就是法、德等积极反战的欧洲国家，美国将如何处理与老欧洲的关系，不但对伊拉克，甚至对世界都非常的重要；三是与伊拉克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何处理和伊朗的关系？如何处理和土耳其的关系？要知道，这些国家在战争中都曾开罪过美国。

第四大挑战是：如何建立伊拉克新秩序。依靠高科技摧毁一个政权越来越容易，但是建立一个政权却很难。重建政权的政体如何选择？谁来执掌政权？政权能不能得到国内人民的支持？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在新政权建立之前的过渡时期，如何管理？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

美伊战争的特点是超出传统战争的常规。传统战争中的道义、法律失去约束力，联合国的权威也受到挑战。在战争过程中，以前不突出的战术（心理战）现在提高到一个突出地位，以前中立的实体（新闻媒体）也被实实在在地卷入战争，战后重建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最重要的是，信息技术正在悄悄引起军事界发生质的变革……

显然，“美伊战争”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对。真正和美国站在一起的只有3~4个国家，而反对美对伊动武的有100多个国家。2003年以来，全球就出现了三次大规模反战示威浪潮。当对伊拉克战争打响后，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及其盟国在内，都普遍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

美伊战争也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微妙变化。由于利益和立场的不同，国际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欧洲、北约、美欧分裂，英美裂痕扩大，伊斯兰世界和美国的矛盾加深。单极世界与多极世界的纷争继续、恐怖与反恐的斗争更加激烈——这些矛盾虽然没有糟糕到让国际关系重新洗牌的地步，但是短期内难以平息。

有实力才有国防。“美伊战争”也说明,现代战争既是交战双方技术实力的较量,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奉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我们只有大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大力发展我国的科技和经济,才能更好地使军队发挥保家卫国的作用。

参考资料

《中国国防报》。

中国日报网站。

董亚超:《美国军事战略新特点》,《中国国防报》2003年7月8日第4版。

新华社。

任芳、廖雷《外交专家谈伊战争:践踏国际规则威胁世界和平》,新华网2003年3月30日。

新浪网。

中国新闻社。

《国际先驱导报》。

《参考消息》。

(作者:段洪涛,上海交通大学教师,硕士)

编 后

本书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负责全书大纲的总体设计,并有主编、副主编共同研究确定了编写的内容、框架和风格。参加本书撰写的有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部分教师,同时也邀请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东华大学等兄弟院校的研究同仁共同参与,鼎力合作。大家在繁忙的教育、行政工作之余,见缝插针,辛勤笔耕,几易其稿,终于完成。这本著作的面世,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是团结合作的结晶,是精心研究的成果。

全书由主编、副主编负责统稿,最后由张雄、王晖、陶国富定稿。宓文湛老师、汪传发博士在统稿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特约编辑陈盈盈女士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及编辑做了大量的编审工作;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对本书的撰写和出版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指导,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东华大学等兄弟院校的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和社科部的领导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撰写过程中,我们还参考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有关资料文献,吸取了国内外有关研究的新成果,引用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在此,谨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愿新世纪大学生喜欢这部作品,让它陪伴着大学生理性地观察世界,理性地对待传统和现实,理性地思考当前和未来。

DANGDAIDAXUESHENGGUANXINDE
25GELILUNWENTI

当代大学生关心的 25个理论问题

- 解答困惑
- 直面人生

组稿统筹：北京学而工作室

特约编辑：陈盈盈

责任编辑：李晓丽

封面设计：zhen3mei
正美设计 书籍装帧事业部

ISBN 7-5006-5763-3



9 787500 657637 >

ISBN 7-5006-5763-3/G · 1617

定价：19.80元

